

红色人流



HONGSE RENLIU

黑匣子丛书

罗平汉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黑匣子丛书

什么是历史的真相？何处寻历史的奥秘？历史风云散尽之后飘然落下的一叶，隐藏着玄妙的历史禅机，蕴含着无穷的历史韵味，散发出永恒的历史魅力……

红色人流

HONGSE RENLIU

罗平汉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庆祝开国大典的游行群众



邓小平在国庆 35 周年盛典上发表讲话



1984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庆祝 35 周年国庆的游行群众向邓小平致意。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国庆 50 周年盛典上发表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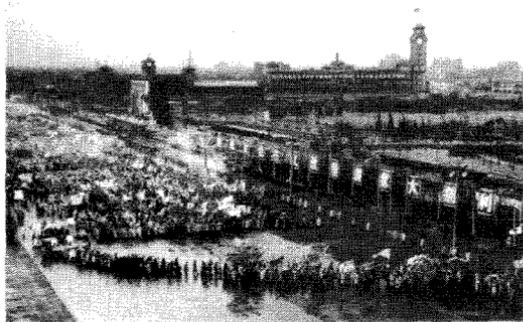


1999 年 10 月 1 日,群众游行队伍中的国旗、年号、国徽三个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1952 年国庆节,首都人民举行游行,庆祝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胜利完成。

1954 年五一劳动节,北京市民高举“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标语牌通过天安门。



1956 年,上海各界 50 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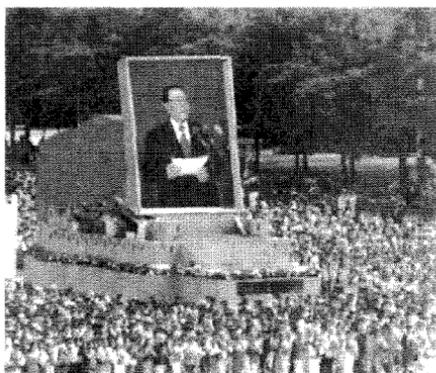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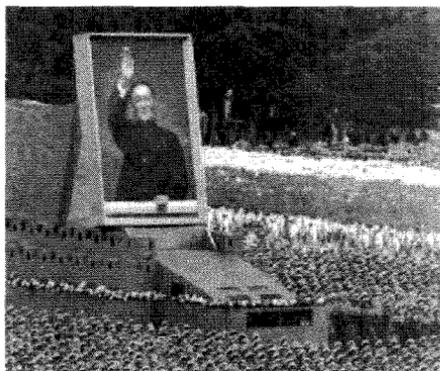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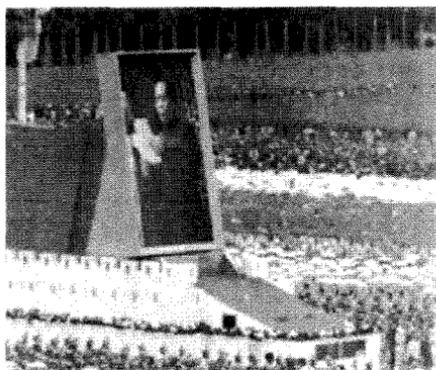


1955年，北京群众游行庆祝亚非会议取得的成就。

1957年国庆节时，举着“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巨幅标语的游行队伍。



1976年，江苏南京市群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幅照片彩车。

目 录

引 子	1
一、 开国大游行	4
1. 紧锣密鼓作筹备	4
2. 万众欢腾通过天安门	13
3. 节日狂欢在上海	21
4. 普天游行庆开国	28
二、 抗美援朝大游行	34
1. 中国下决心出兵朝鲜	34
2. 各界游行推动抗美援朝	38
3. 游行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48
4. 两亿人参加的大游行	53
三、 资本家大游行	61
1. 资本家心甘情愿接受改造	61
2. 工商界敲锣打鼓去报喜	68
3. 集会游行庆祝进入社会主义	75
四、“交心”与游行	84
1. “交心”运动之由来	84
2. “交心”游行在京城	90

3. “交心”游行在上海	93
五、1958年夏秋的两游行	100
1. 声援中东人民大游行	100
2. 反对美国干涉炮击金门	108
六、“五一”、国庆游行十六年	117
1. 建国头几年的“五一”、国庆游行	117
2. 抹上“大跃进”色彩的“五一”、国庆游行	126
3. 国庆十周年大游行	133
4. 60年代前期的几次国庆游行	142
七、支持各国人民正义事业大游行	150
1. 支持日本人民安保斗争	150
2. 抗议美国飞机入侵苏联	158
3. 支援古巴、巴拿马、刚果(利)人民	162
4. 誓作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后盾	173
八、特殊的报喜游行	180
1. 一个“纲领性文件”	180
2. 游行“欢呼”《十六条》	185
3. 中南海前的报喜队	192

九、千万红卫兵大游行	200
1. 毛泽东首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的游行	200
2. 各地游行庆祝“八一八”大会	209
3. 1100 万红卫兵接受检阅	214
十、失控的游行	223
1. 红场流血事件引发的大游行	223
2. 不该发生的游行	236
3. 从游行到火烧英国代办处	242
十一、各式各样的游行	257
1. 无事不游行	257
2. 芒果与游行	273
3. “文化大革命”中的几次国庆游行	284
十二、几次声援与抗议游行	292
1. 声援美、法人民斗争	292
2. 抗议苏联入侵珍宝岛	298
3. 四亿人游行拥护“五二〇”声明	302
十三、游行庆祝十月的胜利	307
1. 十月前的一次应付差事的游行	307

2. 群众游行打破“四人帮”余党梦幻	314
3. 亿万人民游行欢庆胜利	320
十四、 国庆三十五周年大游行	326
1. 威武雄壮的阅兵式	326
2. 游行狂欢曲	332
3. 衷情道一声“小平您好”	338
十五、 国庆五十周年大游行	345
1. 皇皇大典	345
2. 大阅兵显国威	349
3. 世纪大游行	356
4. 为了那辉煌的一刻	363
主要参考资料	371

引子

游行这两个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了。然而，如果翻阅一下二十年前的报刊，游行的字样却不时映入眼帘。

何谓游行，辞书曰：广大群众为了庆祝、纪念、示威等在街上结队而行。

原来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由此观之，游行首先是一种群众性活动，而且参加者必须有一定数量，尽管“广大”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但三五个人结伴在街上行走，绝对称不上游行。

即便有大队人马在街上通过，也不见得便是游行。群众性长跑，万人马拉松，没有人称之为游行。游行有它明确的目的，或庆祝，或示威。

就游行的动机来说，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高兴之事而庆祝或有值得纪念的事情，如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时的游行，国庆或五一节的游行；另一类是有愤怒或不满的事情，要以游行来表示抗议，以表明态度，显示力量。由此可见，游行既可作为喜庆的方式，也可作为示威、抗议的方式。

自开国大典游行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可以说是游行不断，每年的国庆游行自不必说，就是每逢有什么大的活动或

运动，也往往以游行的方式去动员群众。而且，为了声援别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也组织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

从一定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游行，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抗美援朝大游行，反映出中国人民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广度和深度；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资本家敲锣打鼓游行庆祝，体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是大势所趋；1958年春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交心”大游行，只不过是当年进行的红专辩论的一个缩影。即便是几乎年年都要进行的国庆游行，其标语口号的变化，游行队伍的排列，不同实物模型的出现，都是国内政局变化发展的及时体现和反映。游行过程并不复杂，无非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人朝着一个方向行走前进，同时或高呼口号，或散发传单，但每一次游行的背后，总与重大的政治事件相关联。建国以来的各式各样的游行，如同一面多棱镜，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历史发展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曲曲折折。

在“文化大革命”中，游行被滥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泽东接见一次红卫兵，各地就要组织一次庆祝游行；毛泽东视察一次外地回到北京，也要进行游行庆祝；老人家发表一条最新指示，给工宣队赠送几个芒果，如此等等，都要用游行来“欢呼”。更不要说像公布《十六条》、发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等重大历史事件了。

“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事情动不动就游行，也就游出一系列麻烦来。在“革命”最激烈的1967年，就发生了好几起围着外国驻华使馆的大游行，虽然事情的起因很复杂，但用游行的办法并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可在那几次大游行中，规模之宏大，口号之尖厉（不但呼喊要打倒别国领导人的口号，而且还使用了“绞死”、“油炸”这样的字眼），情绪之激昂，完

全与中国的泱泱大国风度不符。这样的游行，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激化矛盾，影响对外关系的发展。1967年8月由游行示威而发展到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便是游行失控的一个例证。

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游行活动比较多的无疑是50年代和60年代，尤以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这几年最多，个中原因自然不用多说。进入70年代后，游行的次数大为减少，主要的游行有1970年拥护毛泽东“七二〇声明”的游行和1976年的两次大游行。1976年之后，游行活动虽然偶尔还有，但其规模、次数、所产生的影响，都不能与以前的游行相比。因此，除了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大游行，对此后的一些游行，本书将不过多涉及，想必读者是能够理解的。

回看历史，也许给人们既有欣慰，也有沉重，还有感叹。但不管有什么样的情感，反正今天是昨天的延续。重要的是更理智地走好今天的路，准确地把握未来。

一、开国大游行

1. 紧锣密鼓作筹备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也就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不过，当时人民解放军还刚刚转入战略反攻，彻底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尚需时日。因此，在同年年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现在还不是考虑成立中央政府的时候，这个问题要在蒋介石更困难，我们更胜利时再去考虑。

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份党内通知时，还认为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这里的五年左右的时间，是从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时算起的。这就是说，到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在估计，要到1951年，解放战争才能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然而，1948年9月开始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国民党军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到1949年初，大局已定，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垮台，已是指日可待了。因此，1949年1

月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作出决定：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虽说这里使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词，与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多了“民主”二字，但是这个决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着手进行开国、建立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准备了。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和通过了各项大政方针，为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做好直接的准备工作。同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开始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从此时起，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不过，开国大典具体定在什么时间，当时并没有明确确定在1949年10月1日。关于这一点，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就建立国家机构、如何管理经济等问题同斯大林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为开国做准备。

刘少奇在莫斯科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在他离开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再次接见了。在交谈中，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打算何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因为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瘫痪，不复存在了，而你们现已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

刘少奇回答说：我们目前正在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950年）1月。刘少奇还说，可能是1月1日。

于是，斯大林提醒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防止

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①

对这一情况，中共代表团立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决定于这年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开国大典。

为了迎接开国这一盛典，庆祝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拟订的开国大典方案包括三大项目：

-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 (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
- (三) 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这三项内容都非常重要，但其中的阅兵式在什么地方进行，则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的场所和程序。

为了组织好这次阅兵，专门建立了阅兵指挥部，由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司令杨成武、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等任副总指挥。指挥部下设指挥所，由杨成武、唐延杰分别兼任指挥所正、副主任。

对于阅兵式的地点，当时准备了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在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进行，另一套方案是在西苑机场阅兵。两套方案各有利弊，最后，周恩来提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这样，整个开国大典的活动都在

^①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419页。

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进行。

参加阅兵式的部队总人数为 1.64 万人，来自第二十兵团、平津卫戍部队及海军和空军。其序列为：一、海军代表部队，由海军学校和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二、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各一个组成，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兵团、坦克团各一个；三、空军，由刚组建不久的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的 17 架飞机进行飞行表演。

这年 7 月底，受检阅的部队分别集结于北京市郊进行训练。接着，各军兵种在分练的基础上，都就场进行了合练。然后，阅兵指挥所在天安门前组织了两次地面部队合练。为了不影晌市区的交通，每次合练都在夜间进行，到第二天拂晓结束。

在参加阅兵的部队进行紧张的训练之时，按照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的要求，北京市组织了 30 万人，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游行。进入 9 月后，参加游行的群众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熟悉集会的位置和进行游行的演练。集会和游行由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华北军区派出了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唐永健参与协助。

如果您有机会漫步于天安门广场，您是否注意到脚下的方砖上都编有号码？这些方砖上的号码，还有一段来历。

当年，参加游行的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是啊！能参加这一千载难逢的庆典，能亲眼目睹自己的领袖，谁不为之激动和兴奋呢？为了这一天，人们不知盼了多少年。

但是，要把这几十万群众的游行组织起来，在开国大典的那天有秩序地通过天安门城楼前的广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次演练时，几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由于不能影响参加游行群众的生产和工作，也不至于断绝天安门前的交通，演练在晚上进行。夜晚光线很弱，虽说广场上已安装了三排24盏普通灯，广场边的围墙的几个门洞上也装了吊灯和弯灯，甚至还配备了探照灯，但几十万人的队伍黑压压的一片，队形很快就乱了套，群众乱挤在一起，根本弄不清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担任阅兵总指挥的聂荣臻见到这一情景，认为这样乱哄哄的不是个办法，他对负责群众游行组织指挥的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肖松说：“这样太乱了，不行，还要另想办法才行。”

面对这样的局面肖松很是着急。本来在演练前是设计了队形图的，可到演练时才发现纸上谈兵根本不行，拿来一用就乱。

正咱肖松为此急得团团转之时，有人向他建议说：用石灰浆规划场地，编上号码，确定哪支队伍站在哪一号砖上，就像戏院的座号一样，按号入座。

这一招果然奏效。于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都有了号码。

为了组织好这次游行，设立了游行总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城楼前面的东侧，并在广场上设了三个学生分指挥站、三个工人分指挥站和一个市民分指挥站，每个分指挥站都有电话通往总指挥部，以便及时联系。

游行总指挥部对游行作了一系列具体详细的规定：

参加游行的各单位须推选出领队一人，副领队若干人。领队和副领队的左臂上佩戴红色袖章。

每个领队在游行前要填写好一张表格，写上单位名称、参加大会的人数及领队的姓名，在进入会场时，交给入口处的指

一、开国大游行

挥部。

游行指挥部为了使游行万无一失，制定了一份详尽的《入场须知》，规定了十五条内容，诸如：不带锣鼓，不化装，不组织秧歌队；队伍入场后，要听指挥，由纠察或联络员领队入场，到达指定地点后，应立即整理队伍，严守秩序，不得任意离队；自行车不得入场；各单位自备干粮和饮水；除规定携带武器者外，其他人一律不得携带武器；注意卫生，不得在广场随地大小便等等。可谓事无巨细都考虑到了。

尽管《入场须知》考虑得很周到，但北京市市长彭真还是发现了问题。

开国大典前夕，大典筹委会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厅里召开了一次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参加庆典的各单位人数、分成几路队形等问题。当然也对那份《入场须知》作了研究。

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彭真突然提出：如果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后，在西三座门那里散了摊子，怎么处理？的确，如果群众过了天安门后便拖拖沓沓，或者存在留恋心理舍不得离开广场，这势必把路堵住，使后面的人走不动，大家都挤在天安门城楼前，那样的话，岂不乱了套？

与会者听彭真一说，顿感这是个大问题，可大家事先并没有估计到，一时愣住了。彭真见此，便打了个手势，对大家说：可以在东西两侧的三座门分别派人把守。特别是西三座门，要派责任心强的人去。等队伍一出三座门，就督促群众跑步疏散。彭真讲完后，随即让唐延杰负责这一问题。

开国大典的那天，果然出现了彭真预料的那种情况，好在事先做了准备，游行队伍顺利地通过了天安门。

开国大典是在10月1日下午3点整正式开始的，而参加

游行的群众在此前早已进入了广场。

在工人队伍中，有一支队伍来自长辛店铁路工厂。

长辛店铁路工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3年，他们就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48年12月，长辛店解放，长期坚持斗争的长辛店工人终于迎来了光明。

9月中旬，工厂领导向工人传达了10月1日组织工人进城参加开国大典的消息。喜讯一传开，整个工厂都沸腾了。

9月30日晚上12点，长辛店铁路工人组织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准备出发参加开国大典。工人们都穿上了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穿的衣服，年轻工人还人人戴上了一顶自己花钱特地缝制的蓝色八角帽，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红红绿绿的小彩旗。

次日凌晨2点，急不可耐的工人们分乘两列货车向北京进发。虽说大家坐在运货的槽车上，但每个人内心都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压过了火车的轰鸣声。

天蒙蒙亮时，火车缓缓驶进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下车后，工人们高举着标语，挥舞着彩旗，排成八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广场进发。^①

在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农民队伍中，有一支队伍来自北京的南苑区。

南苑也是在1948年12月解放的。解放后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农具和房屋，从心眼里拥护共产党。

1949年9月下旬，南苑区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组织农民参加开国大典的问题。市里分给南苑的名额是1000余

^① 参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庄严的庆典——国庆首都群众游行纪事》，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人，这些名额，很快就分到了各村和各单位，其中区里把80%的名额分给了翻身农民。

名额确定以后，区里又把抽调的干部分配下去，每个村一至二人，负责传达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注意事项和要求，审定参加的人员，确定游行时的领队。

名额分配到各村后，广大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游行队伍，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面。

南苑区最东南边有个小村庄，叫石太庄村，这里早在抗战时期就是大兴县抗日民主政府五联区主要的活动地点，很早就建立了党组织。

9月30日下午，石太庄村研究谁去参加开国大典的游行时，年逾花甲的老党支部书记焦玉海第一个报名参加。大家见他年岁太大，怕他吃不消，便劝他不要参加，把名额让给别人。

焦玉海怎么也不同意，他对大家说：“正是因为年岁大了，趁着身体还可以时，参加开国大典去看看毛主席，看看中央和国家的那些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再也用不着担心日本鬼子的讨伐，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今后要跟着党建设新家园，我怎么能不去呢？”

南苑区的小红门村在研究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人员时，村长王盛斌提议说：“在摧毁伪保甲，建立村政权，动员伪军、警、宪人员登记，收缴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等工作中，村里的小青年出力不小，这回让他们多去些人。”

小青年们得知后，个个喜出望外。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年轻人，找来了锣鼓，在村子的广场上敲打起来，一边敲，一边唱，引来了众多的群众围观，天很晚了还不肯离去。村干部劝他们早些回去休息，怎么也说不动他们。

到了深夜 12 点多钟，小红门派出所的所长和村干部在研究完工作后，出来劝他们说：“你们应该赶快回去休息，明天好有精神参加游行，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再说你们也不能这样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呀！要换上干净衣服，还要让家里的人做点干粮带上，好在路上吃。”这样，小青年们才同意回家休息。

在村干部会上，本来确定第二天早上 6 点钟集合，7 点钟从小红门村出发，以区里下派到村里组织游行的干部的手表为准。

然而，不知哪一位性急的人，趁区里来的干部不注意时，悄悄将手表的时针往前拨了两个多钟头，小青年们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脱衣躺下睡一会儿，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同志集合了，赶快到村政府集合！”

这时，天色未明，可那手表的时针却正好指向 6 点，一点也没错。不一会工夫，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人员，全部到齐了，而且人人都穿上了干净、整齐的新衣服。

当小红门村的游行队伍到达指定地点时，还没有别的单位来。可是，很快就传来了歌声、哨声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原来别的村的队伍也来了，看来大家的心情都很急迫。

根据总指挥部的要求，南苑参加开国大典游行队伍的安排是：10 月 1 日上午 9 时，在永定门外的侯庄集合，10 点钟到达指定的地点天坛西门，并规定南苑镇以北各村的队伍，步行到侯庄，而南苑镇以南各村的队伍，则因为路程远，要求在 8 点钟前到达南苑火车站，坐火车到永定门，再到侯庄集合。

还不到 9 点钟，南苑各村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队伍，已陆续到齐了。不到 10 点，便到了天坛。此时，天坛已集中了许

多的游行队伍。

从天坛到南苑区游行队伍被指定的位置东三座门西、长安街路南，其实路程并不远，但足足走了三个小时。因为路上遇到了许多游行队伍，走走停停，将近下午1点钟才到达指定地点。^①

除了工人、农民的游行队伍外，还有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

当时，北京的十二所大学几乎都派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参加的人数达几千人。

10月1日，天刚蒙蒙亮，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学生便早早地起了床，等待集合的号令。

上午7点一过，各校学生会的负责人便把队伍组织好，拉出校门，向天安门方向进发。到天安门广场后，各高校的学生集合在西树林里等待游行。当时，天安门广场远远没有现在开阔，在如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间，是一片小树林。

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等各路游行大军，都到达了总指挥部指定的地点。千万颗激动的心，都在急切地等着那庄严、神圣的一刻的到来。

2. 万众欢腾通过天安门

这划时代的辉煌一刻终于来了。

10月1日下午3点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时，担任大典实况播音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丁一岚，以她那悦耳动听的声音开始广播：“毛主席来啦！毛主席

^① 参见《庄严的庆典——国庆首都群众游行纪事》，第73—74页。

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于是乎，汇集了30万军民的天安门广场顿时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响彻长空。

从天安门城楼远远望去，广场上无数的人们绽开了笑脸，无数的红旗随风翻卷。喜庆的人群，鲜艳的旗帜、彩绸、鲜花，汇集成锦绣的海洋，30万人翘首仰望天安门城楼，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是啊，此时此刻，谁不激动，谁不兴奋。而激动、兴奋的人们，又何止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全北京、全中国的人都在为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而欢欣鼓舞。

为了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如果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民为此苦苦奋斗了一百余年。

这时，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用麦克风对欢腾的人群说：“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今天是首都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

刹那间，广场上喧腾的人声寂静下来了。

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正式开始。

毛泽东走近麦克风，用带有湖南乡音的洪亮声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军乐队立即奏响了激昂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毛泽东亲手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随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人民受屈辱、受欺凌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开国大游行

在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54门礼炮齐鸣28响，这炮声如报春惊雷，久久回荡在天地间，回荡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升旗之后，由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況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政府公告还向世界各国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极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

公告宣读完毕后，林伯渠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司令员朱德身着呢料军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在桥南迎候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立即行了一个军礼，并报告：“受检阅的海陆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与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的演奏声中，朱德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了肃立受阅的三军部队。

然后，朱德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今天和全体人民在一起，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①

朱德在命令中，要求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检阅式完毕之后是分列式。副总指挥杨成武在指挥所里向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2页。

东三座门外的指挥分所发出了相应的命令。

首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代表海军的水兵队。他们身着崭新的白色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先导，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

接下来是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的战士们组成四个方阵，携带着各种缴获的武器，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伴奏，气势雄壮地走了过来。在《军队进行曲》、《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轰隆隆地开过来了，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和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些装备，都是人民解放军在“大反攻”中获得的。为了参加开国阅兵，所有的摩托车、战车、炮车都是重新油漆了的，并装饰上红星与“八一”字样。

当战车师通过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上空。天安门前，天空地上，浑然一体，汇成了壮观雄伟的立体武装阵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广场上的群众，都不约而同地仰望着年轻的人民空军的雄姿。

在最初的阅兵式的设想中，只是安排飞机散发传单，没有安排飞机进行飞行表演的内容。直到8月底，中共中央才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进行飞机表演。

在此之前，中央军委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证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防止国民党飞机来捣乱，陆续组织了一批飞机飞赴南苑机场。从7月初到8月中旬，共有17架飞机陆续进驻南苑，而这些飞机和飞行员，大多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

为了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这17架飞机全都出动了，而其中的9架P-51战斗机飞了两次，所以当时人们看到的是

26 架飞机。

飞机的身影尚未消失，在激昂的《骑兵进行曲》中引出壮观的骑兵队伍。三个骑兵团，外加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1900多匹战马，以六路纵队前进。各梯队装备整齐划一，这些军马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装，持枪持刀，激起了多次热烈的掌声。^①

两个多小时的阅兵式后，群众游行开始。

当广场上的游行队伍分队出发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当时，《大公报》记者杨刚是这样描述这一欢庆场景的：

星星点点，灯笼火把接二连三地燃起来，很快，整个广场在夜色中透明了，并且闪耀着红的星星，黄的星星，紫红的，大红的，金黄的，橙黄的，愈向夜，广场愈益像大地自身活了一样，遍地灯笼火把颤颤跳荡，像人民无边无际的欢乐和希望化身在我们面前跳跃。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向外出动。蓝色的拿着紫色灯笼的队伍，黄色的拿着大红灯笼的队伍，灰色的拿着金红色火把的队伍，浅色的拿着深桃红灯笼的队伍，蜿蜒蜒蜒，交互环绕，像一幅巨大的活动的织锦，各按各的方向走出会场，丝毫不发生混淆或者紊乱的状态。队伍行动时唱着歌，但更多的是喊口号，而且时常是连续不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这使得广场上不但是以颜色和光辉活跃着，同时它还在连续不断地发出巨吼！地面上这时又从许多角落放起了无数五

^① 参见郭德宏主编：《风云七十年》（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页。

彩照明灯球，像整个开了灿灿的光明的花朵。^①

游行开始后，毛泽东一直站在城楼边上望着下面的群众，他的脸时而庄重，时而微笑，他的手几乎一直是高举着，向群众迅速而有力地摆动。当工人群众的队伍走过来时，毛泽东面对工人们的热烈欢呼，通过扩音器高呼：“工人同志们万岁！”当农民群众的队伍过来时，他又高呼：“农民同志们万岁！”每当广场上游行的群众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时，更是热烈地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

由于天色已暗，加之天安门城楼上的灯光并不是很强，广场上川流不息的群众起初并没有看到毛泽东在城楼上招呼他们。当毛泽东那“同志们万岁！”的声音不断地从扩音器传出时，游行的群众发现自己的领袖还在他们中间，并且高呼着最亲切的言语，他们立即要求打破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而要一直朝北过白玉桥向天安门城楼走来，然后再由白玉桥上转出去。

群众的要求被批准了。于是一条条红色火龙似的队伍，向天安门城楼方向挤来，游行的群众挤在桥上，拼命地从肺腑里发出呼喊：“毛主席万岁！”虽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齐越、丁一岚不断地劝说、指挥游行群众按规定通过天安门，但无济于事，人群完全是由后面的人推动前面的人流动的。

游行的群众在天安门前欢呼雀跃，毛泽东不断地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一只手累了，便换另一只手。他的动作同广场上的呼喊声是那么地一致，此时此刻，领袖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已完全交融在一起。

^① 《大公报》，1949年10月6日。

在其他领导人的劝说下，毛泽东来到城楼上的大厅里准备休息一下。刚喝两口水，他又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把程潜找来谈话。程潜在湖南和平解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毛泽东与程潜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周恩来进来为难地对他说：“主席，游行群众不走，要见您啊！”

可是，毛泽东却高兴地说：“好吧，到群众中去，疲劳也得去啊。”

毛泽东熄灭了手中的香烟，向程潜抱歉地笑了笑，回到了主席台。游行的群众看到了毛泽东，又是一阵欢呼，队伍这才慢慢地向前移动。

过了个把钟头，毛泽东又到大厅休息了一次。可是，又有人告急说：“主席快回去，广场上的群众乱了。”

原来，毛泽东刚离开一会主席台，后面涌来的群众没有见到他，生怕失去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便不顾一切地涌向天安门城楼，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毛主席！”没有见到毛泽东他们就不愿离去。

毛泽东来到了主席台，游行群众的愿望满足了，尽管前面的人还想多看几眼，不愿离去，但后面的人心情更为急切，推着前面的队伍往前移动。

这时候，原来已经出了广场的许多人，看到这种情形，又回来了。队伍已经散了的，又重新集合走向广场；队伍没散的，就自己在广场上重新摆起方阵。大会指挥在播音器上再三劝他们回去休息，游行的队伍才逐渐地散去。

游行队伍直到晚上9点一刻钟才全部离开会场。

天安门广场上的游行结束了，然而，整个北京城却进入了

一个狂欢之夜。

从早上8点开始，各路游行队伍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到晚上天安门前的游行结束，已经过去了十几个钟头，城外来的游行队伍游行的时间则更长。这么长的时间里，游行群众除吃了一点自带的干粮，没有休息片刻。但是，他们为开国大典所鼓舞着，当队伍走出三座门的时候，沿街游行又开始了。

从西长安街到东长安街，从王府井到王府大街，从西单到西四……游行的队伍被夹道欢呼的人群所堵塞。游行的队伍走到哪里，哪里的掌声、口号声就连成一片。

连续几天，北京都沉浸在开国的狂欢之中。

3. 节日狂欢在上海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里，不只是北京，全国所有已解放的地区，都同样处在节日的狂欢之中。

上海，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自从10月1日开始，连续几天举行了庆祝开国的喜庆大游行。

从10月2日起，上海先是各界分头举行游行，虽说这几天老是大雨连绵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减退上海人民庆祝开国的热情。

10月4日，上海戏剧界举行大集会、大游行。

这天下午，戏剧界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蟾舞台，参加集会的戏剧界人士达2500人。首先进行了半个小时的集会，由冯定、黄源、董天民、吕君樵作简单的讲话，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接着开始三个表演节目，一个是华东平剧团的“打乐子”，一个是平剧界的武艺“保卫和平大翻身”和扇子舞，再一个是绍兴大班的“活捉无常”。

表演结束后，戏剧界人士从天蟾舞台出发，经过大世界、

八仙桥、霞飞路、嵩山路、爱多亚路、同孚路至威海路。

游行队伍以几辆打着红旗的脚踏车为先导。在游行的大队里，高举火炬、红旗，一眼望去，整个队伍一片红色。参加游行的评弹艺人，每个人的衣襟上都挂上一个装置干电池的小红星灯，在夹道欢迎的群众欢呼时，那一盏盏小红灯也光亮起来。

伶界联合会的四面大红镶黄边的镖旗上，一面写着“庆祝人民政协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面写着“庆祝本界梅兰芳、周信芳当选为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这是告诉人们，解放了的戏人，再也不是被人瞧不起的“戏子”了。

平剧界参加游行的500余人，男的一律是红包头、黑裤衣的武生打扮；女的穿着各种颜色的裤褂。一位武生打扮的演员对进行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我们高兴极了！不用说别的，这回我们的‘平剧’又是‘京剧’了。”

平剧界队伍中，走在前面的四个人一人背一把扫帚，在他们的脖领里还插着“扫除封建”的小红旗。背扫帚是为了打扫干净马路，以便后来的人一路游行一路表演。

而越剧界的前导则是五员骑马大将，他们分别是越剧名演员竺水招、赵雅麟、戚雅仙、吕云甫和吴筱楼。

沪剧的歌唱团，一路游行一路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淮剧演员则赤膊表演“飞火叉”，把两边燃火的钢叉，在背上、手臂上滚来滚去。

当游行队伍来到沪光大剧院面前时，一辆法商公共汽车公司的司机，卷入了两旁观看游行的群众的巨流，跟着游行队伍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后，才想起自己的车子还停留在原地，连忙赶回去开走他的车子。^①

^① 《文汇报》，1949年10月5日。

一、开国大游行

10月6日下午，全上海的3万人力三轮车工人举行庆祝开国大典大游行。

三轮车工人的游行本来是定在10月2日进行的，但老天不帮忙，2日这天下大雨，只好改在4日，但4日又是大风大雨，只得再次改在6日举行。

5日晚上，三轮车工人看到雨过天晴，乌云里渗出明月，大家要游行的心情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了，纷纷向工筹会（工会筹备委员会）提出要游行。工筹会的负责人经过商讨之后，同意了工人们的要求，第二天一清早就通知各区、站，午后在跑马厅集合后举行游行。

只过了一个小时，全上海的三轮车工人都得知了这一消息。工人们纷纷糊灯挂彩，张贴画像，有的人把庙堂里的“大慈大悲”、“圆通教主”的道牌也拖了出来，用来张贴毛泽东、朱德以及斯大林的画像。

四面八方的队伍朝跑马厅方向汇集拢来，就连离市区一二十里远的江湾、龙华等地的工友们也赶来了。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平时在家操劳家务不出门的三轮车工人的妻子以及他们顽皮的小娃娃，也坐上了自家的三轮车，赶来参加游行。不到下午5点，从各方汇集而来的4000余辆三轮车，把跑马厅的站台全占满了。晚上正在做生意的三轮车工人，看到大队要游行，也急忙请客人下车，连车费也不要了，立即加入游行的队伍。

由于人数多，时间紧，下午6点，北区的队伍只好先从黄陂路口出来了，沿南京路东去，转外滩、爱多亚路。一路上，锣鼓齐鸣，秧歌演唱起劲，引来了沿途无数的市民前来观看。游行的队伍长得惊人，当队伍中的第一批人走到了东新桥时，

最后压轴的三轮车尚在大新公司门口呼口号。

在游行队伍中，化了装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扮演者身上，贴满了褪了色的金圆券，在秋风的吹拂下窸窣作响。^①

戏剧界、三轮车工人的游行，只不过是这几天上海各界各种各样游行活动的一个缩影。

10月8日，上海统一组织了有100万人参加的保卫世界和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游行。

8日下午1时整，上海人民保卫和平庆祝人民政协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在跑马厅举行。27响礼炮过后，奏响了国歌、国际歌，然后开始检阅式，各区参加游行的队伍分别由不同的门进出，全部队伍分三路经过检阅台。

对于这一盛况，当时的《文汇报》报道说：

据各单位的报到统计，进入跑马厅的队伍共计一百万人，等于一个欧洲的小国的人口；每一条街上，每一个门窗全是人，六百万人都在出动了呀，我们要和平，要庆贺政协和人民政府的建立。首先，阵容齐整的解放军进来了，每一支枪上一面红旗，成了红旗的海洋，多么伟大呀，人民的队伍，主席台上饶政委（指饶漱石，时任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领导喊口号，全场应和。“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台上台下相互招手，兴奋与喜悦在交流；每一个队伍的节目都在主席台前表演：秧歌、大腰鼓、龙灯、旱船、狮舞、和平女神，各式各样的表演。邮工来了，一片绿色的海；工人来了，精神好，节目多；学生来了，轻快的歌声，轻快的秧歌舞；

^① 《文汇报》，1949年10月7日。

一、开国大游行

农民来了，朴素而淳厚，镰刀、扁担，各样象征着丰收的灯。……四点钟，有雨点落下来，队伍在浩浩荡荡地行进，三千只和平气球飞起来了，飞呀，把和平带给全世界！人们欢呼着，自然景色也来点缀会场，雨没有了，天空上出现了两道彩虹，彩色万千，夕阳斜照在主席台的和平鸽上。五点半，火炬亮了，电灯亮了，跑马厅像一片光的海，每隔一小时，红红绿绿的曳光弹划空而过，场里场外一片欢呼，其中以十时多的烟火最为精彩。队伍太长了，这时候，东区的队伍刚走一半，队伍的头已回到了东区，但后尾还未动身呢，沪中区和沪西区也是如此。午夜了，欢腾还在高潮，看来又狂欢到天明了。^①

这百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有人作了估算，假定四人为一排，前后两人间的距离为1公尺，则全长约达250公里，相当于上海到镇江的距离。若一个人一个人地接起来，则可由上海一直排到济南。

在当天的游行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画面，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场景。

码头工会在游行的行列中，扛着一只又大又臭的死脚鱼（即乌龟），重达六十四斤半，后面还跟着两个愁眉苦脸的洋人，“原来是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哭他们的干儿子蒋介石”，两旁的人看了，不禁叫好。^②

新泾区的农民扶老携幼，早上5点钟就参加了游行，一直步行到跑马厅，走到主席台前，看到毛泽东画像，都不约而同

^① 《文汇报》，1949年10月9日。

^② 《文汇报》，1949年10月9日。

地欢呼起来，连疲劳都忘掉了。

澄安中学的老校长王震，在会场上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领着青年学生呼喊口号，虽然花白的胡须胸前飘拂，可谁也看不出他已是61岁的老人了。他兴奋地说：“光绪二十七年那一年的铁路事件，中国第一次的群众运动我参加了，想不到四十七年以后的今日，我又参加了我们中国民族真正的抬头的庆祝行列，这种愉快是说不出的。”

中西女校的秧歌队，女孩子们美得像一群蝴蝶，在静安寺的路上，群众的欢呼没有停过，女校的学生也没有停止过扭秧歌。

中纺二厂48岁的女工周小美，摆动她的一双“解放脚”（指缠足后又放了的小脚）也参加了游行。48岁在现在还算是中年，在那时已划归到老年人的行列了。周小美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可她一直高举着一盏大花灯，始终没有落在毛头小伙子的后面。有人问她：“您老不感到辛苦吗？”“嘛！”她昂起头来说，“他们说大家可以参加游行，但小脚和大肚子除外，那我才不服气！国家我也有份，干吗不让我也来庆祝一下？”说着说着，就一扭一扭地过去了，连头也不回。

在100万人的游行队伍中，有一支由3000名老板、经理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是著名工商业家卢绪章。在这支队伍中，钱银业经理组成的小队最齐整，上海23位知名的银行大经理都参加了。工商界曾规定50岁以上的老先生不必参加，可参加游行的50岁以上者竟有十几位，60岁以上的还有三位。书业公会的沈鹤泉老先生，已是70岁了，仍精神矍铄地行走在队伍中，不肯离开。

工厂集中的沪西区出动了15万人，且90%以上为职工，其余为贫民、三轮车工人、学生以及教师。职工中又有半数为

各种公私棉纺企业的工人。游行队伍以八个人为一横排，全长达25公里。当排头已进入跑马厅时，排尾却刚刚开始出发。沪西区的游行大队下午5点半就开始，由威海路开向跑马厅，以五十面大国旗以及毛泽东、朱德、孙中山和斯大林的画像为先导。参加游行的群众热情之高，用当时报道的话说，到了“非秃笔所能形容”的地步。许多人在上午10点钟就出发了，直到次日凌晨3点才回到家。中间只吃了点冷面包，喝了几口白开水。大多数单位除了“大肚子和小脚”在值班外，其余全都出动了。

学界和文艺界的游行自然有其特色。华东革命大学有一个化妆游行，叫做“反动派的末路”。“蒋介石”坐在棺材里，由“宋、孔、陈、陈诚”四个人抬着。东南医学院的游行队伍中则抬着一副担架，上面睡着“蒋介石”的全身骷髅骨，上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蒋介石”的手里握着手枪，后面跟着的是“宋美龄、陈立夫、陈诚”的骷髅。^①

文协的游行队伍中扛着世界著名作家高尔基、鲁迅、巴比塞和德莱塞的画像；音协的队伍则是一路游行，一路唱歌，并组织了一个口琴队；戏剧界则在游行中表演了一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出丧”。“丧礼”的前面是“白皮书”、“杜鲁门主义”以及十字架，后面则是由演员化装成贝文、麦克阿瑟、艾德礼、吉田、李承晚等16人，跟着游行队伍行走。

在沪中区的游行队伍中，浴室业的人牵了两头牛参加了游行。“大世界”的一只大猴子也参加了，旁边还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美帝扶蒋的活现形”。同在沪中区，扮演蒋介石的人不下100人，差不多都把“蒋介石”剃了光头。新药业

^① 《文汇报》，1949年10月9日。

行队伍中，则把“蒋介石”关在一只铁笼子里。

在10月8日的这次大游行中，和尚也有100多人参加了游行。他们高举着红旗，唱着解放区的歌曲，还有一个乐队，吹奏着管弦丝竹，给游行增添了不少热闹。

自从10月2日以来，上海的游行就一直没有间断，10月8日则达到了最高潮。上海600万人民，用游行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方式，庆祝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4. 普天游行庆开国

在开国大典后的头几天，沉浸在节日狂欢之中的，又岂止是北京、上海？凡是已经解放了的城市，都是满城的喜庆，满城的欢欣。人民以发自内心的呼喊，庆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庆幸自己进入了一个当家作主的时代。

10月2日晚，30万天津人民举行了热情奔放的大游行。参加游行的，包括工、农、学、商、青联、市民、市政、机关各系统，以及驻军和驻津的各军事机关。

当天晚上8时许，游行行列分六个梯队由人民广场进入市区各主要街道分别行进。游行队伍每列都绵延十余里，当第五梯队的先头已到达解放北路时，后尾则仍在人民广场上蠕动。至晚上12时，解放路、滨江路、罗斯福路等街道，已全为游行队伍所贯拥。载着扩音器、军乐队的300余辆五彩缤纷、鲜艳夺目的宣传卡车，活跃在街头。市郊的许多农民从好几里路外赶来，观看这盛大的开国大游行。旺道庄农民郭金光，领着自己的老婆孩子，赶到市区的六泾路，看到了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浩大的游行队伍，感叹地说：“工人过去有能耐没处用，今天做了主人，今后自己来管自己的事，有能耐要好好使用。”西南角的小贩庞双均，晚上兴冲冲地放下手中的买卖，跑到百

货公司门口，情不自禁地说：“这是庆祝咱们的政府成立了！”

在游行的队伍里，“毛主席万岁！”“斯大林万岁！”“保卫世界和平！”的欢呼声、高亢的国歌声、锣鼓声以及各种乐器的伴奏声、观众的掌声，震天动地。无数的飞机形、坦克形、火车形、五星、宝塔、镰刀、斧头等各式各样的红灯和火炬，如同千万条火龙，闪耀盘旋于游行的行列之中，把拥挤在凉台上、窗口处、马路旁的观众的脸映得通红。

在运输公司的彩车里，“打扮得如同天使般”的一群职工子弟，一面扭着秧歌，一面放声歌唱，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笑逐颜开地对旁边的人说：“生在毛主席的年代里，晚一辈的后生是有福了！”电信局的一辆彩车停在会场的门前，滴滴答答地在那里发报，把游行的盛况迅速传输出去。

学生的队伍里，浙江中学和养正中学的队伍既整齐，乐队的节拍又协调，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各区的小学教员们组织了秧歌队，穿着红红绿绿的衣服尽情地扭着。北洋大学的常锡原教授，虽然上了些年纪，但当年轻的小伙子们随着锣鼓扭动时，他也抬着生硬的腿脚跟在后面扭动着。市立第三医院的医生、护士、工人组成的秧歌队，身着雪白的衣服，女护士头上还束着一条红带，上饰一颗红五星，各执一盏五星红灯，扭起的秧歌格外受人欢迎。就连外商美孚和德士古石油公司的大部分中国籍职工，也参加了游行队伍，游行对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

在游行路线的各街道上，许多商店门口摆着茶水，不时招呼游行队伍来喝水。游行一直持续到翌日凌晨4点，当有的游行队伍解散回家时，东方已经泛起了朝日的红霞。^①

^① 《天津日报》，1949年10月3日。

南京，这个国民党盘踞了多年的反动统治中心，已在几个月前回到了人民手中。9月30日晚7点，当广播电台传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的消息后，古老的石头城立即沸腾起来。

南京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驻军，马上组织人员上街游行。接连而来的是鞭炮齐鸣、锣鼓震天，“拥护人民领袖毛泽东！”“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华东大学的学生听到广播后，立即吹号集合，进行紧急动员，半小时内就结队完毕。然后分作两路出发，一路赴白下路、朝天宫、莫愁路一带游行，一路则在学校附近的街巷里欢庆。南京师范学校的学生得知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立即出动了秧歌队、漫画队、歌咏队、提灯队，由五个人抬着一座写着“毛主席万岁”的灯塔，上街游行庆祝。

10月1日这天下午，虽说天公不作美，下起了瓢泼大雨，街道上到处是湿漉漉的。但是，市总工会筹委会、电信局、自来水厂、南京大学等单位，仍组织队伍冒雨出发游行。

当总工会筹委会的游行队伍经过新民报馆门口时，200多人的队伍一齐高呼：“新民报的工友们出来狂欢吧！”“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啦！”这时，报馆里立即有40多人走了出来，加入了游行的行列。

南京大学用六个扩音器转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学生们冒雨在扩音器前静听。3点过后，扩音器里毛泽东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一传出，一百串鞭炮争先恐后地响了起来。至下午4点，早已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的600名南大师生，冒雨向新街口进发。在新街口广场，师生们尽情地扭秧歌，雨伞扭坏了，帽子在空中飞舞，大家沉醉在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喜庆里。

10月4日，南京举行了庆开国的盛大集会游行。这天早晨5时许，在蒙蒙的细雨中，各界代表百余人，齐集在新街口的和平堡垒前，举行升国旗典礼。市内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亦同时举行升旗仪式，一时军乐声、鞭炮声齐鸣。下午4时，南京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保卫世界和平游行，参加游行的群众达50万人，队伍长达75公里。位于市中心的新街口广场成了游行示威队伍集中的地点。这里矗立着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和五星红旗组成的“和平堡垒”，四周围绕驻宁解放军特种部队的巨型榴弹炮和重迫击炮。5时整，各区游行队伍先后通过新街口广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天空。在游行先导的解放军行列中，渡江战役时起义的“长治号”海军战士格外引人注目。接着，是拥有8000余名学生的华东政法大学的队伍和装饰有各种各样的生产工具的工矿企业的队伍，农业机械公司的队伍中有一台翻卷着白棉花的轧花机，南京自来水管厂的宣传车上装有一个不断流水的水塔，郊区农民则牵着化了装的“大水牛”。南京城里，到处是欢呼声、掌声、笑声和歌声。

在江城武汉，100万市民冒雨狂欢，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传来，武昌、汉口、汉阳的各个街道上，到处飘扬着五星红旗，成千上万的各界群众涌上街头，汇成喜庆的巨流。

开国大典的当天下午6时，汉口的工厂、学校、部队、机关出动的游行队伍，与无数的秧歌队、歌咏队、龙灯队、旱船队，在江汉关大楼前的广场会合了，排成了10公里长的行列。

游行队伍以十面大红国旗为前导，沿江汉路、胜利街、黎黄陂路折向中山大道，浩浩荡荡，人如涌潮，歌声、口号声震

天。直到晚上 10 点多钟，游行才宣告结束。

同一天，武昌、汉阳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庆祝活动。

在古城西安，10月2日这天，60万市民上街狂欢，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这天的连绵阴雨，丝毫不能减退古城人民喜庆开国的兴奋和激情，古老的城楼上插上了无数鲜红的国旗，无数高大堂皇的彩色牌楼更是增添了古城的喜庆气氛。

下午4时，滚滚人流汇聚成无数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革命公园广场。广场四周，四十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各式各样的彩旗如同一片旗林，参加革命公园广场集会的各界群众达20万人。

庆祝大会之后，20万人即高举火把游行，条条火龙从人海中奔向各个主要街道，顿时锣鼓声、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在美丽的杭州，各界群众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西湖活动。10月2日夜晩，红色的信号弹升上天空后，军乐队奏响了国际歌和国歌，游行即告开始。四条大的指挥船，插着红旗和挂着毛泽东画像行进在前面，300多条游船分路蜿蜒紧随。当所有的船只合成一个大圈时，指挥船和文工团、军乐队等的座船进入中央，其他300多条船围绕这些船排成一个大五角星。这时，红灯映红了湖水，歌声、口号声、军乐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西湖上空。

在东北、察哈尔、内蒙古等各解放区的大、中城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举行了盛大规模的游行庆祝活动

动。10月2日，哈尔滨20万人举行庆祝活动和游行。同一天，吉林市7万人举行提灯游行。长春参加游行的群众则达10万多人。齐齐哈尔的群众，为了庆祝开国，举行了三天的提灯游行。安东、张家口、承德、呼和浩特等城市，这几天都是集会游行不断，盛况空前。

华北的太原、保定、石家庄、新乡、郑州等地，华东的济南、青岛、徐州、合肥等地，华中的长沙等地，在开国喜庆的日子里，无一不是游行如潮，红旗似海，庆贺这一伟大的盛事。

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海南全岛尚未解放，但是长期战斗在海岛上的琼崖纵队已经解放了大片的土地，建立了巩固的解放区。为了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迎接海南全岛的解放，10月1日这天，中共琼崖区委在驻地举行了几千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化装游行。

二、抗美援朝大游行

1. 中国下决心出兵朝鲜

新中国是在亿万人民群众空前的游行庆祝中诞生的。游行，似乎与我们的共和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游行示威展开了，这就是中国人民为开展抗美援朝而进行的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过了两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在扩大朝鲜战争的同时，竟然毫无道理地干涉中国内政，居然说什么“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美国的这种任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野蛮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对于杜鲁门的这个声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第二天，周恩来以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的名义，庄严宣布：“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

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①

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一段时间，战局是向有利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方发展的。在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朝鲜人民军节节获胜，于6月28日解放了汉城，7月上旬将美军和南朝鲜军驱逐至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至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解放了三八线以南90%的土地和92%以上的人口，将美伪军压缩到了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的釜山地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进入8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朝鲜半岛南端的美军主力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凭借坚固工事，坚守在狭小的洛东江三角洲地区，既不撤退，也不反击，同时在日本组建新的军团。

针对这种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认为，美军在朝鲜半岛中部仁川一带登陆的可能性很大，战争必将向持久、复杂、艰苦的方向转化。为此，中共中央将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估计通报给了金日成，建议预作防范。同时，中共中央要求东北边防军务必于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

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担心的情况果然发生了。这一天，美军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从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大举登陆，随即向汉城和水原猛扑。洛东江三角洲的美军也向北发动猛烈的攻势。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将朝鲜人民军大部切断在朝鲜半岛南端，形势急转直下。

美军在大举侵犯朝鲜的同时，美国飞机一再侵犯中国领空。仅9月22日一天，美机就向中国边境重镇安东投掷了十二枚重磅炸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① 《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

局势的发展已使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在国庆庆祝会上的讲话,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①

然而,对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美国政府却并未听进耳里。相反,美国人认为这不过是中国虚张声势和进行外交“恫吓”。在他们看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没有能力也不敢出兵与它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相对抗,即便是中国出兵,也不是美军的对手。于是,美国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美军悍然大举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图们江方向大举推进。

10月1日,金日成和外相朴宪永致电毛泽东,通报了朝鲜面临的严重局面,提出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的地区,朝鲜政府将不得不请求中国予以特别的援助,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军作战。

两天后,金日成再次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中国政府是袖手旁观,还是立即出兵抗美援朝,必须当机立断。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作过许多重大的决策,出兵朝鲜是他一生中最慎重,也是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一方面,是自己的友好邻邦处在危急之中;另一方面,新中国刚刚成立,一旦出兵朝鲜,不但要与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直接兵戎相见,而且还将打乱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进程。虽说事先中国对战局的发展已有所防范,但要下决心出兵赴朝参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战，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上旬多次召开会议，对是否出兵反复讨论。尽管一些人不主张出兵，但毛泽东在权衡利弊之后，下定了出兵的决心。他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还认为，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者的一场较量不可避免的观点来看，迟早都要打，则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还可以再建设。

这样，中央高层逐渐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9日晚上，早已集结在中朝边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外加三个炮兵师，共计26万人，雄赳赳、气昂昂地从三个方向跨过了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当然，志愿军是秘密入朝的，志愿军干部战士身上，没有帽徽，没有胸章，没有任何中文标志，有的干部穿的还是朝鲜人民军的军服。这样做，是为了给来犯的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

抗美援朝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在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同时，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正义性和必要性的教育活动。在当时，进行这样的教育活动是完全必需的。

进行抗美援朝，直接出兵朝鲜，对于党员和军队来说，是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但对于新解放区的人民，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具有崇美、恐美心理的人来说，要对此取得正确的认识，就不那么容易了。一些人在怀疑：中国经过多年的战争，现在国内的战争总算结束了，又要去朝鲜

打仗，有这个必要吗？出兵与美国打仗，岂不是惹火烧身？美国那么强大，又有原子弹，能打得赢吗？打不赢怎么办？万一美国再来一个仁川登陆，怎么对付？会不会由此激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0月24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作了题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系统地解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抗美援朝的问题。他说：“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发展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①

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树立胜利的信心，消除恐美心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活动。宣传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我国对美国扩大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二是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10月26日，统一领导国内抗美援朝运动的机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后来简称为抗美援朝总会）成立。此后，各大行政区、省、市成立了地方分会。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迅速展开。

2. 各界游行推动抗美援朝

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除了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外，在国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二、抗美援朝大游行

内还组织了各式各样的群众运动。组织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是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美援朝，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的一种重要方式。

不过，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内在进行抗美援朝必要性的宣传教育活动时，并没有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是因为志愿军刚入朝时，是秘密进入朝鲜境内的。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首战告捷，歼敌1.58万人，迫使敌人从鸭绿江边退到清川江以南地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国内也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更没有大规模的群众祝捷游行。这是因为美国人虽然打了败仗，但他们的统帅麦克阿瑟仍旧不相信中国军队会大规模地入朝参战。在麦克阿瑟看来，有他这么一位在二战中战功赫赫的美军统帅坐镇日本，中国军队还敢大股大股地过鸭绿江吗？

志愿军利用麦克阿瑟这种狂妄的心理，在第一次战役胜利之后立即组织了第二次战役，歼敌3.6万多人，其中美军2.4万多人。12月3日，侵略军实行总退却。6日，中朝军队乘胜收复平壤，把侵略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

经过二次战役的惨败，麦克阿瑟这才相信中国政府早先说过的对其侵略朝鲜“不会置之不理”是动真格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中朝军队收复平壤前后，国内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1950年11月30日，天津4.29万余名工商业者，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示威大游行。这一天，天津市的商店都悬挂着国旗。上午10点多钟，参加游行的队伍陆续向天津第

一体育场进发，到下午1点40分，全体游行队伍集合完毕。会场上红旗招展，游行的队伍高举着标语、口号字牌，在风沙中敲锣打鼓，虽说气温在零度以下，但每个人都是情绪高昂。

开始游行前，天津工商联主委李烛尘宣读了游行示威大会致毛泽东电。电文中说：

今天我们举行了四万余人的示威大游行，告诉美帝，我们中国人民已经认清了它们的本质，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①

会上，与会的工商业者表示一致拥护中国代表伍修权11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并要求安理会接受伍修权在会上提出的三项建议，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加以严厉的制裁，4万多人以暴风骤雨般的掌声通过了这项决议。

在李烛尘宣读完民主建国会对大会的贺电后，4万多人的队伍在雄壮的《团结就是力量》的军乐声中，浩浩荡荡地向市区进发。

游行队伍以年届古稀的李烛尘率领全体工商联副主委为先导，队伍中既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小伙子，有经理，有掌柜，有账房先生，也有小徒弟，还有工程师和技术员。

12月2日的《人民日报》对这次游行报道说：

游行队伍的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是由影剧业同业公会六百人所组成，他们昂首挺胸，齐步前进。队中一百多人组成的歌咏队员服装整齐，精神焕发，沿途引吭高歌，唱出

^① 《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日。

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另外白衣白裤、红发结、红领巾、红腰带的手鼓队，以及化装的狼狈的杜鲁门、麦克阿瑟、蒋介石、李承晚等最引人注目。殿后的队伍是二千余摊贩组成的大队，他们响亮地喊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一整个下午，大家经过的每一条街道两旁，争看游行队伍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真是万人空巷。群众对游行队伍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无论从游行的行列里，或者在欢迎的群众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庄严而坚决的表情，交织着愤恨和胜利在握的信心与愉快。

对于天津工商界的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毛泽东予以高度的评价。12月2日，他复电李烛尘及参加游行示威大会的全体人员：

你们在十一月三十日给我的电报看到了。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并于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做了许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①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日。

天津工商界游行示威后，北京工商界5万多人于12月9日举行了庆祝平壤解放反对美帝侵略的大示威。

参加这次大示威的，有北京全市136个行业的代表。游行者优先在先农坛运动场集合，示威游行总领队、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傅华亭作了讲话，大会一致通过了给毛泽东、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

随后，游行队伍由先农坛向市工商业中心区前门广场浩浩荡荡地前进。游行行列以乐队和腰鼓队为前导，紧随其后是60名代表组成的标语队。标语队的队员高举毛泽东、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以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主席万岁！”“金日成将军万岁！”“中朝人民团结万岁！”等标语牌，有的标语牌上还写着北京市工商界五项爱国公约及各公会公约的内容。游行队伍一路前进，一路高呼着口号。当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前美国领事馆时，游行群众的情绪更是高昂，“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也格外响亮。

12月16日，上海工商界举行有15万人参加的大示威。

这天清晨，全上海的11万多家商店、企业都悬挂了国旗，游行队伍冒着寒风和雨雪，高举着无数的红旗，从全市的各个角落分四路汇集到市中心的跑马厅广场。在中路入场的队伍中，以胡厥文、荣毅仁、刘鸿生、吴蕴初等知名工商界人士为先导。在进行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后，由刘鸿生、胡厥文、荣毅仁分别宣读了对毛泽东、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

随后，游行开始，26个总队、123个大队共15万人分四路通过主席台，分别沿延安东路、南京路、威海卫路向全市各区展开游行。新华社在一则电讯中对此报道说：

二、抗美援朝大游行

在雄壮的队伍中，有经营数家工厂的工业家，有雇用数百职工的商业家，也有独资经营、自己劳动的摊贩们，有六十八岁的工业家蕢延芳，也有十八岁的摊贩陆志鹄，他们一致高呼“全上海工商界团结起来！”“保证继续稳定物价，保证军需民用的充分供应”。各行各业都迸发出要把爱国公约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的口号，都高举着不同内容与形式的图表、漫画和旗帜，表示工商界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恨和解放后生产上升的情况。^①

各路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接连不断的鞭炮声，工人、学生和其他人民团体组成了几十个鼓动站，为游行队伍鼓劲加油。上海学生联合会还赠给了以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的中路游行队伍一面锦旗，上书“遵守爱国公约，积极支援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广泛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几行字。更有不少沿途的市民，纷纷给游行主席团献上一束鲜花。游行从上午11点多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7点才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南京等大中城市的工商界，也举行了各式各样的抗美援朝的游行。

1950年11月2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歪曲事实，把1835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侵略，硬说成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为了揭穿奥斯汀的谎言，国内各教会团体、教会学校，以及留美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等爱国活动。

12月13日，北京市的教会团体、学校、医院及留美学生2万人举行爱国示威大会及游行，作为对奥斯汀在安理会发言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

的回击。

示威大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到会的有华北、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中华圣公会等教会团体，以及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崇实中学、贝满女中、协和医学院等单位的人员，还有在京的留美学生。

大会开始时，燕京大学校委会主席陆志韦首先发表演说，揭露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活动。接着，在辅仁大学任教了二十五年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发言。陈垣说：“两个月前辅大全体师生员工已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去了，这是奥斯汀所不敢讲也不愿讲的事实，这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结果。”会上，陈垣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全场口号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从小就在清华大学的前身留美预备学堂读书，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执教的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以亲身经历控告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华圣公会主教凌贤扬，手捧《圣经》，引用马太福音痛斥奥斯汀：“你们这伪善的法利塞人有祸了，蠅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们倒吞下去。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其他各团体的代表也争相发言。

示威大会后即开始游行，陆志韦、宗教学学院院长赵紫辰、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清华大学副教务长钱伟长、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等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队伍一路游行一路高呼“反欺骗、反污蔑、反侮辱！”“抗议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粉碎美帝文化侵略！”等口号。队伍经过中共北京市委门前时，留学生队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经过东交民巷已被中国收回的前美国驻华大使馆时，辅仁大学教授张怀兴奋地对着旁边的人说：“十年前队伍是不能从这里过的，今天中国人民

二、抗美援朝大游行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真是站起来了。”^①

抗美援朝运动大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大大地启发了宗教界人士的政治觉悟。当年反映这次游行示威的一则报道，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12月23日首都与教会有关的近五十个单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两万人的反奥斯汀污蔑示威大游行大会，这决不是突然的。在这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全部历史上，这是中国的教徒们第一次会合了留美学生，以空前未有的大团结写出光荣的爱国事迹。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帝的群众性活动的女青年会、远东召教会、安息日会、神召会、道济医院……那天都高举着“美金收买不了我们”的大旗，热烈地参加了示威大游行。

在队伍中有老校长陆志韦和陈垣，有三十年前老一辈的留美学生潘光旦、冯友兰、吴景超、雷海宗、李继侗等教授。美以美教会七十一岁高龄的老教友罗宪章也精神抖擞跟着年轻的小伙子赶来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会王梓仲总干事也扶病到场。和赵忠尧教授一道由美返国，途经日本被美帝扣留而脱险归来的罗时钧也和新近回国的八十多个留美学生一同加入了队伍。行列中甚至还有汇文小学的七八岁的小学生们。著名的美国教会所办的协和医院，这一天停止了门诊，除留下几个人值班外，整个医院的医师、护士都来了。代表北京女基督教徒的女青年会俞秀霭董事长激动地发表演说：“今天站在红旗底下的女基督教徒们，是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大会的，但是，今天都来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4日。

了，奥斯汀企图用宗教来利用我们，麻痹我们，他是可耻的失败了。”她说着，说着，眼睛里发出愤怒的闪光，嘴唇因激动的呼喊也微微地颤动起来。

北京教徒们和留美学生反奥斯汀污蔑示威大游行的队伍，像一条钢铁的洪流在“反侵略”的大旗下，从人民中国的首都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声音，宣示抗美援朝不可动摇的决心。清华大学的学生在一幅高举着的漫画上，画着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把手上的“美钞”撕成两片，在漫画的一个角落里，蹲着一个双手抓着头皮，仓惶失望的美国流氓，画上写着“我们决不上当！”燕大同学高举起大幅标语，上面写着“美元收买不了中国人民的良心”，真如清华大学钱伟长副教务长在大会上所说：美帝除了在中国培养那一小撮如胡适、蒋廷黻、吴国桢之流为中国人所唾弃的奴才外，他是失败了。^①

北京教会团体、学校反奥斯汀、支持抗美援朝的爱国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开后，上海、武汉、南京、沈阳、重庆等地的宗教界人士，纷纷进行游行示威予以响应。这些游行示威活动，成为当时开展消除亲美反动思想和恐美错误思想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乘胜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将美伪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并于1月4日解放了汉城。

新华社广播汉城解放消息的时候，北京大学法律系、西语系的学生正在开会。学生们一听到这一消息，尽管此时已是晚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0日。

上8点多钟，气温也很低，但还是决定立即组织队伍出发游行，把这一消息告诉更多的人。

队伍很快就组成了，而且还扯出了“庆祝解放汉城”的巨幅红旗。这面红旗其实是在两天前就准备好了的，因为此前他们就得知中朝军队正在向汉城方向推进，估计汉城很快就会被解放，因而预先准备了这面旗帜。

此时，已经入睡的灰楼的女同学，三院和西斋的男同学闻讯之后，也都从被窝里跳起来，拿起脸盆、铃，连敲带摇，响成一片。有的学生连鞋袜都来不及穿，就涌到院子里来了。

很快，一支700人的游行队伍向王府井进发了（当时北大尚在离王府井不远的沙滩），各系的十几位助教，还有从远道赶来的北京市团工委书记张大中、大学部部长汪家镠，也一齐加入了游行的队伍。

游行的队伍来到王府井大街，立即唤醒了北京市民，学生们告诉他们：“汉城解放了！”立即引来了一阵阵掌声。

当游行队伍回到北大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1点多钟了。

以北京大学的午夜游行为开端，北京为庆祝汉城解放的游行活动便接连不断。

对于各地举行的抗美援朝游行示威活动，抗美援朝总会曾作过统计：

工人：从1950年12月9日至次年2月11日，工人单独举行游行示威的有北京、天津、太原、归绥（呼和浩特）、张家口等44个城市，参加的人数达到63万人以上。

农民：湖北嘉鱼县农民1000余人，皖南芜湖市郊农民3000余人，武汉市郊农民31800余人，重庆市石马河乡农民

6000余人，已先后于1951年1、2月间举行了集会与示威游行。

妇女：从1951年1月1日至2月11日，各界妇女单独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的，有北京、沈阳、哈尔滨、青岛等11个城市，参加人数达22万人以上。

工商界：从1950年11月底天津工商界抗美援朝游行示威起，至1951年2月10日，计有天津、北京、保定、石家庄、上海等80余座大中城市组织了这一活动，参加人数达到101万。

宗教界：从1950年11月中旬至1951年2月10日，组织了游行示威的城市有50多个，共有20多万人参加。

文艺界：从1950年12月10日至1951年2月15日，文艺界举行抗美援朝集会和游行的，有北京、保定、武汉、广州、开封、沈阳、哈尔滨、西安等地共8万余人。

……

自1950年11月至1951年2月15日止，全国各地各界人民参加抗美援朝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数，总计在370万人以上。^①

3. 游行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成了美国进行侵朝战争的重要后勤补给基地，为了把日本建成它在远东的反共桥头堡，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由解除日本武装转变为重新武装日本。

1950年8月，日本政府根据盟军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① 《人民日报》，1951年2月19日。

的指令，建立了一支有 7.5 万人的警察预备队。8 月 10 日，日本政府颁布了《警察预备令》，随后建立了警察预备队总监部。

1951 年 1 月，杜勒斯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访问日本。在同日本首相吉田茂的会谈中，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满足于日本警察预备队的现状，要求日本按照美国陆军编制，建立 10 个师共 35 万人的地面部队。

开始的时候，吉田茂没有答应。但杜勒斯威胁说，如果日本不答应美国的要求，则不能缔结日美相互防卫协定，言下之意是日本将失去美国的防卫保护，特别是核保护伞。在美国的压力下，日美之间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条约规定日本要“逐渐增加承担直接或间接的自卫责任”，这实际上是要求重新武装日本。

日本军国主义自 1894 年甲午战争以来，屡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抗日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军国主义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对战败了的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死灰复燃，一直是保持高度警惕的。

现在，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战场上连吃败仗，为了抽出更多的兵力投入朝鲜战场，美国迫切需要日本增强防卫能力。于是，它公然践踏《波茨坦公告》，不顾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对，公开重新武装日本。

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是与它扩大朝鲜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人民在组织盛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活动。这一活动，实际上也是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活动，是从北京妇女界的示威游行开始的。

1951年1月28日，北京妇女界4万人齐集在故宫太和殿。集会由蔡畅、邓颖超、许广平、刘王立明、丁玲、李伯钊等47人组成主席团。大会主席刘清扬致开幕词后，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如雷的掌声中讲话。蔡畅“揭发了美帝正在阴谋进行重新武装日本的狂妄、卑鄙的勾当，号召北京妇女和全国妇女，进一步展开抗美援朝运动，与全国人民、日本人民、亚洲人民一起，为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签订全面公正的对日和约而斗争”。^①接着，由应邀到会的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的夫人金云竹揭露美国侵略朝鲜的罪行和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阴谋。随后，各界妇女代表相继讲话。

大会通过了北京市妇女界爱国公约，通过了向毛泽东、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的致敬电，也通过了警告日本反动派电，还通过了致日本妇女、朝鲜妇女的信，然后进行大游行。

游行于下午1时20分开始。数百面红旗及各国人民领袖的大画像、文艺大军所组成的仪仗队，以及蔡畅、许广平、罗叔章、丁玲、李伯钊、刘清扬等主席为游行行列的先导，北京的女工、女学生、女艺人、郊区农妇、部队女工作者、女职员、女医生、女护士、保育工作者、修女、尼姑等各界妇女四万人组成的庄严行列，穿过故宫的穹形大门，分东西两路徐徐前进。游行行列中有许多带着孩子的母亲，也有带着媳妇、孙女的祖母。

六区一位八十二岁的老太和只有一条腿的街代表朱虹，都扶着拐杖来参加，从来没有参加过游行的清华大学

^① 《人民日报》，1951年1月29日。

教授沈侗的母亲沈老太太也从城外赶进城来。^①

这次大游行原计划只有3万人参加，结果到会参加游行者大大超过了原定的人数。参加游行的，其中有2.3万多人是家庭妇女，她们中有1.5万人是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这次游行，对于提高平时不大关心政治的广大妇女的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位参加游行的老太太擦着眼泪说：“屋角的秫秸也竖起了，咱也能管国家大事了。”很多妇女说：“这次长了见识，下次就敢出来了。”不少市民也改变了对妇女的看法，说：“现在的女人们也这样了不起。”^②

要把这么多的妇女，尤其是家庭妇女组织起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各级妇女组织做了广泛的动员工作，采取了家庭访问，召开婆婆会议，组织妇女互看小孩的方式，以减少参加游行的妇女的后顾之忧。再加以在筹备过程中，吸收了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的妇女领袖与代表人物参加筹备工作，包括动员尼姑与修女参加筹备，通过这些女人吸收了大批的妇女群众。

继北京妇女游行之后，上海组织30万妇女举行了保卫和平、保卫孩子、反对武装日本的大游行大示威。

3月8日这天，结合纪念“三八”妇女节，上海全市二十个区同时开展各界妇女参加的游行示威，其中许多是从来没有参加过社会活动的家庭妇女。出生在太平天国年间，已是99岁高龄的张倪氏，在外孙女的陪伴下坐三轮车参加了游行，成为参加游行的最年长者。张老太太年岁虽大，却一点也不糊涂。她说：“我的家两次被日本鬼子烧毁，我绝不容许美国武

^① 《人民日报》，1951年1月29日。

^② 《人民日报》，1951年1月30日。

装日本。”另一位张老太太，也已68岁了，当年被日本鬼子用枪托打断了腿，这天也坐三轮车参加了游行。^①

“三八”节这天，广州、沈阳、昆明、兰州、贵阳、太原等数十座城市的妇女，也举行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南京、广州、成都参加集会和游行的妇女，都在12万人以上。

3月22日，上海宗教界5万多人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参加游行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的教徒和130多所教会学校的师生员工，20多位朝鲜籍的基督徒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

据当年的报纸介绍：

游行队伍以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为前导。在九千多人的基督教大队中，教徒们高举着许多幅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漫画，有的漫画的标题是“美帝国主义——披着羊皮的豺狼！”在二千八百多人的天主教大队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从未参加过大会或游行，其中有两百多个六十多岁的老教友。在二千五百多个佛教徒的行列中，有上海一百多个寺庵的僧尼。教会学校师生员工的队伍有三万五千人。东吴大学六十三岁的老教授洪兰友、圣约翰大学六十四岁的老教授刁德仁等，也都和学生一道参加了游行。游行群众高举着写着“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的旗帜，并不断地高呼“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等口号。^②

在此之前的2月21日，北京市的1000余名归国华侨，在

① 《人民日报》，1951年3月10日。

② 《人民日报》，1951年3月23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大会。

仅从1月28日至2月底，全国许多的大中城市都相继举行了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各界群众在300万人以上。不少县城、乡镇也举行了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游行。参加游行的农民达37万人，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游行示威活动的，总计在600万人以上。

4. 两亿人参加的大游行

1951年的五一节前后，全国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达到了高潮。

为了组织好“五一”大游行，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准备。

当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中南、西北、西南、华东等大区。华北全区除400余座中小城市将分别举行示威游行外，8万个农村乡镇也将以区或小区为单位举行联乡游行。“五一”前，华北各地的农民、工人赶紧制作了许多游行用的标语牌。而河北、平原两省产棉区的妇女，星夜赶制春装，蒸烤干粮，做好游行准备。

华北各级抗美援朝运动的领导机关，在4月中旬以前，就普遍地制定了宣传工作计划，并训练了数百万干部与积极分子。山西、察哈尔两省组织了7万名区以上干部及教员和学生下乡宣传。

西北各地的五一节大示威的准备工作的做得很充分，离五一节还有几天的时间，准备工作就基本就绪。西安市计划动员70%以上的市民约40万人参加游行，陕西全省则将动员700万以上的农民参加。甘肃的兰州市组织了10万人，而天水专区已有50万人组织起来准备游行。

青海在4月中旬就成立了“五一”示威游行筹委会，全省

各城镇乡村及寺院届时都将举行游行。新疆、宁夏各地的“五一”游行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中南各省的“五一”示威游行准备也在加紧进行。江西全省打算组织 1000 万人参加。河南禹县县委计划组织四五十万人在五一节那天游行，这意味着全县凡能行走者都将参加。湖南的湘西行署及湘潭、岳阳、平江等县都召开了各界代表会或抗美援朝代表会，制定了具体的宣传组织计划。广州市则由市抗美援朝分会聘请了 107 名演讲员，动员了全市 3 万余师生，组成宣传队，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保证有 50 万以上的人参加示威。^①

北京市为了组织好“五一”示威游行，市公安局决定在 5 月 1 日这天在部分地区临时停止交通，组织了大会指挥部，并提前将各单位队伍集合的时间、地区分别通知了各单位，并对集合、游行的路线作了具体的规定。北京市庆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大会筹委会在事先制定了一份《大会须知》发给了各单位，须知共十一条，诸如奏国歌时必须全体肃立，各单位应自备干粮和水壶水杯，游行开始时不得表演秧歌、腰鼓、变换队形、停留不走，下雨也照常举行等等。

为了组织好“五一”示威游行，抗美援朝总会专门组织人撰写《“五一”示威游行应注意些什么？》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文章说：

在示威游行大会上不要有很多人讲话，凡有讲话都要尽可能简要、明确。讲话的过多，又长篇大论，结果弄得群众十分疲劳，对此应加避免。

大、中城市参加示威游行的人很多，把队伍集中到会场，

^① 《人民日报》，1951 年 4 月 28 日。

要花很长的时间。为了避免队伍在向会场集中或游行中发生交叉的现象，要把各单位预先站立的地点、行走的路线、前后左右的单位等等作安排并通知各单位，到时还要有专人指挥。队伍须按时入场，但不可入场太早，以免造成群众的疲劳，在游行时打不起精神。

文章还说，群众的饮水问题要有专人负责解决，一般城市可在会场周围和游行经过的路旁设立茶水站。还应根据会场内群众分布的情况，在适当的地方设置足够的临时厕所。

各单位参加游行的人应预先确定，在游行的前一天晚上，集体或个别地准备干粮。各单位抬巨幅旗、标语牌、领袖像的人不能太少，以免负担过重，最好挑选力气大的人轮流抬。沿途呼喊口号也应挑选嗓门大的人轮流领呼。各单位最好不要让年纪过大、身体过弱的老人、病人及孕妇参加，但如果群众爱国积极性很高，一定要参加，也不要勉强制止。

文章还特地讲到了在农村如何组织示威游行，认为除了注意上面这些外，还应以一个或几个村为单位，采取分片示威游行的办法。集会的地点应选在位置适中的村庄，不必让游行队伍经过所有的村庄，这样所需的时间太长，最好是以会场所在的村庄为中心，划定几条路线，凡居住在一条路线上或距离这一条路线不远的群众，都沿着这一条路线举行示威游行，各村的队伍到达自己所在的村庄就可各自回家。^①

文章对游行示威要注意的事项，解说得不能不谓详尽。

5月1日这一天，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在全国各地同时开始了。

^① 《人民日报》，1951年4月20日。

北京城区和郊区的 80 余万人，分三十一处举行庆祝五一节示威游行大会。城区的 60 万人，从清晨起，就高唱着雄壮的抗美援朝歌曲，高举着鲜艳的红旗，抬着毛泽东、斯大林等各国领袖的画像及各种图表和模型，从各自的单位汇集到附近的马路上，准备通过天安门广场。

上午 10 点，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示威游行大会开始了。

北京市市长彭真简短致词后，乐队高奏起国歌和国际歌，礼炮齐鸣 28 响。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高举着国旗和毛泽东画像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等 30 位各国人民领袖的画像的红旗队，紧随其后的是 2000 名腰鼓队员组成的仪仗队，游行队伍以七十路纵队通过主席台。首先通过主席台的是解放军队伍，然后是少年儿童、运动员、产业工人、学生、妇女、市民相继接受检阅，最后出场的是 5000 人组成的文艺大队和中央、华北、北京市的机关团体工作人员。

“少年儿童队在大字书写的‘时刻准备着’的呼号后，手拿各色花朵、绿草、白鸽和红色的书本，走向为他们缔造幸福的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前手持红、黄两色花朵的一千五百个队员，组成了一面巨大的国旗图案。两位少年儿童队队员跑到天安门上，代表全市各界人民和机关工作人员，把一束鲜花敬献给了毛泽东主席。会场上，现在是一片欢呼声和掌声。正在主席台前行进的少年儿童队员们高兴得跳起来，把手里的各色花朵，抛向晴朗的天空。”

“包括首都几十个公私营厂矿，六万名产业工人的巨流来了。无数的生产图表和模型标明着北京市的工人光荣地完成了，或者是超额完成了规定的生产任务。”

“各阶层和各民族的妇女队伍，在大会会场上放出了大批

白鸽。在这些象征和平的鸽子，带着红、绿色的彩条，飞翔在蓝色的会场上空时引起了一片欢呼。”

“以中小企业职工、手工业工人、店员、中小学师生、工商业者和市区各阶层人民组成的四十万大军紧跟着妇女的队伍，二百个带着光荣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家属，受到了与会者的无限尊敬。在各区的游行队伍中，有不少持着拐杖的白发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和年轻人一样热情地欢呼着。”

“北京市文学、戏剧、曲艺、音乐、美术工作者今天组成了一支雄伟的文艺大军。在表现中朝两国人民紧密团结的化妆大队后面，是由工厂和少年儿童队组成的两千人的腰鼓队，它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英勇气概。”^①

在观礼台上目睹了这一雄壮场面的黄炎培先生，为这次示威游行大会特地写了一首《五一的五一》的长诗，其中的第二部分是这样写的：

最先出场，
是文工大队，
几百千个腰鼓，
跟着节拍，
编成了方形，
跟着节拍，
且鼓且舞地展开。
……
一切一切，
五花八门，

^① 《人民日报》，1951年5月2日。

有声有色地，
一队一队，
都须通过一条视线，
这视线发自天安门游行检阅的高台。

……

一颠一拐的老汉，
走过了天安门，
一步一回头，
不断地致敬，
望着主席台凝着神，像发呆；
母亲们去年在队里还抱着婴孩，
今年不抱了，
为的是每一条巷子
组织了临时托儿所，
在代她们喂奶；
一大群和尚，
一大群尼姑，
都跟着喊口号，
他们和她们都在搞生产，能自立了，
只是在婚姻问题上，还是例外。
最后是机关队伍，
很有意义的是末了一幅旗帜，
“抗美援朝总会”
前前后后，
一片狂潮，像怒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①

这次“五一”大示威，真是达到了“空前盛大”。这一天参加游行的群众，上海有243万，沈阳有80万，天津有61万，重庆有60万，广州有50万，武汉有40万，大多数省会一级城市的游行人数都在全市人口的半数以上。广大农村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北京郊区参加游行的群众达20万，吉林省蛟河县新站区有1.2万余人参加，占该区人口的三分之二。不少农村的农民，“有的扛着抗日战争时期打游击的红缨枪，有的牵着耕牛，表示要坚决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保卫翻身好光景”。^②

据当时的统计，参加这次“五一”大示威的人数，超过了2亿人。这既是一次盛大的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也是一次广泛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盛大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如果单看游行示威的本身，似乎与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但如此，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无疑还会耗去一定的人力和物力。然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还刚刚获得解放，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还不足以完全理解抗美援朝的意义，加之美国长期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侵略，还有相当多的人对美国的本质认识不清，崇美、恐美思想仍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广大人民对抗美援朝意义的认识，树立与美国兵戎相见而必胜的信心，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是难以做到的。游行示威虽说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可以营造出提高爱国热情的气氛，有利于对人

^① 《人民日报》，1951年5月6日。

^② 《人民日报》，1951年5月13日。

民进行大面积的教育，也有利于增强人民的团结。正是由于包括组织游行示威在内的各种抗美援朝活动的开展，才出现了全国人民踊跃参加志愿军，为前线捐钱捐物，在后方积极生产的感人局面。

当然，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个别地方出现形式主义、命令主义也难以避免。例如在重庆，1951年春季以来，市区内几乎是无日不游行，有些干部和团体动不动就发动群众游行，有时是一个或几个学校、工厂游行，有时是一条街或一个段的居民游行，交通时常为之中断。

针对这种情况，重庆市作出规定：今后除了法定的纪念日、工假、春节及临时规定必须进行者以外，各区各群众团体如需举行群众大会或游行，必须经过市级领导机关的批准。

农村也有类似的现象。在1951年的五一节大游行时，山西的应县、浑源、左云、广灵四县，就有九个区的村干部强制群众游行。为此，《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进行了批评。

三、资本家大游行

1. 资本家心甘情愿接受改造

1956年的1月，全国各大中城市整日敲锣打鼓，鞭炮声震天，一支支的报喜队穿梭于大街小巷，甚至还有一队队的资本家上街游行。资本家们在游行的时候，几乎人人都是喜笑颜开，他们在庆贺什么？原来，资本家们在庆贺自己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庆贺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不过，事情的发生有一个过程。

1999年修改宪法，有一项备受世人关注的内容，便是将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性载入了宪法。其实，把私营经济的地位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加以确定，这并不是第一次。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此时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制定了一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中第三十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这就是说，刚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不害怕资本主义经济，相反，还要“鼓励”它，“扶助”它。当然，这里有个前提，这些私营经济必须是“有利于国计民生”。

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不会像文字上写的那么简单，“鼓励”

和“扶助”还只是一个方面，早在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制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方针。这就是说，对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加以利用，不利的部分则加以限制。

建国之初，尤其是大城市刚解放之时，一些资本家对共产党能否掌管好城市颇为怀疑，有人甚至扬言说，共产党打仗行，搞经济不行。他们不但嘴里这么说，暗中还想与共产党较量较量。于是，他们趁共产党刚接管城市，人民币还没有站稳脚跟之时，大搞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致使城市物价飞涨，人民币大有被挤出城市之势。正在他们得意之时，人民政府从解放区调运来了大批的粮食、棉花、煤炭，敞开平价销售。这一下，投机资本家吃不住了，只得赶紧吐出原来高价吃进来的物资。他们本想囤积居奇大捞一把，没想到不仅没捞到，反而大蚀其本，有的甚至倾家荡产。经过这次限制与反限制的较量，不法资本家一下子老实了不少。

通货膨胀的问题解决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资本家投机倒把造成的市场虚假繁荣消失之后，商品的销路突然萎缩，许多资本家的商品卖不出去，无钱发工人工资，于是大声叫苦。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消息一传开，资本家喜出望外。因为加工订货既保证了资本家的企业有活干，又保证了产品的销路。

可是，只过了半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抗美援朝需要许多的军需，加之经过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也大为增加，国内市场一下子活跃起来。这样一来，资本家眼看产品不愁没有销路，便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或者不按合同完成任务，有的甚至宁肯按合同缴纳罚款，也要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高价。半年前，资本家对国家给他

们加工订货还感激不尽，半年之后，却把加工订货视为束住他们手脚的绳索，千方百计欲图挣脱。

195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在“三反”过程中发现，一些干部出现的贪污腐化行为，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不法资本家的贿赂有关。而且，一些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居然在为志愿军制造急救包、药品、食品时，或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塞进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了17万多把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影响了工事修筑。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时，把从国家那里领来的好棉花换成废烂棉花，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因感染而致残致死。针对资本家的种种不法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从1952年2月起进行“五反”斗争，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在“五反”过程中，将资本家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区别对待，重点打击极少数的不法资本家。在参加“五反”的近百万户工商业者中，约有3%被划定为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其中大部分退回违法所得或被罚款，另有1500多人受到刑事处罚。

“五反”运动对那些患有严重“五毒”行为的不法资本家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消毒”，同时也教育了广大资产阶级。“五反”运动之后，资本家又积极地接受加工订货了。

加工订货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而国家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要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更高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必须探求合适的形式。

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到武汉、

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李维汉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其中特别提到：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形式。

这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同意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6月中旬，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方式是公私合营。1953年下半年开始，先是进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当时工作做得很细，合营一个工厂要用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合营首先是从大企业开始，那时把大企业公私合营叫做“吃苹果”，而把余下的小企业的合营称之为“吃葡萄”。1954年，公私合营主要是“吃苹果”，全国一年才吃了2000多个“苹果”。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心甘情愿地让“吃苹果”。上海的一个大资本家说：“我的十几家工厂都是我的伯父和父亲挣来的。我欠国家的钱，可以拿出一个厂来抵偿国家的债务，但要把把所有的纱厂和面粉厂都拿出来公私合营，死后怎样去见伯父和父亲？”

1955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了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加快了步伐。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七届六中（扩大）全会在北京举行，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就在这次全会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透露了他关于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设想。他说：

一九五〇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讲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①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向全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加快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也将跟着加快。

毛泽东不但发出信号，而且亲自做资本家代表人物的工作。

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谈话。第一次在中南海的颐年堂，第二次在怀仁堂。前后有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参加座谈。

毛泽东对他们说，现在我知道，你们思想上有顾虑。农业合作化了，手工业合作化了。共产党和资本家这些年合作得不错。现在大家都搞社会主义，你们不搞，你们心中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你们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讲话，为资本家们指明了方向，也鼓舞了多数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

为了表达广大工商业者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全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页。

工商联决定发表一个告全国工商界的宣言，号召全国工商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走社会主义道路。事先，陈叔通将这一想法告诉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

许涤新将此事向陈云作了汇报，并送上了全国工商联宣言的文稿。陈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

此时，毛泽东已离京去了外地，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许涤新列席了会议。会上，刘少奇让许把事情的经过和文稿的内容作了简要的汇报。

在讨论文稿可否发表时，有几个人认为不能发表，理由是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怎么能容许资本家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宣言呢？这么一说，反对发表者越来越多。

见此情景，周恩来问许涤新：“问题是你提出来的，你的主张是什么？”

许涤新此时已被反对意见所动摇，连忙说：“既然问题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关系到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问题，那么，就让我明天去说服陈叔老吧！”

周恩来对许涤新说：“工商联告全国工商界的稿件，我已看过，内容是要求全国资本家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这样一篇对工商界的宣言，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什么害处呢？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什么害处呢？为了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同意陈叔老的要求，让全国工商联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这个宣言。”

陈云、陈毅也表示赞同发表宣言。刘少奇在经过深思之后，决定同意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发表。^①

^① 许涤新：《对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历程的回忆》，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

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的《告全国工商界书》发表了。其中说：

全国人民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把我们祖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繁荣富强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一些思想上有怀疑和顾虑的人，要进行耐心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使他们认识前进的道路。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必须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希望全体工商业者努力学习，不断改变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改变旧的生活，接受新生活，把自己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①

这个宣言发表之后，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对宣言的内容感到很满意。

在酝酿发表全国工商联《告全国工商界书》之时，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实行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的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②

随后，中共中央召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

① 《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1日。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149页。

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他还对那种认为民族资本家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说，人家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了，人家现在快变成工人阶级了，人家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

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会议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各地紧锣密鼓，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

2. 工商界敲锣打鼓去报喜

从1955年9月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势头。到1955年12月上旬，据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和重庆等城市和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不完全统计，私营工业中有30多个行业，2000多个企业；私营零售商业中约有10多个行业，3000多家商店，已经政府批准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进入1956年1月，全国各地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和资本家，都以无比的热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各大城市到处可以看到“庆祝批准公私合营”的大红横幅和耀眼金黄的“囍”字，到处都是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报喜队。

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将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一方面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也是经过解放以来多年的教育和社会主义制度所体现出的优越性，使广大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工商业改造进入高潮以来，每个企业为了争取合营竭力创造条件，当时的趋势是以争取合营为荣。据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工商业者赵伯华回忆：

记得在同仁堂被批准合营之时，工商界不少人垂涎三尺，感到是可望而不可及，如有人说“乐主委（指同仁堂

老板乐松生，时为北京市工商联主委——引者）企业合营了，全国人大代表选上了，北京市副市长荣任了，三喜临门”。说明大家不胜羡慕之至。^①

那时的工商界，不是害怕公私合营，而是担心自己的企业不能公私合营。赵伯华在其回忆中又说：

还值得追述的是我本人所主持的货栈业（现在所称托运业）。这个行业是“四不像”，各行业合营其先决条件是“按行归口”，归口后有国营企业领导才能谈得上合营。货栈业，说它是服务业，每天搬出搬入都是商品；说它是商业，商品又都是客方的；说它是运输业，又没有运输工具。直到合营高潮来临，这个行业也没归口，因此就没有条件争取合营。当时同行都有些恐慌，特别是业务不景气的单位感到悲观失望，我作为同业公会负责人，在实际情况压力下，不得不硬着头皮投入合营的准备工作。

1956年1月10日晚上，北京市财贸系统在天桥大剧场召开私营商业、服务业合营预备大会，程宏毅副市长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我代表货栈业在大会发了言，并当场特意向程市长表示“我们货栈业已做好合营准备工作”，并保证做好合营“清产核资工作”。货栈业归口一事，程副市长在合营汇报会上临时指定由储运公司负责，于是货栈业务终于在全行业中合营了。^②

当时的情况是，哪一个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哪一个行业的资本家就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如同过节般的喜庆。为了庆祝本行业公私合营，工商业者们纷纷举行游行。先看看北京的

^① 赵伯华：《一个私营工商业者的后半生》，载《北京文史资料》第54辑。

^② 《一个私营工商业者的后半生》。

情况。

1月2日，北京三铁行业的600多名资本家举行游行，迎接公私合营。

1月5日，北京纺织印染工业全行业公私合营，1500人的队伍欢天喜地在全市游行一天，并到全国工商联报喜。

1月8日，北京东四区的28个私营商业行业公私合营，1000多名店员和资本家游行庆祝。

1月9日，北京十个行业、1276个私营工厂公私合营，东单、西单、东四等区的工商业者，组成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的队伍，上街游行。

1月10日这天，对北京的工商业者来说，是一个永远忘不了的日子，用当时的话说，是个“大喜的日子”。这一天，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为此，全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庆祝活动。

这天，北京全市分六处开会，向所有申请公私合营的工商户宣布批准公私合营。“在西单区长安大戏院的会场里，当第二商业局王一平副局长宣布全市所有申请公私合营的商业已经全部批准时，全场资本家都站起来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还用暴雨般的掌声来欢迎这个好消息。在批准工业公私合营的会场里，当贾庭三副市长宣布申请的工业户全部合营的消息时，掌声、欢呼声好像要把屋顶掀掉。在每一个大会会场外面都是人山人海，职工们和资本家们都来向大会报喜道贺。”^①

大会之后，全市6万多被批准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共6万余人，随即举行了大游行。

^① 《大公报》，1956年1月11日。

一支4万人的职工队伍，在从西单到东单的大街上浩浩荡荡地行进。西单、西四、东单、东四等区的游行队伍，先后来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向北京市政府报喜。当时，“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正在开扩大行政会议，张友渔、王昆仑副市长和各局、处的首长们都从会议厅里出来同职工代表亲切地握手。张友渔副市长接过了贺喜信，亲切地连声说：‘祝贺你们！’接着人群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鞭炮声”。^①

游行队伍经过全国总工会门前时，职工们也去贺喜，得到了全总负责人的接见。然后，队伍经过天安门往南，前往中共北京市委报喜。当游行队伍到来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早已在门口迎候，西四区永生玻璃厂的工人杨宝树，代表西四区全体职工，向北京市委报喜。

这天，全国政协常委会正在开会。会议正开着，西单区工商界报喜队的2000多人来到了政协礼堂。礼堂的楼上楼下都挤满了人。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报喜队。周恩来对报喜队说，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来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也已经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将大大加快。他向资本家们贺喜，并勉励他们认识自己的重大责任，勤勤恳恳、老实地工作，学习、学习、再学习，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傍晚，全市各处的大会均已结束。这时，2万多名资本家的游行队伍分区游行，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天安门广场，再由这里出发，分别到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委献旗。

宣武、东四、前门等地的资本家家属队伍，来到了北京市委。她们一路高呼口号，举着旗帜。前门区伍联霓虹灯厂老板

^① 《大公报》，1956年1月11日。

陈学文的妻子何素琴激动地对站在门口的市委书记、市长彭真说：“我希望您转告毛主席，我感激他，他为我们家里指引了一条光明的大路，祝毛主席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应该说，何素琴的这番话，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当时的资本家和他的家属，绝大多数人是衷心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衷心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由市工商联主委乐松生率领的1万多名资本家游行队伍，也在下午6点多钟到了北京市委。乐松生等六人高举着一面一丈多长的锦旗，献给彭真，上面写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全市各行业已经胜利地走上了公私合营，并以百倍信心积极接受改造，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勇迈进。”

晚上，6万多名职工和工商业者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进行盛大的联欢。

1月15日，北京隆重集会，宣布率先在全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在北京的资本家为实现了公私合营而游行庆祝时，在天津这座华北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各种报喜队和游行队伍，也在不断地涌向街头。

1月9日下午，在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副市长李耕涛宣布：天津市41个商业行业被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了。

这时，早已等候在会场外的职工报喜队和资本家报喜队，立即走向四面八方去报喜。

由私营商店店员组成的报喜队，来到了滨江路、和平路一带繁华的商业区。其中，河西区1000多名店员组成的报喜队

三、资本家大游行

打着腰鼓，鸣放鞭炮，向马路两旁的商店报喜，并与河东区700多名店员组成的报喜队联欢。

资本家组成的报喜队也出动了。这一天，全天津有3000多名工商业者组成的报喜队出现在天津的大街上。新华区500多名商业者分成三队在市内游行报喜。该区贵阳路义发居面食店的老板王盘星，过去从不参加任何活动，这天也参加了报喜队，还特地关照店员，等报喜队来时，要用茶水纸烟招待。

《大公报》的记者对这天参加游行的另一支资本家报喜队作了如此报道：

昨天上午，天津工商界有一支出色的队伍在街头出现。这是河东区工商界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大队，又是庆祝昨天这个欢腾的日子的报喜队。

这支队伍里，青年资本家打着旗帜，怀着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愿望，情绪激昂地走在前面；中年和老年资本家也像年轻人一样，一个个精神饱满。宝聚号杂货店女资本家因为要进货，迟到了，气喘吁吁地赶上队伍，有人问她为啥跑得这样急，她说：“这个事儿还不急？”

队伍打着红旗，喊着口号，越走越有劲。他们走到最繁华的和平路，绕过百货公司大楼，再折回工人剧场。沿途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一个抱孩子的妇女问：“这是啥日子？”另一个妇女说：“公私合营啦！这是报喜队。经理掌柜的提前过春节啦！”郭庄子大街一家百货商店职工放鞭炮欢迎他们。队伍里立即响起了“积极接受改造！”的口号，回答职工对他们的欢迎。^①

自从一个多月以前，天津市的糕点业第一个被批准为全行

^① 《大公报》，1956年1月10日。

业公私合营以来，用《大公报》记者的话说，天津就一直“弥漫着节日的气氛”，这也使卖鞭炮的商店十分红火。天津东马路土产公司土产杂货批发部门前，早上6点多钟就有人排队买鞭炮。等到大门一开，顾客便一窝蜂地挤到柜台前，连价钱也不问，而且一买就是几万响。虽然土产公司预先做了准备，原来经营鞭炮业务的只有三个人，现在增加到了九个人，但仍感人手不够，只好临时再让人来帮忙。仅1月9日一天，土产公司就售出鞭炮280万响。

资本家们不仅放鞭炮，参加报喜游行，而且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也大增。天津曲阜道上有家叫“和春义”的小馓子铺，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掌柜李振武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平时不多说话，也很少外出。大规模的公私合营展开后，李振武像变了个人，哪里开会，都和儿子抢着去，开会回来，也总是乐滋滋的，说个没完没了。

李振武家有二两金子，二十六块银元，锁在箱子里已有七八年了，以前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现在他想：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儿，小买卖也可以公私合营，跟着走这条路，这些财产还留着有啥用？应该拿出来，帮助国家建设。夜里，老两口商量了一下，妻子起初还有点舍不得，后来觉得丈夫的话对，索性主张把家里的铜元三十斤半也一起拿出来。

第二天一早，李振武便把这些金子、银元带到了区工商局，向工商局的干部讨主意。干部们建议他把这笔资金投资到柜上。这样，“和春义”馓子铺又增加了一笔资金。

自此，李振武逢人便高兴地说：“别看咱买卖小，今天也走社会主义道儿啦！”

1月15日，天津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成为紧随北京之后全国第二个实现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公

私合营的城市。

这一天，天津在市政协礼堂召开“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全部私营工业企业公私合营大会”。在此之前，天津全市的商业企业已经完成了公私合营。会上，副市长李耕涛宣布：天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完成了公私合营的任务。

15日一整天，天津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报喜游行的队伍。“从早到晚，街上到处有队伍来来往往，彩色的旗帜一队比一队多，金色的‘喜’字一个比一个大。队伍中包括男女老少，有职工、有学生、有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在和平区的一支工商界报喜队伍中，有一支由资本家组成的乐队，吹奏着欢乐的曲子，路旁的人说：‘瞧！他们真的是吹吹打打朝着社会主义走呢。’”^①

三条石是天津铸铁工业的中心，这里聚集了150余户私营机器铸铁工厂。1月15日的三条石，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满街，三条石的全体资本家都参加了报喜队，连六七十岁的老头也在报喜的队伍中生硬地扭着秧歌。

3. 集会游行庆祝进入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规模和数量在全国首屈一指。1956年1月，上海的资本家们也争先恐后地涌上街头报喜游行，庆祝自己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上海的工商业者要求早日实现公私合营的心情，与北京的工商业者同样迫切。

1月15日上午，上海工商界在天蟾舞台召开全市工商界临时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要在六天之内争取全市私营工

^① 《大公报》，1956年1月16日。

商界一次申请合营，把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推向最高峰。

消息一传开，全上海都激动了，当人们拿着一张张登载这一消息的红色“号外”时，到处都听到人们在说：“好消息，大喜事！”“好啊，这样社会主义就来得快了！”

还是来看一段当年的报道吧：

喜讯传到淮海路上。正在给顾客换表带的顺泰钟表行的业主崔彩荷听到这个消息，连着问：“是真的吗？这下总算巴望到了。”

早在一两个星期前，崔彩荷就叫儿子买了横幅，买了爆竹，放在店堂里准备着。她又担心爆竹着潮放不响，所以有太阳的天就拿出来晒。前些时，她还去批了一些表带来，怕报喜队来报喜时橱窗里空落落地不光彩。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眼看着淮海路上一家家都挂上了红的横幅，独独轮不到自己，心里真着急。忽然她想，横幅先挂上吧，这样也许快些。别人告诉她，一定要报上登了批准合营的消息才好挂，于是从来不订报纸的崔彩荷就天天买报纸来看。横看竖看，就是找不到钟表业批准合营的消息。这几天，崔彩荷等得真有些不耐烦了，觉也睡不着，做生意也没有心思。昨天的喜讯立即使崔彩荷振奋起来，她摸摸藤包里的爆竹，笑嘻嘻地说：放爆竹的日子等到了。^①

报纸上宣传的当然是典型事例，不过那时的报道，大体还是真实可信的。那时的人们，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比感受十分强烈，经过几年的宣传教育，走社会主义道路光荣的思想，不仅扎根于广大工人、农民的头脑里，也深深渗透到了私

^① 《解放日报》，1956年1月16日。

营工商业者的脑海中。工商业者们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是发自内心的。

1月15日之后，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不断加快。

1月17日，上海1.4万名工人代表，代表上海130万工人，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动员全市工人“学习北京，迎头赶上”，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改造的最高潮。

在集会上，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说：“上海市私营工商业的全部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的合作化，郊区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就要在最近几天全部实现，这两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像两个翅膀一样，使上海每分每秒钟都在飞向社会主义。”

上海工商业联合会主任盛丕华应邀到会上讲话。盛丕华代表工商界表示：感谢上海工人阶级六年来的领导和帮助，使上海工商界愉快地走上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道路，保证在合营以后改造思想，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的讲话不断地被工人代表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大会进行中，著名工商业家荣毅仁带着工商界的贺喜队，在锣鼓、鞭炮声中进入会场。工商界知名人士刘靖基、严谔声、席文光等十五人举着“保证二十日完成全市公私合营申请”十五个字牌走上主席台。荣毅仁在台上领头呼喊口号。

大会结束后，1.4万名工人代表在上海工会联合会主席钟民等人的带领下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到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呈递了保证书，然后向繁华的南京路进发。^①

为推动父辈们早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子女们也行动起来了。

^① 《解放日报》，1956年1月18日。

1月18日，上海工商业者子弟1.4万人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大会，他们表示要推动父兄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努力使自己成为劳动知识分子。大会通过了给上海市委的保证书，决心做一个劳动者，决不做剥削者；认真学习党对私营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政策，向家庭和亲友宣传，推动自己的父兄申请公私合营。

会后，工商业者子弟组成了一支700人的报喜队，向上海市委、市人委、团市委等处报喜游行。

同一天，1.3万名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也举行集会。会上，家属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进一步鼓励丈夫坚定公私合营的信心，和丈夫一起走进社会主义。会后，家属们也举行了报喜游行。

1月20日，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这一天，上海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会前，全市242个工商行业的2500名代表和家属代表，聚集在大厅前的广场上，通过了全市尚未合营的205个行业、10.6万户私营工商户的公私合营申请。

盛丕华、荣毅仁、胡厥文等上海工商联的全体委员和他们的夫人，在新药业资本家的铜鼓乐队吹奏声中，率各行业的代表进入大厅。盛丕华手里捧着“上海市私营工商业请求公私合营申请书”，刘靖基、刘念义等八人抬着四具扎彩的红漆杠箱，杠箱里放着用红布包裹的各行各业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书。

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迎到台阶，代表市长陈毅接受了申请书，并在申请书上签上了陈毅的名字，盖上了陈毅的印章。这时全场欢声雷动，掌声不绝，聚集在大厦马路上各区各业的工商业报喜队，立即鸣炮庆祝，敲起锣鼓，出发到市区报喜游行。

随后，盛丕华宣读了申请书，胡厥文宣读了全市工商界的保证书，曹荻秋作了讲话，各界代表宣读贺词。然后，工商界代表登台发言。

荣毅仁说：“今天的大会充分说明我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通过和平改造的道路走入社会主义的，我们不仅愿意接受改造，还欢天喜地的接受改造。”

制笔工业代表汤蒂因说：“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真是说不出的光荣和幸福。”

大会结束后，数不清的报喜游行队伍出现在上海街头。全市工商界代表2500人，分乘60辆插着红旗的大汽车，敲锣打鼓，奔向市区的各主要街道，向市级机关、团体、部队、市民贺喜。全市的报喜游行一直持续到晚上。^①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公私合营后，上海的手工业和郊区的农业也完成了合作化，按照那时的说法，上海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1月21日，全市50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以示庆祝。

庆祝大会以人民广场为中心，同时分区进行。副市长许建国在会上宣布：中国工商业集中的城市上海，开始进入社会主义了。

大会在通过向毛泽东的致敬电后，先是进行联欢。会场上，西装革履的工商界人士第一次扭起了秧歌，家属们穿着华贵的衣服跳起了集体舞。联欢之后，规模浩大的游行开始了。

工人们抬着“庆祝全市进入社会主义”、“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口号牌前进，许多新公私合营工厂和商店的职工，抬着“公私合营”的牌子，兴高采烈地行进在工人的队

^① 《大公报》，1956年1月21日。

伍里。

郊区合作社农民的队伍则以四辆轰轰隆隆的拖拉机为先导，90辆满载蔬菜的脚踏车结伴而过。游行的农民还推着新农具，抬着集体农庄的模型前进。

手工业者的队伍中，合作社社员捧着许多由绢花、花边等手工工业品组成的大“囍”字，徐汇区的手工业者还带来了他们为游行赶制的大红“囍”字地毯。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工商界的队伍。队伍的前头是四个人抬着的一米多高的“上海市工商界的保证书”，许多同业公会的工商联主任委员也亲自扛着本业的保证书。保证书的内容是：坚决和全市人民、全国人民一道，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奋勇前进；保证合营生产两不误；保证不辜负国家的信任和嘱托；保证改造自己，放弃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

这些保证书可不是游行前才随便凑成的。棉布织染业在草拟保证书时，八十多个小组长热烈反复地讨论了三个小时。铝器工业写了两次保证书。在写第二封保证书时，执笔的人换了三个，一再斟酌，一改再改，直到深夜2点才定稿。

工商业者们还抬着他们的“献礼”。游行队伍的“献礼”牌上写着：179个行业，3140件投资——人民币1500多万元，黄金9000多两，银元1.5万多块，房产204栋，废物物3800多件，机器310台，其他320件。

身着盛装的工商界的家属们，也扛着保证书游行。盛丕华的家属金日英和胡厥文的家属沈方成两人，抬着全市工商业者家属的保证书。保证书上写的是：保证搞好家务，建立民主和睦的新家庭，培养教育子女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才；逐步地放弃剥削生活，争取自食其力的生活。

成千上万的资本家手里高举着“保证搞好合营工作”的大

红牌。静安区工商界的队伍还沿途化装表演“老三代”与“新三代”的活报剧。“老三代”是拿着算盘的祖父、提着鸟笼的儿子和挽着讨饭篮的孙子，喻示在旧中国，工商业者一代不如一代，日益没有出路。“新三代”是祖父读着《社会发展史》，儿子捧着公私合营申请书，少先队员的孙子拿着书包和和平鸽，喻示资本家们已认清社会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有着光明的前景。^①

晚上，黄浦江两岸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十多条装扮一新的游船举行水上游行，引来了无数的市民观看。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家如此心甘情愿，又如此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企业公私合营，实际上也就是资本家除了每年按企业的资产规模拿取一定的定息外，企业已归国家而不归他所有了，这是历史的真实吗？

回答是：这是历史的真实。

那么，资本家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压力？

压力是有的，但这个压力，不是政治的压力，而是在公私合营的大趋势下，别的企业、别的行业已经公私合营了，如果自己的企业、行业迟迟不合营，他们就感到自己落后了，脸上不光彩。

当然，这么大的运动，要说少数的人没有一点抵触情绪，没有人不情愿地交出我的企业，也不尽是事实。自己辛辛苦苦经营了一辈子，甚至是祖辈传下来的产业，一旦拱手交出去（虽说能拿到定息，但他已无权支配企业了），没有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白天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公私合营，晚上痛哭流涕的人也是有的。但是，这不是资本家的主体。如

^① 《解放日报》，1956年1月22日。

果多数人不心甘情愿，那么热闹的局面，那么短的时间实现公私合营，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那个时代，新旧社会有着强烈的对比，社会主义社会，不要说工人、农民是衷心拥护的，就是对广大工商业者，也是有吸引力的，他们也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前途。

还是看看上海两位著名的工商界人士说的两段话吧：

有“面粉大王”、“纺织大王”之称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在谈到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对他个人的得失时说：

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①

被誉为中国“煤炭大王”、“火柴大王”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谈到他为什么拥护共产党时，这样说道：

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我是一个企业家，我的企业，无论水泥、毛纺、码头、火柴、煤矿、银行业目前都在发展着，规模远较过去大得多。共产党能推动企业，能使中国变成工业化的国家，这是我过去 50 年的梦想，我为什

^① 《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 4 号，第 77 页。

么不拥护它？解放以后，我和我的家属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今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副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私营企业的定息制度，私营企业的资方有5%的定息。我的章华毛纺厂和水泥业、火柴业、码头及其他企业已先后拿到了定息。这笔定息的数字从我们的生活需要看来是相当大的……我感到政府的照顾实在太多了。

我拥护共产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资本家。现在我身体不好，不能陪你去黄浦滩头看看。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兵舰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人们走过这里，会不知道这儿究竟是哪国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码头企业的，往往站在码头上摇头。如今呢，这一带地方每个码头上都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你想想看：一个看过上海50年变迁的中国人，他心中会不高兴吗？^①这是对这段历史的最好注解。

^①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号，第79页。

四、“交心”与游行

1. “交心”运动之由来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惊心动魄，且不说那50多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从此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就是没有被划入右派行列的知识分子，又重新给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也够难受的。

知识分子一旦戴上了资产阶级这顶帽子，日子就不好过了。首先是被一些人认为“很麻烦”。

1957年11月，当年著名的“左”派，时为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到杭州参加浙江四级干部会议，作了一个长达1.8万字的长篇报告，内有这么一段话：

尤其麻烦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上层小资产阶级，一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只要工人说几句话，他就缩回去了，他要说鬼话，要是有什么违法行为，只要随便向他算一算帐，他就受不了……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一，他说他有学问，他认识几个字，他尾巴翘得很高；第二，他说他没有剥削人家；第三，学生中他有影响，他还有点群众基础，这个事情是比较难办的。你不能随便把他捉起来，杀掉，所以我们要对他做很多的工作，还要用团

结——批评——团结。^①

柯的这番话，当然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存在很深的偏见。

既然知识分子如此“麻烦”难办，“不能随便捉起来”，不能杀掉，又不能让其乱说乱动，那就只得“做很多的工作”，而让知识分子“交心”，就是当时“许多的工作”中的一种。

所谓“交心”，就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内心深处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思想，公开地揭露出来，并加以批判，以示自己从此下定决心与党和人民一条心。把心交出来的群众运动，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交心”运动。

“交心”当然只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因为知识分子自从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紧箍咒后，就已经被从工人阶级中剔除出来了。

本来，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是，好景不常。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由于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的形势、对当时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于是，再次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被认为是没有改造好的对象而要继续改造。

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点也不“麻烦”的。不能说他们当中没有“翘尾巴”的，但这不是“麻烦”的理由，其他阶级、阶层中同样会有“翘尾巴”的人。之所以说知识分子不“麻烦”，从重新戴帽本身这一点就足够可以证明。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递过来的时候，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的知

^① 转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

识分子已如同惊弓之鸟，没有哼出半个“不”字便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自己原来是、现在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走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

既然给了这么顶帽子，知识分子又心甘情愿地戴上了，那么，就等于自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事业的要求，就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把“心”交出来。

“交心”运动的前奏是“红专辩论”。

1957年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们的口号是“又红又专”》的社论，拉开了“红专辩论”的序幕。

社论说：“去年1月间，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国广大的知识青年，从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的目的出发，热烈地响应了这个号召，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这无疑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用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来对待这个号召，把向科学进军，当成了追求个人名利的一种手段，‘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业务书’，滋长了忽视政治的倾向，‘先专后红’，‘只专不红’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怪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观点的具体体现。”

社论说，我们的口号是“又红又专”，所谓“又红又专”，也就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在培养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又红又专”的统一论者，并且“红”是更为根本的条件。

这篇社论提出的红专问题，是针对知识青年而言的，因而红专辩论开始主要也是在高等学校的学生中进行的。其实所谓辩论，基本上是对只专不红、先专后红等思想进行批判。

不用说，在辩论之后，青年学生都会表示要走又红又专，而且是先红后专这条道路的，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说自

己只想专不愿红，而成为“白专典型”呢？

又红又专作为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应该说并无不妥之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情况才算“红”，“红”的具体标准又是什么？实际上，在又红又专问题上，“专”的表现是很具体的，这就是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水平，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专”，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而“红”作为一种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它所体现的，不只是如何言，而是如何行，抽象地谈“红”并无实际意义。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怎么过问政治，但他爱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了贡献，为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难道这不比空言“红”更有益吗？在“红”“专”辩论中，说是要“又专又红”，实际上，在大批“白专典型”过程中，它已成了只“红”而可“专”可不“专”了。

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提高了，可那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却被认为还有相当多的糊涂乃至错误的认识，诸如“红专分工论”、“红专分段论”、“红易专难论”、“红不如专论”、“先专后红论”、“红专不可兼得论”、“红是手段、专是目的论”等等。总之一句话，走的是一条“白专道路”，或者是“粉红色的道路”，而“粉红色的道路”只不过是“白专道路”的伪装而已。

知识分子为何要走“白专道路”或“粉红色道路”？答案很快就找到了：这是由于人生观的问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

于是，有人说：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最本质的东西，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特征，是阻碍知识分子前进的最主要阻力，必须集中力量加以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对立物，它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为了个人，就是利己主义。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私、骄、娇、

假、偏、空。

既然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前进的最主要阻力，那么，要改造知识分子，使他们前进，就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且从私、骄、娇、假、偏、空这些方面去挖根子。

虽说经历了反右派运动的暴风骤雨，但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真心实意去努力改造自己、要求自己进步的。他们纷纷寻找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剖析自己个人主义的表现、根源，纷纷表示要同旧我决裂，同个人主义决裂，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个自我解剖、自我批评的过程，也就当年所说的向党“交心”、向人民“交心”的过程。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使知识分子萌生了必须交心的负疚感，而此时已吹响的“大跃进”号角，又促使他们赶快交心，增强了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期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各国共产党人大为振奋。趁此东风，苏联领导人在会上宣布，苏联将在十五年后在主要工业品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毛泽东在同其他领导人商量之后，也在会上宣布，我们中国十五年后可能赶上英国。此后，“超英赶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中国的富裕强大，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超英赶美”口号的提出，对爱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正式使用了“大跃进”一词，并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此后，毛泽东在关于计划工

作的几点指示中，要求大专院校、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科学文化等方面，都搞一个像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那样的规划。次年1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在整风之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要讲不断革命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知识分子要改造，要附到工人阶级的皮上来。十五年超上英国，要有成百万、成千万忠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又使知识分子既感到有巨大的压力，又感到只有加快自身的改造，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来一个“兴无灭资”，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才能附到无产阶级的皮上，才符合时代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知识分子纷纷检查自己的“错误”，深挖个人主义的根源，表示要打掉知识分子架子，把心交给党。

“交心”的方式很多。一种方法是写揭露自己的大字报；一种是开交心会，在会上作自我检查，也让别人揭发自己；再一种便是联名提倡议或订集体规划。1958年3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望道等三十五人，在已制定个人红专规划的基础上，响应中科院上海地区研究机构十七位科学家的倡议，通过了“红透专深，坚持做政治上的革命派、学术上的革新派和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促进派”的集体规划，提出了在三年内全部成为“左”派等十三项奋斗目标。

为了表达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分子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决心，北京和上海的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的成员主要也是知识分子）和知识界，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交心”集会和游行。

2. “交心”游行在京城

1958年3月16日，北京各民主党派在京的全体中央委员和成员，全国知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近千名科学家、教授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在北京的民主党派领袖、知名无党派民主人士、著名科学家都参加了大会。

会上，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致开幕词。这份开幕词，本身就是一份决心书，全文如下：

同志们：

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开会了。

参加今天大会的有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有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我们万众一心，在首都天安门前，向毛主席，向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最大的决心。

我们决心跟共产党走。

我们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决心向工农学习。

我们决心改造自己——改造我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

我们决心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把一切都交出来，贡献给我们可爱的祖国，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

同志们！在祖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之下，我们的心在跳跃，我们的血在沸腾！

首先让我们欢呼：

祖国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①

接着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讲话。李济深说：“我们决心把民革成员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督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则在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彻底丢掉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要把心交出来，向组织交出来，向彼此交出来。一心一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代表全体成员表决心：“我们一定要加速自我改造，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会一致通过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公约》共四条，其中第一条便是：“改造政治立场，把心交出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大会还通过了《上毛主席书》。^②

大会举行一个小时后，在震天动地的鞭炮声中，游行开始了。

1万人的游行队伍分东西两路，向东单和西单方向前进。

① 《光明日报》，1958年3月17日。

② 《光明日报》，1958年3月17日。

东路是民革、民建、政协、社会主义学院、致公党和台盟的队伍；西路是民盟、无党派民主人士、民进、农工党和九三学社的队伍。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著名人士，拿着旗帜，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在游行中，几位著名人士对记者说及了自己参加这次活动的感受：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对记者说：今天的日子是令人难忘的。我很感动，也很兴奋。在全国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推动下，我们应该立即下定决心，鼓起干劲，立即积极投身在自我改造运动中去。

水利电力部傅作义部长对记者说：今天的会很热烈，大家把“真心”交出来了。交给了共产党！

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对记者说：我们今天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今天的大会会使社会主义自我改造进入一个新阶段。从今以后，我们应当坚决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动摇。还要争取劳动锻炼，努力学习政治理论，认真改造思想。只有这样，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

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对记者说：今天通过的自我改造公约，很好。有了这个公约，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改造目标，利于积极进行改造。^①

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和许许多年老的人，都坚持走完了全程。65岁的郭沫若对别人说，与今天一起游行的人比较，我并不老，今天游行的意义太重大了。

郭沫若的话一点也不假，这一年，李济深74岁，沈钧儒

^① 《光明日报》，1958年3月17日。

已是83岁高龄，黄炎培刚好80岁。这些古稀老人行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确实令人敬佩，令人感动。

游行的民主人士中，当年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就有马寅初、许德珩、陶孟和、周炳琳、刘清扬、顾颉刚、何思源等人。历史学家顾颉刚，因为血压高，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未参加过游行。他说：今天我能参加游行，很高兴。我感到迫切需要改造，坚持要来参加。

地质勘探学院地球物理探矿系主任薛琴舫，腿脚不方便，但也举着小红旗，坐着手推车来游行。当人们问他这么困难为什么还要游行时，他的回答很简单：“我需要改造！”

1955年从美国历经艰险回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从西郊赶来参加集会和游行，这是他回国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游行队伍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模型，一个是一颗巨大的红心，上面写着“把心交给党！”还有一个是只巨大的拳头，上书“把力量献给社会主义！”^①

3.“交心”游行在上海

在北京之后，上海知识界也举行了万人大会和游行，表示永远跟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主义。

3月20日，上海各民主党派成员和上海科学、文教、医药、卫生及工商界知名人士1万多人，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大会由金仲华致开幕词，陈望道、盛丕华、赵祖康、冯德培代表各界

^① 《光明日报》，1958年3月17日。

讲话，然后通过了《上海市民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保证实现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决心书》。《决心书》分为五条：

一、改造政治立场，把心交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效忠社会主义制度，忠实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全心全意把知识和力量献给国家的建设事业。

三、通过社会实践，向工人农民学习，树立劳动观点，积极培养劳动人民所具有的思想感情。

四、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五、加速根本的自我改造，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创造条件。坚持执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政策。^①

接着，游行开始了。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八十七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华东师大副教务长李锐夫、教授朱有猷等八人，抬着“上海市民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的横幅，走在最前面。科学家王应睐、音乐家蔡绍序等抬着毛泽东画像紧随其后，丹尼、胡子婴、汤蒂因抬着上写《保证实现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决心书》的大红旗，走在毛泽东画像后。各民主党派的责任人，都高举着一个红色的大信封，里面装的是给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心书或保证书。民革文史馆支部的十几位老先生，高举着“人人改造为红色老人”的标语，精神矍铄地行走在队伍里，还不时呼喊口号。在民盟的队伍中，谈家桢、刘祖同、周方白、童大璦四位教授抬着一幅“把心交给党，坚决当左派”的标语。复旦大学数学

^① 《文汇报》，1958年3月21日。

系主任陈传璋，一面走，一面擂着鼓，虽说是平生第一次擂鼓，却也兴致颇高。

在游行队伍中，“八老红”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他们是民革徐汇区成员中的八位老人，个个是白发银须，总年龄达604岁。八位老先生排成一排，扛着大红决心书，毫无倦意地行走在队伍里。

参加游行的人中，人称“三毛爸爸”的画家张乐平算是最忙的了。他虽是主席团成员，却捧着一块大画板，紧跟游行队伍，边走边画，一会儿跳上指挥车，一会从车上跳下，边跑边画。他说：“边跑边画，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遭哩，这也算是跃进吧！”^①

游行队伍到达中共上海市委门前时，市委全体干部都在门口热烈鼓掌欢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魏文伯、许建国，以及后来成为“四人帮”一匹好“马”的马天水，接受了大会的决心书。陈丕显握住大会主席金仲华的手，连表欢迎。在一片欢呼声中，主席团成员进入了市委大礼堂。

《文汇报》记者以《披肝沥胆向党诉心曲》为题，详细地记叙了这次会见的经过：

市委书记、常委们和八十多位主席团成员一一握手，接着陪同他们进入礼堂，礼堂顿时活跃起来。

魏文伯：（对着陈望道、沈尹默）你们也参加游行了，老当益壮，老当益壮！

金仲华：（扼要地禀报大会的情况）今天大会情绪很热烈，大家都坚决表示把心交出来，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主席团代表大会送上我们的决心书。

^① 《文汇报》，1958年3月21日。

陈丕显：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陈望道：今天我们走了二公里；本来我们的大会是号称一万人，得到大会消息的人，人人都很兴奋，纷纷要求参加，结果超过了一万人。

沈尹默：是啊，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一个人的事。

徐森玉，这位主席团中年龄最高的七八老人去年曾在上海市人代会上严厉地痛斥右派谬论，经陈丕显同志一再邀请，现在他坐在陈丕显同志的旁边，虽然拄着手杖，跟着队伍走了四里路，却是精神矍铄，抑止不住内心的兴奋，他说：我的腿不能跑路，还是走来了。许多人都说我年纪大了，今天才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从前有句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感到年纪轻了，连病也好了。

陈丕显（亲切地）：你以后还是少跑路。

颜福庆：我们把心都掏出来交给了党，跑点路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提议，再来呼口号，以表示我们兴奋的心情。

这时，全体起立，民革上海市委秘书长武和轩领头高呼：

效忠社会主义，力争又红又专！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窗外，游行队伍还在继续行进，锣鼓喧天，他们也高呼着口号；内内外外，心声连成一片。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使人久久不能平静。活跃的交谈，接着又开始了。

周谷城：古人也有用契约来表示决心的事，他们的契约是不能实现的。现在我们也订了契约，这就是决心书。

我深信，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人民的监督下，我们的决心没有一项不能兑现的。

周仁：我七十岁了，我可以同青年人比先进。我们的决心书是交给党了，这还是开始，我们不但要努力实现规划，而且一定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超额完成任务。

冯德培，他刚才在大会上讲了话，但言犹未尽，听到大家谈到决心书，他微笑着：我是无党无派的“党员”，今天无党派民主人士也交给了党一个决心书，它就是我们的“党章”，一定要坚决执行，而且一定要在上海市委领导下把科学工作做得更好。

舒新城：我也是无党无派。解放九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游行，过去都是看人家游行，这和自己亲身参加，味道就不一样。听到锣鼓声、掌声交织一起，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说到无党无派人士，总是没有组织的约束，容易产生自由主义。确如冯老所说，决心书就是我们的“党章”，用它来约束我们自己，也希望市委多多督促，使得我们也有些纪律。

陈丕显：不是既有纪律，又有自由了吗？还是这样的好！（说得大家都笑了）

谈话到这里，还没有一个文艺界的同志开口。参加主席团的白杨，正在北京，当她接到今天举行大会的消息，打电报回来说要当天赶回。可惜今天没有飞机。巴金也不在，周信芳正在重庆演出，也来了电报，表示了决心。于是，丹尼同志发言了。

丹尼：据说北京人艺在创作方面已经赶过上海人艺了。我们的话说得多了，以后要说话，就到台上去说。

(丹尼的话受到热烈的掌声)

游行时，一路领先抬着标语牌的苏步青教授，正听得出神，忽然大家邀他发言。

苏步青：(激动、坚决地)我十五岁那年，正逢十月革命，解放那年近五十岁，自己觉得年轻了些，今天我才真正是年轻了。因为：解放初，我的心向着旧社会，1952年思想改造时，心到中间了，但藏在那里没有打开，今天心不但开了，而且交出来了；解放初，尾巴翘得很高，认为自己有知识，了不起，思想改造时，群众把我的尾巴扯了下来，今天决心自己把尾巴割掉；解放初，我的脚站在那里不动，要党推着走，1952年后，要党拉着我走，很勉强，今天不但自己开步走了，而且要大跃进。今天我为知识分子的更生、脱胎换骨而高兴，为把心交给党而高兴，为坚决走社会主义、又红又专、更红更专而高兴！

孟宪承，这位六十五岁的著名教育家紧接着：高等学校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教学革新运动，许多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我改造的问题，是思想跃进的问题。今天的大会，就显示了大家的决心，有了决心，就能改造，不久的将来，教学革新一定会有巨大成就！

刘念义：改造自己要靠行动，我已决心下乡锻炼，现在万事俱备，独缺东风，只要领导批准，就可动身！

话题立刻转入了上山下乡。申葆文、许士林争先要求下乡。汤蒂因也不甘示弱。

汤蒂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我曾到市委报喜，那时，我以为交出了生产资料就算改造好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改造好，直到今天，我才真正觉得脚步轻快。我坚决要求下乡，并且要和刘念义、申葆文、许士林比决

心，比恒心，保证做到身心下乡，不辜负党的培养。^①

北京和上海的这两次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我改造大会和游行，把“交心”运动推向了高潮。

从“交心”运动所起的实际效果来看，尤其是在随后开展的“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拔资产阶级的白旗，插社会主义的红旗”的活动，知识分子们的经历和心情，远远不会像游行集会时那么轻松。因为“交心”本身就是在要知识分子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大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这样的运动，不可避免地要给知识分子带来心灵的伤害。

应该肯定，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交心”，是忠诚认真、发自内心的，他们提出的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绝非仅仅是游行呼喊的口号。问题在于，尽管知识分子自身在经过多年的改造之后，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从本质上讲，他们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他们并不留恋过去的生话，也并没有什么二心（他们以虔诚的态度参加“交心”，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非要他们深挖个人主义，非要他们“交心”，怎么能不给他们带来伤害？

^① 《文汇报》，1958年3月21日。

五、1958年夏秋的两游行

1. 声援中东人民大游行

1958年是中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一年，也是50年代大规模游行示威较多的一年。

这年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是7月中旬开始的反对英美干涉中东和侵略中东的游行示威。

事情得从黎巴嫩的局势讲起。

黎巴嫩受法国侵略多年，受西方的影响也较深。1952年起就担任黎巴嫩总统的加米耶·夏蒙是一名天主教徒，以亲西方著称。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阿拉伯人民同仇敌忾，阿拉伯各国也纷纷断绝同英法的外交关系，而夏蒙却没有断绝同英法的关系。1957年春，他又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①。可是，黎巴嫩国内的阿拉伯穆斯林则同情埃及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而且对夏蒙的亲西方政策不满。

^①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同中东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提供“援助”发展其经济，对一些希望获得军援的国家实施军援计划，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保护”任何请求军援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防止所谓共产主义侵略等。

夏蒙的总统任期将于1958年9月届满，而他却不愿离开总统宝座，想通过修改宪法达到连任的目的，结果引来了国内的一片反对声。

这年4月，夏蒙请求美国支援，艾森豪威尔命令美国第六舰队进入地中海。5月，黎巴嫩爆发了反对夏蒙的武装起义，首都贝鲁特也发生了罢工、罢市，反政府组织控制了黎巴嫩三分之二的地区。陆军总司令、基督教徒谢哈尔为了避免军队分裂，让军队保持中立，夏蒙只好再次向美国求援。

随后，美国宣布将向黎巴嫩政府提供警察部队，第六舰队的多艘舰船驶向黎巴嫩沿海，并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可是，就在美国宣布这些决定的当天，谢哈尔出动了军队，使贝鲁特的局势平静下来。美国的第六舰队也就只好解除了戒备。

6月30日，夏蒙不得不宣布放弃争取连任总统的决定，黎巴嫩人开始物色各教派都能接受的人作为下届总统人选，局势也就平静下来。

黎巴嫩的局势刚刚平静，其邻近的伊拉克却爆发了革命。

7月14日，伊拉克首相赛义德正准备去土耳其参加《巴格达条约》四国首脑会议，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已经去机场迎候。这时，以驻巴格达第20旅旅长卡塞姆和副旅长阿里夫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在人民的支持下杀死了国王费萨尔及王室其他成员。赛义德闻讯后中止了安卡拉之行，随即自杀身亡，尸体被游街示众。

同一天，伊拉克国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发布第一号公告，宣布伊拉克“从腐化政权和帝国主义的传统势力下解放出来”，并成立伊拉克共和国。伊拉克人民推翻了君主制，革命成功了。

伊拉克共和国成立的当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即阿联，由埃及、叙利亚组成）承认了伊拉克新政权，并派去了军事代表团。16日，中国、苏联承认了伊拉克共和国政府。两天后，卡塞姆复电周恩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卡塞姆又向西方保证：西方在伊拉克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他的政府将很快摆脱纳赛尔的影响。8月1日和2日，英、美分别承认了伊拉克新政府。

伊拉克革命的爆发，使黎巴嫩总统夏蒙如坐针毡。他一面告诫谢哈尔要么服从命令，要么离职，一面通过美国大使要求美、英在四十八小时内派兵进入黎巴嫩。

7月14日早晨，消息传到了华盛顿，艾森豪威尔迫不及待地发布派兵命令。7月15日至19日，美军在贝鲁特附近登陆，总兵力达到1.4万多人。美国派出这么多的军队进入黎巴嫩，固然是害怕伊拉克革命会产生连锁反应，同时也是向伊拉克新政府发出警告：对于这个地区内西方石油资源的任何威胁都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

就在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之时，英国也出兵约旦。7月14日，约旦国王侯赛因以约旦面临政变为由，请求英美支援。英国曾建议与美国共同占领约旦，但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7月17日，英国伞兵部队2200人从塞浦路斯经以色列空降到安曼机场。同时，美国发表声明支持英国出兵约旦，并派出50架战斗机在约旦上空掩护英军空降。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他国干涉别国内政，也一贯支持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在英美干涉黎巴嫩和约旦期间，中国对黎巴嫩和约旦人民给予了有力的支援。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的所谓保护侨民和保护黎

巴嫩主权的借口，并不能掩饰其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要求美军撤出黎巴嫩。7月18日，中国政府就英国出兵约旦，威胁伊拉克共和国，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警告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约旦的武装侵略，并从约旦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必须立即停止在伊拉克共和国周围集结军队的挑衅行为。7月29日，周恩来致信卡塞姆，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武装占领黎巴嫩和约旦、武装威胁伊拉克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破坏中东和世界和平的侵略行为”。

与此同时，中国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国对中东的武装干涉。

从7月16日起，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纷纷举行集会、游行。这天晚上，北大、清华分别举行万人大会，师生们一致谴责美国对黎巴嫩的武装侵略。天津河西区在当晚就组织了2万工人、学生参加的游行，呼喊“反对美国武装干涉阿拉伯人民”等口号，一直游行到深夜。

7月18日下午1点25分起，北京的英国驻中国代办处门前挤满了示威的群众。示威群众在代办处大门前的石凳上宣读了对英美两国政府的抗议书，有的还把抗议书交给英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示威群众挥舞着拳头和手中的小旗，呼喊“反对英国武装干涉约旦”等口号。代办处的大门和两侧的院墙上，被示威的群众张贴和写满了标语。

夜幕虽已降临，但示威群众却有增无减，到晚上8点正，走过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的群众达15万人。

代办处的大门和墙壁上被贴了一层厚厚的标语与漫画，院外的树木、电杆上，也贴满和挂满了无数的标语与漫画。北大的示威学生唱着他们自编的“美英帝国主义罪恶滔天”的歌曲，在代办处前停留了五分钟。外交学院的学生发挥他们的长

处，用英语广播了他们自己起草的抗议书，两个学生化装成雄赳赳的阿拉伯人，牵着两个垂头丧气的“美国兵”和“英国兵”，在代办处前呼喊口号几分钟。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抬着自己画的150多幅漫画走过代办处。至晚上11点，到代办处前示威的群众达到20万人。而这一天，北京参加示威的群众超过了50万人。

同一天，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抗议英美侵略中东的示威游行。数万上海群众来到外白渡桥畔的英国驻华代办处驻上海参赞办公处门前示威，在参赞处的门上、门外的围墙上贴满了抗议书，围墙顶上插满了抗议标语和旗帜。这天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南京有30万人，西安有20万人，沈阳有20万人，重庆最多，有106万人。

至7月19日，北京组织了有150万人参加的大示威，新华社在一则电讯中说：

“在六亿人民的首都——北京，经历了一次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巨大的反对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示威运动。从18日13时25分起，这个运动延续了三十四小时。现在，各行各业正以基层为单位就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宣传。从今天中午开始，全市已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举行了大小集会和街头宣传活动。其中西城区就有十一万人分别进行了大讨论。”

“昨夜，当白天参加游行示威的人们还没有回到家的时候，刚刚下了班的人又接上了他们的队伍。他们根本没有顾得上休息，就打着旗子，成群结队地涌到从东长安街直到英国代办处门前的马路上。北京市第一机床厂的一千五百多名工人，紧接着下午第一队一千多人的游行队伍，在晚上十时半下了班又立刻赶来参加游行。他们当中很多人连工作服都没有脱，手上的

机器油还没有洗掉。头上还戴着白色工作帽的北京联合纺织厂的女工们，也是在晚上十一点下了班以后才走出来的。”

“有一批在夜间值班的人——公共汽车司机、街道清洁工人和报馆的夜班编辑们，刚刚结束了他们的工作，就毫无倦意地参加了游行示威的队伍。”

“游行示威的人们排成多路纵队，前呼后拥地向着英国代办处所在的兴国路走去。”

“当天色微明时，这条马路上被挤得水泄不通，水银路灯把马路照得通明。在灯光下，游行的人群高举着拳头和拿着红绿纸旗的臂膀，还有那些被人们贴在英国代办处墙上的五光十色的标语和漫画，显得非常耀眼。人们从白天到午夜，用这些标语和漫画贴满了整个英国代办处建筑物长约四百多公尺的墙壁，而且有的地方厚达十二层之多。”

“人们的情绪极为激昂。每一队游行示威的人走过英国代办处门前时，都要停下来喊口号，递送抗议书，把积压在心头的无比愤怒，都一起倾泻在这里。有几张写着‘美国佬滚出黎巴嫩！’和‘英国佬滚出约旦！’的标语就贴在代办处的朱红大门上。”

“示威游行的人群聚集得越来越多。马路上人声鼎沸，人流不绝，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更长更宽的队伍还在波涛汹涌地前进。截至19日早晨，为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干涉阿拉伯人民内政而游行示威的人群总数已增加到三十多万人。”

报道还说：

在今天上午，天安门广场、东单广场、东西长安街和全城大街小巷都出现了手执各色标语牌和旗帜的示威游行的队伍，有些街道的交通已被阻塞。在街道两旁的许多电线杆上、树上、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杆上，都被游行的群众贴上了抗议美英

侵略中东的标语。

从今天一早开始，天安门广场成了愤怒的人群的海洋。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示威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作家和艺术家的队伍，首先通过这个地方，他们愤怒地高呼“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内政”口号。

在首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队伍里，参加游行的有作家艾芜、陈伯吹，艺术家王朝闻、蔡若虹和国画家于非闇等。艾芜走在队伍的前排，拿着首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抗议书。诗人沙鸥被群众示威的场面所激动，他在游行中随即写了“反侵略的红浪滔天”一首诗。

早晨八时多，住在城外的人们纷纷列队入城。北京铁路局工务段的工人刚放下工具，立即拿着标语牌出发游行。

被美英暴行激怒了的京郊广大农民今天纷纷集会，酒仙桥乡五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今天清晨三点钟，就有三千个社员集会抗议美英侵略中东，并举行了示威游行。在会上，社员们决议用实际行动来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决议要求达到粮食亩产六百斤的生产计划。在7月25日以前全乡基本扫除文盲，并且要大搞技术革命。

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台盟等各民主党派的队伍依次来了。这些队伍中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今天他们个个义愤填膺，在英国代办处高呼：“英美侵略者滚出中东去！滚出去！滚出去！”当年领导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革中委蒋光鼐，今年七十岁了，他今天七点钟就参加了游行。^①

连英国代办处的中国籍员工也加入到了大示威的队伍中。

^① 《人民日报》，1958年7月20日。

五、1958年夏秋的两度游行

在代办处工作的中国职工和临时工推举代表，通知代办处一等秘书艾礼雅说：“我们中国职工要参加示威游行，抗议你们的军队对中东人民的侵略！”艾礼雅倒表现出了英国绅士的风度，同意了员工的要求。一百多个中国员工走出代办处，呼喊着“英国军队从约旦撤出去！”的口号，加入了正在通过代办处门前的群众游行队伍。

19日清晨，清华大学的3500名师生，从西郊的清华园赶到城内的英国代办处示威，他们把大把的抗议信交给站在门口的代办处工作人员，这个英国人却把抗议信丢在地上。示威的师生要他捡起来，他不但不捡，反而说：“你们几十万人，威胁我们几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一下引起了示威群众的强烈不满，纷纷对这个英国人严词以驳。不得已，英国人只得让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将这些抗议信一一地捡起来。^①

19日这天正好是周末，全国各地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也就更多。

天津河西区的郭庄子和姚家台两条街道，只有5万多居民，而19日晚参加游行的群众达2.5万人。天河里十四名从41岁到74岁的大婶大娘，组织了化装游行，53岁的陈佩云，扮演帝国主义者，在前面装作抱头鼠窜的模样，其他十三人则腰系红绸、头戴鲜花，象征和平的力量，在后面追赶。

19日，上海参加游行的有100万人，兰州有18万人，成都有10万人，西宁、银川这样的人口不多的城市，也有好几万人参加游行。

截至7月25日，全国2000多个城市和部分大的集镇中，有6400万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和抗议集会活动。

^① 《人民日报》，1958年7月20日。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到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随后发表了会谈公报。公报再次谴责了美英对黎巴嫩和约旦的武装侵略以及对伊拉克共和国的武力威胁，表示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

公报发表之后，全国各地又相继举行了拥护公报的示威游行。8月5日晚，南昌10万人高举火炬，举行大游行。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美英武装干涉的示威游行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底。中国人民虽然对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不能给予物质的援助，但在道义上、精神上是倾力相助的。10月26日，美军终于撤出了黎巴嫩。11月，英军也撤出了约旦。

2. 反对美国干涉炮击金门

1958年夏，美国一只手在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另一只手却在中国台湾地区大搞阴谋活动，制造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以转移世界人民对中东问题的关注。

1958年5月，美国把在台湾的“军事援助顾问团”、“美国台湾协同司令部”等十七个不同统属的侵略机构，合并在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之下，成立了“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

在美国的支持下，龟缩在台湾一隅的蒋介石集团，也加紧了对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蒋介石把他的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集结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在美英武装干涉中东后，他也大言不惭地叫嚷要“反攻大陆”。

7月17日，台湾当局以“中东地区当前的爆炸性局势”为由，宣布特别戒严令。美国也与其互相呼应，下令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第七舰队处于战备状态。万隆会议以来台湾海峡地区保持了几年的平静局面被美蒋打破了。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

8月7日，蒋介石集团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的局势，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公然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

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所谓《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备忘录》，大肆诬蔑中国人民，用相当多的篇幅攻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台湾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只是因为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统一才造成了国际争端。对中国来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还刚刚起步，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是，中国人民也知道，和平是要经过斗争才能取得的，也决不惧怕任何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因此，面对美蒋的严重挑衅，8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为什么要选定在这个时候炮击金门？

第一，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

第二，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

第三，试探美国侵略中国的胃口有多大。

至于为什么只打金门而不打台湾，原因是，台湾一直驻有美军，而且受到1954年签订的美蒋《共同防御协定》的保护，打台湾易给美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提供口实。而金门等岛屿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协定》的约束，便于用来试探美国的反应。

炮击金门，表面上看是惩罚蒋介石集团，实际上是中国同美国进行的一场政治、军事、外交诸多方面的较量。

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马祖，给两岛蒋军以重大打击。

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马，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人民解放军

的大炮一轰，美国人便按捺不住，立即跳出来加以干涉。

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声称，美国将不放弃它已承担的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责任”。

9月4日，艾森豪威尔与国务卿杜勒斯会谈后，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并且宣称已经为此作好了军事上的部署。当时，美国从地中海、本土的西海岸及菲律宾调来了第六舰队的一半舰只，加强其第七舰队在台湾地区的兵力，还向台湾、菲律宾增添空军作战力量，美国海军陆战队3000人则在台湾南部登陆。

为了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9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9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声明强调：

一、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二、美国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并直接用武力侵占台澎列岛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的非法行为。

三、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四、中国根据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尽管美国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粗暴地破坏了国际关系中最起码的准则，中国政府仍然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

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与消除。

五、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干涉和侵略，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①

在福建前线的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马之时，全国人民对此予以了极大的关注。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中国人民对美国一再干涉中国内政，阻挠解放台湾的行径极为愤恨。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发表后，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开展大规模的集会与示威游行，表示对周恩来声明的拥护和支持。

声明一发表，上海成千上万的人涌到街头游行示威，表示坚决拥护周恩来的声明，抗议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晚上，上海的老工人和先进工作者，在参加抗议美国的军事挑衅、拥护周恩来声明的集会后，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但大家还是怒不可遏，当即到外滩游行示威。一路上，不断有工人、机关干部、市民涌进游行的队伍中。

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声明发表之后，天津40万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和店员涌上街头，呼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一定要解放台湾”等口号，举行大规模游行。

正在度周末的广州人民，这天晚上从车间、商店、办公室、学校、家庭到大街上冒雨游行。

^① 《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

武汉、西安等地大专院校的学生，也纷纷走出校园，游行示威，拥护周恩来的声明。

9月7日，北京300万人分别在工厂、郊区、农村、机关、学校集会，拥护周恩来声明，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

这天上午，各界的游行队伍“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下午3点，天安门广场成了“愤怒的海洋”，从东单到西单长3000米、宽100米的東西长安街上，从天安门到前门的广场和马路上，被方圆百里赶来的各界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续不断的口号“有如海涛滚滚，震荡着天安门广场”。

周恩来、邓小平、林伯渠、李富春、贺龙、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各人民团体、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和外交官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百万人示威游行大会。

大会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主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讲话。彭真在大会上高呼：全民武装，让美国纸老虎发抖吧。接着各界代表讲话。彭真和代表们的讲话，不时被“震天动地”的掌声和“愤怒的口号声”打断。

4时45分，参加大会的百万群众分三路从天安门广场分别向城东、城西、城南进发，和城郊各区群众一起开始了300万人浩浩荡荡的大游行。

这个排成数十路纵队的游行队伍，在通过宽广的街道以后，又分成无数支细流，涌向全市的大街小巷。游行的人手执各色纸旗，上面写着各种各样表示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标语。有些人把长达数百字的抗议书、决心书写在纸板上也抬来参加游行。人们还高举着巨幅标语旗、标语牌和漫画牌。漫画

的题材尽情地嘲笑和讽刺野心勃勃而又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人民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巨大力量和决心。

首都许多工厂的工人们在紧张生产的空隙时间里，踊跃地参加了示威游行。石景山发电厂的游行队伍里，有一个民兵基干连，他们表示，美帝国主义如果胆敢干涉我们解放金门、马祖和解放台湾，他们将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参加示威游行的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部队，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东西长安街和前门大街进发，他们迈着雄健的步伐，激昂地高呼：“一定要解放金门、马祖！”“一定要解放台湾！”示威游行的群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的强大无比激昂地喊着：“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致敬！”

成百万农民在天安门和郊区村镇游行示威，强大的民兵队是这支队伍的基干。天刚蒙蒙亮，东方红人民公社的民兵们背起步枪跑到村外的空地上，一边操练一边喊着口号：“练好本领，保卫祖国，加紧生产，解放台湾。”二十一年前首先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卢沟桥三千多农民，听到美帝国主义公然要走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怒不可遏地自动集会游行。在村头搭起的抗议台上，有两个农民愤怒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往事又在人们的心里燃起复仇的烈火。他俩愤激地对乡亲们说，如果美帝国主义胆敢扩大侵略，我们一定要像除四害一样，把它们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愤怒的火焰在农村里燃起了生产跃进的新高潮，人们一面示威游行一面连夜深翻地。东方红人民公社社员编成了这样的顺口溜：“土地翻得深，埋下美帝当肥料，明年定是好收成。”红旗人民公社的沙河指挥站所属各生产队由原计划种冬麦一万五千五百亩扩大到二万亩。他们要把所有土地都深翻一尺半到二尺，保证多打粮食，壮大反侵略的

力量。有些民兵今天在游行后又自动集会，决定从9日起白天生产，晚上练兵，加强人民公社军事化。^①

参加这天大游行的，不但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的队伍，也有大学生、少先队员的队伍，还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新华社记者为此写道：

佩戴首都各大学校徽的大学生们，今天以战斗员的姿态列队开来天安门广场，他们一边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一边高呼：“时刻准备着，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引导他们前进的是写有“民兵师”的红旗。这红旗同广场上人民解放军的大旗遥相辉映。

今天大学生们的情绪特别激昂，他们表示他们是学生是工人，又是拿枪的战士。清华大学教授陈祖东在天安门前编了一首快板，当场演唱，颂扬他们的民兵武装。学生们当场散发的诗传单上写着：“怒火燃烧，热血翻滚，美国强盗无耻侵略，我决不容忍！”千万工人、农民注视他们，赞扬他们是祖国人民的骄傲。

站在示威行列最前列的北京大学军事保尔团副团长唐世敏，自从6日傍晚收听了周总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后，已经整整激动了一夜。6日晚他和同学们才在郊区参加了示威游行，今天一早就又乘火车赶进了城。这个贫农的儿子，真恨不能一下跨上战马，驰向海防前哨。他激动地说：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这都是我们祖国神圣的领土，如果敌人胆敢来侵犯，我们这群已经军事战斗化了的学生部队，青年近卫团、保尔团、黄继光团……在党的指挥下，一声令下，就都会立刻开向火线。

^① 《人民日报》，1958年9月8日。

在示威游行的队伍中，有一队穿着整齐的服装、打着星星火炬队旗的少年先锋队队员的队伍，他们昂扬地在高唱着：“我们是小八路，嘿！坚决又勇敢，保和平，为祖国，革命意志坚，让美帝滚出咱台湾！”随着这昂扬的歌声，他们还放开喉咙不断地高呼着反侵略的口号。大队长唐闻声这个十四岁的女孩，当她一听到美国侵略者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挑衅的消息以后，立刻表示要全力支援海防前线的解放军叔叔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她向辅导员表示，她们全队的少先队员为了保卫祖国一定时刻准备着。

许多白发苍苍的慈祥老人，今天也压抑不住无比的愤怒，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东城区有位七十八岁的黎老翁，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手执写有“滚！滚！滚！”的小旗，在他小孙女的陪扶下稳健地前进，他逢人就说：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叫人无法容忍，我虽然年老也一定要游行，表示咱们全民反抗美帝的军事挑衅。他在手中经常摇摆的小旗是他老伴带病赶制出来的。清早从家里出发时，老太太再三嘱咐黎老翁，要他在游行时别忘了代她多喊几声“美帝从台湾地区滚出去！”^①

反对美国军事威胁和战争挑衅的抗议示威活动，也迅速席卷全国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从9月6日到9月8日，河南有120个县、市举行了群众大会，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约2000万人，约占当时全省人口的一半。9月7日这天，安徽全省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超过1000万人。

示威游行活动也迅速波及边远地区。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林区 and 鄂尔多斯地区，有十二个城镇举行集会游行，参加的群众超过40万人。福建沿海的东山岛7日举行了

^① 《人民日报》，1958年9月8日。

1.4 万人的大游行。浙江舟山岛的 80 万居民同驻军联合举行集会和游行。云南丽江专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9 月 7 日举行了共达 12 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大小集会。

从 9 月 7 日至 11 日短短五天的时间里，全国共有 2.12 亿人参加了大示威，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领土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力量与决心。

六、“五一”、国庆游行十六年

1. 建国头几年的“五一”、国庆游行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的五一节和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尤其是国庆游行，从1950年至1970年，二十年间从未间断过，而且参加游行的群众基本上保持50万人左右的规模。国庆十周年前的每年国庆游行，都是在阅兵式后举行，但60年代以后，国庆庆典活动就主要是游行庆祝了。

从1950年开始，中国就开始邀请外国党政领导人及外国友人参加庆典活动。五六十年代，外国领导人参加庆典活动人数最多的一次是1959年国庆，达四十多位。

国庆游行也罢，“五一”游行也罢，都是一种庆祝活动。但是，年份不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不同，这在游行活动中也会有所反映。

1950年5月1日，为了庆祝开国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20万人举行盛大游行。这一天，北京虽是阴雨连绵，但参加游行的群众从早上10点钟开始，就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结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在庄严美丽的天安门城楼上，正中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

像，门楼的两侧，则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下午3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到达主席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宣布游行开始，12门礼炮齐鸣120响，军乐队高奏国歌和国际歌。

游行队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1万余将士为先导。接着是人们手挽着手，二十人一排并肩行进的4万名工人的队伍。工人队伍通过主席台前时，工人们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斯大林万岁！”等口号。当他们看到毛泽东在台上向他们招手，听到毛泽东在高呼“工人同志们万岁！”时，很多人激动得把帽子抛向空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也就喊得更响亮了。

“接着工人前进的是人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妇女团结的三万人的队伍。他们后面是北京市各区的男女老少的市民群众。随后是各学校的学生和中国少年儿童队共五万人。游行者都热烈地和检阅台上的检阅者齐呼万岁，并互致敬礼。当学生的队伍通过天安门时，已经傍晚，雨后的天空出现了晚霞和彩虹，人民空军排着整齐的‘八一’队形凌空而过，增加了全场群众的兴奋。”^①

游行队伍的最后是北京的公安部队。当公安部队通过主席台前时，已是晚上8点15分了。

1950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首都北京举行了40余万群众参加的盛大游行示威。在威武雄壮的阅兵式之后，游行示威队伍依次进入会场。走在行列最前面的是少年儿童队，1.5万名少先队员身着白色上衣，系着鲜

^① 《人民日报》，1950年5月3日。

艳的红领巾，当他们走过主席台前时，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鲜花、彩旗与松枝。接着是6万产业工人，4万近郊农民，3000回民，6万机关职工，7.5万名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和10万市民组成的队伍，依次通过主席台。

所有的游行队伍在通过主席台前时，都停下来向在台上举手答礼的毛泽东作长时间的欢呼鼓掌，并发自内心地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队伍的最后面，是载歌载舞的6000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文艺队伍，用了3小时又25分钟，游行队伍才全部通过。

参加这年国庆游行的，有不少是从郊区赶来的农民。10月1日一大清早，京郊远近的农民就摸黑起床了。北京十一区南宫村的女劳动模范高淑贞和她的四个互助组员，另外四个农民代表，带着一个正在患疟疾的16岁孩子，早上5点半就起身了，他们一气走了25里路，赶到了南苑集合。太合庄的农民宋玉亭腿脚不方便，却拄着拐杖赶了30多里路，也到了南苑，他对别人说：“要不是咱人民政府、咱毛主席免费让我治病，又分给我十亩多地，这一年我能翻身吗？累点去看毛主席，心里也称意啊！”这的确说出了翻身农民的心里话。新中国开国伊始，气象万新，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是发自内心的衷心拥护。^①

1951年的国庆节，北京举行有40万群众参加的游行庆祝活动。游行是在盛大的阅兵式后开始的，据当年的报纸记载：

阅兵式结束后，庆祝游行开始。领先的是少年儿童队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日。

一万八千人的队伍。他们欢呼着“毛泽东万岁”走过主席台前。两个少先队员跑上检阅台，把一束鲜花献给毛主席。这时全场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有一队少年儿童队员走过检阅台时放出了一大群鸽子，表示他们保卫和平的意志。有一队队员高举着鲜花组成的“抗美援朝”字样，并且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位代表同他们一同行进。

首都产业工人和建筑工人十二万人的队伍相继跟进。他们高举着许多字标和模型，表明他们在爱国主义竞赛中增产捐献的成就和技术上的创造和改进。他们走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面前时，热烈地向英雄们欢呼致敬。

接着是首都近郊农民三万人的队伍，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机关七万人的队伍，和首都文艺团体八千人组成的文艺大军。

游行的群众抬着毛主席和孙中山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巨像前进。他们一再欢呼毛主席，欢呼祖国，欢呼在朝鲜前线获得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欢呼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

文艺大军走到检阅台前时，大家举起红色黄色的布块，组成“毛主席万岁”和“斯大林万岁”的字样。这时花炮震响起来，在碧空中爆裂出了许多面国旗、军旗和红旗。文艺大军过去之后，广场南面的市民队伍向前聚集检阅台前，向着毛主席长久热烈欢呼，庆祝典礼在欢呼和掌声中结束。^①

^①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日。

自1950年开始，每年的五一节和国庆节几乎都要举行游行庆祝活动。1951年的“五一”游行，因与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活动结合在一起，全国参加游行的群众超过了2亿人，达到空前的规模。1952年的国庆，游行群众为50万人，1953年则为40万人，1954年、1955年又为40万人，1956年则达70万人。这些游行庆祝活动的程式基本上是相同的，看看当年的报纸对1956年国庆游行的报道，便可知其大概：

据新华社1日讯 北京人民热烈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的第一个国庆。今天，有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游行的群众欢呼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今天的游行是在大雨中进行的，游行的群众情绪异常热烈。仪仗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千百面红旗引导着欢乐的人群通过天安门广场。广场两侧街道的两旁，建筑物的平台上，挤满了观看游行的人。浩浩荡荡的十三万人的工人队伍中，许多表明生产成绩的图表和各种工业产品的模型，展示出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人们兴奋地鼓掌向北京二十九个国营工厂和全市地方工业的工人们致敬。他们的生产总值提前达到了1957年的水平。

游行队伍中一辆无轨电车的模型吸引着人们。国庆节前夕，北京工人已经制造出完全用我国的材料作成的无轨电车，它们明年将在首都的街道上行驶。工人们带着许多新产品的模型。今年，在六个月中，北京的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就增加了三百一十三种新产品。工人用各种图表表示他们在提高产品质量方面所做的努力。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坚决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准备条件。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队伍里飘扬着一面红旗，上面

写着“向国际水平进军”的金色大字。后面有八块色彩鲜明的标牌，说明这个厂已有八项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游行队伍中有许多去年国庆节游行时没有见过的工厂的名称：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官厅发电厂和机床开关厂等工厂。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队伍用图表、模型说明全国各地工人的最新成就。刚设计完成的氧气炼钢转炉和四千五百吨沿海油轮的模型，湛江港全景图和最近才由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厂试制成功的和平型机车的模型，引起观礼台上的人们的热烈的欢呼。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的农民的队伍中有许多粮食、蔬菜和水果模型，它们显示今年北京郊区虽然受了水灾，但由于他们积极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发展副业生产，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90%以上的社员收入将比去年增加。

由两万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组成的队伍中，有许多精致的产品模型。

第一次以公私合营企业工作人员参加国庆游行的工商业者当中，有很多人带着妻子和女儿。他们举着“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标语牌。

走在整个大、中学生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七千多名小学教师。女教师们穿着漂亮的衣服。十四万大、中学生手里拿着乐器、花束和彩绸。在这支队伍中，今年又增加了四个新建的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每个队走到检阅台的时候，用各种模型表示了他们的愿望：“我们将掌握原子能，为人类造福”；“我们将制造火箭，揭破月球的秘密”；“我们要把祁连山打穿，戈壁滩钻透，让那黑色的金子像流水般地奔流”。当这支队伍走近观礼台时，参加观礼的教授

们都向他们热烈地招手。

中国科学院的队伍高举标语牌和旗帜，表示决心为实现“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实现发展科学的十二年规划而努力，争取许多最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部门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游行队伍中，今年增加了新建的力学研究所、动力研究室和生物生理研究室等九个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

游行的群众队伍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北京市市长彭真在检阅台上高呼：“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机关工作同志们万岁！”“教师、学生同志们万岁！”“全体市民同志们万岁！”

在游行队伍里升起许多巨大的气球，上面带着“世界和平万岁”的标语。游行的人们不断向检阅台、观礼台上的贵宾和国际友人们欢呼、招手，感谢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对我国的支援。

北京人民非常关心埃及和亚非国家人民的维护主权和独立的斗争。在游行队伍中，有许多关于支持埃及、关于加强亚非各国人民团结的标语。

历来最吸引人的文艺大队今天更加丰富多彩。四十八只雄狮，争抢八个绣球，使广场上下一片沸腾。我国各民族的舞蹈也汇集一起，在音乐伴奏下表演行进。

体育大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男女青年运动员在雨中精神抖擞地作了各种优美的表演，引起观礼台上的人们的热烈掌声。体育大队走过天安门广场后，结束了三个小时的群众游行。这时候，站立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群众队伍欢呼着涌向检阅台。毛泽东主席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员，走到检阅台两侧，向狂欢的人们招手，向观礼台上的国际友人致谢。^①

在每年的五一节、国庆节游行中，每次都有来访的外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被邀请上主席台，与中国领导人一道检阅游行队伍。其中，1957年的五一节的游行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波夫应邀出席了这天的游行庆祝活动。在观礼过程中，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一段很有意义的谈话。

“五一”游行开始时，最先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是仪仗队，组成仪仗队的年轻姑娘身着花色鲜艳的服装，在五颜六色的旗帜陪衬下通过天安门前，伏罗希波夫见了情不自禁地对毛泽东说：“这些姑娘的步伐像受过训练的战士一样，非常整齐，好样的！好样的！”

毛泽东回答说：“这些小娃子们个个都不错。”

接着是少年儿童队伍通过天安门，伏罗希波夫很喜欢小孩，看到孩子们过来了，特别高兴，马上对毛泽东说：“这些孩子们都是我们的未来。中国孩子真可爱呀！只要他们时刻准备着，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天，毛泽东的情绪也非常好，他接过话头说：“是啊，一定要把这些孩子教育培养成人，他们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当看到举着如林的红旗的工人队伍走过来时，伏罗希波夫又说：“这些红旗表示工人阶级为了革命，为了世界人民的幸福流了很多很多的汗和血。”

毛泽东回答说：“是啊，工人阶级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主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日。

体。”

工人队伍之后是农民队伍。伏罗希波夫于是说：“我这次在广州看到了当年您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直到今天，这个讲习所不仅保存得很好，而且仍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毛泽东简单地答道。

伏罗希波夫便接着说：“今天在天安门上看到的这种场面说明过去的三十二年没有白过。三十二年来人民做出的努力今天都开花结果了。”他停了停，立即又用赞扬的语气说道：“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刚刚七年多的光景，你们就办了这么多事。今天的人民所以这样高兴，这是狂欢，就是因为历史上任何王朝、皇帝都办不到的事，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办到了。有了共产党才能够得到今天这样的成果。”

毛泽东对此没有作过多的表示，因为毕竟是客人在赞扬自己。

当工商界的游行队伍出现时，更是引起了伏罗希波夫的无限感慨。他认为中国用和平的办法使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在人类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听到工商界队伍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后，伏罗希波夫说：“中国的资本家真使我们惊奇，我到过许多地方，每个资本家跟我接触时都要讲，幸亏有了马列主义，有了共产党，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这些话实在让我们惊奇。你们对资本家改造的政策实在太英明了。”

毛泽东也颇为感叹地回答道：“是啊，中国这个国家有许多独特的地方，在当时搞革命的时候包括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资本家都跟我们合作过。我们今天的政策是要很好地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游行的队伍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伏罗希波夫从中看出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确有着巨大的威信，他对毛泽东说，根据群众高呼的口号，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此前，毛泽东在同他谈话时曾说过，自己不想当主席了，想到大学去当个教授。于是，伏罗希波夫又重新提起了这个话题，对毛泽东说：“你不当主席？你看人民群众对你是何等的爱戴，何等的尊重。”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都不比我差，都可以接我的班。”^①

1957年五一节之前的几年里，是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凯歌高奏的时期，所以怪不得伏罗希波夫对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对毛泽东赞叹不已。

2. 抹上“大跃进”色彩的“五一”、国庆游行

1958年的历史，与“大跃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在这年的历史记录上，才有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才有那么多今天我们叹息的“奇迹”，才有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吹牛，也才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神话。

这既是人民干劲冲天的一年，也是做了许多违背客观规律蠢事的一年。在同美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斗争中，中国打了个大胜仗，不但取得了炮击金门的胜利，也使美国人始终不敢在台湾海峡动武，还使台湾成了美国的一根绞索，并最终使美国人回到了谈判桌上来。可是，在经济建设上，却打了一个不

^① 参见李越然：《城楼之上论乾坤》，载《庄严的庆典——国庆首都群众游行纪事》。

小的败仗，粮食生产放“卫星”，为“钢铁元帅”升帐，用土高炉炼出一大堆无用的铁疙瘩。从这年的“五一”、国庆节游行，便能看出当年“大跃进”的一个侧面。

1958年5月1日这天，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50万人，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之后，是例行的游行活动。

走在最前面的仪仗队，里面除了每次“五一”游行常用的标语外，还多了一幅标语：“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实际上是当年确定的总路线的内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便是那时名震天下的三面红旗。

在工人的队伍中，工人们唱着“赶上英国”的歌曲，举着许多“赶上英国”字标和各种新产品的实物与模型。“赶上英国”是“大跃进”的战略目标之一。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这一口号时，当时估算的时间为十五年。到了五一节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时候，便缩短了一半的时间，认为只要七八年就够了。随着“大跃进”的深入，进一步认为七八年还是久了，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二三年就够了。

在农民的游行队伍中，“黄忠”生产队的老年队员劲头十足地擂着大鼓；“武松”生产队的壮年队员挥舞着“决心大似天，勇气似海浪”的标语牌；“穆桂英”生产队的女队员则举着“气死老龙王，干旱保全苗”的喜报，这倒也充分反映了农民的干劲。从1957年冬起，全国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实是空前高涨，可惜的是这种积极性后来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好，甚至白白地耗费在许多不切实际的事情上。

广场上出现了来自19个省、市的54种新式农具。在“群众智慧无穷无尽，农具改革遍地开花”的标语牌下，河南省长葛县增福乡先进第一农业合作社社员王玉顺带着他创造的双铧犁参加了游行。

长葛县在“大跃进”开始时曾很出名，因为这个县创造了深翻土地的经验。“五一”游行前，长葛县33万亩土地深翻了一遍，深度在1.5尺左右，计划在年内使全县的112万亩土地全都来个“大翻身”。据该县县委书记介绍，土地深翻，可以充分发挥水、肥的效能，能增加百分之几十甚至一倍、几倍。后来，长葛的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并号召全国学习。这一学习到了有些地方，却变成了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竟翻到了一丈二尺深。

双铧犁是那时大力推介的一种农具，为了推广使用双铧犁，《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过社论。双铧犁在一些地方能提高生产效率，但并不普遍适用。农具部门生产出大量的双铧犁后，结果卖不出去，造成很大的浪费。

北京钢铁学院的游行队伍中，600个学生每人举着一支向着天安门盛开的“向日葵”，葵花中显露出“把心交给党”几个大红字。生动地体现了正在开展的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北京师范大学抬来了一个大西瓜模型，西瓜外面写着“大破大立，兴无灭资”八个字。到天安门前时，大西瓜突然分裂成五角红星，从中竖起了“红透专深”四个大字。

抬出大西瓜，反映的是此时正在“双反”（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中，学生们向老师送“西瓜”的情况。所谓“西瓜”，就是那些被认为是典型的、对老师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评得深刻的大字报。贴这样的大字报，被称之为“送西瓜”。“双反”运动中不少高校还专门开辟了“西瓜园”。

游行队伍中，有来自河北徐水县的500名农民，他们擂着26面直径达6尺的大面鼓，200多副大钹随着鼓声起伏。

请来徐水的农民，是因为徐水在1957年冬的水利建设中，为推动水利建设，县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导精神，在全县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反对阻碍“大跃进”的保守思想，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对群众搞自我教育，做什么辩什么，水利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徐水的做法得到了自地委直至中央的重视，《人民日报》还特地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向徐水看齐。

徐水搞水利建设时实行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为随后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开了路。

“五一”庆祝游行时，“大跃进”还刚发动不久，人民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因而整体上它反映出了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958年的国庆大游行，“大跃进”的色彩就更浓了。可以说，这次游行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浓缩。

参加国庆大游行的群众达60万人。

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是“钢铁元帅”。“一定要拿下一〇七〇万吨钢”，是“钢铁元帅”的“军旗”。随之而来的是抬着转炉、电炉、高炉和成群的土高炉模型的队伍。

接着，冶金工业部的游行队伍中又出现了一群银灰色的土高炉模型，模型前面的一条飘带上写着：全国已建成小高炉、土高炉70万座。游行队伍还传阅着刚刚散发的红色喜报，内称：9月29日，全国日产钢近6万吨，日产铁30万吨，分别比8月份增加了165%和1020%。

钢铁产量是当年提出“超英赶美”的重要指标。英国那时的钢年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有3300万吨，因而冶金部提出，如果1962年达到1700万吨到2000万吨，则我国的钢铁工业的大小基地初步在全国铺开了，那么，到1967年钢产量就能达到3500万~4000万吨，这样

的话，十年超过英国是可能的。为此，确定了1958年的钢产量为800万~850万吨。

可是，“超英”的时间随后不断地被缩短，甚至认为不用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英国。既然如此，1958年的钢产量也必须相应增加，于是，经毛泽东同意，这年的钢产量计划为1070万吨。

1957年全国钢的实际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计划为1070万吨，等于比上年翻一番还多。这个数字确定之后，即使全国所有的钢铁企业开足马力，也难以完成，只得发动群众土法上马，用土高炉炼铁炼钢。结果，全国各地土高炉遍地开花，连国家部委的大院、大专院校的校园，都冒出了一座座土高炉。游行队伍中出现的土高炉模型，是全民大炼钢的真实写照。

看到这些土高炉模型，被邀请来观礼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文科夫对身旁的刘少奇说：“你们一天能生产这么多吨钢铁，真是了不起的速度。”

刘少奇回答说：“这是六亿人民组织起来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结果。”

契尔文科夫又说：“按这个速度，赶上和超过英国看来用不了十五年。”

刘少奇答称：“可以大大缩短。”

游行队伍一边走过天安门城楼前，一边高呼“全民动员，保证钢铁翻一番”的口号，周恩来指着广场上的土高炉向朝鲜大使李周渊说：“我们生产那么多铁，主要靠这些土炉子。”李周渊连连点头。

“钢铁元帅”的队伍走过去了，“机床元帅”又来了，游行的队伍抬着巨大的机床模型，紧跟其后的是国产的汽车和拖拉

机。

“大跃进”时，钢铁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真是千军万马全民大炼钢铁。到国庆之后，全国投入钢铁生产的近1亿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元帅”。为了保证“元帅”，确定了两个“先行官”，一个为电力，一个为交通，因为没有这两个“先行官”，“元帅”无法升帐。钢铁大军的游行队伍过去之后，电力、交通部门的游行队伍紧跟上来。

在农民组成的队伍中，老年社员用笙、箫、管、笛吹奏着丰收的乐曲，青年社员手持麦穗跳着丰收舞，女社员唱着“千斤乡出现在全国”的歌曲。当游行的队伍经过天安门时，人群中飞出了一群气球，带着巨幅标语冲上天空。

粮食元帅升帐，产量跃进一倍。

小麦总产量八百亿斤，超过了美国。

棉花产量翻一番，跃居世界第一。

以深翻土地而闻名的通州区五个女社员和十八个男社员，扛着深掘锹，打着竹板，在人群中唱道：“深翻麦田一尺半，每亩施肥二十万，麦产指标亩八千，力争突破万斤关，为了共产主义早实现。”

从1958年6月起，全国出现了将农业合作社由小社并为大社的高潮，随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称呼，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又叫集体农庄的，也有叫共产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人民公社”。于是，国庆游行中，人民公社的社员抬着“人民公社好”的大字牌，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队伍中还有画有图表的字牌，上面标明全国参加公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0.4%。

在炮击金门时，全国开始大办民兵师。由此，游行的队伍中有由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组成的七个首都民兵师，分成

二十一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工人民兵身穿黑色劳动服，头戴柳条安全帽，走在最前列。相继而来的是头扎白毛巾的农民民兵，身着白上衣、蓝裤子的学生民兵和穿着普遍服装的干部民兵。

契尔文科夫对中国人的组织能力颇为佩服，他指着民兵队伍问毛泽东：“他们组织起来有多久？”

毛泽东笑着告诉他：“还不到一个月呢？”

他还告诉契尔文科夫：“北京已经有了五十个民兵师，全国各地的民兵在很短时间就组织起来了。参加民兵进行军事训练，人们的身体很快就好起来，工人和农民生产更好了，学生学习更好了，干部也工作得更好了。”又说：“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

刘少奇也告诉契尔文科夫：“到处是兵，侵略者寸步难行。”

“大跃进”的“跃进”是方方面面的，除了“元帅”和“先行官”在“跃进”外，各行各业都在“跃进”，连县、乡办大学的新闻，也不断见诸报刊，更有几个月、个把月实现了无文盲县、乡的。各高等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也被打乱，师生们大量的精力用在大炼钢铁和勤工俭学上。在“不要迷信教授”的口号下，学生们不仅自己编教材，而且在放科研成果的“卫星”。于是，游行队伍中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工农行列中有很多学生，而学生队伍里又有很多工人和农民。在国庆前刚刚成为无文盲区的海淀区农民，今天抬着一支大火箭模型，上面写着他们向文化进军的新指标。

各个高等学校的学生今天第一次拿着自己的劳动生产和科学研究成果的模式图表参加了游行。这些图表上写

六、“五一”、国庆游行十六年

着：地质勘探学院的师生在两个月内找出了储藏量达一百五十亿吨的铁矿；北京大学的师生苦战四十天，科学研究成果四千一百三十九项，超过了过去二十年研究数目的总和；北京师范大学上山、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的师生已达十万个劳动日。在清华大学的队伍里，有一批从校办工厂来的学生，穿着工作服，头戴电焊面罩。他们个个面孔黑红，一再举起手中的铁锹、铁锤、铁棍等生产工具，高呼“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走过了天安门广场。^①

当然，游行队伍中，还有1.5万人的体育大军及手工业合作社的社员、少先队员、工商业者、市民和宗教界人士。一支8000人组成的文艺队伍，一边游行一边表演“丰收舞”等节目。

国庆节，对生活在新中国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翻了身、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完全有理由为之高歌，为之欢呼，为之自豪和激动。在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人们的情绪更高昂，语言更豪迈，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 国庆十周年大游行

中国人历来有逢五、逢十进行庆祝的习惯。1959年的国庆，是年轻的共和国十周年华诞。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70万人的盛大游行。

为了让人民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尽情狂欢，特地扩建了天安门广场。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日。

自开国大典之后，天安门广场就成了首都集会、庆典、游行最重要的场所。虽说 1952 年 8 月拆掉了东、西三座门，1955 年又拆除了广场中部的东西红墙，扩展了广场南部，铺了水泥路面，但仍有广场狭小之感。

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如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等，同时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任务，当然是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北京市肩上。

1958 年 9 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要在建国十周年前夕改建好天安门广场的指示，还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扩建广场的质量要好、艺术要精的要求。

北京市把广场的扩建当做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为了做好广场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北京市发动全市的城建工作者，并邀请全国 1000 多名建筑师和艺术家，参加广场的规划设计竞赛，最后从众多的方案中，归纳、筛选，取长补短，形成了一个综合方案。

方案从把天安门广场建造成“百万人广场”的要求出发，认为不论是广场的实际功能，还是体现中国的民族气魄，以及满足政治活动的需要，广场的规模都要大。确定从天安门到正阳门，广场的南北长度为 880 米，宽度为 500 米。确定在广场的两侧建人民大会堂，在广场的东侧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12 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批准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和施工方案。

广场扩建从 1958 年 11 月正式开工，到 1959 年 8 月底基

本完工。

广场扩建后，面积增加了两倍多，由原来的 11 万平方米，扩大到 40 万平方米，能同时容纳 40 万人在这里集会。

扩建以后的天安门广场，从规模上、建筑艺术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和革新。广场的西、东两侧是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广场中央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是前门和箭楼。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仍然点缀在天安门的两边。广场的两翼联结着宽阔绵长的东西长安街。置身广场中，四望辽阔，天安门巍然屹立。国徽和门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大字标语，金光灿烂。扩建后的玉带河清彻明净，倒映着红墙、绿树、玉石桥。它的北岸的观礼台经过扩建，容纳量也由过去的 1.2 万人增加到 2.2 万人。

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天上地下都经过了改造。原来广场上空有很多纵横交错的电线网，这一次工人们在铺装路面之前，预先埋设了各种地下管线。其中有供水、污水、雨水、煤气、热力、电力、广播、电话等各种管线 110 公里长。这些管线种类很多，有平行的，有交叉的，密如蛛网。埋设工作十分细致复杂，而且要照顾长远规划和将来进一步的扩建工程。现在广场上除了绿树明灯之外，找不到一根高架线，显得非常整齐美观。

天安门前的道路是首都最漂亮、最坚固、最广阔的道路。整个广场和广场的道路全部是用花岗石、沥青混凝土和水泥方砖铺成。铺设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整个广场的路基都经过了彻底大翻修，路基筑得非常平整结实。为了保证节日游行车辆和坦克等重型武器通过，游行大道拓宽为 1000 米长、80 米宽，可容 150 路纵队的游行队伍通过。其中天安门前 390 米长

的一段，用一米长、半米宽的花岗石铺成了人字形花纹的道路。广场其他部分全部用沥青或混凝土方砖铺设。

新扩建的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四季常青的广场。广场周围、东西长安街上和纪念碑南面，新近移植来相当粗大的油松、立柳、枫树近1万棵，人民大会堂和博物馆门前新铺草坪3万多平方米。另外，还栽种了大片月季、玉兰和云杉。整个广场可以随季节的变化，松青柳翠，散发各种花香。

扩建后的广场上，矗立着几百座高大的乳白色的灯座，有葡萄状的，有玉兰形的，有莲花状的，有棉桃状的。每一个灯座上都有九个直径五十公分大的乳白大灯和十六个聚光灯。在节日的夜里，天安门城楼、广场周围和东西长安街上的高大建筑物轮廓，被无数像串连起来的夜明珠样的电灯勾画出来，千姿百态，各具特殊风格。^①

广场扩建好之后，见了这宏伟壮观的广场，郭沫若先生不禁诗兴大发，秉笔写出了《北京颂》。其中一段是描写天安门的：

坦坦荡荡，大大方方；
巍巍峨峨，正正堂堂；
雄雄赳赳，磅礴磅磅；
轰轰烈烈，炜炜煌煌。

天安门广场尚未完全竣工之时，国庆十周年大游行的准备工作就已开始了。

1959年6月，北京市成立了游行指挥部。

游行指挥部在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在广场参加国庆庆典的人数为10万人，在广场的中心由群众组成国徽图案，

^①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7日。

六、“五一”、国庆游行十六年

在国徽图案两侧组成“1949”和“1959”数字字样，空中以气球悬挂标语作为装饰。

这一方案得到了北京市委的批准。

于是，游行指挥部即着手广场上图案的编排、人员分工等具体事宜。

广场上队伍的组成是：少先队列队在广场北端，位于军乐队两侧，手持各色鲜花、花球和小彩色气球；大学生在广场中心组成国徽图案；工人在国徽两侧组成“1949”和“1959”字样；国家工作人员列队在广场西侧路，城区队伍列队广场东侧路，各以各色彩花为国徽镶边。

大会开始和结束时，放各色小气球 5000 个。大会结束后，10 万人的队伍一齐涌向天安门金水桥前向毛泽东欢呼。

国徽图案的组成需要 2 万人，要把这么多的人组成一个图案可不是件简单的事。为此，具体负责组字指挥的市总工会的王春宜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高君明，想出了在图纸上用圆规画小圆圈，一个小圆圈代表一个人，小圆圈画好后，按国徽颜色着色的办法。这一办法虽然笨一点，也很繁琐，但很实用、有效。

为了使图案有立体感，他们又找来了四号铅字，每个铅字代表一个人，摆放在小圆圈里。这件事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不容易，2 万人组成图案，就得摆 2 万个铅字，密密麻麻地摆上一大片，如不小心，碰倒其中的一个字，就会倒下一大堆，又得重新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次努力，模型成功了。

游行指挥部领导审看了国徽图案模型后，觉得大致可以。但模型毕竟是模型，实际效果怎么样，指挥部的领导心中也没有底。最后，指挥部决定，对方案进行讨论修改，进行预演，

从中改进不足，力争拿出最佳方案，表现出最佳效果。

于是，把图纸和人数落实到广场上的工作开始了。广场地区的方砖的大小是50厘米×50厘米，为了节省人员，又不影响效果，决定东西方向每块砖上站一个人，南北方向是隔几块砖站一个人，从南到北由隔两块砖到四块砖不等。

这样计算下来，组成国徽图案需19441人，两侧的年号需32661人。为了防止站错，就需要把每块砖都编上号，对号入场。^①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艰苦的训练，组图组字获得了巨大成功。国庆游行那天，得到了中央领导人和外宾的一致好评。

组图组字不过是整个国庆游行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几十万人的集会和游行，出一点小差错，就可能酿成大事故。游行指挥部规定，大游行中各个具有表演性的项目必须预演三次，每次至少两遍。为了避免庞大队伍妨碍交通，预演总是在午夜零点开始。由游行指挥部根据第一遍的情况提出改正意见，在第二遍纠正。

国庆游行前，这10万人的表演队伍摆在天安门广场，上厕所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原来以为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地下都有厕所，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图上地下也是有厕所的。当工作人员检查场地时，才发现大会堂的地下厕所在施工中被取消了。集会和游行的队伍入场早，尤其是组图组字队伍，早上7点钟就要入场，到12点才可散场，中间5个多小时，若一人上一至两次厕所，数量相当可观。

指挥部想来想去，还是只得采取临时措施，在纪念碑的西南角搭建大批临时厕所。将刚刚铺好的草坪毁掉，实在可惜。

^① 参见《庄严的庆典——国庆首都群众游行纪事》，第116—117页。

可是，不这样做又不行，否则，就会出现几万人上厕所绕道和排队等候的问题。

天安门金水桥东西 500 米的地段，是游行队伍亮相的关键部位。但就在这关键部位，常出问题。

每次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时，游行指挥部都是一再叮嘱各游行方队，在这 500 米的地段，既要热情，又要队形整齐。可是，队伍一旦接到游行的指令，由东向西行进，经过天安门主席台，看到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那高大身躯时，游行的群众无不心情激动。每个人都想看得更真切一些，也离得更近一些，停留的时间长一些。这样一来，游行的队伍就不是直线前进，而是向天安门城楼方向靠拢，队伍也就发生了扭曲，成了“S”形。有人将此戏称为在天安门前扭秧歌。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再出现，游行指挥部在南池子路口到南长安街路口 1000 米地段，设置了八至十条标兵线。标兵身着白衬衣，佩带“标兵”臂章，游行队伍必须在两排标兵间前进，这样避免了游行队伍向主席台靠近，解决了天安门前扭秧歌的问题。

10 月 1 日这天，北京天气晴朗，碧空万里。上午 10 点，在震天的礼炮声和国歌声中，国庆十年庆典开始了。

9 点 55 分，毛泽东、刘少奇和特地来参加中国国庆的赫鲁晓夫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庆祝大会可谓盛况空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全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此外，参加庆典的还有胡志明、金日成、泽登巴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六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团长和党的代表，朝鲜和越南的军事代表团，八个亚非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

在规模宏大的阅兵式后，70万名游行的群众沿着宽阔的东长安街排成了150路纵队，向天安门广场浩浩荡荡地行进。

天安门前，奏起了《歌颂祖国》的乐曲，由1.5万名工人、学生组成的仪仗队，抬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横幅大标语，整齐地前进。十个金色的插满鲜花的花篮，托着巨大的国徽和几幅彩色的图表，记载着建国十年来钢、煤、粮、棉的发展速度。

接着是少先队的队伍进了广场。十朵巨大的牡丹花环绕着镰刀斧头的党旗，红花绿叶拱托着一篮大寿桃，标语牌上写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孩子们一边欢呼，一边摇动手中的花束。1400名少先队员抬着毛泽东的巨大塑像前进，四个花灯形状的气球从花丛中腾空而起，气球上面写着“天天向上”四个大字。

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中，大型高炉、平炉、电炉、转炉和一组小土高炉的模型，随同队伍一道前进。工人们一边行走，一边呼喊“坚决超额完成今年一千二百万吨钢的任务”！游行的队伍中还有许多巨大的模型和图表，上面记载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随后是农民的队伍。队伍中有两幅巨大的标语牌，其一为“人民公社万岁”，其二为“为提前和超额完成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而奋斗”，两条标语横贯在整个队伍之中。一会儿，农民的队伍中，出现了一大批家畜家禽的模型，肥胖的猪羊、奶牛，展翅欲飞的大鸡大鸭，还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儿童骑在两只羊的模型上，高兴地向群众招手。队伍中，还有一队农民抱着大白菜，向着天安门欢呼。

农民队伍之后，是工人、干部共1.3万人组成的“首都民兵师”，其中包括战斗兵、通讯兵、卫生兵等兵种，配带着步

枪、机枪，还有六〇炮和迫击炮。

在随后来的学生队伍中，有一条巨龙和一只彩色凤凰在凌空跃起。文艺队伍抬着“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标语牌，二十辆彩车上演着反映“大跃进”的话剧《降龙伏虎》、描写新四军的话剧《东进序曲》、京剧《杨门女将》、汉剧《二度梅》、越剧《红楼梦》等优秀节目的舞台片断。由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的代表组成的体育队伍，身着各种运动服，齐整地舞着火炬、棍棒、哑铃，在汽车和摩托车上做着重木马、单杠、双杠、吊环等体操表演。

12点半，游行队伍的最后一部分通过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南部组成国徽等图案的11万人，一齐涌向金水桥畔，涌向天安门前，欢呼声响彻了天安门上空。^①

这次国庆，与以往国庆相比有几个不同之处。

一是规模之大，场面之热烈，是以往没有的。因为这是十年大庆，固然要通过国庆游行体现建国十年的成就，但也符合中国人民逢五、逢十大庆的民俗。

二是担任阅兵总指挥的，以往都是彭德怀，这次换上了林彪。在国庆前两个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问题提了不同意见，结果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头子，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由林彪继任。由此林彪的地位不断上升。

三是出席庆典的外宾之多，是过去没有过的。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赫鲁晓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观看游行时，发生了一个细节。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我们在军事技术方面想给你们一点援助，其中包括原子弹方面的技术资料，还要不要给你们。言下之意是不想给了。毛泽东表示，你们能给或者愿意给

^① 《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日。

更好，如果不能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这时中苏关系已出现了裂缝，赫鲁晓夫从北京一抽身，到了海参崴后就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并在第二年突然撤走了苏联专家，中断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

在这次国庆游行体现的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则是“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有些地方在北京热热闹闹庆祝国庆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国庆节刚刚一过，毛泽东即乘车南下视察，从而也发现了不少他在北京见不到、听不到的问题。

4.60年代前期的几次国庆游行

国庆十周年大游行之后，一直到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大游行，这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年份的国庆节都有游行庆祝活动。游行的方式，诸如列队通过天安门前，队伍中抬着各种不同的模型，一路行走一路呼喊口号，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游行的一些内容，在不同的年份却有很大的差异，及时地体现出了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

1960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50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

在游行队伍中，有两幅特别引人注目的巨大横幅字标，一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二是“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革命旗帜前进”。

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地打出这两幅字标。

在这年3月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三大上，赫鲁晓夫率领大多数与会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对中共代表团发动突然袭击，组织全面围攻，给中共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

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并未被赫鲁晓夫的气势汹汹所吓

倒，而是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没有得到任何便宜，但他不甘心，便在国家关系上向中国大施压力。

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要把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且不等中国答复，就于7月25日通知中方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将在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苏联还中止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赫鲁晓夫此举严重地恶化了两国关系，中国自然不会被赫鲁晓夫的要挟所吓倒。但是，中国不希望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不愿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希望苏共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遵照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

1960年是继1958年后“再跃进”的一年。“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1958年，一个是1960年。1960年的“大跃进”同样提出了一系列的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而且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公共食堂情有独钟，中共中央曾发出指示，1960年全国要实现公共食堂普遍化，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食堂吃饭。于是，游行队伍中有了这样的场面：

在一群土、洋炼钢炉模型的前后左右，有着许多生产生铁、焦炭、原煤的大小高炉、焦炉和竖井的模型，身穿工作服的工人，在载着模型的卡车上表演着生产操作的情景。去年的今天，他们高呼着超额完成一千二百万吨钢的口号从天安门走过，今天，一幅标语牌上写着更高的目标：“为超额完成一八四零万吨钢而奋斗。”

在朝阳人民公社的队伍里，出现了一群穿着白色工作

服的炊事员和穿着花毛衣的保留员。她们挥舞着花束，在公社党委书记率领下，前来参加游行。和她们并肩行走的社员们，一致赞扬她们把全社四百七十个公共食堂和托儿组织办得很出色，使99%以上的社员都喜爱在食堂用饭，全社因此腾出七千名女劳动力到农业生产第一线。^①

1961年的国庆游行，参加的群众也是50万人。这年的国庆游行，是在因“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我国正在遭受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扭转经济的被动局面，1961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次游行中，这八字方针也有所体现。

在游行的工人队伍中，钢铁工人虽然仍走在最前面，但队伍中只有钢铁联合企业的模型，1958年和1959年国庆游行时抬着的那种小高炉、土高炉的模型不见了。而工人的队伍中，还出现了许多的鞋帽、服装、文具、收音机、针织品、搪瓷脸盆、小百货等实物和模型，合成洗涤剂、塑料、尼龙制品也出现在游行的队伍中。这表明，以前的那种一切“以钢为纲”的局面正在改变，轻工业品的生产开始受到重视，轻重工业严重比例失调的现象正在纠正。

1962年的国庆游行中，有两句引人注目的标语，一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一为“大力支援农业，发展农业生产”。

这两句标语，体现出的是当是国民经济的调整政策。

^① 《人民日报》，1960年10月2日。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不但未使中国经济出现跃进局面，反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不少地方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甚至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局势仍很严峻。为此，在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当时全党应着重抓好的两项中心工作：一是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二是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切实加强农业。这两条标语，正是这两项中心工作的写照。

1963年，中国已经从三年暂时困难的阴影中走出来，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并有所发展，人民生活与前几年相比也有了很大改善。这种状况，1963年的国庆游行也有所反映。当年的报道如是说：

“一幅幅图表和各种各样的模型，反映了我国工业部门在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进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后，获得的新成就：今年头八个月和去年同期比较，全国大中型各种拖拉机的产量增长百分之三十，半机械化农具增长百分之八十，排灌机械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五。一辆彩车上堆放着大袋化肥和农药的模型，今年头八个月，全国这两种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和百分之二十七点三。”

“五光十色的轻工业产品彩车上，陈列了罐头食品、面包、葡萄酒、鞋帽、钟表、缝纫机、高级金笔等丰富多彩的产品。……各种色彩鲜明的塑料制品，摆满了另外一辆彩车。北京纺织工人们带来了各种新品种新花色的花布、丝绸、呢绒，以及各种化学纤维纺织品，这些产品在纺织工业的彩车上，组成了一座座五彩缤纷的彩塔。”

“郊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带来了丰收的喜讯。他们拥有各种农产品彩车和巨大模型，表明北京郊区农村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由于人民公社越办越好，今年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两座高大的粮食塔上，堆满了郊区丰收的实物：一尺左右长的粗壮玉米，沉甸甸的金黄稻穗，籽粒肥壮的麦穗。由国产拖拉机牵引的巨大模型，引起人们的欢跃，这里有鲜艳的大蜜桃、葡萄、梨、柿等水果，硕大的白菜、西红柿、茄子、青椒，肥壮的乳牛、猪、北京鸭，这些说明，郊区正生产丰富的副食品供应首都市场”。

“在首都商业工作者队伍里，许多图表、模型，表示了市场上的一片兴旺的景象：副食品成倍增加，百货品种增多，储蓄额不断上升。全市最大的百货商店王府井百货商店的彩车上，摆满了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商品。”^①

与往年不同的是，游行队伍中突出了这样的横幅：“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团结万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为什么？

其实原因也并不复杂。

进入6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曾采取了一些缓和中苏关系的举措。但是，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却不理睬中共的良苦用心，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致使中苏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

7月20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的这封公开信，并加按语说：“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

^① 《人民日报》，1963年10月2日。

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

9月6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后中共中央又陆续发表了八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九篇文章，后来简称为“九评”）。

这篇文章说，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文章进一步认为，苏共二十二大之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自己制订的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政策”。因此，中共认为，苏共领导集团已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演变为现代修正主义，因而在这年国庆游行出现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标语口号。

1964年的国庆游行，参加的群众多达70万人，这是建国以来国庆游行中人数较多的一次。

1965年的国庆游行，参加的群众比上年略有减少，与多数年份一样，为50万人。这次游行中有一条新出现的标语——“发扬大寨精神”。

“农业学大寨”曾是一句国人皆知的口号，大寨也成了全国人民熟知的农业战线的红旗。虽然在此之前，大寨的艰苦奋斗的经验就得到山西省委和中共华北局的肯定与重视，但大寨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还是1964年和1965年的事情。

1964年开始，大寨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插话

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在6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再次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从此，毛泽东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4年12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升起，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

于是，“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兴大寨之风，做大寨人”，“发扬大寨精神”，“奋发学大寨、立志争上游”的口号不断涌现，“农业学大寨”也就很快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并且有了1965年国庆游行中的“发扬大寨精神”的标语。

1965年的国庆游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游行的学生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半工半读的学生。新华社在关于1965年国庆游行的电讯中说：“在九万多名大中学生的行列中，第一次出现了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的学生队伍。几十面校旗和横幅门旗迎风招展，大幅宣传画和模型显示着半工（农）半读教育事业取得的新成果，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发展。北京农业大学分校的半农半读学生，从河北涿县赶来参加国庆游行。他们黑黑的脸庞，肩背草帽，一手握镰，一手拿书，簇拥着一辆大型彩车缓缓前进。彩车上立着四米多长的‘大麦穗’，‘大麦穗’上写着五个红彤彤的大字‘半农半读好’。”^①

半工（农）半读制度是当时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

^① 《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日。

制度的具体运用。

这种劳动与教育制度的提出者是刘少奇。

早在1958年5月，刘少奇就提出，我国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整天都是读书；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辅而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一种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

1964年，刘少奇又多次谈到半工半读的问题，他还曾明确提出，要另设一个教育厅，专门管理这件事。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些省市曾经成立了第二教育厅（局），专管半工半读教育工作，一些半工半读的中学、大学也相继创办。这样，1965年的国庆游行队伍中才有了半工半读的学生队伍。

自50年代以来，每年的国庆游行都是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主持，而且在游行前，一般都由彭真发表讲话。这年的国庆游行前，彭真照例发表了讲话，不过，这对彭真来说，是最后一次在国庆游行前的讲话了。半年之后，彭真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此后的几年，虽然每年的国庆还有游行庆祝活动，但一大批的老革命家、老干部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也就失去了出席国庆游行观礼的资格。

七、支持各国人民正义事业大游行

1. 支持日本人民安保斗争

进入60年代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几年间，除了例行的“五一”、“国庆”庆祝活动外，为了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与外来干涉的斗争，多次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60年代初，中国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是支持南朝鲜人民的反美斗争。

50年代末，南朝鲜人民由于不堪忍受美国的殖民奴役和李承晚集团的专制独裁统治，不断地进行反对李承晚统治，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的斗争。进入60年代后，斗争规模不断扩大。1960年3月、4月，南朝鲜广大人民面对美李集团的刺刀、枪弹和坦克，展开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遍及南朝鲜大中城市的持续不断的大示威。他们提出了“不自由勿宁死”、“打倒李承晚政府”和“美军撤出南朝鲜”等口号，向美李集团发动了强大的冲击。

为了支持南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1960年4月28日，北京60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声威游行和集会。

这天中午，从大街小巷涌来无数支队伍，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旗帜，抬着漫画和标语牌，呼喊口号，向天安门广场集

中。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如是说：

很难形容北京人民对南朝鲜人民爱国正义斗争的关怀心情。几天以来，千千万万的人争着看报纸，听广播，密切注视着南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今天，他们结成数十万人的强大队伍，怀着激动的心情，高呼：“坚决支援南朝鲜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坚决反对美李反动集团屠杀南朝鲜人民！”“坚决支援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他们一致要求美帝国主义立即从南朝鲜滚出去！从日本滚出去！从南越滚出去！从我国的领土台湾滚出去！北京发出的这些响彻云霄的呼声，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呼声。

今天在北京示威游行的队伍里，有来自工厂、学校、机关、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的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成员，还有应邀参加我国“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的数十个国家的外宾。

上午十一时，北京主要街道上拥挤着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人群。许多来自高炉旁和纺纱机旁的工人，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工作服，就参加了游行队伍。一些五六十岁的老大娘，手挽着手走向天安门广场。在许多学生的队伍里，青年们扮演了南朝鲜人民活捉美国佬和卖国贼李承晚、李起鹏的活报剧。当他们走过街头时，沿途人们发出了一片笑声和掌声。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昨天连夜编了大批歌曲，今天他们高歌前进：“打倒卖国贼，赶走美国狼，南朝鲜人民要解放，朝鲜人民要统一。……六万万人民支持你们，正义的斗争一定胜利！”

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的职工们，都为南朝鲜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初步胜利欢呼。一些纺织女工，从十几里路以外的工厂来到天安门广场。她们说，我们过去有着同南

朝鲜人民一样的遭遇，美帝国主义是南朝鲜人民痛苦的根源，必须挖掉这个祸根！北京汽车制造厂老工人张永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曾经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听到今天要举行支援南朝鲜人民爱国正义斗争大会，立即放下锤头，赶到会场，他激动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举着双手跳起来和人们一起连连不断地高呼着口号。这位工人现在过着幸福的生活，他在天安门广场上作了一首诗赠给南朝鲜人民：“美国鬼子野心狼，外强中干瞎猖狂，人民起义齐喊打，美国鬼子心发慌，正义呼声震山岛，李承晚投入海中央！”

数百农民从郊区清河人民公社赶来。他们说，朝鲜人民是我们的亲兄弟，我们一定要支援他们。这个公社的社员侯俊说，李承晚就跟蒋介石一个样，他在南朝鲜横行霸道，胡糟蹋人，现在李承晚下台了，但是只有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南朝鲜人民才能过幸福生活。

南朝鲜人民的斗争一定能胜利——胸前挂满了奖章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员军人坚信这一点。在今天愤怒的人群里，有着队伍严整的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福建省泉州市北峰人民公社民兵团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员军人魏昭燦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侵略军是我们的手下败卒，我们坚决支援南朝鲜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把美国强盗从南朝鲜赶出去。山东即墨栲栳人民公社民兵代表王本清说：我两个儿子就是为了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牺牲在上甘岭。今天，美帝国主义再来干涉南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我绝不容许。

首都四十多个高等学校的师生，今天组成了一支四万人的雄壮队伍，浩浩荡荡向天安门广场汇集。北京大学的

七、支持各国人民正义事业大游行

学生们，以激动的心情表示全力支援南朝鲜人民的斗争。东语系朝鲜语专业的学生们，为南朝鲜人民震撼山河的斗争所鼓舞，连夜赶写出诗歌，歌颂南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今天他们这支宣传队伍走到那里，那里就响起“怒火燃烧，吼声震天，要彻底打垮李承晚反动集团，朝鲜人民和平统一一定要实现”的歌声。清华大学水利系一年级的二百多名学生进城参加大会时，在列车上就创作了支持南朝鲜人民斗争的诗歌二百多首。

首都文艺工作者，抑制不住他们激动的心情。一群美术工作者带着他们连夜赶画出来的十多幅漫画参加大会。一些诗人当场写下诗篇高声朗诵。诗人王亚凡高声朗诵：“请看今日的南朝鲜，马山义旗迎风漫卷，万众一心起来斗争，斗争怒潮如火燎原……”诗人徐迟握紧拳头激昂的朗诵道：“黑暗日子已受够，法西斯统治要到头，被压迫民族要自由，人民要复仇！”

从城市人民公社里，走出了成千上万的街道妇女，涌向天安门广场。她们说，听到美李反动集团屠杀南朝鲜人民的消息，好似勾起了旧日痛苦生活的恶梦。西长安街公社的女社员崔连云说，朝鲜是红半边，黑半边。北朝鲜是天堂，南朝鲜是地狱。我相信南朝鲜人民坚持斗争下去，离天亮就不远了。^①

参加这次游行示威大会的，还有来自朝鲜、苏联、越南、拉丁美洲和非洲二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

支持南朝鲜人民反对美李集团斗争的示威游行还没有停息

^① 《人民日报》，1960年4月29日。

几天，支持日本人民安保斗争、反对军事同盟的示威游行又开始了。^①

《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于1951年9月8日，也就是在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一天签订的。条约分为前言和五条正文，文字虽然不长，却给美国以无条件驻军日本领土及其周围的权利。条约第一条规定：“在和约和本条约生效之日，由日本授予美利坚合众国接受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美国陆、空、海军之权利。”驻日美军可以“根据日本政府的明显要求，为镇压由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所给予的协助”。条约还规定，日本未经美国同意不得将基地及与基地有关权利给予第三国等等。这个条约名义上是双边性质的，但实际上是个日本以牺牲自己的行动自由和平等地位，换取美国对其安全保障的不平等条约。

日本方面其实也意识到了条约的不平等性。1957年6月日本首相岸信介访美起，日美就开始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会谈。6月21日，岸信介与艾森豪威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认为安全条约“本质上是作为暂时规定而制订的，不能让其原封不动的形式一直存在下去”。8月，两国设立了日美安全保障委员会。1958年9月，藤山爱一郎外相正式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修改条约的问题，得到美国的同意。10月，修改条约的谈判在东京开始。日美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讨价还价，终于在1960年1月19日签署了《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即新《日美安保条约》。该条约同时附有有关实施细则的五个附属文件，以及有关驻日美军地位的一个协定与两个附属文件。

^① 日本人民的安保斗争，源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签订。

新《日美安保条约》与原安全条约相比，其共同点是：许可美军常驻日本并使用日本国内的设施和地区；美军不只是为了日本的安全，而且为了远东的安全也可以使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其不同点在于：（一）以明确与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方式确立了日美平等承担义务；（二）明确了美国防卫日本的义务；（三）规定当美国受到武力攻击时，日本基于集体自卫权有采取共同行动的义务；（四）规定日本在服从宪法这一保留条件下，必须逐年增加自卫力量；（五）强调了日美协商原则；（六）删除了有损日本尊严的内乱条款，等等。

同时，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结束了《旧金山和约》以来美国对日本的半占领状态，使美日从原来的父子从属关系转变为大兄弟与小兄弟的伙伴关系，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但是，该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变成了美国称霸世界在亚洲为所欲为的得力助手，加大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性，增大了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而且该条约的签订，正值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之时，日本在此时扩充军备和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不能不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与强烈反对，尤其是条约谈判与签订过程中有关远东范围的解释，^①更是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和新条约的签订，不仅遭到了中国与苏联的反对，而且引起日本人民的担忧与不满，使饱受战争之苦的日本人民感到，日本如果纳入日美军事同盟，就有被美国拖入战争的危险。新《日美安保条约》关于远东范围的界定，明确将中国台湾也包括在日美安全保障的范围之内，而当时台湾海峡两岸正处于高度的对峙状态，金门炮战之后，蒋介石

^① 日本首相岸信介在日本众议院明确表示：所谓远东，大体是指菲律宾以北、日本及周围地区，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的地区也包括在内。

石仍在起劲地鼓吹反攻大陆，台湾海峡局势极为紧张，这更是激起了日本人民的不安。于是，日本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美安保条约》、反基地的斗争。

在新安保条约签订前，日本人民就组织了阻止修改安保条约的“国民会议”，组织安保斗争的统一行动。至1960年1月19日新安保条约签字时，国民会议已组织了十数次统一行动。这年3月9日，日本总评、中立工会、民主团体等在全国600个地方召开共有400万人参加的反批准集会，百万人签名上书。4月26日，国民会议展开第十五次统一行动，举行向国会请愿、集会和示威，国会收到的请愿书达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330万人。至28日，签名者500多万，国民会议准备征集1000万人签名。5月20日清晨，岸信介和自民党内的主流派，不顾日本人民和反主流派、中间人士的反对，使用强硬和镇压手段，由自民党主流派议员单独批准了《安保条约》。于是，从5月19日开始，安保斗争已发展成为以推翻岸信介内阁为主要目标，日本上下发出了岸信介必须下台的呼声。6月4日，为了迫使岸信介内阁辞职，解散国会，废除新《日美安保条约》和阻止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6月中旬的访日，国民会议组织了650万人参加的总罢工。这一天清晨，东京的电车、火车全部停驶，商店一律关门。由于日本人民强有力的安保斗争，迫使岸信介在日美交换新《安保条约》后仅十天的时间，就不得不宣布辞职。

对于日本人民开展的安保斗争，中国予以高度评价，因为这场斗争，同中国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反对态度是一致的。中国一再表示：“中国人民衷心地同情和支持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保卫民主的正义斗争。”

七、支持各国人民正义事业大游行

1960年1月23日，北京各界举行反对日美军事同盟大会，通过了《首都各界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大会决议》，《决议》表示：“中国人民一向热烈支持日本人民反对修改和争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今后将继续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争取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正义斗争。”并向日本人民的安保斗争“致以崇高的敬意”。^①

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时，发表了《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的讲话，指出：“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②

5月9日，北京100万人举行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和集会，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新华社在有关这次示威的报道中说：

今天，北京全城万人空巷。从中午开始，由工人、农民、学生、民兵、解放军战士和市民们组成的示威群众，高呼着口号，涌向天安门广场，汇成一片愤怒的海洋。他

① 《人民日报》，1960年1月24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们排列着严整的队伍，把通向前门箭楼的整个广场和六华里长的广阔的东西长安街都站满了。在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上，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栏杆四周和金水桥上，也站满了人群。广场正中的上空，升起了挂着巨幅标语的十个大气球。人们的怒吼声，像汹涌的海涛，一浪高过一浪。^①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彭真、贺龙、谭震林，以及康生、王稼祥、刘澜涛、习仲勋、罗瑞卿等领导人，参加了这次示威大会。

会上，中共中央委员、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在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表示：“中国人民一向把日本人民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并且坚决予以支持。中日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了战斗的友谊。中国人民始终把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②

5月16日，上海举行170万人大示威，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条约的斗争。

全国共有三十三个城市举行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支持日本人民安保斗争的游行示威，除北京、上海外，天津、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参加示威的人数都在60万人以上。从5月9日至15日止，全国参加这次游行示威活动的群众，总人数在1200万以上。

2. 抗议美国飞机入侵苏联

几乎在举行支持日本人民安保斗争示威游行的同时，一场

^① 《人民日报》，1958年5月10日。

^② 《人民日报》，1958年5月10日。

参加者 300 多万人的示威游行又在北京举行了。这便是声援苏联打下美国 U-2 飞机的大示威。

从 1954 年 11 月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了生产 30 架 U-2 高空侦察机的计划，以及中央情报局关于在苏联领土上空使用 U-2 飞机侦察的建议。从 1956 年起，美国用 U-2 飞机对苏联的侦察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U-2 飞机的最大时速 920~1000 公里，巡航时速为 750~800 公里，最大航程 7000 公里，续航时间 8.5~9 小时，实际升限达 22870 米。它装有 73-B 巨型航空摄影机，在 2 万米高空拍摄的照片，可供判读的横向范围达 150 公里。在 1.8 万米的高度，地面人员的活动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如果在 9000 米以下，地面人员所看报纸的标题可以放大看到。它的电子侦察系统十分先进，地面雷达很难捕捉住它。

这种飞机虽然性能先进，飞行在苏联上空很长时间苏联人对它一直无可奈何。可是，艾森豪威尔清楚，如果苏联人打下一架这样的飞机，放在莫斯科展出，美国人就会丢尽面子。因此，他曾一度想停止 U-2 飞机在苏联的侦察活动。可是，中央情报局却坚持向苏联派出 U-2 的必要性，并且保证飞机一旦失事，苏联人也不会获得完整的装备，或者活捉一个驾驶员。艾森豪威尔也认为 U-2 获得的情报很重要，结果，又同意继续向苏联派出 U-2。

可是，艾森豪威尔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960 年 5 月 1 日，这天天气良好，清晨 6 时 26 分，U-2 驾驶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机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基地起飞，然后进入苏联，当飞机进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上空时，U-2 被苏联导弹击中了，鲍尔斯被俘。

U-2 飞机的击落，却使苏联领导人又喜又忧。喜的是多

年来一直想打下来的 U-2，终于揍了一架下来了。忧的是如果公布此消息，使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各国都知道几年来美国间谍飞机一直在苏联境内进行间谍活动，势必使刚刚和缓的苏美关系再度紧张，甚至有可能使苏美冷战局面再度尖锐化。而且，即将在巴黎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正在筹备之中，如果此时公布击落 U-2 飞机的消息，巴黎首脑会议就可能泡汤，而此次会议一直是赫鲁晓夫所企盼的。

拖了几天之后，赫鲁晓夫还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打下了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又过了两天，他又宣布，苏联俘获了间谍飞机的飞行员。不过，为了不使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由于 U-2 飞机一事而夭折，他还是把 U-2 飞机入侵苏联同艾森豪威尔区别开来，声称此事是“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所为，他相信艾森豪威尔对此是“一无所知”。

巴黎四国首脑会议倒是如期召开了。在 5 月 16 日上午的最高级会议上，赫鲁晓夫首先发言，他坚持要美国对 U-2 飞机入侵苏联一事道歉，并表示苏联现在不能接待艾森豪威尔，他的访苏应该推迟。艾森豪威尔只肯表示美国已停止了 U-2 飞机在苏境内的飞行，但坚持不道歉。虽然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想从中斡旋，可法国总统戴高乐却只愿做东道主，对苏美之争不愿介入，实际上是作壁上观。一气之下，赫鲁晓夫拂袖而去，巴黎四国首脑会议就这样流产了。

这时候，中苏两党之间虽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分歧，但还没有公开化，社会主义阵营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统一。在 U-2 飞机一事上，中国是支持苏联的。这种支持，当然只能是道义上的。

1960 年 5 月 20 日，北京举行了有 320 万人参加的历史上

七、支持各国人民正义事业大游行

空前规模的大示威和集会。

示威大会是一个中心会场和无数个分会场同时进行的。中心会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这样汇集了120万人。分会场则设在郊区工厂、学校、机关和城镇，参加的群众达200万人。这么多的人，称其为“倾城大示威”一点也不过分。

示威大会于下午3点开始。参加大会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朱德、林彪，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等。当然也少不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讲话，明确表示：“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挑衅。”并且警告说：“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每一次挑衅，都一定要受到加倍的回击。”^①

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群众中，有排列整齐、全副武装的民兵队伍，有徒手的海陆空三军官兵，有远道赶来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更多的是城内的干部、学生、市民，他们高举标语和漫画牌，挥舞着红旗，呼喊口号，要是美国人见到这场面，也会害怕的。

青年学生们在前往天安门广场的途中，一边走，一边宣传。在他们的队伍中，一些人化装成戴着高高绅士帽的艾森豪威尔，不断受到沿途群众的唾弃。在一些巨幅漫画牌上，游行的人们用大字标明：“艾森豪威尔不是‘和平的使者’，而是头号战争贩子。”

^① 《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日。

中苏友好人民公社所在地石景山，近 10 万群众分别举行了示威集会。中苏友好医院除了值班者以外，400 名医生护士全都参加了示威。

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稚气未脱的儿童，从尚未洗掉手中油渍的工人，到腿上还沾有泥草的农民，甚至一些很少出门的老太太，都加入到了示威的队伍中。参加游行的北京第二清洁队的工人说：“如果美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战争，我们就要像清除粪便一样，把它装到垃圾车上，送到垃圾堆里去。”正大喷漆厂的工人，有的刚下班顾不上吃饭，穿着工作服参加了示威。他们说，艾森豪威尔谈和平，就像向一块朽木头涂漆一样，无论涂得怎么好看，里面还是腐朽的。正在参加全国第一届盲人聋哑人会议的代表，也参加了这天的示威活动。

这么庞大的示威队伍，恐怕只有中国才能组织起来，它的确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

3. 支援古巴、巴拿马、刚果（利）人民

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一直不甘心，于是便采取禁运、封锁、断交等手段，甚至扬言要军事入侵，企图颠覆古巴革命政权。

中国人民对古巴革命和古巴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干涉的斗争，是坚决支持的。古巴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不久，即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在致卡斯特罗总理祝两国建交的贺电中，郑重声明：“如果必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给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古巴人民一切可能的支援。”^①

1961 年 4 月 17 日，一批古巴流亡分子（据称为 1400

^① 《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30 日。

人)，经过两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主持下的训练之后，全副美国装备，在美国的策划和指使下在古巴猪湾登陆，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成立新的亲美政府。结果，这些流亡分子一上岸，就遭到了古巴强有力的抵抗和反击，三天之内被一网打尽，美国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遭到了广泛的强烈谴责。

猪湾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对美国武装侵略古巴，不能漠不关心。中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声援古巴人民。

猪湾事件使古巴的反美情绪更加强烈，自然也更加使古巴倒向苏联。在这一事件尚未结束之际，卡斯特罗就公开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又多次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积极寻求苏联的保护。

古巴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后，成为苏联在拉美重要的前哨阵地，苏联自然竭尽全力去保护和支援。古巴则由于美国对其的敌视和封锁，在军事、经济上也只能完全依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苏、古都认为，美国有可能再次对古巴发动侵略，在古巴的要求下，苏联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古巴。但是，使用武器的人员却不是短期就可以训练出来的，而且即便有这些武器，也不足以抵御一次真正的大规模入侵。

苏美自冷战以来，虽然矛盾重重，对立尖锐，但苏联一直奉行不直接卷入与美国的武装冲突的政策。在苏联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威慑手段，使美国不敢动手。

这时，赫鲁晓夫想出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办法，这便是古巴部署导弹。当然是秘密地部署。

赫鲁晓夫的想法是，先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等待美国发

现时已经一切准备就绪，这时美国就不敢动手炸毁。因为不可能将所有导弹一次全毁掉，只要剩下那么一点点，也足可以将纽约炸得稀烂，料想美国也不敢对古巴动手。

赫鲁晓夫依计而行，从1962年8月起，将一批中程导弹、发射装置和伊尔-28轰炸机运进古巴。

不料，这些导弹还没有完全安装完毕，就被美国人发现了。

美国开始时不动声色，在做好各种准备之后，于10月22日突然宣布：美国已发现苏联在古巴建立进攻性导弹发射场，足以威胁美国和西半球其他地方，美国必须使这些导弹撤出西半球。第二天，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公告，从24日起对古巴实施海上“隔离”，拦截检查一切通往古巴的船只。美国随即在加勒比海域部署了180艘船只，在佛罗里达集结重兵，数百架战略轰炸机携带核弹升空待命。

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尤其是美国对古巴的“隔离”政策，使古巴人民头上笼罩着巨大的战争阴影。

古巴导弹危机起因于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对古巴的颠覆和侵略政策。导弹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两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同时，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声援古巴。

1962年11月4日，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广州、成都、西安几大城市群众，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卡斯特罗提出的保卫古巴独立、主权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

这天一清早，北京30万群众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举中古两国的国旗，呼喊支持古巴人民的口号，通过天安

门广场前往古巴驻华大使馆。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至古巴大使馆门前，首尾延绵数十里。在使馆附近的街道上，人群拥挤，途为之塞。游行代表向古巴驻华临时代办佩德罗苏递交了成千封声援信，请大使馆转交给卡斯特罗和全体古巴人民。

上海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达 20 万人，其中既有参加过“五卅”罢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也有苏步青这样知名的老教授，更多的是工人、干部、学生和市民。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上海各报社和新华社上海分社，递去了他们给古巴人民的声援信，要求报社将声援信转交给古巴驻中国大使馆。

这天，参与游行示威的群众，沈阳有 8 万人，广州有 7 万人，其他城市的人数也不相上下。

11 月 5 日这天，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前一天已进行了示威游行活动的八大城市，这天的游行人数增加了一倍。哈尔滨、济南、乌鲁木齐等城市，也组织了广泛的群众性集会。在北京，古巴大使馆仅收到的示威群众递来的声援信，就达 2500 多封。上海 40 万人游行示威，暂作古巴人民的后盾。天津佛教寺院的主持、清真寺的阿訇和天主教的神甫，加入到了游行队伍中。在沈阳的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也和中国学生一起参加了游行。

从 11 月 3 日开始，到 11 月 6 日，遍及全国范围的支持古巴的群众性示威，参加的各界群众多达 500 万人。

1964 年 1 月，中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国侵略巴拿马的示威游行。

自从巴拿马运河凿通之后，美国凭借其手中的不平等条约，不但把运河区变成了“国中之国”，而且对巴拿马实行殖

民统治，扶植傀儡政府，恣意进行侵略干涉。巴拿马人民为了收回运河主权，反对美国的侵略干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964年1月9日，居住在运河区的美国和巴拿马中学生，在一所中学内为悬挂巴拿马国旗一事发生了冲突。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为了缓和巴拿马人民的反美斗争，曾同意在运河区悬挂巴拿马国旗。然而，一些美国中学生却在这天将校园内的巴拿马国旗扯下并加以污损。

这种损害巴拿马人民民族尊严的行为，引起了广大巴拿马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要求进入运河区去升国旗，美国出动运河区驻军进行镇压，在两天的时间里，打死打伤300人。

巴拿马人民并未由于美军的屠杀而屈服，他们袭击美国大使馆，焚烧美国新闻处。接连数日，许多城市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美军的暴行，要求收回运河区。巴拿马政府也为此宣布同美国断交，并向联合国安理会和美洲国家组织指控美国的侵略行径。

对于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中国立即作出反应。1月12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地站在巴拿马人民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的正义行动。”^①

毛泽东发表上述讲话的第二天，北京万余人集会，10万余人示威游行，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讲话，坚决支持巴拿马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0页。

人民的爱国斗争。

1月14日，北京群众声援巴拿马人民斗争的情绪，达到了高潮，100多万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集会。

新华社在报道这次游行的电讯中说：

今天，“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的吼声响彻了首都的上空。清晨八时，示威群众就踏着隆冬的寒霜，结成几十路的纵队，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方向天安门广场汇集。远在郊外工业区的工人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今天也都一批一批地赶进城来。示威的人们高举连夜画好的漫画、标语牌，演出新编的歌曲和活报剧。在游行队伍经过的东西长安街的许多路口，今天竖起巨大的红色标语牌，上面写着：“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收复巴拿马运河！”“胜利一定属于巴拿马人民！”游行的人群越聚越多，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内，便结成了数十里长的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时，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激昂的口号声和歌声响成一片，震天动地。到下午五时为止，全市参加游行示威的共达三十多万人，广泛包括了各阶层的人民，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干部，还有来自街道的家庭妇女，还有民主党派人士、工商业者、归国华侨、宗教职业者。此外，还有一些外国朋友。

今天首都百万人巨大规模的声援活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高昂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成千成万的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显示了他们战斗的激情。今天，全市有二十多个文艺单位两千多名文艺工作者，分别组成街头演出队、宣传队、宣传车，来到天安门广场，表演他们通宵创作、排练的大批支持巴拿马人民斗争的文艺节目。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一支支雄壮的战歌、进行曲，歌声响彻云霄。作曲家瞿希贤和歌剧演员方晓天、李晋纬等，从清早就赶到广场。他们有力地

挥舞着臂膀，满腔激情地把他们创作的《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支援巴拿马，赶走美国佬》等歌曲，唱给聚集在广场上的工人、学生和干部们听，并且大家一起来合唱。北京京剧团演出了活报剧《美国佬从巴拿马滚出去》，评剧演员们用北京人民熟悉的评剧老调演唱了反帝段子，受到了游行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今天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刘日东。 he 现在是北京农业机械厂的副厂长。今天，他带领五百名工人和民兵参加游行。刘日东说：“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必将取得胜利，巴拿马的国旗，必将在巴拿马运河区的上空升起。”曾在古巴帮助建设的著名建筑工人张百发在游行时说：“我曾经亲眼看到古巴的工人和农民打退美帝国主义猖狂进攻的情形。现在，巴拿马人民也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我相信巴拿马人民也一定能够在巴拿马运河区取得胜利。”拖拉机手王振环说：我们公社全体社员没有一个不痛恨美帝国主义，我们全都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①

全国许多的大中城市以及一些小城镇，也组织了规模不等的示威游行与北京遥相呼应。各地的党政负责人也参加了当地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柯庆施，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辽宁省省长黄欧东，河北省省长刘子原等。

至1月17日，仅几天的时间，全国参加声援巴拿马人民爱国斗争的示威游行与集会的群众，超过430万人。

^① 《人民日报》，1964年1月15日。

十个月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示威游行爆发了。这次示威，是为了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

早在1884年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上，西方列强将刚果河以西的地区划为法属殖民地，即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河以东的地区划为比（比利时）属殖民地，即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经过刚果人民的长期斗争，两地均于1960年先后宣布独立。

刚果（利）独立后，建立了刚果人民自己的政权——卢蒙巴政府。

可是，刚果（利）虽然独立，但国内形势却很复杂，在比、英等国策划下，冲伯傀儡集团制造所谓独立，还有别的一些刚果人也竖起独立的旗帜，制造分裂活动。

面对复杂、严重的局势，卢蒙巴在无奈之中只得请求联合国提供紧急军事援助。1960年7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比利时撤军，并向刚果派遣联合国部队。

所谓联合国部队，其实主要是美国部队。美军先是镇压了代表刚果（利）人民的卢蒙巴军队，然后又赶走了比利时豢养的冲伯集团，扶植自己中意的势力。后来，卢蒙巴惨遭杀害，其副总理基赞加以代总理的名义，将合法政府迁至斯坦利维尔。

在美国的策划下，1961年7月，刚果（利）成立了以阿杜拉为总理、基赞加为副总理的政府。可就在此时，乘基赞加不备，联合国军和阿杜拉军突然猛攻基赞加的军队，并解除其武装，也解除了基赞加的副总理职务。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

1964年初，刚果（利）人民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并占领了东部、西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6月间，联合国军

被迫撤退完毕。可是，面对刚果人民的武装斗争，美国和比利时再度勾结，大规模入侵刚果爱国力量控制的地区。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引起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极大愤慨。

11月28日，毛泽东发表《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刚果（利）的武装干涉，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中国人民支持你们”。

11月29日，北京组织70万人的游行集会，支持刚果（利）人民的斗争。这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贺龙等，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毛泽东亲自参加示威集会，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

集会上，彭真、郭沫若以及阿联驻中国大使伊马姆、刚果（利）驻中国大使贝约纳等分别讲话，强烈谴责了美国对刚果的侵略行径。大会之后，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的70万群众，继续举行游行示威。对这天的游行，当时的报道作了这样的报道：

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刚果（利）的暴行，激起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今天首都七十多万人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盛大集会，集中地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决心。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发出的庄严号召，极大地激励了首都人民的战斗意志。今天，从清晨到下午，在北京街头，震响着这样的声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把一切魔鬼通通消灭光！”

当晨曦微露的时候，参加游行的人们就扛着连夜赶制的标语牌、漫画牌，高唱着革命的、战斗的歌曲，从一条

条大街小巷，纷纷涌向横贯全城的东西长安大街，涌向首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人们激昂地不断高呼：“刚果（利）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美帝国主义从刚果（利）滚出去！”

许许多多的钢铁工人、机械工人、纺织工人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刚下了夜班以后，就从郊外赶到城内，参加游行示威和集会。石景山钢铁公司职工今晨冒着严寒在厂内集会，接着又来到天安门前参加示威。这个厂的工人、民兵连副连长陈庆太，听到美国侵略者在刚果（利）任意屠杀非洲人民的血腥暴行以后愤慨地说：“从侵略朝鲜战争时的杜鲁门到现在的约翰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说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会变。他们对世界人民欠下的血债一定要偿还！”北京第三轧钢厂六十岁的老钳工杨子明，在天安门广场，向参加游行的青年工人们控诉了当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赶走了这只美国野心狼。这只狼又钻到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祸害人民，我们绝不能听任它胡作非为。

一列列工人、学生、教师和机关干部们的民兵队伍，背着冲锋枪，扛着步枪、机关枪，迈着整齐的步伐，参加了示威游行。许多民兵肩上的刺刀，在朝阳下闪闪发光。一路上，民兵们以铿锵有力的声音，不断地有节奏地高呼：“打倒美帝！”“打倒美帝！”

在“清华大学民兵师”的巨幅红旗后面，数不清的学生民兵雄赳赳，气昂昂，高唱着他们连夜创作的歌曲前进。他们的歌声警告美帝国主义：“血债必将还，不容豺狼挡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个民兵排，听到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刚果（利）的消息以后，写了决心书，表示

要更好地练成一身过硬本领。他们今天也参加了示威游行。新街口中学以“小八路”命名的少先队员们，一个个扛起红缨枪，唱着战斗歌曲，昂首阔步地走上街头。在他们的队伍最前面，有四个学生化装成非洲人，用绳索套住了“美国强盗”的脖子。“侵略者”被挥舞红缨枪的“小八路”们赶得抱头鼠窜。

在北京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在全世界人民的铁拳下面，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被打得狼狽逃窜。这时，周围人群不停地高呼：“美帝国主义从刚果（利）滚出去，从台湾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霸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学生们为表示对刚果（利）人民的声援，连夜赶排了活报剧。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在游行的时候，激昂地唱着他们自编的歌曲《刚果（利），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教授，也纷纷参加了示威的行列。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王竹溪，著名力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七十一岁高龄的北京铁道学院的教授王文翔等，都在游行时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热烈拥护毛主席的声明，要高举反帝斗争的大旗，支持刚果（利）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曾经在三月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阿联等非洲国家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亲眼看到了觉醒了的、战斗中的非洲。他说，美帝国主义对刚果（利）人民的侵略，只能促使非洲人民革命的发展。^①

^① 《人民日报》，1964年11月30日。

七、支持各国人民正义事业大游行

随后许多天，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西安等城市的群众，也组织强大的示威游行，支持刚果（利）人民。

11月30日，北京又有70万人涌上街头示威。

在城外四十里外的石景山钢铁公司的1200名全副武装的民兵和400名职工，一清早就从郊外进城参加游行。

北京第二棉纺厂细纱甲班四工区的十八名女工，上完夜班后也不回去休息，清早就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

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著名作曲家马可，率领400名学生，高唱着他们新创作的《坚决支持刚果人民》等歌曲，走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里。

在11月29日至12月3日五天的时间里，全国共有800万人参加了声援刚果（利）人民斗争，声讨美国侵略刚果（利）罪行的示威游行活动。

4. 誓作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后盾

在60年代头几年的示威游行活动中，规模最大、次数最多的是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示威游行。

在60年代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无保留地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根据越南人民的需要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所能。

1961年5月，当美国蓄意在南越加紧扩大侵略行动时，中国外交部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在越南南方加紧军事干涉。1962年2月，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中国决定向越南无偿地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3年8月29日，毛泽东专门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谴责美国支持吴庭艳集团，强调“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

美国在越南南方搞特种战争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将其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越南北方对南越人民的支持，于是决定将战争扩大到北越。

1964年8月4日，美国宣称，它的两艘驱逐舰在北部湾（越南又称东京湾）海域遭到北越海军的攻击，这便是所谓“北部湾事件”。其实，这完全是美国自己在越南领海内进行侵略活动引起的。

可是，美国却以此为借口，决定对北越发动“报复性轰炸”。当晚，美国舰载战斗机、轰炸机直扑北越几个海军基地和荣市附近的油库，进行了六十余次轰炸。7日，约翰逊总统又下令在北部湾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六十四架飞机再次攻击北越，除炸沉北越多艘巡逻舰外，还轰炸了北越的鸿基、碌州、富利、广宾四个鱼雷艇基地及宜安油库。

对于美国的这种野蛮侵略行为，中国立即作出反应。

8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明确指出：美国的战争行动已是跨过了“战争边缘”，走出了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第一步。声明严正警告美国政府：“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①

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8月7日，北京50万人示威游行，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

这天早晨到傍晚，一队又一队的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市区主要街道，汇集到天安门广场，然后涌向位于东郊的越南驻华大使馆。

8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可游行的群众却冒着酷暑，行走在酷热的阳光下，还不断地振臂高呼口号。北京师范大学、北

^① 《人民日报》，1964年8月11日。

京航空学院和北京铁道学院的师生，从西郊步行几十里赶到了东郊，一些鬓发斑白的老教授，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

8月8日，北京又有百万群众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早晨到傍晚，游行持续了十多个小时。越南驻华使馆门前，涌来了无数的示威群众，成了游行活动的中心。即便远郊的矿区和农村，矿工和农民也在矿上和田间举行集会和游行，以示自己对越南人民的支持。

游行的群众纷纷到越南使馆递交支持信。他们中有78岁的北京钢院教授胡庶华，有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南京剧院著名演员关鹤鹑，有12岁的八面槽小学学生董卫。^①

这一天，上海50万人在外滩、南京路、延安路等主要街道上示威游行。广州30万人举着连夜制作的漫画、标语、横幅，冒着台风和阵雨，沿着珠江河岸，向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广州领事馆进发。沈阳、西安、成都三城市，分别有10万人、5万人、15万人参加示威游行。与越南山水相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1.5万人从各个街道前往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递去了一封封声援信。

8月10日，全国参加示威活动的群众达到700万人。大城市的人数都有数十万到100多万，中越边境云南境内的文山、个旧、麻栗坡，也举行了示威游行。至8月11日，全国参加示威与集会的群众达2000万人。

1965年2月7日，美国飞机再次对北越实施轰炸。2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越南政府就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北方发表的声明之后，只过了一小时，立即就有成群结队的工人、农民、店员、学生、机关干部和市民，打着红旗和标语，

^① 《人民日报》，1964年8月9日。

高举毛泽东和胡志明画像，呼喊口号，涌上街头举行示威，声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罪行。

据称：“强大的示威游行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广阔的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大街，在东郊的越南大使馆门前和使馆区，游行队伍延续十余里。在这些地方，人群摩肩接踵，一时交通为之堵塞。游行队伍经过越南大使馆门前时，人们激愤地呼着口号，把一封封用大字写的声援信交给使馆的越南同志，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为打倒美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①

2月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表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声明发表的当天，上海80万人冒雨示威游行，拥护我国政府的声明。同时，广州、南宁也举行示威游行，参加者分别达50万人和25万人。这天，北京示威游行的群众则达100万人。

在北京的游行队伍中，有许多的国际友人。请看当时的报道：

今天，在红旗如林、吼声震天的首都街头，呈现一片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动人景象。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人士、专家、留学生和实习生，高举着用各种文字写的标语牌，结队走上大街，同首都各界群众一起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分别到越南驻中国大使馆门前，表示他们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意志。各国人士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各国人民一定要紧密团结起来，同美

^① 《人民日报》，1965年2月9日。

七、支持各国人民正义事业大游行

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在北京工作和学习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的专家和留学生，今天分别集聚在一起，高举胡志明主席像和毛泽东主席像以及用越文写的标语牌，同中国同志一起并肩地参加了示威游行。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三十多位越南留学生，有的头上裹着“斩断美帝国主义魔爪”的标语带，有的手里拿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旗，来到天安门广场，愤怒声讨美国强盗的滔天罪行。留学生胡延松对记者说，我们恨透了美帝国主义。对待美国强盗就是要给它迎头痛击，毫不留情，因为事实再一次说明，美帝的侵略本性不会改变，对它绝不能抱任何幻想。

家在越南南方的留学生胡文明在游行中说，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屠杀我们同胞，又派飞机侵犯北方，这只能说明美国强盗在越南南方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美帝国主义一定要从越南南方滚出去，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得到统一。

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以及他的夫人和孩子，同在北京的几十位日本人士，今天也结队参加了游行。日本朋友们头上绕着标语带，一路上振臂高呼：“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从日本、从南朝鲜、从台湾滚出去！”他们来到越南大使馆门前时，西园寺公一代表日本朋友向大使馆参赞阮筠递交了支援信，表示日本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他说，越南人民必胜，越南人民的胜利就是日本人民的胜利。^①

^① 《人民日报》，1965年2月10日。

2月10日，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更多。

北京：150万人；

上海：150万人；

天津：70万人；

广州：70万人；

武汉：60万人；

……

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但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予以道义上的支持、精神上的鼓励，还给予无私的物质援助。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派出了大量的二线作战部队，如防空军、铁道兵等。从1965年6月至1973年3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志愿部队32万人。中国给越南的物质援助则达200亿美元，其中无偿部分180多亿美元。

1966年7月，美国飞机对越南首都河内和第二大城市海防，进行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7月17日，胡志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和局部动员令，号召3100万越南人民团结起来，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争取最后的胜利。

这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火虽然已经燃起，但即便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中国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支援，都没有停止过，何况此时全国性的动乱还刚刚出现。因此，胡志明的《告全国同胞书》发表之后，处境已比较困难的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身份，于7月22日发表声明：“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最坚决地、最热烈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夺取抗美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七

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①

同一天，百万北京群众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援越抗美盛大集会游行。

7月23日，广州、南宁、昆明、沈阳、哈尔滨等十九座城市，总计500万人集会游行，拥护刘少奇的声明，支持胡志明的《告全国同胞书》，的确是用“气壮山河的气势”向越南人民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① 《人民日报》，1966年7月23日。

八、特殊的报喜游行

1. 一个“纲领性文件”

共和国历史上游行最多的年份，恐怕要数1966年和1967年这两年了。

不须说，这与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

要说1966年的游行，除了这年7月进行的支援越南抗美斗争的那次游行外，更多的游行还是在8月9日以后。

因为8月9日这天，公布了一个“划时代”的“纲领性文件”，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赫赫有名的《十六条》。

凡是经历过“文革”这段特殊历史的人，都会熟悉这《十六条》，因为这《十六条》把“文化大革命”彻底地发动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起始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这个《通知》说，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

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还说，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①

这个《通知》，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不过，虽说自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国内的政治空气便日趋一日地紧张，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人们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底是哪些人，还是不甚了了；对“文化革命”（当时还没有加“大”字）怎么搞，还很茫然。所以《通知》公布之后，倒也没有出现后来那种“最高指示”一公布，万众一齐涌上街头齐欢呼的热烈场面。

此后不久，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写了一张攻击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且得到了康生等人的暗中支持。毛泽东出于发动群众大搞“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以打破《通知》发表之后仍很“冷清”的局面，决定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广播与刊发这张大字报，同时配发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这一下全国轰动了，也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矛头不仅要对准“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可以对准宋硕、陆平、彭珮云这样的“当权派”，或者说“黑帮”。

于是，激进的人们一面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而“欢呼”，一面也仿效聂元梓等人的做法，纷纷贴大字报，揪“黑帮”。

人们“欢呼”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倒不是对聂元梓有什

^① 《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么了解，而是因为大字报刊登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而且还加以评论员文章。人们不仅把《人民日报》看成是党的喉舌，而且也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成是党的声音，因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之后，立即有许多人致信《人民日报》，表示支持。但这时人们还没有为此去大搞游行示威。

随后，受到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影响，全国各地贴大字报、揪“黑帮”成风，大中学校乱起来了。

为了控制混乱局面，刘少奇和中央一线的其他领导人决定向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

工作组进驻学校后，混乱的局势有所控制，但毛泽东却对派驻工作组越来越不满，认为是工作组使得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对主张派驻工作组的刘少奇也提出了严厉批评，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只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坏作用。

既然“文化大革命”搞了两个多月，还那么“冷冷清清”，毛泽东就决定打破这种冷清的局面，以排除所谓“运动阻力”，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把“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得旺旺的。

于是，他在地视察回京前，临时决定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经过仓促的准备之后，8月1日至12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中央全会上，发生了好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毛泽东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这便是有名的《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红卫兵由此横空出世，冲向社会。

第二件大事，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

报》，对刘少奇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第一次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在中央高层公开出来。

第三件大事，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第四件大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则上升为第二位，成了事实上的接班人。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总共有十六条内容，所以又简称为《十六条》。

《十六条》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拟定的。陈伯达、王力等人7月初就开始起草，改了二十几稿。毛泽东委托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加以修改，陶铸等与周恩来商量后，删去了“黑帮”、“黑线”等提法和一些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十六条》指出：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领导等等，都作了严重错误的分析与规定。《十六条》虽然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等字句，但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并没有具体规定，这就为后来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开了方便之门。

《十六条》的通过表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正式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确认。“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已经完成了法定的手续。

8月9日，《十六条》公布发表。

8月12日，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公报说：

全会讨论和批准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我国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

样。^①

“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再次擂响了，各式各样的游行也出现了。

2. 游行“欢呼”《十六条》

《十六条》公布之后，立即得到了“革命群众和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欢呼”，“广大革命群众对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表示了最真挚、最热烈、最坚决的拥护”（新华社语）。那么，人们是怎样“欢呼”和“拥护”《十六条》的呢？

除了贴大字报、开座谈会、写决心书等方式外，游行庆祝《十六条》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游行在《十六条》公布之时，有一个好听的名词——报喜。尽管有些“报喜”称不上是游行，但是，一队一队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去党的机关所在地“报喜”，其实与游行并无二致。当时在报道这一盛况时，有的报刊干脆使用“报喜游行”的说法。

《十六条》公布的当天晚上，北京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就络绎不绝地来到党中央所在地和北京新市委门前，送喜报，送决心书。人们高举红旗，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带着毛主席语录牌和标语旗，许多学生还手持花束和花环，载歌载舞，表达他们欢欣鼓舞的心情和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昨晚和今晚两场急雨，送喜报、送决心书的人群仍然川流不息，情绪高昂。很多人自己淋着雨，却把衣服脱下来盖在毛主席像和决心书上。在党中央所在地的接待站前，锣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

鼓声、爆竹声、歌声和口号声响成一片，震天动地。^①

“在天津，连日来，一列列高举毛主席画像、毛主席语录的游行队伍连续不断。沸腾的口号声和歌声响彻海河两岸。”

“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锣鼓喧天，爆竹震响，彩旗飘动。一队队由各旗职工、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组成的欢呼中央决定的游行队伍，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语录牌，昂首阔步，喜气洋洋。”

“在哈尔滨，两天来一批批的革命师生，高举毛主席的画像，欢唱革命歌曲，到中共黑龙江省委报喜祝贺。9日，一些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冒着倾盆大雨上街游行。”^②

“8日晚，兰州市和全省各地广大工农兵、大中学生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围在收音机旁、广播喇叭下，细心听了关于党中央决定的广播，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鸣放鞭炮，一片欢腾；纷纷举行座谈，赶写大字报，上街游行，载歌载舞，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高唱革命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口号声、锣鼓声、歌声，此起彼伏，直到深夜。9日，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工人、干部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打着彩旗，高举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游行欢庆，到省、市委领导机关送喜报、决心书。从8日晚到9日，游行欢庆和到省市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③

“四川大学六千余名师生员工10日隆重集会，一致表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把四川大学办成毛泽东

① 《光明日报》，1966年8月10日。

② 《光明日报》，1966年8月11日。

③ 《甘肃日报》，1966年8月10日。

思想的大学校，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四川大学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几天来，‘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响彻贵州山区。许多专、县所在地的群众，收听广播后，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举着红旗，敲锣打鼓，向党委送喜报和决心书。”^①

“近三千名革命师生员工组成的吉林师范大学队伍，充满着一派热烈欢腾的气氛。他们中有的手执彩花和红旗，有的手捧着毛主席画像，有的带着《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本，有的拿着刚刚采摘下来的葵花，表达了他们对党和毛主席衷心热爱的感情。他们在省、市委领导面前宣读了决心书，一致表示：我们最热烈地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最热情地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最坚决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要进一步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向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不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决不罢休！吉林财贸学院的革命师生员工以披挂彩带和标语的彩车为先导，高奏着雄壮的乐曲，结队前往省、市委。他们在省、市委领导面前表示说：我们满怀革命的激情，一次又一次的收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太及时了，太好了，字字句句说到我们心里。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一伟大决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数十面红旗簇拥着的巨幅毛主席画像为先导的由五千多名革命师生员工组成的吉林工业大

^① 《光明日报》，1966年8月12日。

学队伍，抬着‘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决定’、‘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牌，高唱着革命歌曲来到了省、市委。五千多名革命师生员工一致坚定表示：党中央这一纲领性的文件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是指导我们当前斗争的‘方向盘’，是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有了它，我们心明眼亮干劲足，大风大浪无阻拦。敬爱的党，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一定要忠实地贯彻执行这一决定，彻底埋葬害人的旧教育制度，把我们的学校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抗大式的新型大学。在军乐声中迈着雄壮步伐的吉林医科大学革命师生员工来到了省、市委，表达他们热烈拥护、坚决贯彻党中央英明决定的决心。他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党中央和毛主席怎样决定我们就怎样执行。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把自己锻炼成为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①

8月1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报喜游行活动更是进入了高潮。

《公报》发表后头几天，天一亮，北京街头就已人山人海，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中南海方向，常常是贺喜的队伍汇集成几十路纵队，东至天安门，西至西单，挤满了半条长安街。

这几天，天公不作美，常下大雨，可这也没使人们的热情降温。雨越大，情绪越高，鼓声越响。那时面对困难常用的办法是背诵或朗读《毛主席语录》。在倾盆大雨中，报喜的人们高声朗读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朝着中南海方向进发。许多街道妇女，也是人手一册

^① 《长春日报》，1966年8月11日。

《毛主席语录》去报喜。在中南海墙外的接待站前，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震天响。即使到了晚上，前来贺喜的人也是川流不息。

《公报》发表前，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印刷发行毛泽东著作的决定，报喜的人们手持刚刚买到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或《毛泽东著作选读》，时而放在胸前，时而举上头顶，当齐呼口号时，无数的红彤彤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顿时被高高举起，场景确实壮观。

工业出版社（并非有意隐去，原文如此）的革命职工，手捧着这次印刷的最新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来到接待站。他们叮嘱记者站的工作人员：“要把这些宝书，送给我们最最敬爱的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是我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最珍贵的献礼。”^①

8月14日这天，杭州市简直比过年还热闹。从市区到郊区，从大街到小巷，杭州到处是锣鼓喧天，歌声嘹亮，红旗飘扬。从清晨开始，成千上万的群众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数不清的宣传队和宣传车，穿过西湖畔的主要街道，人们簇拥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抬着语录牌，手持《毛主席语录》，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举行庆祝公报发表大游行。^②

《公报》发表后，古老的西安“立刻沸腾起来”（《陕西日报》语）。怎么个“沸腾”？无非也是一队队高举毛泽东画像和语录牌的群众熙熙攘攘地游行，再加上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锣鼓声。各路游行队伍纷纷前往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报喜。仅两天时间，报喜人数超过5万。

^① 《光明日报》，1966年8月16日。

^② 《浙江日报》，1966年8月15日。

西安不仅城内热火朝天地报喜游行，城郊的农民也在游行。永宁公社草滩坡大队和夏家坡大队的社员听到广播后，立即整队敲锣打鼓地进行游行。

对西安游行、报喜的盛况，《陕西日报》说：

近几天来，西安一直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不管白天黑夜，浩浩荡荡的人群，接连不断地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写着毛主席语录的标语牌，载歌载舞，上街游行，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向党报喜。人群所到之处，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歌声和“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①

8月20日，安徽省会合肥，举行庆祝《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大会和盛大规模游行，《安徽日报》说：

二十日，合肥人民的革命激情达到了新的高潮，全城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大革命景象。中午，革命群众手捧《毛主席语录》，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抬着巨大的《毛泽东选集》模型，抬着大红喜报和决心书，迎着灿烂的阳光，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省体育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欢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欢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欢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宽广的体育场上，红旗如海，万众欢腾，锣鼓震天，鞭炮齐鸣，千万颗炽热的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这样关心我们，信任我们，支持我们，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殷切期望，决心挑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担子，发扬敢想、敢闯、

^① 《陕西日报》，1966年8月16日。

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昨天的庆祝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姿勃勃、意气风发的戴着红色袖章的“红卫兵”。这些本来不出名的革命小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安徽银行学校革命烈士的后代、贫农的儿子谢少峰，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后，激动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他对大家说：“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地，打下了人民的江山，我们年青一代，一定要全力保住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我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又是一个‘红卫兵’，今后一定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举起无产阶级千钧棒，打倒一切害人虫。”

靠力气举不过千斤，靠毛泽东思想能改天换地。担负着印刷毛主席著作光荣任务的合肥印刷厂的革命职工，有的捧着自己印制的《毛主席语录》，有的双手举起自己印制的毛主席像，有的肩扛着《毛泽东选集》的巨大模型，欢欣鼓舞地参加了游行队伍。^①

《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终于烧旺了。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僻的乡村，到处是敲锣打鼓报喜游行的队伍。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那么多的报喜队伍报的“喜”是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这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而欢呼，而兴奋，而激动。当时的人们以为通过这样的“革命”，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虽说旧

^① 《安徽日报》，1966年8月21日。

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多，更多的是封建主义，但是，在新旧两个中国的对比中，广大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确是无比热爱，的确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从而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当时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是衷心拥护的，是把它当做一件喜事的。如果当时的人们有今天的人们这样对“文革”的理性认识，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然而历史是不可能用“如果”来书写的。同样，不论是去报喜的群众，还是接受报喜的领导干部，都不会想到，“文革”给中国，也给他们个人带来的，不仅没有喜，反而是无穷的灾难。这就是历史，历史常常捉弄善良的人们。

3. 中南海前的报喜队

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之时，8月12日，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报道说：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十日下午七时十五分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庆贺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革命群众。

毛主席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来到群众接待站的时候，引起了群众的一片欢腾声：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成千上万的首都工人、农民、学生、革命干部和街道居民，狂欢跳跃，向毛主席涌去。“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声浪，响彻天空。

八、特殊的报喜游行

毛主席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走上接待站的讲台。我们伟大的领袖满面笑容，一面向着摆在接待站周围的贺信、喜报和决心书，一面向汇聚在接待站周围的人们亲切招手致意。这时，多少颗火热的心在激烈跳动，多少双眼睛闪着感动的泪花，多少双手一齐向毛主席伸了过去。

毛主席在讲台上，从这边走到那边，伸出双手，和拥簇在前面的人们紧紧相握。毛主席和一些同志谈了话，还向周围欢呼的群众问好。他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毛主席离开接待站的时候，一再向欢腾的群众招手。毛主席离开后，前来贺喜和送交决心书的人们，还是激动得不愿走。

许多站在后面的人拥到前面，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紧握。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心里想：毛主席呀，毛主席！就是你用这双伟大的手，写出了大量的革命文章，给全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道路，是你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你这双手又给我们指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许多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他们逢人就说：你们赶快来和我握手啊！我的手是刚才和毛主席握过的！还有一些人随后赶来，他们说，能够走到毛主席刚刚同革命群众见面的地方，也是最大的幸福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虽然各报社都把这条新闻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且用特大字体作标题。可是，毛泽东又是怎么样来到中南海的群众接待站的？是特地安排的，还是毛泽东无意间走来的，报道中没有提及。

《十六条》公布后，报喜的队伍川流不息地涌向中国心脏

的心脏，位于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喜，或递交报喜信，或致祝贺词，或宣读决心书和誓词。一时间，府右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川流不息的人群从早到晚来中南海报喜，如果不加以引导和疏导，势必会发生混乱。但是，对群众的热情又不能泼冷水，不能随意将群众赶走。这就需要既能让群众表达自己心情，又能保持中南海前良好秩序的办法。

中央办公厅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在中南海西门外一侧，搭个报喜台，组织人员在那里值班。这样，既可代表中共中央接受群众各式各样的报喜，又可维持秩序，疏导群众。

从此，报喜台前，充满了欢呼的人群、报喜的队伍，当然也有来看热闹的。锣鼓声、口号声不时地传入中南海里。

8月10日下午傍晚时候，毛泽东像往常一样散步，身边只跟着一个警卫、一个护士。

毛泽东从住处出来，顺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往南，到了宝光门又折向西，到了怀仁堂前。忽然，他听到府右街上鼓乐喧天，人声鼎沸，口号声阵阵传来。这一下引起了毛泽东的好奇心，便想走出去看一看。

于是，他信步往西，走出了中南海，警卫和护士了解毛泽东的脾气，不敢劝止，只得让他走到街上。

毛泽东一出门，正好遇上了一支报喜的游行队伍。游行的群众见到毛泽东，简直是喜从天降，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确实是说不出的激动，说不出的高兴。

见到群众，毛泽东也很高兴，和蔼可亲地望着游行的群众。队伍中一些胆大的人，便上前同毛泽东打招呼、握手。他不但没有拒绝，而且很热情。当时，能同毛泽东握手，确实是一件无限幸福的事情。于是，一双双手伸了过来。

据当年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的陈长江回忆：

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人声鼎沸，欢呼阵阵，游行报喜的队伍，接连不断，几乎分不出上班、下班时间有何不同，白天和夜晚有什么两样。这是为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发表。

游行队伍的组成，有机关干部、厂矿职工，也有在校师生。尽管他们的身份、地位、参加游行的心态和直接动因各不相同，呼喊的口号也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声音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毛主席万岁”这个声音。

与之仅有一墙之隔的中南海里，却是另有一番景象。在这里，不论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机关，还是警卫部队，都保持着原来的那种严肃、紧张、有秩序、讲效率、简单朴素的工作作风，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吃晚饭时，没有听说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一切都很正常，以为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便回中队吃饭去了。同时，队里也有些具体事情需要处理，饭后也没有马上回到游泳池。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喧闹的府右街上，突然爆发了更高亢激越，更为激动人心的呼喊声，像是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巨型爆炸，它引发的声浪天震地颤，四方回应，一波胜似一波，持续不断，久久没有停息。

接着传来令人着急、使人不安的消息，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外被群众包围，想回也回不来了。我知道，中南海西门外的府右街，那是一条连贯北京南北向的重要通道，平时车水马龙，人来车往，络绎不绝。那里是社会的一角，社会上的千奇百怪，样样都有。何况，现今呢！那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当然大多数人是好的，但谁能说没有不好的呢？还有那些神经不正

常的……毛主席在外边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不安全，就会多一分危险。好在我们这个中队的成员，自然都是挑选来的，训练也是好的。我一声招呼，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一下集合起数十人，他们紧跟在我的身后，自动排成两行，飞快地向中南海西门跑去。

……

这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见挤得够呛，连站立都有困难了，他们便请毛主席上了临时搭的那个报喜台。

这样，毛主席一下站得高了，看得远了。能看到毛主席的人也就更多了。这简直就像童话里讲的，毛主席从天而降，他突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突然间，出现短暂的沉寂，继而惊喜之声四起，欢呼的激浪，一波高过一波，他们在喊什么？身在其中的我，根本听不清，辨不明，只能从他们那表情、那手势，还有那汪着泪水的眼神里去判断，去猜测，不过，这个并不难，他们呼喊的就是“毛主席！”

或许，在他们看来，此时此刻，喊毛主席时多加个“万岁”似乎也会妨碍他们的激情的抒发。

毛主席站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微笑着，向他们挥手，向他们致意。

台上台下，一片沸腾，鼓掌声、欢呼声、口号声，连成一片，响彻天宇，群众激情的宣泄达到了极点。毛主席走到麦克风前，以慈祥的目光扫过全场，激动沸腾的人群，再次出现短暂的平静。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毛主席连声说。

高亢有力的湖南话，在人群上空回荡，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鼓掌声、欢呼声，又是一个高潮。

八、特殊的报喜游行

成千上万的人们欢欣跳跃，向毛主席涌去，“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声浪响彻天空。^①

不管警卫们怎么紧张，毛主席却若无其事地对周围的人大声说：

“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此时，随后赶来的警卫部队来到了报喜台前，战士们在人群中开辟了一条走廊，毛泽东这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接见首都群众的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又到处为此事举行庆祝游行。

中南海的报喜站，前来报喜的群众比以往更多。在远郊的一些公社社员、农场职工、半工半读学生，也进城来送喜报和决心书。一些以前来报过喜的人，又来到了报喜站。

各地举行的庆祝毛泽东接见首都报喜游行群众的情况，从当年的地方报纸中摘录几段，以便说明。

“自从传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消息，各学校的革命师生欢腾起来了。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工业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陕西工业大学、西安外语学院等院校的革命师生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说：‘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您领导了全国革命人民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您制定了伟大的革命纲领，是您指引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如今，您又同革命群众会见，向我们发出了伟大的号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

^① 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6页。

舞。我们决心在您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锣鼓喧天，歌声动地，欢呼声响彻四方。革命的师生员工在学校里张贴起千万张喜报和决心书。那鲜艳的大红纸上的每一字，每一句，表达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表达了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意志。许多学校的革命师生，把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写在大红牌上，高高举起，拥簇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无数的人流涌向中共中央西北局，涌向中共陕西省委，向党送喜报，表决心。”

“西安市郊以及长安县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也掀起了一个无比狂欢的热潮。十一日中午，当广播中首先传出这个喜讯时，西安市郊有些公社正在召开的会议停止了，田间也变成了座谈讨论的会场，一时群情激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毛主席时时刻刻和咱们站在一起，今天我们虽然身离北京，但我们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毛主席。小寨公社社员近三千人抬着毛主席像、带着保证书来到西北局接待站。西北局负责同志接见了他们，并讲了话。韦曲公社的广大贫下中农，在中午休息中听到这个喜讯，就立即敲打起锣鼓，到中共长安县委报喜，他们情不自禁地争相发言，表达自己万分兴奋感激的心情和战斗决心。东三爻村大队第七生产队贫下中农社员，万分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话大大长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大灭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威风。一致表示，要坚决按毛主席的话去做。”^①

“兰州一中的革命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后，一齐走上街头，

^① 《陕西日报》，1996年8月13日。

八、特殊的报喜游行

载歌载舞，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张掖一中的革命师生，听到这个喜讯后，抬着毛主席画像和巨幅标语，手持《毛主席语录》，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来到张掖地委向党宣誓：一定听毛主席的话，永远关心国家大事，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向省委报喜的红山根街道办事处，东站街道办事处等居民队伍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怀抱幼儿的职工家属。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捧着毛主席语录牌，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向省委报喜。他们表示永远跟着党，永远跟着毛主席，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一切牛鬼蛇神。”^①

^① 《甘肃日报》，1966年8月13日。

九、千万红卫兵大游行

1. 毛泽东首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的游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及会议公报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就要全面启动。几天之后，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由此，“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加速了“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后，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取经”的人，如同潮水般地涌来，高潮时，一天进入北大的达几十万人。开始，主要是北京的学生和群众，不久，外地的学生来了。北京，在每个中国人心里，无疑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前一拨人还滞留在北京，后一拨人又来了。学生来北京，固然是为了“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同时也为了逛逛北京城，尽管后面这条理由不能说出，但许多人对此心照不宣。

工作组进驻学校后，造反学生同工作组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工作组为了控制住运动不出现大的动乱，对学生的过激行为往往进行压制，学生不服，便到北京去反映情况。8月初，中南海接待站每天都要接待上百批、上千人的上访学生。8月13日，天津大学等校的部分学生，因在本校“造反”受阻，决定徒步到北京去学习“革命”经验。一路上，他们高唱当时

九、千万红卫兵大游行

流行的革命歌曲，风雨无阻，向北京进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知道后，立即派火车去天津与廊坊间的杨村迎接。这些学生坐上“毛主席派来的火车”到了北京。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等同志接见学生代表并检阅文化大革命大军的游行”。^①

为什么要开这么个大会，周恩来这天接见北京三十一中学生谈话时说：“8月16日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外地来的学生很多，大家都想见中央首长，当天晚上就研究18日开百万人大会，把这个结果汇报给毛主席后，毛主席一定要参加大会，并且要求穿军装。后来给毛主席赶制了一套军衣。”^②

至于毛泽东穿的这套军衣，陈长江回忆说，这不是赶制的，而是借一位警卫战士的。他在《毛泽东最后十年》中说：

夜已很深了，忽然得到通知说，毛主席要“穿军装”上天安门。这样一来可把我们难住了。

穿什么军装？当然是现行的了。可是，毛主席自1949年进北京之后，不管解放军服装、佩带的符号怎样改变、更换，毛主席从来没有穿过军衣，因而也没有为他做过这个方面的任何准备。常说量体裁衣，适合毛主席穿的军衣那真还是难找啊！

汪东兴、张耀祠急得团团转。与解放军总后勤部联系吧，现在已是深夜了，人家机关早已下班了；而且这种需要也不好说清楚，因为还要保密啊。如果不把切实的用途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898页。

讲出来，让人知道是为毛主席找衣服穿，就不易引起重视和得到很快的配合；若讲出来，又不符合当时的保密要求。

张耀祠对我说：“你们中队有没有与毛主席个头相仿的？”

“有。”我说。

我们中队有个干部队员叫刘云堂，他高大的身躯，壮实而宽厚的胸腰，还有那硕大的脸庞，红光满面……虽说只有二十几岁，前额上的头发已显出几许稀疏，他走起路来规规矩矩，不紧不慢，颇有老同志、大干部的样子。这一年春天发新衣时，特号的衣服他也穿不上，只好为他也来个量体裁衣请人家给他定做了。这在连队来说，是少见的，显得很特别，印象也就很深。

张耀祠听了我的述说，简直有些兴奋了，忙说：“快去，把他的衣服拿来，量一量，看是不是可以用？”

我把刘云堂仅有的那一套新军装拿来后，缀上红领章，钉上红帽徽，送毛主席去试穿。毛主席穿上一试，看上去除前胸尺寸不够，略显得紧一些外，其余基本上还可以，好在毛主席对衣着并不怎样讲究。^①

17日晚上，毛泽东没有睡觉。清晨5点，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射出光芒，毛泽东便上了车，要去天安门，其实庆祝大会要到7点半才开。

这天，毛泽东兴致很高，他在天安门里面下了车，健步从西马道乘电梯登上了天安门的西平台。

此时，广场上的群众正在敲锣打鼓地集中。已经到了的群

^① 《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22—23页。

众席地而坐，广场上还有一些空地，还有群众队伍没有到齐。

见此情景，毛泽东决定到广场上去看一看，于是转身下楼，出天安门城楼门洞，过金水桥，来到广场的北边。

接下来的场景，当年报纸这样说：

毛主席穿一身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举过头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①

这种情景，绝对没有夸张。那时节，毛泽东在群众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谁不把能亲眼见到他当做自己最大的幸福？

正因为毛泽东有巨大的吸引力，使那本来排列有序的队伍顷刻大乱，人们一齐涌向毛泽东身边，把他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了。就连跟着他出来的几部车子，也陷在密密麻麻的人海里。即使如此，毛泽东仍若无其事地同群众握手问好。

此时，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及时赶来的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战士将拥挤的人群分开，清出了一条通往金水桥和天安门城楼门洞的通道，毛泽东才从群众中回到城楼上。

上午7点半，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泽东在林彪等人的陪同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霎时间，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全场万众欢呼，齐刷刷地高举着《毛主席语录》。

庆祝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主持。陈伯达操着那没多少人能听懂的闽南话，致开幕词说：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毛主席时时刻刻都是同群众在一起的。他的心，永远向着群众。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今天同大家见面，大大鼓舞我们，将大大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①

接着是林彪讲话。林彪用煽动性的语言，扯着嗓子说：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

“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就能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①

接着，周恩来也讲了话。周恩来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②

与林彪讲话唱的高调相比，周恩来讲话显然是低调。

周恩来讲话后，写下了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以及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小学代表，也讲了话。

庆祝大会结束之后，参加大会的百万人开始了大游行。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② 力平等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按照预先的安排，有 1500 多名学生代表也被邀请上了天安门，与中央领导人一起观礼，检阅游行队伍。

本来，这些学生和中央领导人是分区域站立的。可是，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不仅感到什么都新鲜，而且离毛泽东靠得那么近，先是到处乱窜，继而是挤到毛泽东这边来。于是便发生了后来名震天下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和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的事情。

据几天后《人民日报》登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文章说：

早上七点，我们“红卫兵”战士列队登上天安门城楼，心里真是激动万分，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就要接见我们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喜事啊！这时，“红卫兵”战士只有一个念头：毛主席要来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八点零五分，“红卫兵”战士宋柏林、骆小海、韩军，实在忍耐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奔进了天安门城楼，来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他们一见毛主席，什么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微笑地站了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坚强的手呵！就是这双手，挥笔写出了革命的真理；就是这双手，指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这双手，指挥着我们打下了人民的江山；就是这双手，指挥着我们保卫着人民的江山！紧握这双革命的手，千言万语涌心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说：“好，好，好！”

“红卫兵”战士这才想起还没有通名，连忙说：“我们

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毛主席问：“哪一个？”

“红卫兵”战士说：“清华附中‘红卫兵’。”

“红卫兵”战士又齐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战士激动地对毛主席说：“我们永远做您最忠实的小兵”，“我们要革命，要造反到底”！

毛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巨大的鼓舞激励着“红卫兵”战士，大家什么都忘了，只有一个念头道出来：“毛主席万岁！”他们再三和毛主席握手，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顿时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异口同声地说：“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个个意气风发，同声欢唱，大家的心啊，早就飞到了毛主席身旁！

九点四十五分半，突然，掌声格外响，阳光格外明亮，毛主席向我们走来了！毛主席穿着一身崭新的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在闪闪发光。毛主席满面红光，他老人家是那样魁伟，步伐是那样稳健，真是健康极了。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红卫兵”战士蹦跳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人人都把《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过头顶，到处闪耀着红光，红遍四方！毛主席走了一圈，缓步登上台阶，人们拥簇过去。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多看看毛主席！只有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看着这群欢腾的革命小将，高兴地

笑了。^①

至于毛泽东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则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宋彬彬戴上的。宋彬彬在她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中说：

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了我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心里激动极了。当时，我向主持大会的一位同志要求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以表达全体“红卫兵”战士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仰，无限热爱。他把我带到了主席跟前。我满怀激情，把“红卫兵”袖章戴在我们伟大领袖的臂上。

毛主席高大魁梧，红光满面，身着一套绿军装，戴着一顶绿军帽，鲜艳的红领章红到了人的心坎上。看到毛主席这么健壮，我心中感到有说不出的幸福，真诚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②

这天后，宋彬彬果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

戴上红袖章时，毛泽东没说别的，但他此举实际上意味着对红卫兵的公开支持。毛泽东戴着红卫兵袖章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又加上第二天报纸、电台对此大加宣扬一番，红卫兵运动顿时风靡全国。“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便冲向社会，横扫“四旧”，大扫“封、资、修”，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接见学生代表时，天安门前的游行正在进行中。游行队伍见不到城楼上的毛泽东，便停下来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1日。

② 《光明日报》，1966年8月20日。

不愿走，非要见到才肯往前走。眼看队伍要乱起来，工作人员只得请毛泽东到主席台前来。

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毛泽东在城楼上面向游行队伍，由西向东，又由东向西地走着，不断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队伍又奇迹般地向前移动了。

就这样，游行进行了几个小时，毛泽东也在城楼上时而站立，时而走动了几个小时，没有休息片刻，直至最后一批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他才离开。

“八一八”大会时称“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因为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又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于是又被称为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2. 各地游行庆祝“八一八”大会

8月18日北京的庆祝大会一结束，全国为欢呼毛泽东与百万群众一起共庆“文化大革命”的游行活动也就拉开序幕了。

对“八一八”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实况广播，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国。新华社在当天的电讯中说：

“上海今天全市欢腾，广大群众的革命激情达到了十多天来的最高潮。全市有数不清的人冒着滂沱大雨，和首都人民在同一时刻走上街头举行庆祝游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小将们，簇拥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手持红缨枪，高举革命火炬，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歌曲，到中共上海市委表示他们从小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闹革命的决心。许多人捧着新买到的《毛泽东选集》，

以无比幸福的心情参加了庆祝游行。”

“在沈阳，各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以无比幸福的心情，一边收听大会实况广播，一边热情欢呼。”“他们听完广播后，立即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上街头。”

“首都庆祝大会刚结束，天津市由工人、学生、干部等组成的无数游行队伍，就从四面八方涌向街头。”

此外，乌鲁木齐下午举行了10万人的集会与游行，银川、南宁、拉萨、西宁、长沙、长春、济南、太原、杭州等城市，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①

8月19日，游行的规模更大。

广州：50万人；

武汉：50万人；

沈阳：30万人；

济南：15万人；

昆明：10万人；

杭州：10万人；

……

几乎所有的省会、自治区首府，都举行了庆祝大会和庆祝游行。

这些大会和游行也差不多是一个模式，先召开大会，由省委、区党委的主要领导、驻军的主要负责人、革命师生代表、革命工农兵群众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相继讲话。这些讲话，也无非是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高举起”之类。

^① 《人民日报》，1996年8月19日。

还是具体看看其中几座城市的这一盛况如何。

江西省会南昌，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同百万群众共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传来后，用《江西日报》的话说：“英勇的南昌城，整日整夜人潮似海，红旗如林，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欢呼声，喜炮声，不绝于耳，一浪高过一浪。”南昌群众纷纷前往中共江西省委、南昌市委送决心书。这些决心书上保证：“要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下，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发动总攻击，一定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对一般群众来说，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哪些人外，对何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什么样的人才是反动学术权威，内心并不清楚。因为《十六条》上有这样的话，他们也就搬出了如此语言。其实，《十六条》对此也没有具体的规定。正因为如此，这才给后来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开了方便之门。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虽说广大群众对这次革命怎么搞，搞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并不清楚，但他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也是党中央发动的，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加以早已开始的对毛泽东的神化，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是真理的化身，就是自己的领路人和指路明灯。他们绝对不相信毛泽东也会犯错误，也不会去怀疑毛泽东是否正确。现在，毛泽东号召大家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群众自然群起呼应。因此，当年出现的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活动，固然有组织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群众的自

愿行动。当然，这其中也不能排除凑热闹、随大流的成分。

在南昌这天的游行队伍中，有来自梅岭的当年声名远播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的师生，有来自南昌地区的1000多名省、市“五好”、“六好”职工，有来自郊区的3000名公社社员，更多的是南昌的工人、学生和干部。

江西电机厂这天恰好是厂休日，厂里的很多职工本来已经进城来看电影，他们在城里听到了“八一八”大会的消息，又立即跑步回厂，自动集合整队到南昌市委报喜。

南昌百货公司的职工在游行中，大家争着要抬毛泽东画像。其中两位职工说：“我们穿上自己最心爱的衣服，满怀最欢乐的心情，抬着毛主席像。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我们紧紧跟着毛主席走，越走越有劲，越抬越高兴。这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最难忘的一天。”

消息传到郊区，郊区群众在天还未亮时就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游行队伍，抬着画像，端着语录牌，向城里进发。其中的一位群众说，首都群众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也就同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一样，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跟黑帮分子斗，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共大总校的学生连夜做好游行准备，凌晨4点就动身出发游行。游行中，许多人喊口号把嗓子都喊嘶哑了，但还是一个劲地使劲欢呼。^①

为庆祝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浙江杭州市举行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大游行。

杭州也是先开庆祝大会，然后再举行游行的。

在游行的队伍中，大专院校的师生举着毛泽东像和《毛主

^① 《江西日报》，1966年8月20日。

席语录》，抬着巨大的《毛泽东选集》的模型，捧着新买的《毛泽东选集》，高声呼喊口号。一队又一队的舞蹈队，跳着《祖国颂》、《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等连夜赶排出来的舞蹈，唱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

远在郊区半山的浙江水力电力技工学校的“小将们”，簇拥着毛泽东的石膏像，一早跑了二十里进城游行。杭州四中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王某，刚在医院动过手术，听到游行的消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坚决要求出院”。看来这个筹备委员会主任还是个学生，因为《浙江日报》上说：“这位小将迈开大步，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进。”

在工人的队伍中，和毛泽东见过面、一起拍过照的杭州天成丝织厂职工沈金福，“以最大的热情冒雨游行。他抬着巨幅毛主席画像，精神抖擞地走在本单位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雨不停地下着，盖在毛主席画像上的尼龙布沾满了雨珠。沈金福惟恐雨水流到画像上去，立即摸出手帕细心地擦着。他虽然被雨淋得很湿，却什么也不觉得似的”。

“两千多贫下中农代表，冒着风雨，从郊区摸黑赶来参加游行，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一声又一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表达广大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深厚感情。”^①

伴随“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个人崇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文革”前的游行中，也常出现毛泽东画像，但那时基本上是一支队伍前面一幅，不像此时，队伍中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画像，简直成了肖像林。游行时手持《毛主席语录》，而

^① 《浙江日报》，1966年8月19日。

且须是人手一册，也是这时才开始的。组织这样游行的目的，为的是表示对“八一八”大会的响应。自此之后，毛泽东出现在一次游行活动中，各地就要举行一次游行，以示庆祝；毛泽东发表一条“最高指示”，要举行游行拥护；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进行游行响应。“文革”前期，中国是游行不断。

3. 1100 万红卫兵接受检阅

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毛泽东又7次接见红卫兵。

第二次是8月31日。这次主要是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在这次接见中，林彪在大会上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了政治，触及到了经济，学校的斗、批、改，要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①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宣传媒介对此再次作了大肆的渲染。本来从8月中旬开始，红卫兵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北京的红卫兵“南下”、“北上”、“东征”、“西征”，各地的红卫兵涌入北京。这次接见之后，出入北京的学生与日俱增。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了“把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要求各地组织高等学校学生、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来京参加文

^① 《人民日报》，1966年9月1日。

化大革命运动。《通知》规定：“从9月6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对此，周恩来曾提出所有来京串联的师生，其膳食费用包括粮票，都必须由红卫兵所在省市偿还。后来，毛泽东说：来北京串联闹革命，吃饭还要钱吗？既然毛泽东有了如此表示，于是，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联，吃、住、行一律免费。

为了接待这些红卫兵，专门成立了“北京市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委员会”，在天坛的空地上搭建了大批席棚，从全国十三个省市调来了1500余辆公共汽车和6800多名司机，补充北京市公共交通运力的不足，腾出北京站和永定门站两个火车站专门负责输送红卫兵。

外地来京的红卫兵，除了来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外，更重要的是能在天安门前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聆听到最新指示。由于吃饭、住宿、乘车、看病一律免费，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是最好的通行证。一时间，外地的红卫兵一批批地涌来，而来京的红卫兵却迟迟不愿返回，以致一天之内在京的红卫兵最多时曾达300万。

由于来京的红卫兵太多，有关部门曾动员他们离京返回本地闹革命，可红卫兵说，他们还没有看到毛主席。有的干脆说：“没有见到毛主席就不走。”

红卫兵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时称“革命小将”。对于“革命小将”的要求，有关方面哪敢怠慢，只得请示毛泽东，请毛泽东接见他们。

红卫兵的要求得到了满足。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这次没有采取以往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让红卫兵在

天安门前以游行通过的方式接见，而是先让近百万的红卫兵分别坐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中间留出几米宽的通道，由毛泽东站在敞篷汽车上，从通道上徐徐通过，毛泽东在车上不断地向两旁群众挥手致意。

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是10月1日，这次是结合国庆游行进行的。

这天上午10点，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林彪，以及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10点过5分，北京市代市长吴德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接着由林彪讲话。随后，由工人、农民、解放军、革命师生、少数民族代表讲话，还有越南南方女战斗英雄谢氏娇代表外国友人讲话。

这次国庆没有阅兵式，讲话结束之后便开始游行。据称，参加游行的人数达15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红卫兵。对于这次游行，新华社这样说：

上午十一时十五分，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群众游行开始。一百五十万各族各界革命群众，人人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意气风发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红墙中央，高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广场东西侧的苍松翠柏前，竖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广场南面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着孙中山的画像。观礼台左右高大标语塔顶端的红星，象征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四方。

引导整个游行队伍的，是毛主席的巨大塑像。毛主席塑像身着军装，一只巨手伸向前方，指引着我们胜利前进的方向。

由两万多名人民解放军、民兵和红卫兵组成的前卫队，英姿勃勃，威风凛凛，走在群众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护卫着国旗和国徽的人民解放军健儿，雄赳赳，气昂昂，挎着冲锋枪，个个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踏着整齐的步伐，有节奏地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紧跟着解放军的，是作为解放军强大后盾的民兵和红卫兵。武装的民兵们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谆谆教导，昂首阔步进入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红卫兵小将们，抬着《毛主席和红卫兵在一起》的巨幅油画，格外兴高采烈。在天安门上下，万众欢呼人民的铁流无坚不摧。人们说，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胆敢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定叫它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外地和首都革命师生组成的游行大军，分成一百四十路纵队，连绵数十里，汇成一支伟大的革命洪流，浩浩荡荡地前进。当工人、农民队伍来到天安门前，人们都为全国工农业战线传来的大好形势而欢呼，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工农群众热烈鼓掌致敬！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队伍，是今天首都国庆游行中一支人数最多的文化革命大军。他们和首都的工人、革命师生、革命干部携手并肩前进。在这支队伍中，有来自西藏高原的翻身农奴子女，有来自毛主席故乡的红色青少年，也有来自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遵义等地的革命后代。他们受全国亿万革命青少年的委托，来接

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向毛主席表达他们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①

这次游行，只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

新华社在这天发布的《毛主席检阅一百五十万游行大军》的电讯中，有这么一段话：“从上午持续到下午的六个多小时中，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精力充沛，神采焕发，一直和大家在一起。集会游行结束时，毛主席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过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队伍之中，亲切地向大家祝贺节日。”

庆祝大会是10点过5分开始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是10点。如果按上面所说的“六个多小时”的话，那么，游行要到下午4点多才结束，而事实上，游行到上午12点多就结束了。电讯稿为何要故意把游行时间拉长四个小时？为的是能够与后面的毛泽东从天安门上走来，“一直走到群众队伍中”这句话相衔接。

实际情况是，毛泽东的确到了群众队伍中，但不是从城楼上走下来的，当然也没有从上午到下午持续六个多小时。对此，国庆这天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陈长江回忆：

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没有阅兵。参加游行的主要成员是红卫兵，到12点多一点游行就结束了。下午4点多钟，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大会堂118厅开会。晚上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按惯例也是要出席并与大家一起共度国庆佳节的。

大会堂118厅的会议结束后，已是7时多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大会堂出来，乘车去天安门参加晚会。随行的还有林彪和文革小组的成员，加上警卫车辆，是个

^① 《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不小的车队。

我们的车队驶出大会堂西侧路北口，正要进入南长街南口，准备经西华门、筒子河到天安门城楼处。当时，也正是群众队伍进入广场的高峰，宽阔的西长安街不论是快车道，慢车道，还是人行便道。满是一队又一队行进中的群众队伍。他们看到我们的车队，不仅不像往常那样，很有礼貌地让路，而是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口号，顽皮地把路口给堵上了。

我乘坐的头车一停，后面毛主席乘坐的和其他首长的车，也都一辆接一辆地紧急刹车停了下来，顷刻之间我们的车队被包围在千万人之中。路被堵了，我们的车，前进不行，后退也不行，周围都是密集的人群，动弹不得。这些群众，他们一个个探着头，闪动着奇异的寻索的目光，向车里张望，还指指点点，没完没了。

这时，中央警卫团的一位领导带领近百人的预备队赶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分开人群，清出一条通道，使我们的车队得以通过。由于这里的耽搁，直至晚上8点多才到达天安门城楼上。^①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约150万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被接见。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被接见者约200万人。

11月10日至11日，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也是200万人。每次接见之后，红卫兵照例都要游行一番。

前七次接见，共接见了红卫兵约800万人。尽管如此，还

^① 《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31—32页。

是有大批的外地红卫兵因为没有见到毛泽东而不愿离京，给北京的交通、饮食、住宿等方面带来巨大压力。

一次又一次的接见，毛泽东也逐渐失去兴趣，甚至视为一种负担了。虽说后几次接见采取的是检阅式，受接见者坐在大道两旁，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可是，一二百万人的队伍，要排几十里路长，汽车又不能开快，一次检阅，耗时不短。检阅时，又不能坐，坐下红卫兵看不见，他们见不到毛泽东就不回去，所以只能站着，这对已是73岁高龄的毛泽东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每次接见前，他自己也诙谐地说：“今天又要罚站去了。”

第七次接见之后，滞留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尚有300万人。寒冬将至，如果不尽快让这些红卫兵回去，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困难。

要让这些红卫兵回去，还是只能由毛泽东出面，这些“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看来还是只有毛泽东自己才能送走。

一天，周恩来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动员外地红卫兵返回原地的

问题。

周恩来说：“主席，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发出通知，一律暂停外地师生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联。于是，毛泽东反问道：“不是发了通知，贴了布告，也登了报，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么！”

周恩来回答说：“是啊。天冷了，这些小将已经来了，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可能早日接见，然后让他们赶快回去。”

既然如此，毛泽东只得再接见一次红卫兵。

11月25日和26日，300万红卫兵分作两批，每天150万，由毛泽东检阅完毕。

这样，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总人数达 1100 万人。

成百万人的大接见，即使组织最严密，考虑最周详，也难免有所闪失。时任国务院接待站站站长兼“北京市外地革命师生大串联接待委员会”主任的吕鸿，在三十余年后回忆说：

有一次毛主席突然从天安门城楼走下来一直到了金水桥头，顿时，“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天动地，大群红卫兵像潮水般地涌向金水桥。我和警卫人员深怕毛主席被人流冲倒，赶忙拼命上前手拉手地阻拦这涌上来的人群。好不容易地把毛主席领上了观礼台，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紧紧关上了观礼台的铁门。这次没有出现闪失，实在万幸。还有一次，毛主席临时修改原定接见方案，要求乘坐吉普车在人群中走一遭。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我慌忙地带领警卫部队，硬是在人海中开出一条环形弯道，其宽度必须能通过一道吉普车。我们在环形弯道两边安排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警卫部队官兵组成；第二道防线由北京市红卫兵组成；第三道防线由我们派出的军训解放军所带领的外地师生红卫兵组成。在迅速完成这一布置后，才请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开出来绕行。没有想到，将要接近走完一圈时，突然从人群中窜出一个外地来的带红卫兵袖章的成年人，一下子躺在毛主席车前，险些发生意外事故。位于二、三道防线的一些北京的红卫兵抢上前去，一窝蜂似地把这个人连拖带拉抓到天安门前的指挥室。红卫兵怒火中烧，抡起带铜扣的皮腰带，没头没脸地向这人身上抽打，边打边嚷，忙乱中有人把热水瓶向他头上砸去，顿时这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谁也不敢出面干预。我出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大声呼喊着手扑上去：“同志们！别打了，别打了！万一打死了，就无法问出口供了！事情

不好了结啊!”边喊边上前阻拦，我身上肩上也挨了好几条皮带，幸好没有击中头脸，然而鲜血溅了我一身。最后总算制止住了这场残酷的打鬥，这人已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立即叫了几名警卫战士把这人带走了。以后，怎么审讯的，我也顾不得去过问了。^①

当然，大接见中出现的伤亡事故，是不可能见报的。

毛泽东每接见一次红卫兵，各地都要举行庆祝游行，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载歌载舞，真可谓“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① 吕鸿：《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12期。

十、失控的游行

1. 红场流血事件引发的大游行

在“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各种游行中，有相当多是涉及中外关系的游行。尤其是进入1967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以其他复杂的原因，新中国的外交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各种各样的抗议游行也层出不穷。

在涉及中外关系的大规模游行中，首先发生的是反苏大游行。

50年代末60年初，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中苏两党的分歧不断扩大，并且影响到两国关系。可是，苏联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不但不维护两国50年代建立的友好关系，反而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如支持印度大举入侵中国，在新疆伊犁策动暴乱事件，发表大量的文章攻击中国等，致使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1963年和1964年，中苏两党又发生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大论战，两党两国的关系越拉越远。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国本寄希望于新的苏联领导人能在改善中苏关系上有所作为，曾对勃列日涅夫的就职发出了热情的贺电，并派出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

周年庆祝活动，与苏共领导人进行会晤。

可是，中国的良好愿望没有变为现实。在会谈过程中，苏联领导人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同时，苏联人在其国庆招待会上有意制造了一件侮辱中国领导人的事件。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挑衅地对周恩来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还胡说什么“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这种行为，当然是中国方面不能容忍的。结果，这次两党会谈不欢而散。

随后，勃列日涅夫继续坚持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不但大量增兵中苏边境，挑起边界冲突，而且派重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把威胁中国的军事前哨推进到距中国首都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强行召集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中共和其他六国党拒绝参加。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中苏关系全面破裂。

造成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违背党际关系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时也违背国家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此，中国认为，苏联和苏共已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演化为修正主义，斥责其为“苏修”。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不断地强化“反修防修”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尤其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红卫兵在冲向社会大扫“四旧”的同时，也大反“封、资、修”。

红卫兵破“四旧”是从“改名”（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公社名）开始的。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40万人

十、失控的游行

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并准备在29日举行20万人的命名大会和大规模庆祝游行。周恩来得知后，担心红卫兵要把反修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去，硬闯大使馆，发生涉外纠纷，要求红卫兵只在大使馆门前示威，不能闯入使馆。经过反复说服，红卫兵同意了。尽管如此，周恩来仍不放心，吩咐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出700名徒手的解放军战士到大会会场值勤，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8月29日和30日，红卫兵和其他群众在大使馆前持续游行两天，参加者共达40万人次，由于事先作了防范，没有发生意外事件。

1967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派往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向所在国的有关方面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1月24日，65名留法学生和4名留芬（兰）学生，先后抵达莫斯科，准备乘26日的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列车回国。这样，留学生们在莫斯科有一天的停留时间。

既然有时间，他们自然想起应去红场瞻仰列宁的遗容，这意味着对这次专程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更重大。于是决定25日去红场向列宁墓和斯大林墓献花圈。

自红卫兵8月在苏联驻华使馆前游行后，中苏关系更趋紧张。8月31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把大使馆外面的游行说成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团结的一个新的严重措施”。此后，苏联报刊发表大量的批评中国的文章，甚至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悲剧，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前所未有的耻辱”。^①10月，苏联单方面决定中国全

^①（英）彼得·琼斯等著：《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体留苏学生休学，并限令在当月内离苏。12月，在苏共中央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毛泽东及其集团”政策的决议，对毛泽东进行指名道姓的攻击，这在苏联的官方声明中还是第一次。次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市讲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一大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在这样的背景下，留学生要向列宁墓献花圈，同时还要向被苏联现在领导人否定的斯大林墓献花圈，势必会引起苏方的高度紧张。

实际上，苏联人不只是紧张，而且暗中作了布置。

留学生们也估计到给斯大林墓献花圈势必会引起苏联人的干涉，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如在列宁墓前排方队时，让女同学和体弱的男同学站在队伍的中间，身体高大强壮的男同学站在外圈。

25日中午，中国学生经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苏联有关当局后，携带花圈前往红场。这一天，天气阴沉沉的，很冷，大概在零下30度。开始时，由一名苏军少校和数名警察把中国学生带入红场。过了一会，警察把中国学生插入参观者的行列，在学生队伍的后面布置了数百名冒充参观者的军警和便衣特务。

中国学生秩序井然地列队走到列宁墓前，把花圈放在列宁墓的入口处，并全体脱帽默哀。默哀后，一位中国学生正要带头朗读《毛主席语录》，突然两个军警冲上来，左右架住这个学生，并嚷着：“红场是个严肃的地方，不准大声喧哗！”使馆去的领队和翻译随即出来交涉。队伍中接着就齐声朗读起《毛主席语录》来：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

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中国学生接着又朗读一段语录：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这两段语录，都是明显针对“苏修领导集团”的。尤其是后面一段语，出自毛泽东为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于1939年12月发表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更是直接针对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中国学生在朗读语录时，苏军少校带头阻挠，推搡女学生，还关上了列宁墓的大门，中国学生便放开嗓子齐唱《国际歌》。这时，苏军少校向大批苏联武装警察和早已布置在中国学生身后的便衣特务招手。这些人一拥而上，强行把中国学生和中国大使馆的陪同人员以及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重重包围起来，拳打脚踢，乱打乱撞。有的便衣特务还手持暗器，有的用拳头猛击中国学生的脸部。顿时有许多学生、使馆陪同人员及新华社记者被打得头部流血、鲜血满面。

尽管如此，中国留学生还是手挽着手，坚持唱完了《国际歌》。苏联军警和便衣特务用脚把中国学生踩在地上，撕破学生的衣服，打破学生的眼镜，还有衣服被抢走。很多中国女学生被打倒在地，站不起来。在场的69个留学生，全都挨了毒打，受伤的有30余人，其中9个人受重伤。随行的女翻译高呼口号，苏联警察拉住她脖子上的围巾使劲勒。他们还阻止新华社记者照相，企图抢走相机和胶卷，由于留学生冲上去全力保护，才使相机和胶卷未被抢走。

半个小时后，在莫斯科的不少外国记者和市民闻讯赶来，

红场上人山人海。一些苏联人在高喊：“不能打，不能打他们啊！”有的人同情地向中国学生挥手以示支持，有的老人则在一旁流泪。

这时，学生们手拉着手，高呼口号：“伟大的列宁万岁！”“斯大林万岁！”“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勃列日涅夫！”他们还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下午1点45分，中国学生撤出红场。当大轿车经过闹市区时，学生们打开车窗，将拳头伸出车外，拼命高呼“打倒苏修”等口号。^①

红场流血事件是苏联当局蓄意制造的暴力事件，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生有刺激苏方之处，如向斯大林墓献花圈，朗读针对苏联的语录，但苏联当局并不是想方设法避免冲突的发生，而是预做准备，到时大打出手。即使中国学生献花圈、念语录有不妥之处，但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拳脚相加，实施暴力，实在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

这一事件立即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大游行。

红场流血事件发生之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加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中国必定要对此作出强烈反应。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即发表声明，提出“最最强烈抗议”。声明说，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这一法西斯暴行，再一次暴露了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嘴脸。并且指名道姓地要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听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

^① 关于这一事件，参见杨赞贤《红卫兵红场流血记》，载《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并参见新华社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

人，凡是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人，凡是背叛革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声明最后用当时特有的语言说：

老实告诉你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革命学生、革命青年和七亿人民，不是好惹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们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难道还怕你们这几只在漫天大雪中快要冻死的苍蝇吗？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还有什么花招，统统使出来吧！你们的一时猖獗，不是表示了你们的强大，而只是表示了你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语。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现在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世界的时代，是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苏联的上空，尽管暂时笼罩着一片阴云，但是，我们深信，它必将被革命的风暴卷去，伟大的、具有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苏联人民，绝不会容忍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这样横行霸道，他们总有一天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把修正主义的统治砸个稀巴烂！一个红彤彤的崭新的革命的苏联必将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①

1月27日，全国差不多所有公开出版的报纸，都刊登了红场流血事件的消息和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声明。紧接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开始了。

声明一发表，北京红卫兵和各界群众就纷纷聚集到苏联驻

^① 《人民日报》，1967年1月27日。

华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怒不可遏的首都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和街道居民，在苏联大使馆的围墙上和主要街道上，刷满了强烈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漫画、标语和大字报。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冒雪游行的队伍汹涌澎湃，怒吼声震天动地。”游行的人群不断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的口号。更有群众制作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的模拟像，在大使馆前处以“绞刑”，然后当场焚毁。^①

28日，苏联使馆门前更是热闹非凡。红卫兵和北京群众高举着毛泽东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带着大批的抗议信和巨幅标语，从四面八方涌向使馆门前，“怒斥苏修混蛋们镇压我国留欧学生的滔天罪行”。

情绪激昂的群众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模拟像，高高地吊在苏联大使馆的门上和使馆前的树上示众。成群结队的红卫兵来到使馆门前，齐声朗读中国留学生在红场上读过的那段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的语录。

宣传车上的大喇叭对着大使馆播送一份份火药味浓厚的抗议书。其中有的抗议书声称，要“把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的狗头砸个稀巴烂”。

大使馆的大门和围墙上，大字报、标语、传单、宣传画糊得层层叠叠。有一份抗议书上写道：

苏修混蛋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赫鲁晓夫没有好下场，你们这些混蛋也没有好下场。你们欠下的血债，一定要偿还。^②

^① 《光明日报》，1967年1月28日。

^② 《光明日报》，1967年1月29日。

从27日开始，上海、天津、广州、西安等地，也纷纷举行示威，抗议苏联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暴行。

面对群情激愤的示威群众，苏联大使馆的人的确心惊胆战，终日大门紧闭。大门可以关住，但内部却又出了问题，在使馆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举行罢工，与外面群众互相呼应。

1月27日下午2点钟，在使馆工作的中国厨师、汽车司机、锅炉工、电工、清洁工、养花工等近百名工作人员，抬着毛泽东画像，加入到使馆外的示威游行行列。

对于这次罢工，新华社报道说：

今天清晨，被苏修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中国汽车司机们，一大早便聚集在车房里，义愤填膺地声讨苏修的新挑衅。忽然一个使馆苏联工作人员走进车房，伸出手来要同中国司机刘杰握手言欢。

“不要！”刘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还清楚地记得，就是这个家伙不止一次地硬把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塞到车房，妄图煽惑我们中国工人。此时此刻，怎能握手言欢呢！？

可是，这个家伙还假惺惺地问：“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苏联军警打了我们的学生。打了我们学生，就等于打了我们工人！”

“这是谣言！”

司机们站立起来了：“不！苏修一小撮领导人专欺骗世界人民！”

这个家伙灰溜溜地退出车房去搬兵，找到了负责总务的使馆秘书。在使馆办公楼外的西面，这个秘书向中国清洁工李德才挑衅：“今天怎么回事？”

“我们要罢工抗议!”

“为什么?”

李德才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你们的军警和特务打我们的学生?”

“消息不可靠!”苏联使馆秘书说。

“你们说的才不可靠。柯西金尽欺骗世界人民!”

那个秘书竟然操起北京土话，厚颜无耻地说：“老李，你别‘寒伧’我们苏联人了!”

“你这是歪曲!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拼命反华的是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一小撮苏修领导!”

“好，好，好……”苏联秘书狼狈不堪、败阵而走!

全体中国工作人员汇集到使馆大门口来了!司机刘杰宣读罢工抗议书以后，他们集体离开了使馆。^①

至1月30日，在持续五天的示威游行中，前往苏联大使馆示威者即达100万人。

红场流血事件的第二天，除9名重伤者乘坐飞机外，其余60名受轻伤或无伤的中国留学生，坐火车从莫斯科启程回国。

2月1日，留学生们回到北京。

为了欢迎这些“光荣的反修战士胜利归来”，“首都革命造反派和各界革命群众”10万人，在北京站举行欢迎大会。陈毅副总理到车站迎接，和留学生们一一握手。在欢迎仪式上，每个留学生的左臂上都套上了一个“反修红卫兵”的红袖章，欢迎的人和留学生们人人手捧《毛主席语录》，齐声朗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段著名的语录，陈毅亲自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① 《光明日报》，1967年1月28日。

大会结束后，与会者组成几十路纵队出发游行，沿途不断高呼“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等口号。^①

然而，针对苏联的游行活动并未就此结束。

2月3日上午，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利柯夫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要求立即清除中国大使馆的新闻图片橱窗，因为橱窗里陈列着红场流血事件的照片和谴责苏联领导人的材料。并且声称，如果中国大使馆不拆除，苏方将要采取措施予以拆除。

当天晚上，莫斯科时间18时50分，苏联当局组织一百六七十个便衣警察，突然乘车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封锁两侧街道，闯进大使馆前院，强行砸坏和抢走设在前院围栏以内的六个新闻图片橱窗，并且还殴打了前来劝止的安致远及其他外交人员和工作人员。在场的三十一名中国人员全部被毒打，三人伤势严重，其中包括使馆二秘王荃卿。安致远的头部被猛击，商务参赞蔡新德被打倒在地，胸部被踩伤。

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在使馆前值勤的十几名苏联警察，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参与殴打。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当局还切断了大使馆同北京的电话联系。^②

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外交部于2月5日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在中国大使馆范围内犯下的新的法西斯暴行，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苏联政府公开承认错误，向中国大使馆全体被害人员赔礼道歉，严惩肇事凶手，恢复大使馆的六个新闻

① 《光明日报》，1967年2月2日。

② 《光明日报》，1967年2月6日。

橱窗，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①

为抗议苏联当局的所为，拥护政府声明，苏联大使馆前本来开始稀少的游行队伍，又骤然密集起来，用当时的语言说，这是“新账老账一定要清算，新仇旧恨一齐涌心头”。

2月5日，北京4万“革命造反派工人”正在举行抓革命、促生产夺权斗争经验交流大会。消息传来，经验交流大会立即变成了声讨大会，“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的口号不绝于耳。大会一致通过了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抗议信。信中说：苏联当局欠下的笔笔血债必须偿还！对你们的任何挑衅，我们一定要还击，绝不饶恕。会后，4万名工人又赶到大使馆前来示威游行。

这天，苏联使馆门前，“怒潮澎湃，抗议和吼声震天动地”。北京农业大学分校的师生，从五十里外赶到了使馆前。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的广播车，从早到晚用中俄两种语言对着使馆广播抗议文稿。^②

除了这些以外，还发生了当时媒体没有报道的内容。英国人彼得·琼斯所著的《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说：

1967年2月4日至6日，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分三批从北京撤走。2月4日离开的那些人在机场遭到红卫兵的嘲弄。次日，第二批人被红卫兵阻碍了6个小时未能登机，红卫兵闯进公共汽车里，把他们带到机场。他们到达那里时，红卫兵打他们，向他们啐唾沫。2月6日，发生了最残暴的场面，妇女（有的抱着孩子）和儿童被红卫兵逼迫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下爬过去。当苏联

① 《光明日报》，1967年2月6日。

② 《光明日报》，1967年2月6日。

和欧洲其他外交官们——包括唐纳德·霍普森（英国代办）和卢西恩·帕耶（法国大使）力图保护妇女和儿童时，遭到粗暴的虐待。返回大使馆的苏联官员们遭到袭击，一些人在公共汽车里被囚禁了12个小时。示威者破开苏联大使馆大门，走进庭院，挥舞着亵渎人格的标语牌。

1967年2月6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馆，禁止苏联使馆官员离开使馆大院，否则，他们的安全无法予以保障。有几天，大使馆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2月7日，东欧的外交官给苏联同行送食品，次日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走近苏联大使馆，那么他们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2月9日，那些外交官不顾警告和监督把从莫斯科空运来的食品供应送到苏联大使馆。^①

当然，琼斯所言未必完全真实，只能作为参考。

2月11日，北京10万人在首都体育场举行“首都革命造反派欢迎我国留学生声讨苏修法西斯罪行”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此后，对红场流血事件和中国使馆橱窗被砸事件的宣传，逐渐冷却下来，苏联使馆外面的示威活动也就结束了。

半年之后，又发生了一次针对苏联的示威游行。

这次游行起因很简单。8月6日，停泊在大连港的苏联货船“斯维尔斯克”号货船二副伊万诺夫和一名船员，曾主动向中国边防检查人员索取毛泽东像章，可像章到手后，两人又当着中国边检人员的面，将一枚像章投到海里。^②

当时，中国人把毛泽东画像、像章视为神圣不可亵渎之

① 《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138页。

② 《光明日报》，1967年8月14日。

物。这两个苏联人居然当着中国人的面扔掉像章，既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也是一种挑衅行为，何况这还是“苏修”人所为。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最最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人，于8月13日召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卜烈仁，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已决定驱逐该船船长柯尔诺夫和二副伊万诺夫出境，不准他们再来中国，并将“斯维尔斯克”号货船武装押送出境。^①

13日下午，旅大市的群众和红卫兵举行集会，表示拥护中国政府将“斯维尔斯克”号押送出境的决定。8月14日，对“斯维尔斯克”号事件的抗议示威活动，再次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举行，并且一直延续了好几天。

2. 不该发生的游行

1967年6月、7月，发生了针对缅甸的游行。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缅两国有长达2000余公里的共同边界，自古以来，中缅两国人民就和睦相处，有着悠久的友好历史。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1950年6月，中缅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50年代，中国领导人与缅甸、印度领导人倡导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成为处理国家间事务最基本的准则。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缅之间成功地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① 《光明日报》，1967年8月14日。

十、失控的游行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缅关系，正如1960年12月周恩来与陈毅率中国代表团赴缅庆祝缅甸国庆节时陈毅写的一首诗中所言：

我住江之头，
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
共饮一江水。

可是，进入“文化大革命”之后，中缅友好关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在对外交往与对外宣传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做法。一些人认为中国最革命，以为中国现在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而且十分热切地向外国人赠送《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等“红宝书”，希望外国人也像中国人一样热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确也有一些外国人，或者出自内心，或者出自迎合，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作出夸大其词的赞誉，这又反过来助长了上述行为。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的工作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人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像章，引起了缅方的不满和干涉。

缅甸曾长期遭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人统治缅甸期间，曾组织过一个团体，给参加的成员每人发一个徽章，且必须佩戴，目的是为了表示效忠英国女王。这种徽章伤害了缅甸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因此，缅甸政府对像章之类特别敏感，的确有些杯弓蛇影之味。于是，缅甸政府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这年6月开始，在缅甸的一些华侨学校里，校方要求华侨

学生摘下毛泽东像章，但学生不答应，双方常常发生一些冲突。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接着，发生了一些缅甸人冲击华侨中学和中国驻缅使馆的事件。

据中国驻缅大使馆事后给外交部的报告说，6月26日，约2000名缅甸人（时称“暴徒”）袭击了仰光南洋、华侨两所中学，毒打了华侨学生和去探望他们的家长，华侨多人受伤，至少有一人死亡。中国驻缅使馆外交人员闻讯赶去，也遭到了缅甸人的侮辱，他们乘坐的汽车也被砸坏。

6月26日晚和27日晨，数百至1000余名缅甸人多次袭击了中国驻缅使馆以及新华社仰光分社和中国民航总局仰光办事处。28日中午和下午，又有数千人冲击中国大使馆，中国援缅专家刘逸被暴徒杀害，中国外交人员多名被刺伤。

友好国家之间发生这种事情，实在不幸。但是，少数缅甸人的行为，并不代表缅甸政府的态度。因此，事件发生后，双方都应该保持克制，冷静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时，缅甸政府表示，愿意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打算使两国关系紧张。

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左”倾惯性的作用，中国方面对缅甸的态度十分强硬。

6月28日和29日，中国外交部两次照会缅甸驻华大使馆，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29日和3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报纸都对照会作了全文报道，而且加以醒目的黑体大字标题。29日，《光明日报》的标题写道：“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华侨，我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30日，《光明日报》的标题则称：“缅甸政府迎合美帝苏修需要继续策划空前严重

十、失控的游行

的反华排华暴行，我国政府声明再次向缅甸政府提出最强烈最严重抗议。”

中国政府的照会刚发出，北京的群众便开始前往缅甸驻华使馆，进行示威，以示响应政府照会，抗议缅甸政府。

抗议示威的群众，按照当时游行的惯例，抬着毛泽东画像，捧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语录歌，高呼“万岁”口号，一边游行，一边在使馆的门上、墙上张贴大字报、抗议书。

那些被称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美帝不怕，苏修不怕”的红卫兵，在使馆前高唱《造反有理》歌曲，表演《砸烂缅甸反动派》的活报剧，“斗志昂扬，口诛笔伐缅甸反动派”。

游行的队伍中，有一支被缅甸暴徒杀害的中国专家刘逸所在单位——水利电力部水利电力建设总局的群众队伍，他们抬着刘逸的遗像，向缅甸驻华大使信瓦瑙递交抗议书，其中自然少不了“暴露了你们的法西斯反动面目”、“血债必须偿还”等字眼。^①

这一天，在缅甸使馆前示威的人数超过20万人。

7月1日，前来使馆示威的群众达30万人。

这两天，上海、昆明也发生了针对缅甸的游行。

7月1日这天，上海在前日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后，“又有十万革命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清晨到夜晚，黄浦江两岸，怒涛滚滚，人们高举红旗，抬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捧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不断振臂高呼：‘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声明！’‘坚决支持我国爱国侨胞的正义斗

^① 《光明日报》，1967年6月30日。

争!’‘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他们把一封封抗议信委托报社转交给缅甸使馆”。

“昆明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归国华侨学生五万人，今天下午举行示威。”“参加示威游行的工人和红卫兵小将，对缅甸反动派杀害我国援缅专家和侨胞、袭击我国大使馆的法西斯暴行，无不万分气愤。”^①

这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的大概是造反派。

随后连续几日，仍有群众不断涌到缅甸大使馆前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既有红卫兵、工人、市民，也有从郊外赶来的农民。示威群众呼喊口号，朗读《毛主席语录》，在使馆门上、墙上张贴大字报，递交各种措辞严厉的抗议书。据称，仅至7月2日，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即超过100万人。

缅甸使馆前的大规模游行，引起周恩来的不安。在当时的环境下，他难以阻止群众去示威，但是，他坚决不允许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去冲击缅甸使馆，去“偿还血债”。为此，他打电话指示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游行，绝不能冲进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②

在北京卫戍区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虽然连续多日示威，群众情绪激昂，但秩序还好，没有发生冲击使馆的情况。

四年后，周恩来会见来访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谈及这段情况时说：

你知道一九六七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一九六

^① 《光明日报》，1967年7月2日。

^② 参见陈扬勇著：《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七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当时我国政府想把这件事尽量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开始我国使馆有一份抗议照会送给了贵国外交部，我记得照会中提出了五点要求。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支持抗议照会的要求。《人民日报》就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七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了，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一个是要冲缅甸驻华使馆，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两件事都有坏人，他们想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查清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大概从一九六七年七月起，有些重要照会就由大使馆直接送出，当然上面一定是盖了大使馆印的。你知道，那时我们的大使回来了，原来还要回去，六月底发生事情以后，我们才决定不要他回去了。

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当时我国在缅甸的专家虽然没有事做，但还留在那里，要看一看形势的变化。事态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到了一九六七年十月，你们通知我们的专家回国。十一月初，我们的专家都撤了回来。这样关系就搞得更紧张了。去年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请你们代办处转达对阁下的问候。阁下在这个时期也采取了主动。这样，情况就转过来了。^①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事态的发展得到了控制，中缅关系没有因此而恶化。

3. 从游行到火烧英国代办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7年的涉外游行，可谓层出不穷。

这年的5月至8月间，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针对英国政府的游行。

1967年5月初，香港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人上街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港英当局出动200多名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1—483页。

警察和防暴队队员驱赶罢工工人，双方发生殴打，多名工人被打伤，21名工人被逮捕。

尽管如此，事态仍在继续发展。据新华社报道：11日下午，港英当局再次出动警察镇压人造花厂的工人和前来慰问的工人、师生和各界同胞，并逮捕了127人。

12日，港英当局在九龙东北部宵禁区逮捕100多名居民。一名18岁青年的头部被击受重伤，次日凌晨在医院死亡。

13日，又有100多名香港群众被拘捕。

仅据港英当局14日早晨的宣布，这几天被捕的香港同胞共有391人。

事件虽然起因于劳资纠纷，但与内地正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亦不无关系。

当时新华社关于这一事件的电讯中，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点。这篇题为《香港英国当局竟敢与香港同胞和七亿中国人民为敌，港九同胞愤怒声讨英当局血腥暴行》的电讯中说：

“4月13日，香港人造花厂的资方公布了一系列加重剥削和加强压迫的苛刻条例。4月28日，又无故开除总厂和九龙分厂几百名工人。这个厂的工人为了维护职业和起码的生活条件，派出代表一再要求与资方谈判，但遭到拒绝。工人为了争取合理解决，他们连续几天戴着毛主席像章，举着《毛主席语录》，在九龙新蒲岗分厂前进行有秩序的抗议。”

“港英当局看到港九爱国同胞学习毛主席著作，十分恐惧和仇视，便勾结香港人造花厂资方，于5月6日下午4时半借故挑衅，制造事端，指使工厂的总管动手殴打工人。十分钟后，香港英国当局高级警司谷巴率领大批警察乘坐五辆警车开到工厂附近，封锁现场。紧接着，港英‘防暴队’头戴钢盔，手持藤牌、警棍、手铐、步枪、卡宾枪、冲锋枪、催泪弹发射

枪等，一下子就扑向人群，挥舞警棍、枪托，见人就打，有的工人和同胞被打倒在地，遭到践踏；有的被打得血流满面；有的被连拖带拉揪着头发押上警车。有些被推上警车的受伤工人，在车上高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呼‘抗议港英当局法西斯暴行’、‘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在港英警察血腥镇压香港人造花厂工人的时候，邻近工厂的许多工人和群众立即前来声援，也遭到丧心病狂的港英警察的毒打。各厂工人忍无可忍，他们从楼上用铁块、石头、玻璃瓶进行回击，吓得‘纸老虎’躲的躲，藏的藏。到当日下午八时许，港英警察和‘防暴队’匆匆撤离现场。”^①

当天晚上，港九树胶塑胶业总工会派出三名代表前往九龙港英黄大仙警署交涉和抗议，也遭到港英当局的无理扣押。

5月9日，香港人造花厂的工人在港九同胞的支持下，继续在工厂门前进行斗争，他们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并且把港英当局派人偷偷洗刷掉的语录纸和抗议标语又重新贴在工厂的墙壁上。

11日中午，香港人造花厂工人近百人在工厂门前排成整齐的队伍，抗议港英当局插手该厂劳资纠纷，蓄意制造血腥暴行。工人们手持《毛主席语录》，胸前佩戴着毛泽东像章，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港九各界同胞一批批前来慰问和声援，给工人们以巨大的鼓舞。

下午3时半，港英当局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镇压。它们出动了大批武装军警和“防暴队”千余人，手持藤牌、警棍和自动步枪，乘警车开到现场，在港英“九龙东区总警司”伊令和指

^① 《光明日报》，1967年5月15日。

挥下，摆开阵势，向在场的师生发射木弹，当场打伤一名女学生，然后挥舞着藤牌、警棍冲向青少年，见人就打，打伤了的就连拖带拉押上警车。接着，“防暴队”又强行驱逐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香港人造花厂工人，并且到处乱窜，毒打和追捕途人和附近居民，不断地向群众发射木弹和催泪弹，使许多人受伤。在这一天，仅根据港英当局宣布，就逮捕了一百二十七人。

这些刽子手由于害怕他们的罪行公诸于世，竟公然干涉新闻记者的活动，一再恫吓记者，并野蛮殴打在现场进行正常采访活动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和香港爱国报纸记者，据查明，已有五名记者被打伤。新华社香港分社、《文汇报》、《大公报》和《新晚报》的记者当场向指挥这次血腥暴行的港英“九龙东区总警司”伊令和提出强烈抗议。

港英当局为了进一步镇压中国同胞，宣布从11日晚九时三十分开始在九龙多处实行宵禁。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香港工人、爱国师生和各界同胞在敌人的残暴镇压面前，英勇不屈，正气凛然，充分表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当刽子手们在相隔十余英尺的地方举起木弹枪向爱国师生射击的时候，几十名青少年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高呼“毛主席万岁！”严词斥责港英当局的法西斯暴行。一名少年不顾敌人的射击，冲到一名警官面前，愤怒地指着他，高呼“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吓得这名警官慌忙向旁边躲开。一位被打得满身鲜血的工人被强推上囚车后，仍然顽强地把头伸出车外，让记者拍摄下港英当局的暴行罪证。有些同胞在囚车上愤怒地面对着法西斯暴徒，谴责他们的血腥暴行。当这些暴徒毒打和追捕一部分群众时，另一部分群众为

了帮助自己的同胞解围，就在后面向暴徒投掷砖块、石头和玻璃瓶；当暴徒转过身来毒打和追捕这部分群众时，那部分群众又重新集结起来用同样的办法向暴徒进行还击。在工厂和住宅里的工人和同胞也纷纷向这些暴徒投掷石块和玻璃瓶，法西斯暴徒陷于群众的重重包围中。^①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一副部长于5月15日清晨召见了英国驻华大使霍普森，面交中国外交部声明，向英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声明要求英国政府责成港英当局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向受害者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对于这些要求，必须无条件接受。^②

当时，周恩来在得知港英当局的镇压行动后，认为，中国作出反应是必要的，但基于我国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和政策，要十分注意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充分掌握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武斗会遭到英方镇压，且容易被美国利用。他还对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临时性的突发性罢工，不要像搞1925年香港总罢工的形式，因为时代不同了。如果搞总罢工，日本商人就会乘机去占领香港的日用品和副食品市场。而且，搞长期罢工，工人无工资收入，生活要靠国家救济，这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对我不利。^③

可是，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周恩来的指示也得不到贯

① 《光明日报》，1967年5月15日。

② 《光明日报》，1967年5月16日。

③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52页。

彻，矛盾朝着激化的方向越滑越远。

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最紧急最强烈”抗议，果然对香港同胞产生了鼓舞。他们成立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并且仿照内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张贴反港英政府标语、大字报，开展游行示威，继续举行罢工。有的人甚至用土制的手榴弹和炸弹袭击港英警察。

为了配合香港工人的行动，内地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对此，当时的媒体报道说：

“被香港当局血腥镇压中国同胞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革命工人、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革命群众，今天以无比愤慨的心情涌到英国驻中国代办处门前游行示威。首都广大革命群众表示，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并且严正指出：绝不容许香港英国当局勾结美帝猖狂反华，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首都和全国人民是坚决支持香港中国同胞正义斗争的强大后盾。”

“今天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成了首都工人、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集中声讨美帝帮凶——英帝国主义的场所。英国代办处的门前，墙上，马路上，到处贴着抗议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高举红旗，高呼口号，来到这里游行示威。人们捧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齐声朗读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毛主席语录歌曲，表现出无比高昂的革命战斗意志。”

“游行示威的革命群众纷纷指出，香港英国当局制造镇压香港中国工人、各界代表和青年学生的血腥事件，完全是它蓄谋已久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暴行，是英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挑衅。英国政府胆敢与七亿中国人民为敌，充当美帝国主义反华打手，是绝没有好下场的。北京市第一清洁车辆厂一位清洁工人愤怒地说，香港英国当局如不悬崖勒马，我们清洁工人就要同它斗争到底。北京市食品公司许多工人，下班后就赶到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抗议。他们说，我们决不允许香港英国当局镇压我国同胞。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好惹的，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坚决支持香港同胞的正义斗争，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①

5月15日，广州也举行了4万多人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5月16日，北京40万群众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声气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天，从凌晨到深夜，通向英国代办处门前的马路上，示威游行的队伍首尾相接，连续不断，而且喊出了“一定要向英帝讨还血债”等口号。

精力充沛、情绪激昂的红卫兵无疑又一次充当了示威活动的主力，他们“潮水般地”涌到英国代办处门前，唱着当年最流行的革命歌曲，开来了一辆辆宣传车，用大喇叭对着代办处，宣读一封又一封的抗议信。

从5月16日至18日三天的时间里，前往英国代办处示威的群众超过100万人。代办处的门上和围墙上，贴满了声讨港英当局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抗议书、漫画，有的地方贴了五六层之多。

不过，由于在游行前周恩来特地指示外交部制定了不冲、

^① 《人民日报》，1967年5月16日。

十、失控的游行

不进、不砸代办处，不阻拦代办处的工作人员进出，不揪人，不打人等规定，没有发生冲砸代办处等过激行动。

可是，被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上海，工人、红卫兵多次到英国驻上海侨务代表的办公处和住处举行抗议游行，并冲击侨务代表的办公室和宿舍，砸家具、贴标语，还把他拖进院子里进行批判，强迫他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打人行为。周恩来得知后，对有关部门不把北京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游行的几项规定告知上海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责令尽快通知上海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①

然而，事情还在继续发展。

内地举行的各式各样声援香港工人的示威游行，对香港局势的恶化，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5月18日，香港工会、学校、新华社香港分社、报馆、电影公司、银行和贸易公司六十多个单位的代表，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前往港英总督府抗议。自从罢工事件发生以来，港英当局神经极为紧张，在总督府附近派驻了大量警察，另有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总督府的铁门也用铁链重重锁住，只留下一条窄缝。总督戴麟趾不敢面对群众，要副官让代表们将抗议书当做请愿书递进去，结果引来了代表的强烈抗议。愤怒的群众纷纷把用大字写成的抗议书，贴在总督府的铁门和墙壁上。

近100名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和货车的司机，把贴着标语的车子摆在总督府面前的街道上，以示对港英当局的强烈抗议。

5月2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

但是，正如一群学生在给香港《文汇报》的信中所言：

^①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53页。

“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其实，毛泽东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我们一定能够挫败美帝及其帮凶英帝国主义。”^① 正是因为有这种信心，又受到内地强大声援活动的鼓舞，香港各界的斗争并未因为有《紧急条例》而停止，而是继续举行游行抗议。5月23日，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

被激怒了的香港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予以回击。

面对香港同胞与港英当局日益尖锐对立的情况，有关部门不是冷静地分析形势，采取缓和局势的办法，而是把内地施行的“左”的那一套去对待香港问题，有人甚至提出要打死几个港英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周恩来对这种极左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5月24日、27日，周恩来约见国务院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负责人谈香港问题。他强调，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现在既不是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国打仗。在香港问题上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利、有理、有节。^②

5月26日，英国政府派遣航空母舰“堡垒”号开到香港，并在香港地区搞海空军联合演习。英国政府这样做，更是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挑衅》的社论。社论用严厉的语调“警告英帝国主义者”：“这场斗争还刚开了个头，更加威武雄壮、更加气壮山河的战斗还在后边。”同时，社论号召香港同胞，“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

① 《光明日报》，1967年5月20日。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55页。

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在此前后，北京、广州等地，声讨港英当局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

这时，对于香港同胞尤其是香港工人来说，一面是港英当局的高压政策，一面是内地群众和舆论的强大声援，实际上已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得以更强硬的态度、更激烈的方式去同港英当局作斗争。

贴大字报、大标语，就是港九同胞与港英当局对抗的常用方法。

他们把反英抗暴的标语贴到了位于维多利亚公园入口处的维多利亚女王铜像上，在铜像的四周，用红漆写上“打倒英帝”、“血债血还”、“港英必败”、“我们必胜”等标语。

北角邮电局、电车总站、汇丰银行等港英机构和英资企业建筑物上，也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和大标语。香港邮电局门前贴着一张漫画，画着代表香港爱国同胞的一只巨掌，正向着一只象征港英当局的负伤的小螃蟹劈头压下来，旁边用英文说明：“看你横行到几时。”电车总站、汇丰银行附近的墙壁和灯柱上，都贴着“打倒英帝”、“反对血腥迫害”、“打倒戴麟趾”等反英标语。

1967年的6月、7月、8月三个月，正值内地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最为猖獗的时期，这也对香港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香港的斗争，由游行、罢工，张贴标语、大字报，发展到组织埋地雷，搞真假炸弹。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个别小报，甚至提出了制造武器、拿起武器、夺取武器的口号。^①

8月，港英当局逮捕了一些埋地雷、搞真假炸弹者，并强

^①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56页。

行封闭了三家小报，逮捕了数十名新闻记者和报社职工。

8月14日、20日，中国外交部先后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强烈要求港英当局停止在一些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那三家小报的停刊令，释放被捕人员。

8月7日，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王力，拖着伤腿“召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的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他公然支持在外交部夺权，赞同“打倒陈毅”的口号。这个讲话，当时被戏称“王八七讲话”。

在“王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的政治部，并公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到晚上8点才放出来向造反派“汇报”。整个外交部的工作陷入混乱之中，一直由毛泽东、周恩来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了造反派手中。^①

外交部被“夺权”的当天，在外地的毛泽东接到有关报告后，对正在来访的外宾，用轻松而不失幽默的口吻说：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②

毛泽东“不高兴”陈毅，是因为陈毅在所谓“二月逆流”

^① 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②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增订本，第244页。

中是唱主角的人之一，而且在发言中触及了“斯大林晚年”、“把班交给赫鲁晓夫”及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说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等语。^①这样的话，当年的毛泽东是不愿听的。

毛泽东虽然对外交部“夺权”之事看得很轻松，但事情的发展却很严重。造反派们“夺权”后，便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发的电报，飞往中国驻各国使领馆，电报中竟然出现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

在此前后，英国代办处前的游行示威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8月22日，被极左思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及北京高校一些红卫兵组织，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

在燥热的空气笼罩下，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情绪也进入了狂热状态。

北京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负责人打电话给总理值班室，请示如何处置。周恩来不在办公室，去中央文革开会了。值班室秘书根据周恩来一贯强调的精神，答复说，还是按总理的指示办，不能冲，不能砸，在外面示威可以。

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向群众传达了周恩来的

^① 参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4页。

指示，进行劝说。可是，极左思潮已使人们的头脑发胀、发昏了，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置周恩来的指示于不顾，不听工作人员的劝阻，向代办处发动了攻击，随即发生了火烧代办处事件。

英国著名女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在她的一本书中，作了如此记载：

8月22日，大批群众聚集在英国代办处门外。由于中国政府已照会香港当局，限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其余23名代办处工作人员（其中5名女士）正在等待消息。代办处门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示威者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的不同武器打我。妇女发疯似地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到了那个离门不远的地方。突然

有人抓住我的胳膊，用中文朝我喊“这边来”。他拉着我朝英国代办处后面的印度使馆跑去，在那里，他将我藏在印度使馆的大门后。”

“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我被打得昏昏沉沉。”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原文如此，应为毛主席像——引者）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有一个领头的——“家庭出身好”——还穿着精制的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踩。^①

另据《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一书中说：

“22时40分，几乎是在同时，一千多名造反派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从英代办处围墙的西墙、北墙、正门三个方位冲入英代办处。”

“一番冲砸还不过瘾，院内有车库和汽油储存室，里面停有7辆汽车。砸红了眼的造反派取来汽油，就在东、西两院开始点火。”

“顷刻之间，东院楼的地板、门窗、车库、油库及7辆汽车，西院楼的门窗、三个卧室、档案室、两辆汽车已经腾起熊熊大火。”^②

①（英）克莱尔·霍林沃思著：《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中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154页。

②《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57页。

周恩来得知英国代办处遭冲砸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由于游行示威而演化成的严重涉外事件，它不仅影响了中英关系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使我国的国际声誉遭到了巨大损害。

23日凌晨，英国代办处的大火刚被扑灭，周恩来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

后来，中国方面主动修复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并向他们道歉。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一些极左做法也逐渐被纠正，中英双方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香港的局势也得以平静。

1967年发生的涉外示威游行，除了针对苏联、缅甸、英国的游行外，还发生了针对印度尼西亚、蒙古、肯尼亚、斯里兰卡等国的游行。虽然发生这些游行的原因各不相同，背景也很复杂，但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去处理同他国的关系，只会加剧本已紧张的国家间关系。

十一、各式各样的游行

1. 无事不游行

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近三年的时间，中国游行活动之频繁、游行内容之广泛，是以往任何时候无法比拟的。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办法，并且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通知说：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样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①

这个通知于6月18日全文刊登在全国各重要报纸上。随后，北京大中学校的师生纷纷前往中南海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送去贺信。有的郊区学校的学生，连夜步行几十里到中南海递决心书。这一天，到中南海送贺信、决心书的学生川流不息。

送完决心书，学生们又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会，然后举行庆祝游行。全国其他城市，也进行了类似的活动。

按照通知的要求，高校新生招生工作只推迟半年。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也就无形中停止了，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这十年，除了几届工农兵学员外，广大高中毕业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权利，这恐怕是当年为改革高校招生办法而欢呼的学生们始料未及的。

转眼到了8月，原来大中学校的学生，一些人变成了“革命小将”，成了红卫兵。接着就是红卫兵破“四旧”。“小将”们破“四旧”，也就是改街名、改店名，剪长发烫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裙子，改警服，改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等等。总而言之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横扫“封、资、修”。至于“四旧”与“封、资、修”的标准是什么，全靠红卫兵自己的判断。“小将”们年幼无知、头脑容易发热，干出各种各样荒唐事来，倒还可以理解。问题是许多“老将”，即成年人，却对其赞赏有加，称颂不已。这倒也不奇怪，当时的《人民日报》不是对此

^① 《文汇报》，1966年6月18日。

说“好得很”，而《红旗》杂志则大唱《红卫兵赞》吗？

红卫兵破“四旧”时，不少地方组织职工游行以示支持。随便摘抄当年报纸上的几段话以为证：

“连日来，许多地方的革命职工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并肩战斗，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遗迹和旧习，共同欢庆破‘四旧’立‘四新’的重大胜利；他们互送《毛主席语录》、贺信和喜报，相互鼓励，相互激励。许多革命职工和贫下中农还举行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反得好，反得对！”

“天津市广大革命职工纷纷贴大字报，写支援信，举行集会，上街游行，自己动手起来砸碎一切带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色彩的旧招牌，破陈规陋俗，决心同‘红卫兵’小将们砸碎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①

“全国大庆式企业、西宁运输车辆厂的工人，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誓作革命小将的后盾。”^②

破“四旧”不但有红卫兵们的“功劳”，这些“革命职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所谓全面“夺权”阶段。首先是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1月4日，《文汇报》造反派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5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十一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上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6日，《解放日报》造反派接管该报。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

^② 《陕西日报》，1966年8月27日。

同一天，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下，上海市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泽东对《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予以高度称赞，说：“这是一个大革命，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① 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团体发去贺电。19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的夺权。同一天，《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支持上海的夺权。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上而下地夺权”。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太原市党政大权。22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了青岛市党政大权。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贵州省党政大权。从此，全国上下，大刮夺权风。

在这些地方造反派纷纷夺权的时候，驻各地的解放军部队连日举行示威游行，支持“革命左派”夺权。据报载：

“连日来，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表示最热烈地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最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长城内外，无数支浩浩荡荡的钢铁队伍，高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和红艳艳的旗帜，威武雄壮地举行示威游行，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示威！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示威！向胆敢反对革命左派夺权的一切敌人示威！游行队伍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夺权！’‘向革命左派致敬！’‘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等口号声，响彻云霄，震撼大地，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切阶级敌人的威风。”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先起来夺权的上海，黄浦江畔、南京路上，江流滚滚，吼声震天。驻沪陆海空三军战士一批接一批地走上街道，一面高呼口号，高唱战歌，一面向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散发表达战士决心的传单：‘我们紧握手中枪，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如果谁敢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动武，我们就坚决还击，砸烂他们的狗头，叫他们粉身碎骨，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援真正的革命左派，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向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夺权斗争，彻底砸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某部队的游行队伍经过复旦大学门口，正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奋战的革命师生立即欢腾起来。干部战士们对他们高呼‘坚决支持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革命师生深受感动。鼓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许多部队指战

员全副武装，走上大街、工厂和郊区农村，表达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心。示威队伍高举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军装、神采奕奕的彩色画像，挥动《毛主席语录》，时而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时而高呼口号：‘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夺权！’示威队伍所到之处，革命群众欢欣鼓舞。某工厂的老工人看见人民解放军的强大队伍时，眼眶里闪着喜悦的泪花，激动地说：‘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心贴心，在我们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派解放军支持我们，为我们革命左派夺权撑腰。有解放军作我们的坚强后盾，阶级敌人再顽固，再狡猾，我们也不怕。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争取夺权斗争的全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福建前线在驻福州的部队上街游行示威之时，前线空军某部还派出直升飞机，在福州、南昌、九江、上饶等地上空，散发 10 万份表示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传单。^①

1967年7月，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对来武汉处理两派群众组织问题的王力、谢富治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从7月19日晚上开始，一部分“百万雄师”的成员在汉口游行，反对王力、谢富治的做法。7月20日上午，“百万雄师”代表200多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战士，来到东湖宾馆谢富治、王力的住处，要王力去武汉军区大院回答问题。可是，王力不敢答应，赖在宾馆不走，群众忍无可忍，将王力抓出来塞进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对此，王力自己回忆说：

^① 《人民日报》，1967年1月27日。

接着就是“七二〇事件”了。20日凌晨，他们就来了。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主要是穿海军制服的。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箍，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像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还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箍。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我穿过人群通道时，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陈再道、钟汉华同志对中央定的方针是拥护的，主席要他们检讨，他们也没有任何抗拒。谢富治想进大院来，说：“我是谢富治。”让人骂回去：“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他不敢进，又回去了。后来主席给陈再道、钟汉华下了死命令，要把王力接出来。陈再道也住在东湖宾馆，被个别人误认是王力，把他的头也打破了，因此不能去。钟汉华奉命去了，他很老实，在讲台上向群众磕了头，哀求说王力是毛主席的人，一定要让他回去。陈再道、钟汉华二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命令的。当时“百万雄师”负责人对我提的要求主要是：要我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中央要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开会，听取大家意见。日程已经排好了，首先听“百万雄师”的意见。哪一

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他们又说，是不是定了他们是反动组织？我说，我反对说“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我认为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①

7月20日上午，“百万雄师”调动200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握长矛，分成四路纵队在武汉街头示威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游行。独立师的几百名指战员全副武装，带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活动。

下午，“百万雄师”召开7万人大会，向王力示威，军区领导人将王力转移到了安全的处所。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出动卡车400多辆，附近的黄石市也来了30多辆卡车参加游行。在游行中，他们呼喊口号，张贴标语，声势不小。

“百万雄师”此举的目的，是想以示威游行引起中央的重视，解决王力、谢富治对两派组织的一打一拉的问题。

然而，事件发生之时，正好毛泽东为巡视大江南北而停留武汉，且住在“百万雄师”抓走王力的东湖宾馆，加之“百万雄师”抓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对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领导早有不满。于是，林彪、江青一伙借此大做文章，将这一事件指责为“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搞兵变”，“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

7月22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并作出决定：

^① 王力：《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载《传记文学》1994年第2期。

一、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进京。

二、起草文件通知全国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三、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

这三条被迅速执行。

7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武汉军区。电报说：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安定，拟先约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二位同志来京一商。

7月24日凌晨，陈再道、钟汉华等乘飞机到了北京。尽管事先周恩来对陈、钟等人来京作了周密部署，且用绝密电报通知其来京，但陈再道等人一住进京西宾馆，中央文革的人便有意将此消息泄露出去，引来造反派揪斗陈再道等人。虽然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陈再道没有被揪走，但在随后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陈再道受到了谢富治、吴法宪的批斗，他们还煽动不明真相的服务员对陈再道拳打脚踢。不久，又撤掉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各种“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欢呼谢富治、王力同志回到毛主席身边”的游行也开始了。

7月23日，北京组织了群众和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工委、海陆空三军驻京机关、部队人员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欢呼”王力、谢富治回来。“威武雄壮的游行队伍，高举毛主席画像，挥动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浩浩荡荡，汹涌向前。”^①

这天，上海20万“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热烈欢呼”谢富治、王力回到“毛主席身边”。其实，此

^① 《人民日报》，1967年7月24日。

时毛泽东正好在上海。“七二〇事件”的当天，周恩来即赶到武汉，组织毛泽东乘飞机安全转移到了上海。

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组织了类似的示威游行，而且均有当地驻军参加，进行武装游行。

随后几天，各地“欢呼”谢富治、王力回京的示威游行接连不断。这些游行无非是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欢呼谢富治、王力同志回到毛主席身边”，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并且“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当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此前，这句口号中没有“军内”一词。林彪正是利用“七二〇事件”，大挖“黑后台”，并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以趁机打倒军内的一批老同志，实现其篡党乱军的目的。

对于这样的游行，看看7月26日新华社的一篇综述也就够了。

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连日来纷纷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欢呼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了毛主席身边。各地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满怀革命激情，热烈庆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滔天罪行，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黑龙江畔到云贵高原，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广阔土地上，这几天到处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到处都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声：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各地的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集中地表达了全国亿万革命群众钢铁般的共同意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连日来，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成都、哈尔滨、济南、青岛、太原、贵阳、西宁、昆明、长沙、乌鲁木齐、西安等许多地方，都有几万、几十万以至百万人集会游行，表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参加游行的人们高举毛主席巨幅画像，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参加集会游行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指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将继续引导全国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①

“七二〇事件”中，谢富治、王力一下子成了国人皆知的大“英雄”，风光一时。

7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

7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归来，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出席了大会，而在上天安门的名单中，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特

^① 《光明日报》，1968年7月27日。

地在名单中不写叶剑英和徐向前，企图以“七二〇事件”来打倒这两位老师。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对江青等人说：“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文章”很快就做出来了。陈再道、钟汉华被撤职并遭受批斗；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被诬陷为“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徐向前、徐海东的家多次被抄；“百万雄师”被打成“白匪”，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取消番号。

1967年7月中旬到9月下旬，毛泽东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指示。这次视察，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总体上是充分肯定的，认为现在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形势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但是，在视察过程中，他也发现并纠正了一些具体的“左”的错误，针对各地群众组织分裂对抗的情况，提出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号召正确地对待干部，指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要求搞文斗，不要搞武斗；提醒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警告那些“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等等。这些谈话，对纠正一些具体的“左”倾错误，扭转当时混乱的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9月2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9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各大报以“特大喜讯”公布了毛泽东视察三大区并

已回到北京的消息。

公布消息的第二天，各地组织大规模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亲自视察三大区”。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群众，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敲锣打鼓前往中南海报喜，庆祝游行的队伍潮水般涌向街头。

河南郑州 20 万人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和盛大游行。武汉也举行了 10 万人的庆祝大会和游行。南昌数十万群众走上大街，进行庆祝。杭州、贵阳、哈尔滨、济南、西宁和呼和浩特等地，都在这天举行了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和游行。

1968 年 9 月 5 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从 1967 年 1 月上海夺权开始，历时 20 个月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外的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基本完成，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9 月 7 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说：

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把被他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回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

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一天，北京、上海等地为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举行盛大游行。

“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特大喜讯一传出，锣鼓鞭炮震天响，祝贺的大幅标语很快贴满了全城。长安街上的灯火更加辉煌灿烂，天安门显得格外壮丽宏伟。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结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高唱颂歌，从四面八方奔向天安门，奔向中南海，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献忠心，表决心。”^①

这一天，北京上街游行的群众达100万人。

上海也在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6日晚上，“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消息广播后，进驻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和学校师生，便组织报喜队到上海市革委会去报喜。7日夜晚，上海全市灯火辉煌，“黄浦江畔礼花缤纷，游行队伍接连不断”。^②

“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是在“文革”头几年，毛泽东每发表一条“最新指示”，各地都要举行“欢呼”游行。

1968年8月6日，针对工宣队进驻学校以领导学校的斗、批、改的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

^① 《人民日报》，1968年9月8日。

^② 《文汇报》，1968年9月8日。

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①

针对工厂的斗、批、改，他又作了这样的指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②

与此相配合，《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姚文元文章一发表，全国“到处一片沸腾，千百万工人、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通宵达旦地举行庆祝游行”。“全国许多地方的大中小学校，从昨晚到今天（指8月25日—26日），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也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他们纷纷连夜座谈学习，上街游行，有的召开了欢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盛大集会。”^③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和通过党章草案。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造就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1—532页。

③ 《人民日报》，1968年8月27日。

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九大的决定、九大代表产生办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最后通过了会议公报。

全会公报一发表，全国各地照例举行庆祝游行。本来，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出席者不足半数，因为除了正常死亡外，有的中央委员已被迫害致死，有的被打倒，有的尚在牛棚。后来在候补中央委员中递补了十人，才勉强凑够半数。像这样一个会议，实在没有什么好庆祝的。但是，当时却不这样看，林彪就说过：“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对于这样一次“胜利”的全会，自然应该庆祝。据报载：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发表，有如强劲的浩荡东风，急速吹遍祖国大地，城乡亿万人民欢天喜地，载歌载舞。从昨夜到今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的大中城市，有两千多万军民欢聚街头、广场，欢呼全会公报发表。在首都北京，中共中央所在地门前、天安门广场和条条大街上，在上海的黄浦江畔，在天津的海河两岸，分别有一百多万到五百多万军民集会庆祝和游行。沈阳、武汉、西安、重庆和海防前线的福州，各有四十万到五十万人涌上街头，欢呼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西藏高原的拉萨市有五万各族人民高举烈焰熊熊的火炬，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游行。南昌、西宁、成都、长沙和呼和浩特，各有十多万到五十万军民，冒雨或披雪隆重集会游行。在广州、哈尔滨、太原、长春、郑州、石家庄、南宁、乌鲁木齐、兰州、银川、昆明、贵阳、杭州、合肥、南京和济南等城市，都有十几万到数十万人欢聚街头和广场，载歌载舞，热烈欢呼。喜讯传到祖国的广大农

村、山寨和渔乡，亿万贫下中农一片欢腾。许多老年人牵着孙孙，许多妇女背着娃娃，簇拥到村边地头的大喇叭周围，一遍又一遍地收听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的大喜报。^①

公报公布的当晚，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种、兵种和北京部队的领导机关，连夜举行庆祝集会。集会结束时，已是第二天拂晓，又接着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1969年4月24日，事先没有公布的中共九大宣布闭幕，并发表了会议公报。九大最突出的特征，一是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了党章；二是把林彪规定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还将此写进了党章。于是，全国城乡连夜举行庆祝集会和游行。北京游行的队伍“绵延数十里”，许多县城“几乎倾城而出”，解放军指战员也“纷纷集会游行”，以此来“欢呼”九大闭幕，“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中央委员会”。^②

这样的游行，除了浪费群众的热情，耗费群众的精力外，并无任何实质性作用。这些一个接一个的游行，不知要耽误多少生产，影响多少工作。好在那时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只需“抓革命”，勿需“促生产”。

2. 芒果与游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游行被滥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要游行，中央召开了重要会议要游行，毛泽东发表一条“最新指示”要游行，各地成立革命委员

^① 《人民日报》，1968年11月3日。

^② 《人民日报》，1969年4月25日。

会要游行，只要翻开“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的报纸，随处都可以见到有关游行的报道。游行已成了这几年中国政治生活中一道独特而又少不了的风景。

1968年8、9月间，毛泽东赠送给了工宣队几个芒果，工宣队又将其转赠给了福建前线。在这个芒果的赠送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以及福州为迎接芒果而举行的15万人大游行，恐怕是中外游行史上难以再觅其二的游行了。

其实事情的起因很简单。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来自访的巴基斯坦外长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人宣传队。

可是，毛泽东送给工宣队芒果，绝不是想让工宣队的工人们尝个鲜，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图。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原本希望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并未出现。经过一番“造反”、“夺权”之后，原来的各级党政组织，实际上已处于名不存、实已亡的境地，代之以各级“革命委员会”。虽然当时也说“革命委员会好！”可是，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派性斗争，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不少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武斗，中国陷入了全面内战的边缘。

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也是不愿看到的，他决心尽快结束这种局面。

“文革”中特有的那种两大派势不两立的派系斗争，不仅存在于地方上的各种群众组织间，而且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也都存在，甚至与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学校的武斗可谓如火如荼，昔日的同窗变成了今天武斗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宁静的校园也演变成了武斗的战场。

著名学者季羨林在其《牛棚杂忆》中，对这种武斗场面作

了一段精彩的间接描写：

此时，北大的两派早已开始了武斗。两派都创建了自己的兵工厂，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一点。掌权的“公社派”当然会阔气非凡。他们把好好的价值昂贵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了长矛，拿在手里，威风凛凛。“井冈山”物质条件差一点，但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每一派各据几座楼，相互斗争。每一座楼都像一座堡垒，警卫森严。我没有资格亲眼看到两派的武斗场面。我想，武斗之事性命交关，似乎应该十分严肃。但是，我被监工头领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一场激烈的武斗留下的战场。附近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砖头石块，是两派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但是，我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里莞尔一笑。关于破鞋的故事，我上面已经谈过。老北大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的就是那一位“老佛爷”（即聂元梓——引者）。我真觉得这些年轻的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①

针对当时武斗不止的局面，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等文件，要求各地所有的两派组织一律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者依法惩办；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枪支弹药、现金和物资。

对于武斗严重的大、中学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统一和协调学校中的两派红卫兵

^① 季羨林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组织，结束武斗局面。7月27日，北京六十多个工厂和农场3万余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

8月5日，毛泽东向首都工宣队赠送芒果，以示对工宣队的“极大支持”。

用赠送物品的方法表示对工宣队的支持，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策略和领导艺术，明确表明了他对工宣队的态度，这对于使工宣队顺利进驻学校、尽快制止学校武斗，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功效。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盛行的情况下，这些芒果也被神化了，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出来。

毛泽东赠送的芒果到了清华工宣队后，立即由普通的水果变成了神物。顿时，清华园里“红旗飞舞、欢声雷动”，真可谓“东风传喜报，凯歌入云霄”。

当年的报纸上有如此记载：

在清华园，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革命战士们，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的芒果，看了又看，闻了又闻。他们含着无限幸福的热泪，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向毛主席敬献忠心。很多人连夜写信和打电话，把这一特大喜讯传告给自己的战友和亲人。

在首都大街上，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珍贵礼物的大字标语不断出现。一队队革命职工、革命师生、解放军战士涌向清华园，向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热烈祝贺。还有不少人特意赶到中南海，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

示决心。^①

在毛泽东向工宣队赠送芒果前，巨山农场的群众（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贫下中农）曾摘了两篮鲜桃，慰问本场驻清华的工宣队队员。巨山宣传队的队员舍不得吃桃子，将其送给了兄弟团（工宣队按解放军编制为团、连等单位）的病号。结果，这些病号也舍不得吃，又将桃子送给了宣传第一线的四团。

桃子到了四团队员手中，他们便将桃子上升到了这是“凝结着我们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的无产阶级深情厚意”的高度，认为“应该把大家关心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宣传好毛泽东思想的一片忠心，献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于是，四团宣传队的全体队员（时称战士），精选了八个鲜桃，端端正正地摆在一个红色的托盘上，并写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准备将其送到中南海去。

正在此时，传来了毛泽东向工宣队赠送芒果的消息。工宣队队员们激动地说：“毛主席惦记着我们，我们想着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真是心连心啊！”他们立即从各团中推选出240名代表，连夜冒雨将寿桃送到了中南海。^②

北京标准件二厂驻清华工宣队的队员，听到毛泽东赠送芒果的“特大喜讯”后，“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得跳了起来”。“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共同分享这一最大幸福”，他们连夜赶印传单。

到了深夜1点多钟，他们把1000多份传单印好了。然后

^① 《人民日报》，1968年8月8日。

^② 《人民日报》，1968年8月8日。

冒着雨，走出清华园，哪里有人群就往哪里送，哪里有灯光就往哪里奔，把一张张传单送到了仍在上班的清洁工人、牛奶工人、三轮车工人手里，并且步行了3个小时，回到了自己厂里，把毛泽东送芒果的消息告诉了全厂职工。^①

毛泽东赠送芒果的消息一传开，不少单位连夜组织人去中南海接待站报喜，北京针织总厂的报喜队去得最早。

《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署名“红辉”，题为《第一支报喜队》的文章说：

一个小时前，当革委会副主任张成明把毛主席赠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珍贵礼品芒果拿到厂里的时候，全厂的职工一边含着热泪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拥着挤着，都想最先看到毛主席送来的珍贵礼品。职工们深深感到，毛主席赠送的不只是芒果，而是对工人、农民的最大关心、最大爱护、最大支持！当革委会的同志捧着芒果送到各个车间的时候，多少工人捧着芒果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呵！职工们为了让这一特大喜讯迅速传遍全城，连夜冒着风雨到街上去贴大标语。他们响亮的提出：“要把大标语刷到最注目，最显眼的地方去！”

“要连夜报出热爱毛主席的一颗忠心”，这是广大革命职工的一致要求。他们为了到中南海报喜，要把决心书“写得最好最好”。当时又有多少人围在一起，一双双深情的眼睛望着执笔人小王同志。

“小王，要好好写，要写出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骨肉亲的感情！”

“要用最好最好的词句，最美最美的语言写出咱们对

^① 《人民日报》，1968年8月8日。

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一颗忠心……”

小王同志全身热血沸腾，他紧紧攥着笔杆，屏住呼吸，在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认真地写着。决心书写完，工人同志马上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他们要求每个字，每句话都能最真挚，最热烈地表达出忠于毛主席的忠心。

尽快地把决心书送到中南海去！送给敬爱的毛主席，让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亲眼看到北京针织总厂三千多颗红心。

报喜的汽车在急速飞驰，报喜的职工更加激动。坐在车上的女工小王刚刚下夜班，她一听说报喜，激动得连工作服也来不及换，就上了车。当她看到中南海那辉煌的灯火时，一股暖流冲上了她的心头，她用颤动的语音向身边的一位解放军同志说：“老李呀，到中南海啦，请你把中南海的水端一碗来给我喝，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那水是最香最甜的。”

……

报喜队的汽车到接待站了，职工们连忙跳下车来，高呼着口号，挥动着语录，向前涌去。他们是答谢毛主席关怀的第一支报喜队。^①

北京人民印刷厂亦是向清华大学派出工宣队的单位之一。在清华举行迎接芒果的庆祝会后，人民印刷厂工宣队的队员连夜回到厂里，厂里立即召开了庆祝大会。

芒果属于热带水果，不能长时间存放。人民印刷厂的庆祝大会刚开完，人们便集中议论一个话题：“我们要把毛主席的

^① 《人民日报》，1968年8月8日。

珍贵礼物传下去，要让子子孙孙永远忠于毛主席，一定要把它保藏好。”

要把这些芒果保藏可是个难题。

厂医务所的人向厂革委会献计说，要使芒果长期保存下去，就要找到一种长期保存植物标本的药水才行。

印刷厂只能印书，当然找不到这样的药水，怎么办呢？

又有人献计说：北京农业展览馆可能有这种药水。

大家一听，“心里乐开了花”，冒着大雨，开车直奔农展馆。

到了农展馆，叫开了门，一打听，才知道没有这种药水。

这时已是凌晨3点多了。天还在下雨，虽说是8月天，但深夜还是挺凉的。可是人们心里却热呼呼的。

大家又商量了一阵，有人提出，自然博物馆经常保存植物标本，可能有办法。于是，这些人又驱车直奔自然博物馆。车子开到那里，天已快亮了。他们敲门进去，听说有药水，“高兴得蹦起来”。

长期保存芒果的问题解决了，木工们连早饭也不吃，赶制了一个高大的玻璃盒，把芒果放在里面。工人们说：“保存芒果，是件大事。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好，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刻在心上。”^①

从当时的报道中判断，毛泽东送给清华工宣队的芒果，各单位的工宣队，起码是人数较多的工宣队可能都得到了一两个芒果。在人民印刷厂开庆祝会的时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宣队队员也手捧芒果回到了工厂，全厂职工冒雨迎接，并且召开了“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红心”大会。

^① 《人民日报》，1968年8月8日。

当时人们迎接芒果的激动心情，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首题为《颗颗芒果金光闪》的诗充分地表达了出来。诗云：

霞光万道红满天，
特大喜讯四海传，
伟大领袖赠芒果，
万众欢呼震河山。
颗颗芒果金光闪，
盏盏明灯照心坎。
珍贵礼物送到厂，
革命工人尽开颜。
老工人手中捧芒果，
一股热流暖心间：
“毛主席啊，毛主席，
您的恩情说不完，
我们无限忠于您，
人老心红斗志坚！”
……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誓叫全球红烂漫！^①

毋庸讳言，毛泽东给清华工宣队赠送芒果，有着深刻的用意。这就是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工宣队进驻学校的支持，也表达他对制止武斗的态度。但是，人们在迎接芒果过程表现出的虔诚，却刻上了深深的“文革”印记，刻上了个人崇拜的深深烙印，也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对于这些芒果的事情，更热闹的还在后头。

^① 《人民日报》，1968年8月8日。

既然毛泽东要向工宣队送芒果，那么，宣传媒体对此大肆渲染，也就是必然的了。

很快，全国各地都知道毛泽东给工宣队送芒果了，而此时又恰逢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发表两年。于是，“喜讯传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工厂矿山，车间码头，山村渔乡，操场营房，到处一片欢腾”。

8月7日，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工人和群众，“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张贴大红喜报，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关怀。参加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十个工厂的广大革命职工，人人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工人们双手捧着毛主席赠送的珍贵礼物，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说，毛主席送给我们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

沈阳、西安、成都、武汉和广州的广大工农兵群众，也“纷纷出动游行”，他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全国亿万革命人民的最大关怀”。^①

8月8日，北京举行“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等学校红代会的代表，共1.4万人。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大会。

会议开始前，由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双手捧着毛泽东赠送的芒果，绕场一周，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1.4万多人同时高举

^① 《人民日报》，1968年8月8日。

《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等口号。

会上，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代表作了联合发言，工宣队代表、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的代表也讲了话。发言和讲话的内容，新华社在电讯中用“他们一致指出”作了概括，这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最珍贵的礼物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仅是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也是对全国工人阶级和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员工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等等。^①

一个多月后，得到芒果单位之一，也是首都工宣队单位之一的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将芒果转送给了福建前线三军。北京市第一轻工业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把一个芒果的复制品送给了福建省“革命人民”。

9月16日，福州15万军民集会和游行，欢迎芒果和芒果复制品。

福州这次大会的名称很长，全称为“福建前线军民热烈欢迎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转送伟大领袖毛主席赠给的珍贵礼物大会”。

这个大会真可谓隆重，与会群众达15万，福州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福建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

为了将芒果和复制品送到福州，中央军委办事组和总参谋部派专人护送。到会场时，芒果和复制品分别放在两辆大彩车上，当彩车出现在大会会场时，全场“欢声雷动”。

总参护送芒果的人，首先介绍了芒果的赠送经过：

^① 《人民日报》，1968年8月9日。

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一部分职工参加了工宣队，收到芒果后，连夜召开了庆祝会。此时，他们想起了福建前线的三军指战员，便决定将芒果转赠给福建前线部队，“让福建全线全体指战员和他们一起分享最大的幸福”。

为了能使芒果长期保存，北京食品总厂职工连夜开会，想了很多办法。北京玻璃总厂、木漆厂等单位职工共同商量，精心设计，制作又庄严、又美观的盛放芒果的容器，又让刻字社的老工人刻了字。

为了把芒果送到福建前线解放军手里，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召开了隆重的大会，推选出 360 名代表，将芒果送到了总参。军委办事组和总参的领导又派专人将芒果送到了福州。

接着，大会举行礼物交接仪式，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皮定钧，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接过了芒果。然后由皮定钧讲话。

大会结束后，举行规模盛大的游行，两辆放置芒果的彩车走在最前面，后面紧跟着 15 万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①

3. “文化大革命”中的几次国庆游行

进入“文化大革命”后，国庆游行也就充分体现出了“革命”的色彩。

1966 年的国庆游行，是与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结合进行的。

1967 年的国庆游行，有两幅巨大的标语牌，一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二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① 《福建日报》，1966 年 8 月 17 日。

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开展所谓“革命大批判”，再就是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发展和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斗、批、改”的主要内容是“斗私”和“批修”。用当时的话说，“斗私”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改”则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因为毛泽东在此前曾发表过“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最高指示，“斗、批、改”也就成了“毛主席战略部署”之一。

“革命大联合”则是针对当时群众组织形成对立的两大派，矛盾重重、武斗不断，毛泽东提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组织”，要求各派群众组织在“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实现“革命大联合”。

“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政机关被夺权后，成立了既非党的组织，又非政权机构，但又行使党政大权的“革命委员会”。在组成“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要老、中、青三结合，所以“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亦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之一。

至于那幅“立新功”的标语，则是林彪为解放军的最新题词。因为解放军过去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实行“三支两军”，故称“立新功”。

这次游行除了呼喊“文革”特有的口号，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红卫兵队伍等等外，还有八个“革命样板戏”的“高大全”人物形象出现在文艺队的彩车上。这八个样板戏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和京剧《海港》。虽然这八个样板戏不能一概否定，可它从此长时期称霸中国舞台、银幕，以致闹出了十年“文革”中国人只看了八部戏这一不是笑话的笑话。

1968年国庆游行，最具特色的恐怕是那满载巨大芒果模型的彩车了。

在这次游行的文艺队伍中，八个样板戏的“工农兵高大形象”再次登场亮相。与去年的国庆游行不同的是，此次多了一个“无产阶级文艺新品种——钢琴伴唱《红灯记》”。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每年都把这八个样板戏摆进游行队伍中，因为这八个样板戏是“江青同志亲自领导培育的”。

1969年的国庆，是建国二十周年。而这一年，召开了党的九大，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按理，这次国庆游行应该规模大，场面热烈。可是，出乎意料，这年的国庆游行实在平淡。多年的“文化大革命”，除了打倒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反动学术权威”，清出了无数的“牛鬼蛇神”，取得了“阶级斗争”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外，生产力没有提高，经济没有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倒退，社会发展停滞，实在没有多少骄人的业绩可以展示。对于这国庆二十周年大典，多少有些应付的味道。

不过，这次的国庆游行也有新东西。

第一，有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用语。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共中央作了人事调整后，林彪在党内跃到排位第二。这次全会并没有改选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但以后文件上、报刊上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不明不白地被取消了。林彪成了惟一的副主

席，而且成了事实上的接班人。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进了党章，说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自此以后，党中央有了一个统帅，一个“副帅”，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奇谈。

第二，游行的队伍中出现一支从未有过的队伍，这便是“五七干校的学员”。

“五七干校”可谓真正的新生事物。

1968年5月7日，也就是毛泽东作出《五七指示》^①两周年纪念日，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的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柳河县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对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大加推介。其中说：

“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

从此，各地及中央各部委都大办“五七干校”，大批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包括老弱病残，都下放到各地的“五七干

^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个大学校”，并且提出了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

校”去参加劳动，实际上是进行变相的劳动改造。“五七干校”当时还有一个通俗的名称：牛棚，意即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五七干校”的创办，又增加了一条迫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途径。

正因为有了大批的“五七干校”，所以这次国庆游行中有了这么一支新队伍。

第三，游行队伍中出现了“老三篇”模型。在以往的国庆游行中，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的模型，而“老三篇”模型则是第一次出现在国庆游行中。

所谓“老三篇”，就是毛泽东的三篇短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不可否认，这三篇文章不论是其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上乘之作。但“文革”中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且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要求群众不仅要读这三篇文章，背这三篇文章，而且发展到“早请示，晚汇报”，在饭前、就寝前都要面对毛泽东画像，虔诚地读、背这三篇文章。游行队伍中“老三篇”模型的出现，是此时全国上下大学“老三篇”的真实写照。

1970年的国庆游行，正如当时的报道所言：“突出地反映了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这是怎么反映出来的呢？请看：

参加游行的广大工农兵群众，簇拥着《毛泽东选集》、“老三篇”、《实践论》、《矛盾论》等毛主席光辉著作的模型，大踏步前进。在游行队伍的彩车上，耸立着一面巨大的红旗模型，上面写着林副主席的光辉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红旗模型下面，写着北京针织总厂工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七字经”。在一辆又一辆的彩车上，人们还以各种生动的造型，表现了毛

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的情景。现在，毛主席著作“天天读”，经常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经常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我国七亿人民中已蔚然成风。广大革命群众表示：坚决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更加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认真搞好斗、批、改”，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把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①

不过对“七字经”、“天天读”、“活学活用”之类，毛泽东本人并不感兴趣，他在随后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时说：现在搞个人崇拜有些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导师。“四个伟大”是林彪的创造，也是他喊得最凶，叫得最响。毛泽东当着斯诺的面说“四个伟大”讨厌，说明他对林彪已有了相当大的不满和厌恶，对林彪的阴谋诡计已有所察觉。

斯诺在他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对这次国庆游行有如此记载：

当我们一起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民都出场了，大约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他们讲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现在在七亿五千万至八亿

^① 《人民日报》，1970年10月2日。

之间)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灰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就很少看到武器。

颂扬毛的著作、语录和指示的标语牌,都是涉及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中怎样遵循他的教导的,这些标语牌一个胜似一个。最为壮观的,是群山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后一环的完成,这个铁路系统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起来了。全身塑像和半身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第二次解放或文化上解放的领袖和倡导者的形象。这第二次解放是为了使革命像原来那样纯洁,是为了让空前广泛的群众参加到革命中来。

在我们面前通过的游行队伍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迸出了热泪,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指着怀有崇拜心情的游行队伍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印象如何?”

毛皱一下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看来他不是十分满意的。是怎样不满意呢?在他未及作答以前,我们的谈话被走过来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只是几星期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我这才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想的不是那成千上万人用来为毛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鲜花。他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加速结束越南战争,

以及扩大中国同外间世界的接触等问题。他是否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①

斯诺本人也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这本身就是毛泽东发出的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尼克松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国表示，愿意与中国接近。在国庆大典中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受到如此礼遇。这一方面因为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向美国愿意与中国改善关系作出的一种表态。两个月后，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

1971年的国庆，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为寂静的国庆了，多年一直进行的国庆游行这年也没进行，因为这年9月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的反革命政变事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筹办国庆庆典。

自此之后，大规模的庆典活动基本上停止了，国庆游行也就一直没有举行，直到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庆典时，天安门广场上才又一次举行了国庆游行。

^①（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十二、几次声援与抗议游行

1. 声援美、法人民斗争

1968年春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尚在熊熊燃烧之际，西方大国内部也不稳固，美国发生了黑人抗暴斗争，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此时，中国依据自己的世界革命理论，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声援美国黑人和法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美国的黑人抗暴斗争肇源于马丁·路德·金的被害。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著名的黑人运动领袖。60年代，自称最民主、最尊重人权的美国，却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二的黑人，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他们在就业机会、职业、工资、上学等等方面都与白人存在很大的差别。

战后，美国黑人为了争取自由平等权利，开展了广泛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到了60年代，斗争进入了高潮，同时也遭到充当世界“人权宪兵”的美国政府的残酷镇压。

在反歧视斗争中，马丁·路德·金逐渐成为黑人运动的领袖，他主张采取群众性的“直接行动”，但不主张采取暴力手段。

可是，反暴力的马丁·路德·金却遭到了暴力的残害。

1968年3月，孟菲斯的1300名清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承认他们的工会，已坚持罢工七周，马丁·路德·金来这里领导这场斗争。28日，他率6000名黑人举行示威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时，他要求示威者“回到教堂去”。随后，他发表声明，只要联邦政府答应在黑人问题上“开出一张积极的清单”，他就取消计划中的“穷人向华盛顿进军”，并表示愿同政府谈判。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他所住旅馆的阳台上被暗杀。

马丁·路德·金深为美国黑人所崇敬，他的遇害，激起了美国黑人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以抗暴斗争来回答美国政府的挑战。在他死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美国有170座城市爆发了200多起黑人抗暴斗争。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的学生、工人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戴高乐政府的斗争。

60年代中期，法国由于受第三次经济危机的袭击，失业人数骤增。到1968年初，失业人数达到了45万。

失业增加，人民生活下降，导致国内消费锐减，这又反过来促使生产进一步下降、失业更加严重，陷入如此恶性循环之中。这样，法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法国青年学生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因而对社会现状和教育制度也越来越不满。

1968年5月2日，法国警察封闭了农泰尔文学院。3日，又驱散了在巴黎大学集会的群众。法国大学生早已积蓄的反政府情绪终于爆发出来。3日深夜，在巴黎拉丁区，大学生们建立了街垒与警察对峙。5月6日至8日，巴黎数万学生和教师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当局封闭学校、逮捕学生。

这三天的示威宣告法国“五月风暴”的开始。

5月12日，工人走上街头，声援学生的斗争。13日，巴

黎全市总罢工，80万工人、学生和教师举行了战后法国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们高举着“学生、教师和工人团结起来”的巨幅标语，高唱《国际歌》，浩浩荡荡涌向巴黎市中心，在巴黎警察总署和最高法院门前示威。

在巴黎的影响下，全法国十八所大学的学生全部行动起来，并且占领了学校。工人也开始占领工厂、矿山，扣留厂长、经理，全国约有一半的工厂被工人占领，包括法国最大的企业雷诺汽车公司和南方飞机制造公司所属的全部工厂。

一时间，法国水、陆、空交通中断，银行、邮局关门，电话不通，商店关闭，学校罢课，剧院停演，就连法新社与法国广播和电视公司的职工也宣布罢工。法国大多数机构都瘫痪了。

此时，正在罗马尼亚进行访问的戴高乐，只得急匆匆地回国。他在内阁会议上说：“改革可以，乱来不行！”法国政府出动万名警察和宪兵，甚至调动坦克和伞兵，对群众实行高压政策。罢工工人和学生推倒汽车，砍倒树木，设置路障与警察对抗，巴黎街头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硬的一手不行，戴高乐只得让政府出面，约集资方和工会代表进行谈判，戴高乐还许诺起草改革计划。27日，三方达成协议，工人复工，增加工资百分之十，教育部部长辞职，政府改组，答应改革教育。这样，“五月风暴”总算没有延续为“六月风暴”。

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和法国的“五月风暴”发生后，基于战后形势是革命和战争的判断，中国对此评价甚高，并且组织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活动以示声援。

马丁·路德·金遇害后，4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声明说：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

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①

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声明并对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予以“最坚决支持”，从声明广播的那一刻起，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连夜到街头游行，张贴标语”。4月17日，全国许多的城市都召开了几万人到几十万人参加的集会，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北京从15日夜里就“出现了一队又一队的游行队伍”。16日，从早到晚，“全城沸腾，游行队伍络绎不绝”。

上海也“掀起了强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革命浪潮。全市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伟大声明。在市中心区、外滩和南京路等主要街道上，革命群众汇成了滚滚洪流，口号声震撼着黄浦江两岸”。^②

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的游行场景也大体如此。

进入5月后，全国各地又相继举行了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斗争的示威游行。仅5月21日这天，北京就有50万人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参加游行的群众有工人、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街道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之所以那时要称之为“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一则与当时什么都要冠上“革命”二字开头有关，二则大概是以示与普通的师生、干部区别。

① 《人民日报》，1968年4月17日。

② 《人民日报》，1968年4月18日。

对这次游行，新华社有如下报道内容：

今天，首都全城红旗飘扬，巨幅标语贴满街头，呈现一片火热的革命战斗的景象。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是整个游行示威群众汇集的中心。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络绎不绝的示威群众，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坚决支持巴黎工人、学生的正义斗争！”“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传统万岁！”

首都广大工人群众怀着对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无限关怀的阶级感情，走出车间，举行示威游行，声援法国进步学生和工人兄弟的斗争。他们高度赞扬法国革命人民当前的正义斗争，是巴黎公社革命斗争传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继续。工人们在游行时不断地高呼：“坚决支持法国革命人民的斗争！”“坚决支持伟大的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战争！”“坚决支持欧洲、美洲、大洋洲的工人、学生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亚非拉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反帝反修的斗争中联合起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北京的革命工人说，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是不朽的。我们工人阶级坚决相信，法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必将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传统定将更加发扬光大。^①

在声援巴黎工人、学生反对法国统治者的示威游行中，喊

^① 《人民日报》，1968年5月22日。

出“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实际上是一种四面树敌的做法，同时也反映了一段时间中国反美、反苏左右开弓的心态。至于“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更反映了当时人们头脑的不冷静。各国的反动派的打倒，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来提出。由于“左”的思想在作怪，一些人认为只有中国才是最革命的，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以中国为榜样，掀起世界革命的新高潮，用那时的流行语来说是“彻底埋葬帝、修、反”。

据称，在游行中，许多“革命工人”激动地说，法国工人和学生的正义斗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革命的学生走向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争取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是一条革命的道路。^①这也是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去作生搬硬套的类比。事实上，法国“五月风暴”之时，工人与学生的觉悟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他们斗争的方向是对着戴高乐政府，但他们的斗争目的却不是夺取全国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五月风暴”也不可能成为巴黎公社第二。

5月25日，北京又举行了7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上海、天津、沈阳、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共有200多万人参加了这天的游行活动。

建国初期，报刊上在介绍游行活动时，还刊登一些游行花絮。那些即便是严肃的游行，也出现一些滑稽的场面，使游行严肃而不失生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论是与国内事件有关的游行，还是声援他国人民斗争的游行，大体上有一个固定的程式。首先集会，会上领导与群众代表讲话，会后游行。游行中，群众抬着毛泽东画像，手持“红宝书”，呼喊口

^① 《人民日报》，1968年5月22日。

号。口号的内容除了与游行内容相关的为临时拟定的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必不可少的常呼口号。

媒体对于游行的报道，也非常的空泛。“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报纸、杂志被迫停刊，就是那少得可怜的报纸，也很少见到“本报讯”、“本报记者”、“本报通讯员”之类的字样，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新华社××日电”，就连全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也是如此。本来还生动活泼的《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几乎是《人民日报》的翻版，只不过是版面少一点而已。至于在报道游行时，也无非是这样的词语：“欢声震天”、“敲锣打鼓”、“涌上街上”等，更多的则是“广大群众一致指出”、“他们纷纷表示”、“革命群众坚决表示”之类谈话内容，至于“指出”的、“表示”的，又是千篇一律的“坚决响应”、“热烈欢呼”等等空泛的语言。

不过，当时的游行也有特点，这便是齐呼《毛主席语录》中的与游行内容有关的语录，成千上万的人异口同声读语录，或齐刷刷地举起“红宝书”，场面还是蛮壮观的。

2. 抗议苏联入侵珍宝岛

1969年3月，为抗议苏联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全国各地举行了浩大的示威游行，有力地配合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中苏之间有长达7300公里的边界线。在中苏友好时期，尽管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但这条边界线还是安宁的。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恶化中苏国家关系，中苏边界就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反华衣钵，而且变本加厉地恶化两国关系，甚至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1968年1月5日，在中国黑龙江、

乌苏里江七里沁岛地区，苏方用装甲车撞死中国渔民四人，打伤九人。中国方面不断地提出强烈抗议，可苏方不但不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反而蓄意制造更大的边界冲突，最终导致珍宝岛事件的发生。

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领土。它原本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为江水冲刷成为岛屿，但在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乌苏里江作为一条通航河流，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的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无可置疑地属于中国，而且一直处在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管辖之下。

可是，苏联由于其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怪，却硬说珍宝岛是它的，并企图用武力实现其非法侵占的要求。

从60年代中期起，苏联边防军就开始动用直升飞机、装甲车等侵入珍宝岛地区，干涉中国边防人员的巡逻活动，多次打伤中国边防人员，抢劫枪支弹药，绑架中国边民。

对苏方的挑衅活动，中方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要求苏联停止入侵，但毫无结果。

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3月2日，数百名全副武装的苏联军人，从两个方向同时侵入珍宝岛，突然向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开火，打死打伤中方多人。中国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将侵略者赶出了国境。

3月15日，苏联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在飞机和远程火炮的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并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进行炮击。中国边防军打退了苏军的三次猛烈进攻，保卫了中国的神圣领土。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再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当局惩办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并警告苏联政府，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使本已尖锐对立的中苏关系更是火上加油，同时也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对苏联侵略行径的极大愤慨。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情绪本已十分高昂的环境下，苏联对中国领土的公然侵犯，更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广大群众无比的爱国热情和抵御外来侵略的决心。

从3月3日开始，北京的群众接连不断地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前示威游行，如果说苏联大使馆处在愤怒的中国群众的包围之中，也不算过分。大使馆前，震天的口号此起彼伏：

“打倒新沙皇！”

“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誓死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

当然，愤激的群众也难免喊出了“吊死柯西金”、“油炸勃列日涅夫”之类至少是欠文雅的口号。

前往苏联使馆示威游行的群众，各个阶层都有。朝阳区太阳宫公社的群众，在珍宝岛事件广播的当天，就在各大队举行了示威游行。第二天，这个公社的3000多群众又踏着积雪，走到苏联使馆前示威。正在出席北京卫戍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代表大会的1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在示威中不断高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反华的恶棍没有好下场”的口号。北京阀门厂的200多名工人，4日这天正好是轮休日，但他们放弃了休息，自动集会起来前往苏联使馆示威。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带领

全校数千名师生，唱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语录歌，来到了使馆前。^①

4日这天，前往苏联使馆示威游行的军民超过100万人。

紧接着，示威游行运动迅速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农村及边疆地区扩展。3月6日，全国除台湾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所在地，分别举行了十几万人到一二百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许多中小城市和集镇，也举行规模不等的示威游行活动。据统计，在三天的时间里，参与游行示威的军民总数在1.5亿人以上。

在边疆地区，游行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了。

居住在小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鄂伦春族群众和居住在黑龙江边的赫哲族群众，从儿童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参加了声讨集会和示威游行。人口不多且居住分散的额尔古纳右旗、东乌珠穆沁旗、二连浩特等中苏、中蒙边境旗镇，都举行了各种示威游行活动。

不用说，在中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时，苏联方面也必然有所反应。果不其然，3月3日和4日，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了针对中国的示威游行。3月7日，莫斯科的游行队伍5万人列队走过中国大使馆，一些苏联人向大使馆扔石头、冰块、墨水瓶和颜料炸弹，砸烂了许多窗户。3月8日，中国大使馆前又有10万苏联人进行游行活动。

为此，北京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予以回击。

3月11日，北京80万军民走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涌向苏联大使馆。游行群众在苏联大使馆前，一遍又一遍地呼

^① 《人民日报》，1969年3月4日。

喊“打倒苏修”、“打倒美帝”、“反华恶棍决没有好下场”等口号，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语录。

同时，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沈阳、西安、成都等大城市，都组织了几十万人到上百万人的大游行。新疆则共有100万人参加了这天的抗议游行。被称为“反修前哨”的哈尔滨，海防前线的福州，参加游行的人数分别达50万和80万。《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些游行时，用了这样的标题：“打倒新沙皇！反华的恶棍决没有好下场！全国亿万军民迎头痛击苏修反华暴行，苏修叛徒集团头脑发昏是在自挖坟墓”。

据当时的统计，围绕珍宝岛事件举行的示威游行，全国参加的人数共达2.6亿。

3. 四亿人游行拥护“五二〇”声明

70年代头几年，与60年代中后期那种接二连三、连绵不断的游行相比，游行活动大大减少了。一方面，“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好几年，人们的政治狂热逐渐在消退；另一方面，中国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改善了同曾与之发生外交纠纷的一些国家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前期，各种游行频频发生，与“左”的东西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70年代初，在相对不多的游行中，为拥护毛泽东发表著名的“五二〇”声明，支持柬埔寨人民爱国斗争而举行的游行规模最大。

“五二〇”声明的发表，起因于美国对柬埔寨的悍然入侵。

长期以来，柬埔寨王国在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坚持民族独立和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为了迫使柬埔寨改变外交政策，

使其屈从自己的指挥，为不断扩大的侵越战争服务，美国对柬埔寨一直持敌视态度且不断施加压力。

1962年起，美国军队及南越傀儡军队经常侵犯柬埔寨领土，打死打伤柬埔寨平民，引起了柬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1965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宣布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1969年7月，柬美复交，但美国对柬埔寨仍深怀敌意。

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在南越面临的军事形势更加恶化。1969年2月，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前夕，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武装力量发动大规模攻势，使驻越美军和南越伪军损失惨重。于是，美国借口越南民族解放武装力量是从柬埔寨境内的基地向美军进攻的，而且还从柬埔寨运进了大量的补给品为理由，下令轰炸柬埔寨。

1970年3月18日，乘西哈努克亲王正在苏联访问而不在国内之际，受美国支持的朗诺右派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的合法政权。紧接着，在美国政府策动下，美国军队伙同南越伪军，从4月30日起，向柬埔寨发动了名曰消灭共产党人在柬埔寨的“庇护所”，实为进攻柬埔寨爱国进步力量的军事入侵。

对此，中国采取了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制造的反动政变和军事侵略的立场。在莫斯科访问时因国内政变而遭到冷遇的西哈努克亲王，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于3月19日来到北京。中国对西哈努克亲王仍以国家元首的待遇给予接待。

3月20日，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发表五点声明，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次政变的策划者，并谴责朗诺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号召爱国的柬埔寨人民拿起武器，同美国及国内的卖国贼进行坚决斗争，并成立了以宾努亲王为首的民族

团结政府。

4月5日，周恩来在欢迎朝鲜首相金日成的宴会上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所执行的独立、和平、中立、民主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5月5日，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民族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国率先予以承认。

5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著名的“五二〇”声明。声明说：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指1970年4月24日至4月25日，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老挝爱国阵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代表团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会议，会后发表了此声明——引者），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打败强国，小国能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①

^① 《人民日报》，1970年5月21日。

5月21日，北京召开“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50万军民参加大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政治局常委全都出席了大会。会上，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声明。西哈努克亲王也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说：“我们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一百多年来是受气的，现在要逐步联合起来，要翻身。”

“五二〇”声明发表后，全国各地开展广泛的游行示威活动，拥护毛泽东的声明。从声明发表至5月23日，北京军民参加集会和游行示威的人数，总共达到450万人。上海则有500万人参加游行示威，天津参加游行和集会的群众也达到了260万人。

至5月27日，仅一周的时间，全国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达到四亿几千万人次。^①当然，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大概的估计，未必那么准确，其中的“几千万”，本身就是一个笼统含糊的数字。其实，即使以往游行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也只能是大概的数字。宣传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恐怕更多的是凭感觉估算出来的。不过，即便这“四亿几千万”不很精确，但这次游行规模之大，在建国以来的游行中是罕见的，在世界游行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其规模之大，只有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庆祝游行可以与之相比。遗憾的是，当年的报刊对游行的详情报道很少，以致我们今天对其细节也知之不详。

从这次游行的规模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柬埔寨人民，以及整个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是倾力相助、衷心支持的。

五年之后，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彻底胜利。在胜利

^① 《人民日报》，1970年5月28日。

之时，西哈努克亲王对毛泽东说：“我认为我们的胜利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胜利。”他特地提到了“五二〇”声明，表示全体柬埔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历史性的声明。这一声明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与中国人民为拥护这一声明而举行的真正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分不开的。

十三、游行庆祝十月的胜利

1. 十月前的一次应付差事的游行

在共和国历史上，1976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值得庆幸的一年。

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去世，唐山发生毁灭性的大地震，中国人民长时期陷入悲伤和忧虑之中。也是这一年，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垮台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的“革命”宣告结束，中国由此从十年动乱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年的4月和10月，在半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次是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后的示威游行，一次是粉碎“四人帮”的庆祝游行。然而，这两次游行，民心向背迥然不同。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可是，“四人帮”却千方百计地压制人民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的长篇报道，大谈特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必要性，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此后，“四人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大做文章，恶毒攻击邓小平。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炮制了大量的反动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直接诬蔑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四人帮”还捏造了一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唐公式，将那些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诬称为“还乡团”，对老干部进行迫害。

经过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革命”已经厌倦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各项整顿工作全面中断，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肆意批判，一些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老干部再次被打倒，打砸抢分子和造反派却得到重用，派性和武斗再度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对这场倒行逆施、黑白颠倒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人民群众从内心感到厌恶，而且也从中逐渐认清了“四人帮”一伙的丑恶面目。尽管“四人帮”一再叫嚣“翻案不得人心”，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日渐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一旦有了一个触发点，就会迸发出来。

这个触发点很快就出现了。

从1976年2月起，各种针对“四人帮”的大、小字报相继出现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它预示着地火已经燃烧起来了。

1976年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在刊登一篇纪念雷锋、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竟将周恩来的四句题词全部删去。3月25日，《文汇报》又在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同他斗》的文章，公然说什么“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不但恶毒地攻击邓小平，而且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一时间，《文汇报》接

到的抗议电话不断，抗议信和抗议电报堆满了报社的收发室。

3月20日和28日，忍无可忍的南京工人、学生和居民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和游行。南京大学数学系师生400余人，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沿途不断有群众加入。南京人民还贴出“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并将其刷在京沪间的列车上。

3月底至4月初，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福州等城市的群众，也利用清明节缅怀先人的习俗，用各种方式悼念周恩来。

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深切怀念周恩来，反抗“四人帮”。

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前往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日益增多。4月3日，有几十万人。4月4日，则达200万人次。人民已经清醒了，觉悟了，也要反抗了。

可是，“四人帮”却狗急跳墙起来。他们把群众张贴的许多大标语定为“反动口号”，将悼念诗词诬称为“反动诗词”，进而将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反革命事件”。4月5日，北京市出动大批的民兵和公安人员，驱赶广场上的群众，抢走花圈，殴打并逮捕坚持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四五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且指出要“找到地下司令部”、“尽快通报全国”，“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此时与外界几乎断绝了联系的毛泽东，再次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

同意了这份报告。

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时，指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据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还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指出，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7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决议通过一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公布了这两个决议。4月8日，《人民日报》也刊登了这两个决议，并发表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同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署名《人民日报》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报道颠倒黑白、满纸谎言。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要立即召开规模宏大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宣读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并由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各地只得奉命行事，纷纷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拥护两个决议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同时召开群众大会和举行游行，“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罪行”。

4月9日、10日、11日这几天，《人民日报》对这类集会和游行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虽说连篇累牍，但内容却是千篇一律。第一段说：“今天，××省××市××万群众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欢呼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坚决拥护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议，愤怒声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决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接着，介绍省市出席大会的领导。再报道省市主要负责人讲话的内容。讲话也无非是对两个决议再作表态，同时对邓小平“愤怒声讨”一番，再就是“决心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然后便是“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工农兵代表、人民警察和红卫兵代表，他们说，中央的两个决议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反映了我们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强烈愿望，表达了我们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的决心”等等套话。

最后一句必定是“会后，××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那么，这个“声势浩大”具体情况如何，报道除了提供了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外，其余语焉不详。

据称，参加游行的人数，4月8日，北京有100万，天津10万，长春15万，西宁10万。至4月9日，上海200万，沈阳50万，成都50万，重庆40万，南京20万，等等。如果数字可靠，人数也不算少。但参加游行的群众，均是组织命令而来，既然中央明令要求组织游行，下面也就只得一级级动员、组织，何况参加游行可以不上班，农民则可以记工分。

《人民日报》在报道北京10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的“盛况”时说：

昨晚，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刚一广播，许多地方就响起了锣鼓和鞭炮声，郊区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工厂、机关、商店的革命群众，分乘数以百计的车辆，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驶向天安门。

今天清晨，越来越多的游行队伍和车辆，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有的队伍分十路纵队，高举红旗，昂首阔步，一队接着一队地前进，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从金水桥到广场北边，到处是庆祝的人群，到处是胜利的喜悦。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战士、郊区人民公社的社员，肩并肩走在一起，互相鼓舞，团结战斗，革命口号声此伏彼起。街道居民们，也赶来参加了庆祝游行。有些精神焕发的老大娘，从小伙子手中接过鼓槌，播起了震人心弦的大鼓。位于城区百里之外的煤矿工人也赶来游行。输送游行队伍的卡车，川流不息。^①

实际上，天安门事件后的游行，不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地方，都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时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的王平，其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便可说明这一问题：

4月5日，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7日，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要求全国各地都开会表态。武汉地区开大会，由我代表军区表态，尽管我勾掉了讲话稿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但还是违心的做了发言。大会中途下起大雨，我和杨（勇）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借机离开会场。军区机关的表态大会是在新华社记者再三催促下才召开的。当时记者说，全军各大单位都召开大会上街游了行，只剩武汉军区没有动了。到了11日晚，由军区政治

^① 《人民日报》，1976年4月9日。

部组织召开司政机关人员参加的大会，我和在汉的军区领导出席。会议开了半个小时，接着组织游行。从礼堂出来，又遇下大雨。游行队伍从机关大院东门出，北门进，我和其他军区领导走在队伍前头，记者照下两张相，不到二十分钟就解散了，总算了了差事。^①

除了“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外，在这次游行中，又有几个人真正感到“胜利的喜悦”？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他们对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内情并不了解。虽然也奉命参加了游行，但广大群众此时所感到的不但不是“胜利的喜悦”，相反是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深深忧虑。

对于这种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的游行，此时正在北京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也看出来了，她曾为此写道：

天安门事件过后两天，江青下令组织一场反对邓小平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使我倍感震惊的是，我亲眼看到××部长×××（原文有姓名与部名，这位部长也可能出乎一种无奈，或许别的原因，暂且将名隐去——引者）跟在锣鼓队后面，领着中国××官们绕着同一个广场，用西方妇幼皆知的一种节奏高呼“打倒邓——小——平”。他的朋友尽量原谅他，说他是受了新婚娇妻的影响，但部长的这种行为使许多高级官员深感尴尬。我的翻译是邓的坚决支持者，她很聪明，干脆躺在我的卧房兼办公室装病，最后我出面证明她“病得太厉害”，不能按照指示参加反对邓小平的示威游行。^②

①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84—585页。

② 《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这段文字实际上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时的许多“高级官员”都不屑参加这样的游行，因为他们不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也不赞同对邓小平的错误处理。

2. 群众游行打破“四人帮”余党梦幻

如果说天安门事件后组织的游行，是一次彻底违背民意的游行的话，那么，这年10月举行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就是一次真正体现民意、反映民心的大游行，也是一次庆祝胜利的大游行。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一伙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9月11日，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三天，王洪文撤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他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及时向他请示汇报，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一伙指挥全国。

12日起，“四人帮”党羽迟群动员人们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有的信公然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们还为自己赶照标准相，赶制礼服，准备拍摄“盛大的节日”等影片，急不可待地为上台做准备。

9月16日，“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写进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联合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当华国锋提出不是“按既定方针办”而是“照过去方针办”时，张春桥竟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由，阻止华国锋对此作出的批语下发。

“四人帮”还企图以上海作为夺取中央党政权力的基地，

暗中加紧与上海亲密的秘密串联。他们要上海的党羽“谨慎小心，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什么“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张春桥还特地送口信给上海某些领导人，示意“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四人帮”一伙变本加厉地加紧夺权活动，引起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警觉和不安。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叶剑英、李先念等促使华国锋下定决心，于10月6日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曾骄横不可一世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不到一个半小时，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被粉碎了。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且立即传达到全党。

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是逐步向党内外宣布的。

10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

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消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人们自发地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甚至举行游行庆祝。对此，被“四人帮”视为夺取中央最高权力基地的上海爆发的游行活动，便是一个典型。可以说，广大上海人民的上街游行，彻底打碎了“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进行反革命暴乱，在上海搞“巴黎公社式的革命”的幻想。

“四人帮”有“上海帮”之称，除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发迹于上海，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之下，上海有一

批他们豢养的死党，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这些人在相当长的时间控制了上海，他们又培植了一批喽啰。正因为如此，“四人帮”曾考虑一旦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受阻，就以上海为基地，利用上海的“第二武装”，发动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将“四人帮”隔离审查后，其在上海的余党一时与其联系不上，但其余党不死心，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派人到北京刺探消息，很快得知江青等人找不到了。

徐景贤、王秀珍一看大事不妙，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实行紧急动员，决定“要干”，“拉出民兵来，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贤下达手令，调集和部署3.35万名民兵，动用各种枪炮2.7万件，组织指挥班子，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集中了大量的物资和食品，部署了叛乱的具体步骤。他们还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并配合发表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企图制造舆论。还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垂死挣扎。

然而，“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策动反革命叛乱的企图，没有得逞。

中共中央对上海的问题早有预料，并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措施。

先以开会的名义，将马天水召到北京，随后又通过马天水将徐景贤、王秀珍召到了北京。中央政治局同志出面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周纯麟谈话，叶剑英、华国锋规劝他们觉醒，勇于揭发批判“四人帮”，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率领一批

领导干部去上海，控制事态的发展，人民解放军也做好了应付事变的准备。

10月13日，中共中央让马天水等人返回上海做工作，平息事态。可是，马天水等人使用两面派手法，当面假表态，蒙骗过关；回到上海后，却按照事先商定的“搞合法斗争”的阴谋，企图长期潜伏下来，搞所谓长期斗争，到时东山再起。

可是，马天水等人的如意算盘拨错了，上海人民已行动起来，打破了他们东山再起的美梦。

10月14日上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达到区县局和大专院校负责人，下午后才陆续传达给群众。消息一传开，如同平地起春雷，全上海顿时沸腾了。

当天，上海的大街小巷，一下子涌出了成千上万的指向“四人帮”的大字报。在上海最热闹的外滩，防汛墙上、大楼墙上，贴满了这样的大标语：

“誓死捍卫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打烂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

“砸烂‘四人帮’在上海的老窝！”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必须老实交待！”

……

第二天，上海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当年曾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来到上海的司马东去回忆：

从10月15日下午二时开始，一队又一队手擎红旗和标语的游行队伍，自发地来到外滩的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大楼前游行示威。下午五时起，人群源源而来，外滩人山人海，口号此伏彼起。每走过来一支游行队伍，站在马路两旁的群众就热烈鼓掌致意。此情此景，使每个身临其境的

人都深刻地感受到：上海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是向着党中央，是无比仇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

从那天以后，到外滩游行、看大字报的群众，天天人山人海，这真是革命的“盛大节日”！而且，除了游行声讨外，外滩还自发出现了宣讲台，控诉“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

10月16日，交通大学、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轮胎一厂、南洋模范中学、湖南路街道、上海越剧团、上海话剧团等单位，约十万群众，不顾马、徐、王的规定，涌进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大院，张贴大字报，开展广播宣传。许多群众还涌进了王洪文所住的二十二号楼，砸了一些家具和玻璃窗。

交通大学走在这场群众运动的前面。10月14日下午，党委书记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之后，全校师生员工无不拍手称快。当晚，整个校园里灯火通明，到处刷出了“彻底砸烂四人帮”的大幅标语。许多工农兵学员自动跑到南京路、淮海路、外滩刷大标语，其中有的写道：“四人帮的罪恶活动是‘571工程’的继续！”“清除四害，人心大快！”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首先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大楼周围，刷出了一批使马、徐、王心惊肉跳的大标语：

砸烂反革命集团的黑窝！

揪出反革命的帮凶！

清除四害，斩草除根！

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出大院，接受师生们递交的抗议书，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交通大学的学生会和团委，还发起于10月19日召开的全市十六所高等院校声讨“四人帮”大会（这就是马、徐、王于10月18日给中央电报中所说的那个大会）。大会在文化广场举行，三万多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这个大会，通过了向党中央的两点请求：

一、立即改组上海市委，组成新市委，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二、立即派中央调查组到上海，调查“四人帮”在上海搞的一切罪恶勾当。

交通大学不愧是一所民主革命的堡垒，她如今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发挥了先锋作用。

到了10月20日，上海的群众又自发组织了一次一百万人的声讨“四人帮”大会。这次是以工人为主体的大会，有二百多个单位参加。大会在人民广场举行。上午十点开始，人流就涌向广场。下午二点开始，四点结束，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①

对此，当年曾被错划为右派的《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先生，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就在他们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要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动上街游行，敲锣打鼓，各举各色旗帜：“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真是响彻云霄。以后连民兵也卷入游行的队伍。这样如醉如狂的热烈、愤怒队伍，经常首尾相接，足足持续了三天

^① 司马东去著：《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页。

三夜。接着，上海人民广场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声讨“四人帮”大会。

在这空气下，徐景贤等的“巴黎公社式”梦幻，当然化为泡影了。^①

3. 亿万人民游行欢庆胜利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发出通知，列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宣布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从10月21日开始，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

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在此后接连三天的大游行中，北京参加游行的群众达到580万人。

10月23日，北京参加游行的群众达250万人。新华社对这天北京游行的盛况作了这样的报道：

今天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二百五十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扩音器里不断播送着《伟大领袖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

① 《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7页。

手》、《歌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歌唱祖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①

当时的庆祝游行，所庆祝的实际上是两项内容，一是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庆祝粉碎“四人帮”。尽管当时的报道中，前一项内容往往占有不少篇幅，但当时人们所庆祝的，更多的是打倒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对于华国锋，虽然自周恩来去世后就代理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后又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但他毕竟到中央工作的时间不长，群众对他的了解也不深，当时人们拥护他，主要是凭着他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这一点。毛泽东逝世后，党的主席出现了空位，人们当然也担心。这种担心，也包括最高权力落入“四人帮”之手的忧虑。现在，华国锋被确定为党的领袖，群众对此进行庆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而群众对于游行表现出的极大热情，更多的是出自对粉碎“四人帮”的欢欣与庆贺。与对华国锋的相对陌生相比，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危害可谓有切肤之痛。“四人帮”作为“文化大革命”所滋长的怪胎，给中国所带来的危害可谓擢发难数。诚然，人民群众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文化大革命”还难以作出深刻的反思，也难以认清“文化大革命”与“四人帮”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人们对这种“革命”的厌倦是显而易见的，对“四人帮”一手造成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十分厌恶，对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的丑恶表演更是十分痛恨，因而对“四人帮”的真实面目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四人帮”之所以被打倒，而且问题解决得那么顺利，固然与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断

^①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4日。

的措施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四人帮”民心尽失，人民对他们已是完全厌弃了。而“四人帮”问题的解决，正是顺应民心、顺从民意的体现。因此，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加入到了游行队伍中，为民族的新生、国家的新生而庆贺。那游行的场面，用倾城而出、万人空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在10月21日、22日、23日三天的时间里，除了北京有500多万人参加游行外，据报载，上海有650万人，武汉有350万人，天津有450万人，沈阳有300万人，广州有400万人，西安有150万人，重庆、成都都超过了100万人。

当时群众庆祝游行的盛况，不妨摘录一段文字作为佐证：

几天后，全国政协近10年来首次召集包括平时不参加政协直属组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学习组学习的政协委员在内的数百人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告王、张、江、姚“四人帮”被粉碎。文件只念了一个开头，全场就欢呼起来了！中间多次鼓掌，多次中断，才把文件念完。然后宣布上街大游行，主持人劝说年老体弱者不要去，因为队伍从政协礼堂大门口出发，往南过天安门绕至东城沙滩全国工商联办公楼前解散，要步行20里地以上。但是，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白底红字的大门旗打开，所有人都争着参加，包括时年80岁以上的10多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常委，都一律不听劝阻，主持人只得率领大队伍，缓缓而行。

队伍上了街，才知道整个北京城都沸腾了！许多文化艺术界和大专院校的队伍，都有许许多多千姿百态、出奇制胜的表演，最多的是王、张、江、姚的漫画和模拟人像丑态！人民政协的队伍除了一人一面小旗，没有别的，相比之下似不及人家壮观，但这面政协的大门旗，这大旗下

的一批引人注目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却赢来了一路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政协直属组的成员过半数坚持三天上街。老人们的心同亿万人民群众相通，他们熬过漫漫 10 年的灾难，迎来了这新时期的曙光！^①

对于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盛大游行，外国通讯社也作了客观的报道，从中也可以印证人民群众的喜庆心情。

法新社 10 月 21 日说：

中国首都今天数十万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反党四人帮”。

与此同时，在大街上第一次贴出了极大的大字写的各种颜色的标语，不指名地指责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

数十万人——有孩子——也有老人——汇集到市中心。群众举起拳头，高呼“打倒反党四人帮”。

路透社 10 月 21 日说：

中国反对四个激进派领导人的如火如荼的运动今天在狂欢般的气氛中，以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示威的形式涌上北京的大街，景象壮观。

从清晨直至夜晚，高呼口号，挥动旗帜的队伍要求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数以十万计的人参加了示威，其中有政府的部长和将军。领着呼口号的人带头高呼拥护华国锋的口号。

虽然示威显然是党组织的，但是气氛异常欢快。有经验的

^① 汪东林著：《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2 页。

观察家称这明显地表明公众支持清洗四个激进分子。

法新社 10 月 22 日说：

（北京）今天上午继续举行反对“反党四人帮”的群众游行，这是自六十年代文化革命以来举行的最大规模的群众游行。

游行群众并没有由于天气恶劣而情绪低落，他们几十万几十万地经过闹市区以表达他们对“可恨的阴谋家”、“卑鄙无耻的叛徒”、“毒蛇”和“爬虫”的仇恨，群众的这些称呼是指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的。

游行群众举着红旗和雨伞，来往于宽广的长安街，形成了一条真正的长河。

这几天全国的大城市显然都在举行游行，特别是上海。

广州的居民使游行集会具有狂欢气氛，他们在游行时举着纸做的龙和其他动物。

这些外电报道中，都认为游行是有组织的，也是党支持的，同时都认为游行群众对“四人帮”十分憎恨，群众是在过节一样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游行庆祝活动在广大农村也广泛举行。农民们从自己居住的村子，前往公社所在地或者县城，参加由公社、县里组织的游行。虽然农民们对华国锋比城里人更为陌生，对江青等人为何被称之为“四人帮”也有人不甚了解。但是，他们已经知道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却要抢夺华国锋接班人的位子，知道了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对“四人帮”产生强烈不满。何况，他们很快也得到了小道消息，说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江青不但不照顾毛泽东，而且还有意让毛泽东翻身子，使毛泽东的病情恶化，就凭这一点，

朴实的农民对江青一伙也就十分憎恨了。

在一篇题为《欢声震沂蒙》的新华社通讯稿中，可以了解到农村游行的一个侧面：

从岱崮山顶到沂河两岸，从孟良崮主峰到凤凰山下，人们一连几天抬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巨幅画像，举着彩旗，敲着锣鼓，涌向县、社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举行庆祝集会和游行。许多老民兵、老游击队员，手持当年英勇参战的大刀、长矛，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的前头。喜气洋洋的军民，在欢乐的锣鼓中扭起了秧歌舞。入夜，沂蒙山区一片火红。收工归来的社员举着火把、提着灯笼举行游行。许多人把当年为八路军送信、带路用的马灯擦拭干净，罩上红纱，加入游行行列。^①

这其中，自然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爱用的套话，也有牵强附会的因素，如擦拭“当年为八路军送信”的马灯，似乎给人感到沂蒙山区的人早已不用马灯了，其实未必如此。但是，当时农村不论是平原还是山村，不论是城郊还是偏乡僻壤，的的确确是一支支游行的队伍走在乡间路上。

据统计，仅全国三个直辖市、二十一个省会城市、五个自治区首府，几天时间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数，就达 5000 万人。就全国而言，无疑是数以亿计了。

^① 《各族人民无限信赖华主席》，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94 页。

十四、国庆三十五周年大游行

1. 威武雄壮的阅兵式

自1970年的国庆游行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已有多多年没有举行国庆游行了。

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共和国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强国富民之路，这便是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到了1984年，共和国已经经历了三十五个春秋，改革开放也进行了五六年的时间，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国泰民安的局面。

这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对深受农民欢迎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作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宣布延长土地承包期至十五年以上，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度高涨。

1月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随后，他又视察了厦门经济特区，并为厦门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回到北京后，

邓小平再次对办经济特区予以肯定，明确指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使人们对创办特区尚存在的疑虑一扫而光，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更加明确。

这年1月，中国政府总理访问了美国。4月，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建交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在职的美国总统。里根在访华期间重申，美国政府将信守中美两国发表的三个公报，无意干涉中国内政。

7月28日至8月13日，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经过顽强拼搏，共取得了十五枚金牌、八枚银牌和九枚铜牌，金牌总数位于参赛国中第四位，改变了旧中国在奥运会上的零分纪录。

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同时将香港交还给中国。按照“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中国人民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为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民生活有了从未有过的改善。社会稳定，人民安康，改革开放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共和国三十五周年华诞。

面对这大好的局面，在共和国诞生三十五周年之际，没有理由不为此而欢呼，而庆祝。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决定这年的国庆节在北京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

中共中央对建国三十五周年庆典活动十分重视，为此专门成立了以万里任组长的庆祝活动领导小组。

随后，庆典的各项准备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有金秋时节之称。人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其实，何止人是如此，连天也是如此。10月1日这天，晴空万里，天宇蔚蓝，金色的阳光铺洒在喜气洋洋的人们身上，首都北京呈现出一片欢乐祥和的景象。

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城楼红墙中央，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孙中山的大幅画像，竖立在广场的南面。城楼对面的东西两侧，竖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广场的东西两侧，林立的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空十四个大红宫灯气球高高并排飘起，上面是金色的大字组成的巨幅横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广场上，身着鲜艳服装的10万少先队员、青年学生和工人，手持花束轮番换出五个图案：金色的国徽和年号“1949—1984”；红色白字的“祖国万岁”；红底白字的“振兴中华”；绿底白字的“保卫和平”；红底黄字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典礼开始前，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主席台。来访的民主柬埔寨主席西哈努克亲王、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等，也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上午10时，庆典开始。广场上1200人组成的军乐队齐奏国歌，28响礼炮响彻云霄。

此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走下天安门城楼，由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乘敞篷汽车检阅了受阅部队。检阅车驶过一个方队时，邓小平频频地向

指战员挥手致意，不断地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指战员们则齐声回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

检阅完毕，邓小平回到城楼发表讲话。邓小平说：

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宣告：我们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们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了一系列的适应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今天，我们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①

邓小平的讲话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刚结束，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开始了。

接受检阅的部队共有42个方队，他们在“八一”军旗的引导下，一队接一队，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事院校的六个方队。年轻的军官队伍迈着正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他们是由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和石家庄陆军学校学员分别组成的。这些院校的2100多名学员，身着崭新的军官服，代表着全军一百多所军事院校的学员，意气风发地接受检阅。他们都是文化、懂现代军事科学的人民军队的新一代指挥

^① 《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日。

员。

整齐的步伐声由远而近，五个步兵方队阔步从东长安大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行进中每个方队横看一条线，纵看一条线，斜看还是一条线，像刀切一样的整齐队形，就像一道游动着的钢铁长城。

“水兵方队、空降兵方队、女卫生兵方队和人民武装警察方队各有特色。海军战士身着洁白军服，军帽飘带随风飘舞，行进中如同翻滚着银色的波浪。空降兵战士头戴钢盔，身穿伞兵服，个个精神抖擞，给人带来无穷的力量。来自汉、满、回、壮、彝、蒙古、朝鲜、达斡尔、鄂温克九个民族的女卫生兵们，一律着棕绿色上装、藏青色裙服，脚登黑色筒靴，右臂佩戴红十字臂章，显得分外英姿飒爽。人民武装警察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广场。这支新组建的人民武装日夜战斗在公安保卫工作第一线，为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四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两个徒步方队是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民兵。着米黄色服装的男民兵方队由首都钢铁公司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着天蓝色服装的女民兵来自北京朝阳区的十七个工厂企业。他们全副武装，迈着和正规部队一样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

徒步方队之后，是延绵数公里的二十四个机械化部队方队，分四路进入天安门广场。这二十四个方队由陆海空三军的四百二十八辆战车组成。依次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反坦克导弹火箭炮、火箭布雷车、轮式和履带式装甲运输车、坦克、自动火炮、海军导弹、空军导弹和战略导弹。

四十管火箭炮部队隆隆进入广场。这个方队所在的师，是1948年创建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这

支部队曾以作战缴获的马拉野炮参加受阅。如今，当年的受阅武器早进了部队的历史陈列室。

七十二辆配备有防空导弹和高射机枪的轮式、履带式水陆两用装甲车开过来了。四个装甲输送车方队全部来自我军战功显赫的“红军团”。这支部队的前身曾经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平江起义，在以后的革命战火中百炼成钢，无坚不摧。现在，这个团已经建成为诸兵种合成的新型部队。他们的成长典型地展现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进程。

由一百零八辆坦克组成的强大坦克群，分六个方队威风凛凛地进入广场。这些坦克型号新，马力大，行动敏捷，火炮穿甲能力强。通过广场时，马达的轰鸣声盖过了嘹亮的乐曲声。

人们不会忘记，1959年以前的国庆阅兵中，人民解放军参加受阅的大口径火炮、坦克、车辆和飞机等，大部分是苏式的。人们更不会忘记，1949年开国大典时，受阅部队的武器是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来的各种美式装备。而今天，所有在天安门广场受阅的兵器，从常规武器到战略导弹，都是中国自造的，显示中国的国防实力已有了巨大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能力保卫好祖国的神圣领土。

在铁流滚滚的队伍里，四个载着各种导弹的方队格外引人注目。行进在前面的是汽车牵引的十六枚海军潜地导弹、反舰导弹和岸防导弹。随后是两个方队，携带三十二枚地空导弹的空军导弹方队。最后是战略导弹部队的方队。九枚巨型战略导弹由重型牵引车拖载，其中有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当这些导弹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显得格外壮观。

在战略导弹部队驶过广场的同时，天安门广场上空骤然响起雷鸣般的轰鸣——人民空军的战鹰来接受检阅了。

九十四架由喷气式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组成的强大机

群，出现在天安门上空。我国自己制造的新式战鹰以严整的编队，分四个梯队依次受阅。首先进入的是成“人”字形的领队机队。一架大型轰炸机领队，后面是八架护卫机。护卫机飞临广场上空，一起喷射出蓝、橙、绿、红四种彩烟，空中顿时彩霞飘拂。接着，由十八架大型轰炸机组成的梯队分六个中队，由三十二架强击机组成的梯队分八个中队，由三十五架歼击机组成的梯队分七个中队，都以严整的队形，雷鸣电闪般地飞过天安门上空。^①

盛大的阅兵式历时一个小时，事隔多年之后，人们对这次阅兵仍记忆犹新，因为它使人们领略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风采。

2. 游行狂欢曲

紧随受阅部队的是由身穿节日盛装的 14 万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

首先进入广场的是整齐庄严的仪仗队。

仪仗队以国旗方队为先导。近千名身穿白色服装的仪仗队员，在行进中举着十条巨幅红绸，组成一面二十五米长、十七米宽的平展展的国旗，国旗四周是鹅黄色的玉兰花边。在“国庆”两个金色大字的后面，身穿各色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手持花束组成花环，花环中的彩车上是国徽图案。当国旗方队来到天安门前，1 万只象征和平的鸽子从广场上空飞过。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仿铜半身塑像，由 1000 多名手持果绿色玉兰花的男女青年护卫着通过广场。

^① 参见《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1984 年 10 月 2 日的机关报道。

队伍中，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的模型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浮雕像。整个仪仗队共由 1.8 万人组成。

“振兴中华”、“实现四化”、“2000 年工农业总值翻两番”三幅大标语后面，是一幅数千名大学生擎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图案长 30 米，宽 27.5 米，上面写着“统一祖国”四个大字，图上的台湾、香港、西沙和南沙等虽不算大，但赫然入目，很是分明。

这时，天安门前突然出现了蓝色的海波，近千只和平鸽拂浪轻飞。这是 2000 多名一身海蓝色挂披的青年在扬动手中的塑料白鸽。碧海之间，横着两幅醒目的标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仪仗队之后，是大队的农民队伍。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审查国庆游行队伍的方案时，特地提出，让农民方队走在国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这在多年的国庆游行中还是第一次。

五台红色大拖拉机，牵引着“联产承包好”五个四米高的大字，来到了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伴随着《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欢快乐曲，京郊八个区县 500 多名农民组成的唢呐队，大兴县的“武吵子”、门头沟的太平鼓、海淀区的大头娃娃骑鲤鱼、顺义的桃中幡、延庆的跑旱船，一队接一队地来到天安门前。

以 2.7 万人组成的工人队伍分为八个方阵，簇拥着三十二辆彩车，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乐曲中，紧随农民队伍之后。

在工人队伍中，有一辆整个游行队伍中最重的彩车——50 吨的“红旗齿轮”彩车，随着齿轮的不停转动，彩车上闪烁着七色彩虹。

在各色彩车中，“有‘平朔露天煤矿’彩车乌金滚滚。‘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彩车上石油喷涌。‘数控立式加工中心’彩车上机车飞转。‘长江水利枢纽工程’彩车上浪花翻腾”。^①

在电子工业的方队中，当队伍来到天安门城楼前时，那身高4.5米的机器人突然转身面向天安门城楼，右手挥动着花束，双眼闪闪发光，随着头部的转动，发出“祖国万岁！振兴中华！”的高呼声。

取名为“大鹏鸟”的深圳特区的彩车出现在游行队伍中。这是国庆游行中第一次有地方的彩车参加。大鹏的两翼，分别镶嵌着邓小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紧跟着走来的是知识分子队伍。

走在最前面的是大学生。在游行的大学生中，有苦聪人的第一位大学生刘明翔，有门巴族的女大学生陈吉，有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水族学生吴国林……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大学生子弟行走在这欢乐的队伍里。

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精心制作了一辆“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彩车。车中，一双“手”托着写有“优秀教师”四个字的金质奖章，三十五个手持桃花和李花的女学生，围在那双大手的下面，象征着三十五年来教育园丁们已是桃李满天下。

改革开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虽然也曾宣布过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曾有过脱帽加冕的经历，但为时都不长。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更是成了“臭老九”，大批的学有专长的知识

^① 《北京日报》，1984年10月2日。

分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知识分子也从此脱掉了资产阶级这顶可憎的帽子，真正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日益为社会所尊重。所以，这次国庆的游行中，知识分子队伍人数最多。呼唤了多少年的知识分子的春天、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了。

知识分子队伍之后，是由 8000 名居民组成的游行队伍。

走在方阵前列的是由 120 名天真烂漫的学龄前儿童和他们的父母组成的“五好”家庭代表。孩子们有的坐在儿童车里，有的牵着妈妈的手蹦跳着，有的爬上了爸爸的肩膀，他们也用那稚气的童音，跟着大人在呼喊“祖国万岁！”

跟在他们后面的，有居委会、街道的干部，有街道联社的职工，还有穿着袈裟、道袍的宗教界人士……当他们来到金水桥时，8000 人手中挥舞着的花束，组成了一块巨大的向前移动的“绿地”。“绿地”的中央是一个长三十八米、宽五米的“首都军民共建文明街”的巨大模型，这是群众游行中最大的一辆彩车。

伴着节奏明快的《运动员进行曲》，走过来运动员的队伍，这是一支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队伍，是一支实现“零的突破”的队伍。在一万名运动员组成的体育大队中，有近年来在重大国际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的优秀选手一百一十四人。

参加二十三届奥运会的二百四十五名运动员扬起了“中国奥运会会旗”，在十五枚奥运会金牌模型的四周，站着许海峰、吴小璇、张蓉芳、李宁等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紧接着，过来的是世界排坛三连冠获得者中国女排队员和她们的教练袁伟民、邓若曾。站在“田径”、“体操”、

“登山”等彩车上的，有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栾菊杰、世界跳高纪录保持者朱建华、登山女英雄潘多等。海浪帆板队伍设计得最为别致，八百名运动员手持海蓝色长绸，做海浪起伏动作，顿时间波浪滔滔，中间有六艘帆板在不停地划行，它象征着我们的队伍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体育大军过后便是文艺方阵，这是一只百花盛开的方阵。强悍的小伙子敲响了铙钹和大鼓，如惊雷轰响，降下满园春色。踏着欢快的乐曲，文艺大军高举着“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标语牌翩跹起舞。

身着鲜红藏服的姑娘们甩着长袖，像飘撒着无数条的哈达；朝鲜族姑娘穿着白色纱裙婀娜漫步，手中两把粉红色的纱扇时开时合，好似腊梅花竞相开放；背着长长大弦子的彝族小伙子和裹着鲜红披毡的姑娘，随着腰肢的摆动，交错对舞，洋溢着大凉山的热情。

十八部优秀剧目的彩车上，不同剧种的演员在一展技艺。在党的文艺方针的照耀下，我国的文艺工作者通过辛勤的劳动，浇开了芬芳鲜妍的文艺百花，使人们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①

游行队伍的最后是2.3万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大队。走在他们前面的是三十五面鲜红的队旗，象征着共和国诞生三十五周年，也象征少先队成立三十五周年，表明少先队员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让少先队员走在最后表明我们的共和国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活力。

在少先队员队伍的中间，有一辆旋转着的大火炬模型的彩车，五个小火炬围绕大火炬在旋转。彩车的周围160名少先队

^① 《光明日报》，1984年10月2日。

员牵着 80 米长的红绸带。“时刻准备着”的横幅标语引导着喧天动地的鼓号队、彩虹队、舞蹈队，孩子们高呼着“祖国万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口号，挥动着手中的花束，如同层层浪花涌向天安门。

在群众游行的过程中，邓小平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农民队伍中“联产承包好”的标语车和“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模型彩车驶来时，邓小平对身旁的西哈努克亲王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农业队伍。”西哈努克说：“中国的农业搞得很好，是因为阁下的领导和中国的政策好。”邓小平笑答：“标语上写得清楚，是因为政策好。”

陈云对评弹情有独钟，对曲艺的发展也非常关心。在文艺队伍中表现沪剧《姊妹情》的彩车经过时，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向他介绍说：“这个剧是根据评弹《真情假意》改编的。《真情假意》还被改编为歌剧、电视剧。”陈云高兴地连连点头说：“好啊，文艺也兴旺啦。”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看到游行队伍中的体育大军时，兴奋异常，他又是鼓掌，又是招手。他对周围的人说：“参加你们的国庆盛典，我感到很荣幸。你们的游行队伍里专门有体育大军，这说明体育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我为中国这样重视发展体育运动感到高兴。”

81 岁高龄的彭真兴致很高，两个多小时的阅兵和游行，他一直没有离开主席台。从开国大典开始，曾长期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彭真，领导和组织过多次国庆和其他游行。此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说：“今天的庆祝活动搞得太好了，我舍不得走开，我怕看漏了精彩的场面。”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已是 95 岁高龄，这位当年五

四运动的健将说：“想想六十五年前，我们在天安门前参加五四运动游行时的状况，看到今天的动人场景，我国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这都是共产党领导得好！”^①

作为一个经历了几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许德珩先生的这番话，绝不是应景之语，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3. 衷情道一声“小平您好”

对于1984年的国庆游行，除了那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喜庆热闹的宏大游行场面，人们印象最深的，要数游行过程中北京大学学生打出的那幅并不算大的横幅——“小平您好”了。

当年的国庆游行中，有一支大学生队伍，当他们来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时，为炽热的情绪冲动的大学生们狂热起来了，他们把手中的花环、花束、花球纷纷抛向空中。就在这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亮出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横幅，迅速地展开，只见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几个字。顿时，主席台上、广场上无数的目光全都汇集到了这幅不大的横幅上。

几天之后，新华社对这幅横幅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报道：

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欢呼前进的时候，大学生队伍里忽然出现了一幅横标。上书四个大字：“小平您好”。这幅用竹竿挑着的横标，比那些高大的模型和巨大的字标要小得多。但是它一出现，群众就欢腾起来。大学生们高兴极了，他们簇拥在横标的周围，摇花束，挥彩带，抛纱巾，跳跃着欢呼：“祖国万岁！”“振兴中华！”

^① 《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日。

这幅饱含着群众真挚情意的横标，是怎么忽然出现在游行队伍中的呢？

那是九月三十日晚上九点多钟，北京大学的一间学生宿舍里，生物系细胞遗传专业一九八一级学生郭庆滨、李禹、栾晓峰等商议：明天就要游行了，为了这欢乐的一天，大家排练了很长时间，做纸花手都磨出了泡。可是，总觉得呼喊口号、挥舞花束，还不能充分表达出自己对党对祖国的激情。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一幅横标表达心意。就在这时，同班学生常生闯进来问：“有纸笔没有？”原来，大家想到一起了。于是，他们就合起来计议。这时，同班学生于宏实、毛小洪和哲学系一九八一级一班学生赵宝晨等也闻讯赶来。只有十二平方米面积的小宿舍里，一下子聚集了二十多人，连门都开不开了。

写什么标语呢？有人说“教育要改革”，有人说“改革要加速”……这些标语的意见虽好，却都是只说出了一个方面的愿望，不能集中地表达出大家共同的心愿。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讲到我们党在乌云满天的日子里力挽狂澜，大家想到了邓小平同志；讲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大家又想到了邓小平同志；讲到当前全国的一派大好形势，大家还是想到了邓小平同志。于是，有个学生脱口而出：“就写‘小平同志万岁’。”但“万岁”两个字立即被否定了。大家觉得，这两个字不亲切。经过反复琢磨，终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写“小平同志您好！”大家觉得，这句话最能亲切地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敬意，最能表达对党中央的领导、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衷心拥护。

夜已很深了，一时找纸笔困难。有人去学生会拿来几

大张绿纸，可是太薄，容易坏。李禹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塑料床单拿来作衬。可是，塑料床单上字写多了不醒目，大家一合计，就写了“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写好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横标裹起来，外面绕以彩带，顶端缀以纸花，横标变成了一把高大的花束。

“十一”凌晨四点多钟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护卫着这把“花束”，进入游行的行列。到达天安门前时，横标忽拉一下展开了！

在欢呼声中，举着横标的郭庆滨、常生、于宏实，和群众一起来到金水桥头。他们把横标高高地向天安门城楼举起。“小平同志在城楼上向我们微笑招手哩！”“耀邦同志和紫阳同志也看见我们了！”大家兴高采烈，人人心里都在说：“小平您好！”^①

在国庆五十周年来临之际，“小平您好”这幅横幅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记者禾冈为此作了一次详细的采访。禾冈在《国庆庆典的幕后新闻》一文中说：

就在“十一”前几天，指挥部突然发布了一道命令，大学生队伍可以不按统一的步齐走，但不是让自由走，而是要活泼一些，欢快一些。一接到这个通知，大学生们又是遗憾又是高兴，遗憾的是辛辛苦苦练了一个月的正步走白练了，可是抱怨一过，马上就有人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个命令里蕴藏的一种机会和宽松。

后来，他们才了解到，这一年的指挥部接到命令，在游行队伍的设计上也要解放思想。

他们又是如何想到要打出“小平您好！”这个横幅的

^① 《人民日报》，1984年10月3日。

呢？

赵宝晨回忆说：“9月30号晚上，我们几个人包括栾晓峰、常生、李禹、于宏实都跑到28号楼216宿舍生物系81级细胞与遗传专业宿舍，商量着明天做些什么。其他系的同学也在纷纷做着横幅，有的写‘教育要改革’，有的写‘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几个想，总要标新立异地写点什么。”

赵宝晨非常坦诚地解释说：“改革开放以后，生物系有一个教改政策，就是输送留学生出国深造。我们对这项举措非常拥护，希望改革能加快步伐，说白了就是多为我们提供了出国机会，但是总不能把这些都写进标语里去吧。”

顿了顿，他又说：“如果没有这一代领导集体，不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中来，我们这些人哪有上大学的机会，更不可能出国留学。因此，最后话题慢慢就集中到领导人身上了。”

栾晓峰说：“有的人说，要不就写‘小平同志万岁’吧，马上就有人反对，说不能写万岁，万岁是封建时代的叫法，现在都改革开放了，不能再用这个词了，想了半天，有个人提出，写‘小平同志您好’六个字吧，这个话一出口，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了，觉得这句好。”

“为什么想到用‘小平’这个称呼呢？”赵宝晨说：“因为过去许多场合都用过，我们在学校里是党员，党员开会经常听报告说，‘某某领导圈阅过了’，这个某某领导就经常用‘小平同志’这个称呼。”

“常生的字写得好，常生用布头蘸墨的办法写了六个大字，写完往被单上别的时候，才发现这句话太长放不

下。因此，我就去掉了‘同志’两个字。”

“去掉了‘同志’两个字一看，反而比原先那句话更好了。”栾晓峰说，“有一种意境，显得那么亲切，与‘万岁’所表达的味道完全不同。”

横幅写好了，但怎么往会场里带呢？要知道，游行组织工作是非常严密的。指挥部要求，不准携带与游行无关的物品，不准私自制作标语口号，广场上所有的标语口号、横幅旗帜都由组委会统一制作。

这个问题颇费一番脑筋，最后大家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用一束彩花做掩护，“混”过队伍里。又是几个人七手八脚连夜扎了一个彩色纸花，把卷起来的横幅和两根竹竿扎裹得严严实实。

“学校发给每个宿舍不少彩纸，让学生们做成纸花。”赵宝晨回忆说，“我们就用纸花把卷起来的横幅包裹起来，从外面看，是一个巨大的花束。”

一切已准备就绪。大家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让不让打出来？万一打出来捅了漏子犯了错误怎么办？

在国庆游行这个庄重的场合，一切行动都是在游行指挥部的精心策划和严密组织下进行的，广场上打出的标语、口号又都是经过了分指挥部、总指挥部、国庆筹委会、北京市委层层审批。这样未经批准擅自打个横幅，事后若追查起来怎么办？

这时有人说出了问题共产党员负责。赵宝晨当时是党员，他认为他们这一举动对党没有敌意也没有恶意，最多就是有点自由主义。他当即拍胸脯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十一’凌晨1点起来，2点多在东单集合。那天上

天安门广场以前我们都有点紧张，”赵宝晨回忆说，“记得当时常生拿着照相机给阅兵坦克拍照，让警察抓住，把他的胶卷曝光了，我们感觉很严，说不定带不进去呢。”

栾晓峰说：“李禹、于宏实和常生拿着横幅，我和其他好些同学在周围打掩护。”

“真没想到，我们轻而易举地就把它带进去了，没人拦我们。”赵宝晨说。^①

据说，这幅横幅打出来之后，游行指挥部为此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打得好，它准确地反映了大学生对党的热爱。一种认为这种做法应该受到批评，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指挥部事先曾三令五申规定不能带文字物品。持后一种意见者认为，这次打出个“您好”来，如果打出了个“您不好”，那怎么办？

为了这件事，负责学生队伍的组织者还受到了批评，写了检查。

然而，不论是当时的报刊舆论，还是普通百姓，对大学生们的这一举动，都深以为然。新华社当天就对此作了报道，并配发了照片。两天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群众从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中看到了这幅横幅，无不表示赞同，因为它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

“小平您好！”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却表达出了人民对小平丰富深厚的感情，朴素的言语，体现了领袖与人民间的亲近。人民不会忘记，是小平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小平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小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① 《南方周末》，1999年6月18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小平的伟大，也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小平您好”所包含的无穷蕴味。

十五、国庆五十周年大游行

1. 皇皇大典

1999年10月1日，走过了半个世纪光辉历程的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她50华诞。这是一个12亿中国人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在共和国的心脏——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50万各族军民以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欢庆祖国的这一伟大节日。

50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一个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时代。

这是全国人民艰苦创业的50年，这也是中国取得从未有过的发展速度的50年。古老的中国在这50年间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中华民族由此开始了伟大的民族复兴。诚然，这50年间也有过失误，出现过挫折。但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正在逐渐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已经强劲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今天的辉煌来自于50年的奋斗，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节

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十一”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共和国 50 周年庆典。

这一天，首都北京秋高气爽，繁花似锦，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真可谓是满城的鲜花，满城的笑脸。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格外雄伟壮观。城楼红墙的中央，悬挂着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是他 50 年前在这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 40 年，却带着无限的遗憾在北京溘然长逝。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他所苦苦追求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在天安门城楼的两侧，有两幅巨大的标语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迈向新世纪”。鲜明地昭示庆典的主题。

广场的上空，飘浮着 34 只大红灯笼造型的气球。两只直径为 7 米的巨大气球，悬挂着五彩缤纷的花篮，象征着 50 年来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余的 32 只气球，分布在广场的四周，象征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广场上，彩旗林立，迎风招展，10 万名少先队员、青年手执红、黄各色纸花，组成红底黄字的巨幅“国庆”字样的图案。

上午 9 时 58 分，在欢乐的迎宾乐曲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健步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主席台。

10 时整，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宣布庆典开始。以往的国庆庆典都是由北京市的主要领导主持，这次也不例外。

在广场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与正阳门间，整齐地排列着 50 门礼炮。庆典一开始，轰鸣的礼炮声响彻天安门上空。礼

炮总共鸣放 50 响，象征共和国的 50 华诞。

伴随着庆典的第一声礼炮，200 名身着橄榄绿武警服的国旗护卫方队官兵，走下人民英雄纪念碑台基，绕过孙中山先生画像，迈向天安门。闪亮的枪刺、矫健的身姿、整齐的步伐，国旗护卫队官兵铿锵的脚步声，与隆隆的礼炮声雄浑交响。在激动人心的 3 分 57 秒钟里，队伍走过了 260 米长的红色地毯铺就的通道，在国旗杆基座前一字排开，面向天安门广场持枪肃立。这时，升旗手从擎旗手手中接过国旗，右手用力一挥，鲜艳的五星红旗立即伸展开来。

顿时，数十万人面对国旗肃立，行军礼、队礼、注目礼，千人军乐团奏响了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气势磅礴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面对庄严神圣的五星红旗，香港特别行政区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梁思谋先生，激动地对新华社记者说：“多少年梦里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每当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就如同听到母亲的召唤。今天到北京参加庆祝伟大母亲的生日，让我刻骨铭心。”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也将升起五星红旗。来自澳门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铨的哥哥何厚焯先生，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首次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到特别激动，香港已经回归，澳门即将回归，‘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深得人心。我坚信祖国统一大业定会圆满完成。”

46 秒钟后，五星红旗升至旗杆的顶端，高高飘扬在天安门上空。

升旗仪式后，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走下天安门城楼，坐上国产红旗牌敞篷轿车，检阅受阅部队。

检阅车驶出天安门，经过金水桥。这时，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上将驱车迎上前去，报告江泽民：“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你检阅！”江泽民命令：“开始！”

军乐团奏响了阅兵曲，江泽民乘检阅车徐徐东去。

这次受检阅的官兵有1.1万余人，包括陆、海、空、第二炮兵、武警、预备役部队和民兵，代表了构成中国武装力量的所有成分。其中，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特警和预备役部队，是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

江泽民在李新良的陪同下，检阅了42个威武雄壮、军容整齐、装备精良、精神抖擞的人民武装力量地面方队。

江泽民站在指挥车上，不时用宏亮的声音对受阅指战员亲切问候：“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首长好！”“为人民服务！”三军健儿齐声回答。

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军部队。

检阅部队后，江泽民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重要讲话。他说：

“五十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十五年前的今天，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阔步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将乘风破浪地驶向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经过五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艰苦卓绝的奋

十五、国庆五十周年大游行

斗，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人间奇迹。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践也充分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康庄大道。”^①

在讲话中，他还简要地阐明了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继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在新的世纪里不断谱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以后，最终完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江泽民讲话结束后，全场响起如雷掌声，广场的背景也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图案。

2. 大阅兵显国威

10时36分，当江泽民的讲话结束后，军乐声再次回荡在天安门上空，气壮山河的阅兵分列式开始了。

这是共和国20世纪最后一次国庆盛大阅兵。

这是一次军威、国威的大展示。

首先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17个徒步方队。

走在徒步方队最前面的是三军仪仗队组成的方队。156人组成的仪仗方队，队员平均身高为1.84米，为所有受检阅方

^① 《人民日报》，1999年10月2日。

队之最。仪仗队员们护卫着鲜红的八一军旗。这是一面无数先烈们的鲜血染红的战旗。从八一南昌起义起，人民军队在这面旗帜引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

10时38分，国防大学方队走过来了。素有“将军摇篮”之称的国防大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也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学府，人民解放军现职90%的高级将领在国防大学接受过培训。

10时40分，海军院校方队像一波波银色的浪花飞舞过天安门广场。

由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成的海军院校方队，是所有徒步方队中参加国庆阅兵次数最多的方队。新中国成立以来举行的13次阅兵，海军院校方队参加过12次。

年轻的水兵方队从大海走上天安门广场，他们的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是所有受阅方队中年龄最小的。

10时43分，海军陆战队方队正步通过天安门广场。这是这支精锐的特种部队首次在国庆阅兵中亮相。

组建于1980年的海军陆战队，是人民海军的五大兵种之一，具有陆地、海上、空中、水下多种作战能力，有着“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的美称。

10时44分，飞行员方队在天安门广场亮相。从开国大典起，空军飞行员每次阅兵都是在空中接受检阅，从天安门广场徒步通过，今天是第一次。

10时45分，通过天安门广场的伞兵方队，由曾参加过10次国庆阅兵的空降兵部队组成。空降兵是现代战争舞台上一个极具战斗力的兵种。我国空降兵部队目前已经完成了在山地、丛林、高原、寒区、海上等各种地形和气候条件下的空降作战训练，具备“随时能飞，到处能降，降之能战”的全方位、全

天候机动作战能力。

10时45分，身着草绿色上装、深蓝色军裙的女军人代表——女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女兵方队的队员全部来自白求恩军医学院。

走在方队前面的两位领队，是一对孪生姐妹——身高1.68米的张薇薇和身高1.69米的张莉莉。孪生姐妹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受阅，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0时46分，首次在国庆阅兵中亮相的武警特警方队，是一支经过特殊训练、配有特殊装备、执行特殊任务的快速反应部队，他们在反劫机、反劫持、反恐怖以及扼制和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行动中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

10时46分，我国新型的后备力量——预备役部队首次在国庆阅兵中亮相。

预备役方队的绿色服装乍一看与陆军方队的服装一样，但在这些预备役官兵的胳膊上都戴有一个明显的预备役标志。他们当中有机关干部、工人、农民，也有私营企业的业主。

10时48分，男女民兵两个方队朝气蓬勃地行进在天安门前的宽阔大道上。

英姿飒爽的女民兵们身着红色制服，头戴红色贝雷帽，分别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十几个单位。身着蓝色制服的男民兵方队，是由首都钢铁公司各个岗位的工人组成的。

徒步方队通过天安门时，那刀切一般整齐的步伐，不论是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为之赞叹不已。

分列式共有17个徒步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他们以1022步、8分30秒的步速，准确地从调整线到达疏散线。其中，从敬礼线到礼毕线96米，不多不少128步，用1分零6秒，与军乐团的阅兵曲配合得一丝不差。徒步方队排面的整齐划一

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横成线、竖成线、斜也成线，正如新华社在报道中所说的：“每个方队都宛若一个整体移动的巨大板块。”

据称，队列的排列面要达到整齐划一，难度极大，世界各国阅兵横排面人数最多不超过20人，而这次阅兵则达到了25人，创世界之最。这不仅因为人民解放军有铁的纪律，更重要的，是官兵们的心里，始终装着祖国的荣誉。

徒步方队之后，战车隆隆，铁流滚滚，车辆方队开了过来，驶向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12亿中国各族人民的检阅。

10时52分，主战坦克方队通过。这种外型美观、性能优越的最新型主战坦克，首次展示在世人面前。这种新型坦克比人民解放军已装备的坦克性能更优越，防护装甲厚，机动能力强，火控系统先进。

10时54分，装甲车方队通过。装甲车方队全由国家新型装甲车组成。

有关专家称，我军装甲兵在未来战争中，坦克作战有步战车、装甲车和各种自行火炮伴随掩护，完全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陆战之王”。

10时56分，火炮方阵过来了。这天参加阅兵的大炮方阵，八个方队由八种火炮组成，包括新型榴弹炮、滑膛炮、加农榴弹炮、火箭炮、高炮五大类，全部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有的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45年12月1日，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装甲兵，但只有缴获的日军坦克，没有装甲车。1949年开国大典时，阅兵式上的装甲车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时，坦克、装甲车都是我国自行研制的，但没有步战

车。今年的国庆阅兵的装甲兵阵容中，不但有坦克、装甲车、步战车，还有各种自行火炮，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实现了质的飞跃。

11 时零 4 分，陆海军导弹方队亮相。

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导弹有：反坦克导弹、地空导弹、舰空导弹、舰舰导弹。

空军导弹方队有两个。方队中的地空导弹是空军导弹部队的新型装备，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够有效地对付高技术空袭兵器。受阅部队是我军惟一参加过实战的空军导弹部队，他们在 1959 年 10 月 7 日开创了世界地空导弹首次击落飞机的战例，先后击落多种型号的国民党军队高空侦察机。

海军的 3 个导弹方队由国产新型舰空导弹、两种新型舰舰导弹组成。今天的海军导弹部队已经具备了海上、水下核反击能力。

陆军的两个导弹方队，由反坦克团的反坦克导弹发射车和防空旅的地空导弹组成。反坦克团和防空旅都是集团军建制部队。陆军导弹部队是由高炮部队发展而来的，这是我军防空部队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11 时零 6 分，由陆、海、空三军航空兵组成的庞大机群，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

受阅的空中梯队由 10 个机种、15 种机型的 132 架飞机组成，是新中国历次阅兵中规模最大的。参加空中梯队的有空军的轰炸机、歼击机、强击机，还有海军航空兵的歼击轰炸机和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

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是我国自行生产的，驻香港部队航空兵配备的也是这种直升机。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我国的空中加油机也在阅兵中首次亮

相。当我国自行研制的两架拖着长长加油管的空中加油机和四架轻型受油机组成的空中梯队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时，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欢呼声。空中加油机的出现，结束了我空军无法为轻型飞机空中加油的历史，表明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已有很大提高。

我国自行研制的高空高速歼击轰炸机“飞豹”，也首次撩开了其神秘的面纱，以700米的高度飞过天安门广场。这种飞机，既可对地面和海上目标实施突击，也可进行空中作战。

随后，国庆阅兵最大机群的直升机空中梯队，从250米的低空飞过天安门。

这次阅兵中的空中梯队，高、中、低空相配套，展示了人民解放军空中力量的飞速发展。

11时零7分，战略导弹部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的常规地地导弹、中程地地核导弹、远程地地核导弹在天安门广场亮相。这是新中国历次国庆阅兵中第二炮兵导弹亮相最多的一次。

第二炮兵部队这天共有四个导弹方队接受检阅。

参加受阅的常规地地导弹是目前我国先进的战役战术导弹，它的特点是反应速度快，打击威力大，环境适应能力强，是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打局部战争的主要兵器。

战役战术导弹是我国最早研制的常规导弹武器，具有机动性好、系统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的优点。

中程地地核导弹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战略核导弹，具有科技含量高、发射距离远、威力大等特点。这种导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水平。

远程地地核导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是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十五、国庆五十周年大游行

由陆、海、空和第二炮兵的坦克、步战车、装甲车、各种火炮、导弹组成的25个车辆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的百米单车时间误差全部控制在0.2秒，距离误差控制在0.02米。世界上其他国家阅兵时最高水平是百米单车时间误差在0.5秒，距离误差在0.3米。这说明我国的这次阅兵比世界最高水平还高出一截。

不但如此，空中歼击机、歼击轰炸机、强击机、轰炸机、直升机等9个机种、15个机型的132架飞机组成10个空中梯队，在地面导弹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从不同的空域分秒不差地同时临空，这种受阅水平也为世界所罕见。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50周年大庆，总共举行了13次国庆阅兵，其中从开国大典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年年国庆节都有阅兵式，总共进行了11次阅兵。进入六七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1984年国庆35周年之际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1999年的国庆阅兵是新中国的第13次国庆阅兵。

与以往国庆阅兵相比，这次阅兵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受阅军种多，武器装备全。受阅的部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海、陆、空三军外，陆航、海航、陆战队、特警和预备役等，都是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从常规武器到战略导弹，我军的许多重要装备都展示在阅兵式中。

二是装备新，且技术含量高。这次阅兵展示的大型装备中，首次公开亮相的新装备占95%以上，除了“苏-27”飞机和“C300”地对空导弹外，其他装备都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有的新式装备如第三代坦克、第二炮兵四种型号的导弹、空中加油机等，技术水平可以与国外同类先进武器相媲美。

三是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参与受阅的部队达2万余人，

其中正式受阅部队 1.1 万人，地面负重装备 400 余台，各种飞机 132 架。17 个徒步方队、25 个车辆方队和 10 个空中梯队多层次、立体化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场面蔚为壮观。这样空前的阅兵规模，在世界各国中也是少见的。

四是参阅部队都是精良之师，装备先进，技术过硬。受阅部队以北京军区为主，同时选调了济南、南京、兰州等军区的部队，大多是立过战功的精锐之师。参加的人员也是经过严格的体能测试等各种检验而筛选出来的，无论是部队作风，还是个人素质都非常高。

为了搞好国庆阅兵，受阅部队集中在北京沙河机场阅兵村进行严格的集训。进入 6 月份，官兵们把汗水湿透的军装和干军装分别用秤称，湿军装要重出一公斤。坦克兵一连几个小时在五六十摄氏度的坦克中训练；徒步方队的官兵在四五十摄氏度的训练场上踢正步，每个人都晒掉了几层皮，脚底长出了层层老茧。

这次阅兵，充分展示了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形象，体现了人民解放军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信心和决心。

3. 世纪大游行

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后，在庄严的《歌唱祖国》乐曲声中，群众游行队伍精神抖擞地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首先出现的是由“国旗”、“国庆年号”、“国徽”三个方阵组成的仪仗队伍。领头的国旗方队由武警北京总队特警支队的 1080 名官兵组成。方队的中央是一面长 25 米、宽 17 米的巨幅国旗，国旗的四周由棕黄色的花束组成宽 5 米的镶边。国庆年号方队中巨大的“1949”、“1999”字样，让人感叹共和国

50年的沧桑巨变，巨大的国徽闪发出金光，象征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国庆年号方队和国徽方队分别由500人和1371人组成，他们都来自武警北京总队训练基地的官兵。

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乐曲声中，主题为“开国·创业”的游行第一部分拉开序幕。

在“创建新中国”的方队中，装饰八一勋章图案的“红军长征”彩车反映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困苦；饰有独立勋章的“延安宝塔山和抗日军民”的彩车上，巍巍宝塔傲然屹立，抗日军民的英勇气概栩栩如生；饰有解放勋章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彩车，把解放军战士“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壮举刻画得惟妙惟肖；在一辆耸立着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巨幅画像的彩车旁，簇拥着身着红色服装的腰鼓队和身着黄色连衣裙、手持葵花道具的女学生，表达了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亿万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情怀念，寓含着新中国的成立来之不易。

随后的四辆彩车分别以毛泽东的四句诗词为主题，它们是“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展示新中国在创业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在第四辆彩车上，还有共和国创业时期涌现出来的劳模和解放军英模代表。

在这几辆彩车之后，是由195头南北狮子组成的“东方醒狮”方队，这些活灵活现的狮子边走边舞，表明东方雄狮已经觉醒。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全新时代。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因此有人又将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称为邓小平时代。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的中国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二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此，国庆游行的第二部分“改革·辉煌”作了重点展示。

伴随着《春天的故事》这人们熟悉的旋律，“改革开放”四个大字出现在广场背景图上。身穿绿色衣裙、头戴粉红花冠的女青年，以轻盈的脚步拉开了群众游行的第二幕。在这春天的色彩中，有一幅巨大的邓小平画像矗立在彩车上，总设计师正在向广场上的人们微笑，象征着共和国历史上那次非凡的转折。

这次国庆大典最大的彩车驶入了广场，彩车上蔚蓝色的大海波涛滚滚，一艘巨轮正在启航，写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字的红旗迎风飘扬。紧随其后的是写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等标语的五辆彩车。

接着出现在广场上的是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成就的几个方队。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9亿中国农民创造了空前的奇迹，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水利方队首当其冲。以“高峡出平湖”的世纪工程——三峡工程造型为代表的水利彩车和一艘乘风破浪的农业巨轮并驾齐驱，牵引出一片由京郊3986位农民组成的硕大“丰”字。

他们身着传统民族服装，高呼“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兴修水利为国为民”，挥舞着金黄和翠绿相间的巨型扇子。整个场景看似麦浪涌动，寓含着丰收的原野，以农业科技为先导的农

业正向着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巨大的“工”字型队伍簇拥着6辆彩车驶向天安门广场，这是由4400名工人组成的工人方队。为了这次游行，有的新婚夫妇没度蜜月就双双加入方队，有的为确保游行主动推迟原定“十一”的婚期，有的将孩子托付给他人照料，夫妻双双投入游行训练。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国庆游行中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豪情，走出改革开放的风采，走出广大工人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

在农民、工人方队之后，是卫生和环保方队。队伍中“保护环境”的彩车上巨大的地球仪在转动着，上书“只有一个地球”几个大字。环保方队出现在国庆游行队伍中，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见党和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重视。

在“改革·辉煌”的游行队伍中，有几个方队显得格外多姿多彩。其中有：

最漂亮的方队：牡丹方队。方队由1827名身着绿色长裙、手持正反两面红黄花道具的女青年组成，簇拥着一辆寓示着喜庆富贵的牡丹花车。彩车花瓣层层开放，开到最后中间现出一个美丽的花仙子。

最亮丽的方队：时代风华方队。1054名男女青年身穿由银白色光新材料制成的现代服装，手持金银色折扇，边跳现代舞边行进。

“成分”最多样化的方队：首都居民方队。方队中有包括来自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界的人士，有由残疾人组成的轮椅队，有居民自行车队，有个体私营企业代表，有街道工作人员等等，他们簇拥着巨大的菜篮子彩车和计划生育彩车。

最浪漫的方队：新婚夫妇方队。93对新婚一年之内的年

轻夫妇，男着西装，女着婚纱，手持百合和康乃馨等花束，使游行活动更添了几分喜庆。

文艺队伍的方阵由 5000 名北京职业中学的文艺骨干和人们熟悉的演员组成。在行进的过程中，他们载歌载舞，其中先导方队全由男青年组成，他们身着湖蓝色服装，手持方伞道具，通过亲密相接没有缝隙的方伞，在彩车四周组成变化的风景，从高处看，像湛蓝的天空，上面白云飘游，又似无边的海洋，浪花翻动，彩车如同在大海上航行。文艺大军中有十辆彩车，彩车上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在表演，表现电影、电视、戏曲、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成就。

文艺队伍的最后，9 条巨龙在狂舞。巨龙身长 50 米，象征共和国 50 华诞；24 洞节，寓示一年 24 节气风调雨顺；2000 片鳞片，表示中华巨龙跨过历史，腾飞入新世纪。225 名重庆铜梁汉子，身着红黄两色民族服饰，9 条龙龙头翻滚，龙身起伏，龙尾摆动，翻江倒海，呼啸而来。

体育大军紧随其后，许海峰、邱钟惠、邓亚萍、王军霞、李小双、伏明霞等 44 名在世界各项体育比赛项目中获得冠军的新老运动员，出现在体育彩车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三大赛事上共获得了 1237 个世界冠军，打破了 982 项世界纪录。80 年代女排的三连冠，曾大大振奋了中国的民族精神。

在群众体育方队中，由少年儿童组成的“轮滑队”和“独轮车队”在队伍中来回穿梭，以滚动式通过天安门广场，格外引人注目。

体育大军之后是庞大的科技、教育方阵。队伍中，由“1”字变型组成的高塔型彩车，突出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正负电子对撞机抽象模型、DNA 双螺旋结构模

型和数理化等基础科学的标志，展示着中国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

7380名首都各高校的大学生迈着欢快的步伐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尽情地挥舞着手中的各色校旗，广场上呈现出一片斑斓的色彩，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在教育方队中，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教授，他便是来自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吴麒。吴麒听说学校要组队参加游行，几次找到系总支要求参加。他动情地说：“我是1949年毕业留校工作的。50年前我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今天我要再去广场欢庆祖国的50年大庆。”他的请求终于得到了批准。

“世纪·腾飞”是游行第三部分的主题。

4500名各族群众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簇拥着江泽民在十五大上作报告的巨幅画像和十五大报告单行本的模型，挥舞着2米长的桃红色彩带，健步通过天安门广场，游行群众不断高呼着“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同心同德，再创辉煌”的口号。

参加50周年国庆的彩车共有96辆，其中90辆参加白天的游行，另外6辆在国庆晚会上亮相。这些彩车浓缩了共和国50周年的建设成果。

在群众游行的第三部分，共有40辆彩车，其中有34辆是以往国庆游行没有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台湾的彩车方队。为了向世界、向全国展示自己的风采，各地对制作彩车十分重视，都是通过专家论证、投标中标，甚至是省、区、市领导通过办公会议才确定式样的，充分体现了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建设成就和人文、自然风光。云南省的彩车以一只会开屏的大白孔雀为其特征，四川省的彩车是一只憨态可掬

的大熊猫，黑龙江省的彩车上是一条巨龙，浙江省的彩车上是一只彩凤，海南省的彩车满载热带瓜果，安徽省的彩车上是黄山迎客松，革命老区江西省彩车顶部是一只特大的瓷瓶，车顶上书写“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的省市则在彩车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在上海的彩车上，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标志性建筑一目了然。

港澳台彩车在游行队伍中颇为抢眼。香港特区的彩车设计富有现代感，彩车上搭建了最能代表香港特色的建筑，展示了香港回归、贯彻“一国两制”的伟大成果和香港回归后繁荣稳定的面貌。澳门彩车以牡丹花、荷花为主体造型，彩车上矗立着澳门回归祖国倒计时牌。台湾彩车以山峦与彩虹的巧妙结合象征统一大业的美好前景，表达了台湾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神圣主题。

游行队伍的最后是少年儿童方队。在一辆巨大的星星火炬彩车之后，是一幅写着“时刻准备着”字样的巨大标语牌，随后是人数众多的鼓乐队。8640名少先队员组成了一幅长达108米的向日葵图案。孩子们高喊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掌握本领，建设祖国！”的口号。将少年儿童方队放在队伍的最后，表示50岁的共和国依然如同东方朝日，永远年轻；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继往开来，后继有人，祖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手持5万只气球的少先队员，簇拥着“奔向未来”的大型彩车，来到天安门城楼前，彩车上，1999年年号模型中间，一艘太空船穿行而出，飞挂半空，两名少先队员在飞船上摇动花束，这时，5万只和平鸽同时飞过城楼，孩子们放飞手中的气球，奔向天安门城楼，涌向金水桥。孩子们在欢呼，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金水桥畔，广场上，

汇集成了花的海洋、歌的海洋，游行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此时，时针指向了12时零5分。

在游行队伍行进中，广场上的背景不断变换出“祖国万岁”、“改革开放”、“科教兴国”、“奔向新世纪”、“民族团结”、“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和平发展”、“祖国明天更美好”等字样和图案。鲜艳的服装，自豪的笑脸，别致的彩车，独特的模型，装点得天安门广场如同彩色的河、流动的画。

这次群众游行有三大特色：一是改变以往国庆队伍行列排列、板块拼接的模式，尝试以共和国创立、发展的50年历史为线索，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辉煌业绩为内容进行设计，犹如书写一部共和国的编年史，使整个游行风格统一、结构严谨、一气呵成；二是注重发挥广场背景的作用，把阅兵、群众游行与广场背景融为一体，互为补充，深化表现主题；三是注重音乐在游行中的线索作用，选用最为人民熟悉、最能体现各个时代特点的音乐精品作为背景音乐的主旋律，贯穿始终，凸显游行的时代脉络。^①

4. 为了那辉煌的一刻

10月1日国庆大典的游行活动，从上午11时开始至12时零5分结束，总共才一个小时的时间。可是，为了这辉煌的一刻，参加游行的各界群众，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训练，付出了辛勤和汗水。

整个游行准备工作从4月份就开始了，北京市为此成立了国庆群众游行总指挥部，市委副书记于均波担任总指挥。确立

^① 此次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引用和参阅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

50周年国庆大典有游行活动的内容后，第一件事便是如何抽调数十万群众参加游行训练，而训练只能是业余进行，且无报酬可言。但是，总指挥部将参加游行的人数落实到各区各单位后，广大群众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国庆游行，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面。

北京第十一中学校这次共有400名初一的中学生参加国庆游行训练。初一的马蒂诺在参加游行训练前，不慎将门牙撞断了一颗，学校考虑到他有伤，再加之他从小在国外长大，最近刚从国外回来上学的特殊情况，就没有安排他参加游行训练。马蒂诺得知后，先是自己找老师百般争取，没有说动老师，接着便请奶奶——一位著名的老教授出面“四处活动”，终于如愿以偿。由于名额有限，一些初一的同学没有被选中，只好委屈自己当替补队员，虽是替补，但他们同样热情很高，每次训练时都在旁边“监视”，一旦发现正式队员中有体力不支者，就立即要求替补。^①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游行训练从4月下旬就开始了。

10月1日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国旗、国庆年号、国徽三个方队，这三个方队有3000人，他们是来自武警北京总队的官兵。

拉开群众游行序幕的是国旗方队，组成这个方队的是武警北京总队特警支队的1000余名官兵。这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官兵们不仅有枪响靶落的绝技，也有飞檐走壁的真功，而这次游行训练的难度，却不亚于他们平时的军事训练。

按照游行总指挥部的要求，国旗方队以正步通过天安门，

^① 《北京晚报》，1999年6月7日。

十五、国庆五十周年大游行

行进中高举 10 条红绸条幅，组成那面长 25 米、宽 17 米的巨幅国旗，国旗四周由棕黄色花束组成。国旗方队通过天安门的时间是 7 分 50 秒。

为了走好这 7 分 50 秒，特警支队的官兵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艰苦训练。

按理，特警官兵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尽管如此，支队接到任务，针对部队是以正步通过天安门广场，支队训练科提出，要确保圆满完成任务，参加训练的人员的身体素质必须达到能连续正步不停留地走完 2000 米全程。为此，特警战士每天进行五公里的越野训练。正步走是各种步伐中最累的一种，为使横排面手臂、踢脚的脚尖成一条线，每个队列的两侧各由两名战士上下拉两根绳，踢腿、摆臂必须分别触到两根绳，直到动作定型定位。为做到腰杆挺拔，战士们自制了“T”型木质十字架，在训练时别在腰上，于是身体上下成为一体，腰肢不能动弹，由此练到腰杆笔直、动作规范。

在组成国旗时，所有举旗人员用力必须均匀，否则国旗会发皱，而国旗又是由 10 个条幅组成的，条幅间不能有间隙，因而在整个游行过程中始终要牢牢捏合住。在表演时，1000 余官兵有 70% 是在旗下面，双手要一直举着国旗。这看起来容易，但真要做起来就不易了。训练时，战士们托举着替代国旗的红绳一遍又一遍地在晒得发烫的水泥地面踢着正步，长时间机械地举着，双手发酸发疼。由于训练强度大，加上天气炎热，官兵们的衣服被汗浸透，干后上面结成了一层厚厚的盐碱。^①

组成年号方队的武警官兵训练的艰辛，也不亚于国旗方队

^① 参见《北京日报》，1999 年 9 月 24 日。

的官兵。按照行进方案，要求步幅为每秒 60 厘米，步速为每分钟 116 步，可战士们的习惯步伐是步幅 75 厘米和每分钟 105 步。初走之时，战士们像不敢迈步的老太婆，深一脚浅一脚，整个方队前后摇摆不定。为了达到训练要求，战士们在训练基地的主路、辅路及所有的房前屋后拉出 60 厘米的步幅线，用白漆标画，看着步幅线走，走一步看一步，查距离、找感觉，就连去吃饭、上厕所的路上，都是踩着线走，很快就达到了步幅要求。^①

在盛大的游行队伍中，现代化小区方队、时装表演方队和首都居民方队颇具特色，而这三个方队的训练场景也很感人。

《北京日报》1999 年 9 月 24 日在一则报道中有如此记载：

在首都居民游行队伍中，轮椅队员、残疾人黄健宏单腿高位截肢，行动十分不便。他家住大兴县，交通也不方便。为准时赶到地坛公园参加训练，每次他都要一大早起床，坐火车到丰台，然后搭车或由其他队员开车接到训练场地，从没有迟到过。轮椅车要靠手推，黄健宏的手都磨起了厚厚的茧。48 岁的刘丽英是个体私营游行队伍中年龄最大的。5 月份去日本看儿子，签证 3 个月，原本 8 月初回国。当得知开始训练的消息后，她匆匆告别爱子，5 月 26 日便赶回北京，28 日就参加了训练。她说：“母子团聚机会很多，但国庆 50 周年庆典只有一次，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住在门头沟区潭柘寺和戒台寺的僧人，为不误训练，凌晨 3 时就起床，作完法事后，再赶到训练场地。

现代化小区游行队伍队员中，年龄最小的 1 岁多，最

^① 参见《北京日报》，1999 年 9 月 23 日。

大的72岁，但大家都认真训练，一丝不苟。来自建国门医院的马慧媛家住金鱼池，是三口之家游行队伍中离训练场地最远的。她说：“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能参加国庆庆典，我感到非常幸福。”王晨健是急诊室护士，家有一个不足两岁的孩子，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丈夫开出租车。她克服重重困难，做到家庭、工作、训练三不耽误。6月7日，烈日当空，老年夫妇队伍参加首次合练。训练从早8时至10时30分，老同志只在中间休息几分钟，其余时间一直站立、走步，没有人叫苦、叫累。同一天，新婚夫妇队伍也举行训练，和平里医院的吴阳抢救完病人刚从手术台下来，连饭都没顾上吃，就直奔训练场。

时装表演游行队伍由东城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和北京第61中学组成。家住通州、大兴、门头沟等地的同学，有的家长开车送，有的自己搭车，保证了训练时间。职教中心学生贾晓凤、王晓滨、韩斌博等开始编队时定为三角大队标兵，后变动调入三角方队，但他们毫无怨言。“只要参加国庆游行，安排什么位置都行。”

组织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也为训练付出了许多心血。在一次训练中，东城区个体私营协会办公室主任杨世芬为保证参训人员准时集合，凌晨4时就起床，5时准时呼叫队员。8月28日夜间广场合练，29日凌晨2时，残疾人队员刚回到集结地，东城区残联理事长孟惠莲就亲自为大家准备好一顿可口的夜宵。

在50周年大庆游行活动中，当近2万名中小学生和随队老师组成的少先队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游行达到了最高潮。当你通过电视看到广场上5万只彩色气球腾空而起，无数的花环在金水桥前欢呼跳跃时，可曾想到，为了这一刻，这些

可爱的孩子们付出了多少辛勤与汗水。

这些孩子，大的13岁，小的才9岁，平日在家里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被父母视为心肝宝贝的独生子女。往常学校组织郊游，家长都要千叮万嘱，为他们准备这准备那。而游行训练不但时间长、难度大，而且还要进行为期一周的封闭训练，这些孩子行吗？

4月份开始训练之时，指挥者在台上发号施令，孩子们在台下窃窃私语，连向左转向右转也转不好，就更不要说组成整齐的方队了。为此，北京市在各中小学开展“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主题教育活动，以此激发孩子们爱我中华、兴我中华的爱国热情，进而转化为刻苦训练的动力。

为提高参加游行的学生的体能，丰台区各学校组织学生进行爬山比赛、夺旗竞赛，学生们在每次训练之后还要围着200米跑道跑六七圈。宣武区游行分指挥部建立了学生身体状况监测制度，校医随训，确保参加游行的学生体质全部达标。

7月、8月两个月，北京出现几十年来罕见的高温，但训练一直按原计划照练不误，许多孩子脸上、身上长满了痱子，一个个“白雪公主”被晒成了“黑煤球”。这些，孩子们都挺过来了。通过训练，他们的体能增强了，组织纪律性也增强了。8月28日，全市游行群众进行合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列队处是一大片积水，当指挥老师命令原地坐下时，同学们“扑通”一声全坐在水里，没有一人有半点犹豫，因为他们已将“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的信念扎根心中。

在10月1日上午的庆典活动中，10万中小學生用彩球为庆典活动变换出了23种背景图案，使整个庆典活动更为热烈、隆重。

这么多的人，如此多的图案，要将此组织好确非易事。为

此，来自北京8个城区的151所中学和122所小学的10万中小學生，从4月开始，就练起站功，每次训练都是一站就是几小时。而设计图案的专家们，为了确定这些图案，耗费了230个日日夜夜。8月7日，第一次游行训练开始前，负责背景图案的4位专家，布置场地，在广场上贴不干胶、草地上打点、马路上打号，观看合练效果，连续36小时没有合眼。

国庆游行这一天，90多辆彩车在游行群众的簇拥下通过天安门广场，驾驶这些彩车同样不简单。彩车有的长达27.8米、宽7米、高15米，没有反光镜，左右也没有视窗，只能通过前面的小口看方向。开彩车的司机，不但技术要求过硬，而且要有五年以上大型货车的驾驶经验。为了选好这些司机，不少单位把安全驾驶百万公里作为选人的重要指标，并且进行盲开千米的训练。在驾驶彩车前，被选中的司机要驾驶长、宽、高度与彩车相同的训练车，训练车驾驶室前后、左右的车窗都被蒙上，司机全凭感觉往前开。经过反复的训练，游行这一天，彩车十分顺利地随着游行队伍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群众游行从4月份开始训练，至6月下旬，以增强体能为目的的作风纪律、意志耐力、配合协调、精神风貌等基本训练完成，此后进入大规模的方队合练。8月7日，游行群众在天安门进行第一次合练。8月13日，在离国庆还有50天之际，北京市国庆群众游行总指挥部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各级指挥人员和游行群众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提高认识，党团员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巩固思想动员和训练成果，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圆满完成任务。9月10日，游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第二次合练。

为了使几十万群众在游行时顺利通过天安门广场，游行总指挥部为此作出了一系列的严格规定：

规定行进速度。仪仗队每分钟为 80 米，体育大队为 87 米，文艺大队为 63 米，少先队和农、工、科教、居民队伍为 70 米。

规定时间。各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为：仪仗队 4 分、农业队伍 3 分 10 秒、工业队伍 7 分 30 秒、科教队伍 5 分 30 秒、居民队伍 1 分 20 秒、体育大队 7 分 30 秒、文艺大队 13 分、少先队 7 分。

规定模型尺寸。为确保速度，队伍中携带的彩车模型和大型标语规定长不超过 10 米、宽不超过 6 米、高不超过 5 米。

严密编队。游行方队以横排面编队，每横排为 100 人，宽度 56 米，前后排之间距离行进时为 1 米一排，身高右低左高。全部游行队伍共编为 67 个方队。

设立标兵。在每个方队的前 3 排、后 3 排和中间每隔 10 排设横排标兵；每横排标兵中的第 1、第 21、第 51、第 81 和第 100 人为纵向标兵，每个标兵必须沿着事先在天安门前马路上画好的标兵基准线前进。

设立计时站。在东单路口等 7 处设立计时站，记录各种队伍的头尾通过的时间，与计划时间比较，及时调度指挥，确保所有游行队伍都按照规定时间通过天安门。^①

要做到这些规定，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在国庆大典前半年的时间里，参加游行活动的几十万群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分练、合练，从而保证了国庆游行的顺利进行。他们为了展示共和国的风采，付出了许多、许多，但无怨无悔，因为他们为能展现共和国半个世纪的辉煌而自豪。

^① 见《中国经济时报》，1999 年 9 月 27 日。

主要参考资料

〔1〕《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大公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半月刊》、《新华月报》等报刊相关材料。

〔2〕郭德宏主编：《风云七十年》（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李家骥：《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朱育和等主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凌志著：《1949：大开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庄严的庆典——国庆首都群众游行纪事》，北京出版社1996年出版。

〔8〕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第九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9〕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1995），中

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

〔10〕《中共党史资料》、《北京文史资料》有关文章。

〔11〕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3〕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14〕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15〕（英）彼得·琼斯等著：《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

〔16〕（英）克莱尔·霍林沃思著：《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中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17〕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18〕陈扬勇著：《苦撑危局——周恩来在 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19〕司马东去著：《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年版。

〔20〕马齐彬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21〕《各族人民无限信赖华主席》，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22〕《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2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以来历年版。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以来历年版。

(桂)新登字 01 号

丛书策划 曹光哲

责任编辑 李庭华 郑维宽

责任校对 陈红燕 韦秀琼

红色人流

罗平汉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1.875 印张 295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1 月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4016-4/D·556

定价:18.00 元

策 划 曹光哲
责 任 编 辑 李庭华
封 面 设 计 李筱茜
郑维宽

黑匣子丛书

ISBN 7-219-04016-4



9 787219 040164 >

ISBN 7-219-04016-4/D·556

定价：18.00 元